

上
篇
俄
国
政
党
制
度
的
形
成

第一章

俄国政党产生的历史条件

一、政党的概念和西方政党的产生

“党”这一概念源于拉丁文 *pars* 一词，原来的含义为“一部分”，后来表示由共同思想和利益联合起来的人们的有组织的团体。政党是政治性质的组织，代表某个社会阶级或社会阶层的利益，联合这些阶级或阶层中最积极的代表人物去实现既定目标。政党是社会中间阶级或阶层积极分子的正式组织，多数情况下以进行政治斗争和夺取政权为目的；政党通常具有自己的纲领、章程和其他纲领性文件。纲领阐述政党的目标和任务，达到目的的手段和方法；章程阐述党的结构、地方组织、中央领导机关和出版机关、党员的权利和义务。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政党”概念和定义问题上最重要的是阶级原则，即每个政党都应该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代表某个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虽然现在有些政党宣布自己是非阶级

的，具有全民性质、全人类性质，但是实际上它们仍然代表某一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利益。

政党这种政治组织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政党的产生需要有相应的客观和主观条件。最重要的客观条件是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水平。在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时期，没有政党存在。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强化专制君主制度，不仅剥夺被统治阶级的结社自由，也不允许本阶级的成员享有结社的权利。政党通常是在人类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资本主义产生和确立的时代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是雇佣劳动制。为建立和发展这种制度，资产阶级要求有平等地剥削劳动力的权利，即所谓的“自由”、“平等”。这就要求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教神权制度，实行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制。这种保证剥削者享有民主的制度，不仅表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等机构采取普选的形式，还表现在资产阶级内部各个阶层和集团都有政党组织，通过议会等机构参加国家管理，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主观条件是社会上的先进分子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理想。历史经验表明，一个阶级、阶层、集团的要求往往并不是由他们的直接代表首先意识到的，而是由其他阶级、阶层、集团的代表，由那些同自己的出身决裂的有教养的人首先意识到的。这就是知识分子。在大多数情况下，正是他们成了党的组织者和领袖。

西方党派和政党组织的出现是同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同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同议会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最早出现的是资产阶级政党，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英国（如 17 世纪末英国国会中的辉格党和托利党，19 世纪 30 年代以后逐渐演变成保守党和自由党），18 世纪在北美争取独立的斗争也出现了类似的政党并于 19 世纪演

变成民主党（1828年）和共和党（1854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有吉伦特派、雅各宾派、斐扬派等等。

西方政党活动的主要舞台是议会和市政机关，它们的主要目的是争取选票，扩大政治影响，最终争取掌权。为此它们不惜采用各种手段：从提出崇高原则到进行蛊惑宣传，从诚实竞争到直接作弊、诽谤政治对手。各政党之间的尖锐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各阶级和社会阶层之间的斗争。列宁曾指出：“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①虽然这种竞争、斗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它最终促进了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促进了社会、政治和民族问题的解决。与此同时，西方政党大都是公开活动，有许多机关刊物，在本国社会生活中有很大影响。相对而言，政党的数量并不多，党的纪律也不特别严格，纲领和思想原则内容非常广泛，弹性非常大。政党的面貌也受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即使是西方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面貌同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党组织也有很大区别。

二、俄国政党的分类

俄国历史上曾存在许多形形色色的政党，如何把它们分类，是研究这些政党活动和相应时期历史进程的重要条件。一般情况下，研究人员根据政党的社会基础、政治纲领、战略和策略原则对其进行分类。在对政党进行分类时不仅要考虑政党的宗旨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27页。

和任务、党的社会成分、战略、策略、宗教观、对当代迫切问题（如土地、财政、工人、民族等问题）的看法、党的政治领导人（领袖）的政治行为动机，还必须考虑到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各政党之间的关系。

列宁和马尔托夫等政治活动家以及俄国许多政党史的研究学者对这个问题都非常重视。由于所依据的原则和标准不同，出现了不同的分类法。

列宁认为，分类的基础只有一个原则即阶级原则。早在1900年他就写道“确定对待各种政党的态度”，只有根据对它们所作的科学分析，即阶级分析才能做到”。^① 1912年他又写道，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指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是向人民解释，“左右这个或那个政党的是哪些真正的切身利益，躲在这个或那个招牌下的是社会上哪些阶级”。^② 列宁认为，对于俄国政党来说，阶级原则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国内政治斗争乃是阶级斗争的表现。阶级原则还意味着客观上必然存在对立的政党、对立的思想和领袖。列宁在《俄国政党的分类尝试》一文中对俄国政党作了如下分类：“（1）黑帮；（2）十月党；（3）立宪民主党；（4）劳动派和（5）社会民主党。”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作了如下划分：觉悟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激进的或激化的小资产阶级的（首先是农村小资产阶级）政党，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反动资产阶级政党。^③ 七八年后列宁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和《俄国的政党》两部著作中又重复了这种分类。苏联史学界曾认为，列宁把所有政党分为四类：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地主君主派的。也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1页。

② 同上第21卷第143页。

③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22、26页。

有人把资产阶级政党分为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和反动资产阶级政党，但是严格地讲，列宁没有作过这种划分。这种划分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归纳的。

马尔托夫对政党的分类有所不同，他把俄国政党划分为：反动保守派政党；温和保守派政党；自由民主派政党和革命派政党。他的分类法所依据的是政党对现存国家制度的态度。

苏联和俄国史学界有时也按三个阵营来划分俄国政党：执政党（地主君主派和资产阶级的保守派政党）；自由主义反政府派（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革命民主派政党、小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也有人根据合法程度划分：公开的、秘密的和半公开的政党。如此等等。

近年来，俄国有些学者认为阶级原则并不是俄国政党分类的唯一标准，还应该考虑到民族、道德伦理、宗教、地理等因素。政党分类的基础应该是诸因素的综合，每一个因素都起一定的作用。

但是就本书所研究的历史时期而言，尤其是就重点研究的俄国几个全国性政党而言，列宁的阶级原则无疑是科学的、正确的，因为这些政党明显带有阶级烙印，都明显代表某个特定的阶级或阶层。

三、19 世纪下半叶俄国的改革

1861 年 2 月 19 日，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关于在俄国废除农奴制的诏书。沙皇政府由于害怕有可能爆发革命，希望通过改革使国家经济和政治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列宁曾指出：“2 月 19 日的法令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代

替农奴制的（或封建制的）生产方式过程中的一个插曲。’^① 这是一次“由农奴主实行的资产阶级的改革”。^②

那么，改革的资产阶级内容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从前属于地主的农民被宣布为法律上的自由人，从奴隶状态变成有某种权利的人；地主已经不能再支配他们，干涉他们的私生活。农民还获得了一般公民权，可以以法人身份行动，签订合同、起诉、经商、务工、拥有动产和不动产。农民摆脱对地主的依附后成了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现在开始依附于城乡资本。这就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861年改革是由国内的统治阶级搞的。地主政府进行改革的目的是保存自己阶级的政治经济统治地位和自己的特权。因此“伟大改革”是农奴制的改革，而且不可能是别的改革，因为它是由农奴主实行的。”^③

根据《1861年2月19日条例》，农民可通过赎买获得非常有限的土地。同时地主保留了“对从前他拥有的土地的所有权”。由于“解放”，农民被迫“赎买”土地，赎金往往高出土地实际价格的4—5倍。而且农民往往被迫迁到“沙地”上去，地主得到的都是好的土地。地主的土地像楔子一样插在农民土地中，从而使名门贵族们更容易盘剥农民。与此同时，农民并没有成为他们的份地的所有者，他们购得的全部土地都是农民村社的财产。村社是全部份地的所有者，份地交给农民暂时使用或轮流使用。未经村社同意，农民不能支配自己的份地，不能买卖或转让。农民想退出村社是极其困难的。沙皇政府把从封建时代继承下来的土地村社变成了管理改革后的农村的基础之一。统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163、174页。

② 同上第174页。

③ 同上。

治阶级认为，村社能够保证宗法制基础不被破坏，能够保护俄国免遭无家可归的、贫苦的无产者的侵犯。

改革后，农民的生活并未得到多少改善。很多人不是没有牧场，就是没有草地，不是没有森林，就是没有饮马场。农民在“解放”以后也仍然是“卑微的”等级，仍然是纳税的贱民、平民，他们受着地主委派的长官的摆布、横征暴敛、鞭笞、殴打和凌辱。“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农民像俄国的农民这样在‘解放’之后还遭到这样的破产、陷于这样的贫困、受到这样的欺侮和这样的凌辱。”^①可是，农奴制的崩溃震动了全体人民，把他们从几百年的沉睡中唤醒，教会他们自己去寻找出路，自己去为争取完全的自由而斗争。

农奴制崩溃后，俄国封建生产关系逐渐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社会经济结构中发生的变化必然会引起社会政治（国家和法律）制度发生相应的变化。沙皇政府为了保护贵族地主的权利和特权，在被迫进行管理、司法、教育等方面的资产阶级改革时，千方百计使俄国专制警察制度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

19世纪60—70年代农奴制度废除后资产阶级改革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下进行的。“谁对‘伟大的解放’宁愿保持缄默而不愿说出愚蠢或虚伪的赞美之词，就判谁服苦役；谁对政府的自由主义赞不绝口，对进步的时代兴高采烈，就让谁来进行改革（对专制制度和对剥削阶级无害的改革）”^②

资产阶级改革的主要内容有地方自治改革、城市改革、司法改革、军事改革。

（列宁全集 第2版第20卷第141页。

② 同上 第5卷第25页。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俄国的逐步确立，旧的行政管理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势在必行。欧洲所有国家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都伴随着人民参加地方管理。改革前的地方管理是一种等级制地主阶级的和官吏官僚主义的管理。地主管理农民，贵族官吏保护地主对农民的无限统治权。沙皇政府同意实行地方自治和用资产阶级原则即由民选机构来管理地方经济和政治生活是迫于形势压力。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也是为了在改革过程中尽量维护统治阶级和贵族集团的利益。

1864年1月1日(13日)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关于省和县地方自治机构条例》，开始进行地方自治改革。根据该条例，建立由选举产生、拥有有限权利的省和县地方自治机关——地方自治会议及其执行机构地方自治局。没有乡级地方自治机关，也没有全俄地方自治会议。省和县的地方自治机关每三年选举一次，受严格的财产资格限制。选民分为三组：第一组选民是县的土地占有者，即拥有200俄亩以上土地的地主、拥有1.5万卢布以上不动产的人士，以及受拥有200俄亩以上土地的地主和僧侣委托、本身财产资格不足要求的小土地占有者；第二组选民是城市有产者，年收入6000卢布以上的工商业者以及按城市大小拥有500—2000卢布不动产的人士；第三组选民是村社代表，其中主要是农民，地主贵族和僧侣有时也以村社代表的身份参加这个选民组。按照这个办法进行选举，最大的资产阶级有1/3的票数（尽管属于这个阶级的居民还不到1%）中等的资产阶级拥有1/3票数（尽管属于这个阶级的居民可能只有10%）而所有其余人口，也就是90%的居民，一共只有1/3的票数。在县地方自治会议代表中，贵族和官吏几乎占1/2加上资产阶级就几乎占2/3而农民则只占1/3多一点。在选举省地

方自治会议代表时已经不是由居民直接选举而是由县地方自治机关选举），事先就保证了资产阶级占多数，而在资产阶级中又是土地占有者占多数。在省地方自治会议里，贵族和官吏已占4/5以上，而农民还不到1/10。在地方自治局里，地主的优势就更大了。从地方自治机关的捐税来看，情况更加明朗。19世纪70年代末，每俄亩地主土地的地方自治机关赋税平均为6.2—6.5戈比，而每俄亩农民土地平均为13.9—14.8戈比；1897年，每俄亩官员土地的地方自治机关赋税为17.3戈比，而农民土地为21.8戈比。^①地方自治改革也像在农民改革中一样，旧秩序仍然占着上风，地方自治实际上仍旧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的贵族自治。

第二项地方自治改革是根据1870年颁布的《市政自治法规》进行的改革。城市建立杜马和自治局，在城市自治机构中，保证富裕的资产阶级有大部分选举权，绝大多数城市居民完全无权参加选举，城市自治机关只负责解决一些经济问题，如城市规划、卫生保健和部分国民教育问题。市杜马的活动要受官吏的监督。市杜马选出的市长要经省长或内务部长批准。虽然有种种限制，但地方自治制度还是给居民带来了福利，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1864年沙皇政府进行了司法机关的改革，如建立代表各阶层的法院，确立公开的诉讼程序，法庭受理刑事案件须有陪审人参加，创立律师制度等。在实现资产阶级原则方面，司法改革总体上说是当时各项改革中最彻底的。不过它仍然带有农奴制的烙印。在政治案件方面，司法诉讼充满了专横和暴虐现象。

1874年沙皇政府又进行军事改革。克里木战争使沙皇政

^① 明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历史》1973年莫斯科版第1卷第28页。

府看到，农奴制国家的军队很难战胜资产阶级国家的军队。军事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以代替旧的募兵制。服役期由 25 年逐渐缩短为 6—7 年，采取一些措施革新部队的装备 提高军官的训练水平。

此外，这一时期还进行了国民教育方面的改革。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要求有更多受过培养和识字的人，需要培养工业、农业、商业和国家及地方自治机关方面的专家。因此必须扩大国民教育的基础。但是政府在进行教育改革时是非常谨慎的，它害怕人民觉醒。

19 世纪 60—70 年代资产阶级改革的意义在于，改革促进了俄罗斯国家制度的变化 用列宁的话说“这是俄国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道路上迈出的一步”。“总之，60 年代的整个‘改革时代’使农民仍旧贫困 受人欺压 愚昧无知 无论在法院还是在管理机关 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地方自治机关 农民都得听从地主—农奴主的摆布”。^①

四、俄国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及其特点

农奴制的废除和以后进行的资产阶级改革标志着俄国发生了变革，“结果一种社会形式被另一种社会形式所代替——农奴制被资本主义所代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划分仍然存在，还保留着农奴制的各种遗迹和残余，但是阶级划分基本上具有另一种形式”。^②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0 卷第 174 页。

^② 同上 第 37 卷第 65 页。

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是一种进步，因为它使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摆脱了农奴制社会关系的束缚。在农奴制度废除后的 20 年时间里，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加快，整个经济水平大幅度提高。资本主义在俄国的确立正在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浅耕犁与连枷、水磨与手工织布机的俄国，开始迅速地变为犁与脱粒机、蒸汽磨与蒸汽织布机的俄国”。^①

废除农奴制后，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但是农业已经面临新的形势。正如列宁写的那样，土地关系“无论在地主的经济中或在农民的经济中无论在‘村社’以外或以内都正在按资本主义方式发展”。^②地域的劳动分工和各部门在农产品生产方面的专业化扩大了国内市场。出现了一批专门的产粮区（中部黑土地区、乌克兰南部、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奶制品产区（波罗的海沿岸、俄罗斯北部、中部工业省）经济作物产区（乌克兰、西北地区等）。城市和城市居民的数量在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铁路和水路运输业的发展对扩大农产品贸易具有重要意义。地方农业原料加工工业（酿酒、奶酪制造业等）也在发展。总体上讲，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粮食、经济作物收获产量的提高和播种面积的扩大。1881 年耕地面积比 1860 年扩大 14% 达到 9400 万俄亩。据俄国欧洲部分 50 个省的资料，1864—1866 年谷物和马铃薯年收获量为 2040 万吨，1870—1879 年年收获量达到 2810 万吨。但是大多数粮食仍然留在农村（87%—89%）。农业牲畜的数量从 1864 年到 1882 年增加 11%。1861 年改革前夕，粮食商品率不到 5% 而 19 世纪 70 年代末达到 11%~13%。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549 页。

② 同上 第 45 卷第 295 页。

地主经济适应资本主义新形势是经济的必然要求，但是这种适应是逐渐地、缓慢地实现的。其原因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条件尚未具备。需要有一个由惯于从事雇佣劳动的人们组成的阶级，需要用地主的农具和牲畜代替农民的农具和牲畜；需要把农业像其他各种工商企业那样，而不是像老爷们的事情那样组织起来。所有这些条件只能逐渐形成……不能一下子过渡到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旧的徭役经济制度只不过遭到了破坏，但是还没有彻底消灭”。^①此外，主要的土地和农业用地仍然属于地主，根据《2月19日条例》地主掌握牧场、森林、草场、饮马场等等。农民没有这些土地就根本不能经营独立的经济，他们不得不向地主租种土地。这就使农民经济在经济上依附于地主经济。地主仍然有实行‘超经济强制’的可能性。

60—70年代，大多数黑土省份的地主经济都是依靠所谓的工役制发展的。所谓“工役制度就是用附近农民的农具和牲畜来耕种土地，其偿付形式并不改变这一制度的实质（不管是计件雇佣制下的货币偿付，对分制下的实物偿付，或是狭义工役制下的土地或各种农业用地偿付）。这一制度乃是徭役经济的直接残余”。^②

工役制的推广严重阻碍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1861年改革后一部分地主已经开始按资本主义制度经营，即“雇佣工人（年工、季节工、日工等等）用私有主的农具和牲畜来耕种土地”。^③

在实际生活中，工役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经营方式在地主

① 《列宁全集 第2版第3卷第162—165页。

② 同上第165页。

③ 同上第166页。

经济中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是两种地主经济都比农民经济有更高的生产率和商品率。地主的农作物收获量更大，相当大一部分农作物投向农产品市场。

然而，不管地主采取什么经营方式，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是靠残酷掠夺农民向资本主义过渡。

这条“普鲁士式”的发展道路并不是所有地主都走得很顺利。一部分人卖掉了自己的土地，1861—1880年地主共卖出700多万俄亩土地，地主在土地所有者中的比例也由84%下降到77%。

农民经济向资本主义轨道的过渡要复杂和困难得多，农民由于受1861年改革的掠夺，受苛捐杂税的压榨，受地主的残酷剥削，不能迅速适应新形势。农民发生两极分化，一极是贫农，年复一年地增多，另一极是富农，他们掌握越来越多的土地、牲畜、工具，他们还逐渐成为农民村社中的统治者。这些“破落富农”不想满足于掠夺村社土地，开始从那些破产的地主手中收买土地。仅60—70年代就有500多万俄亩土地成了富农的私有财产。^①

改革后农民经济的发展充分表明，尽管大多数农民都在村社土地上劳动，但是“村社农民不是资本主义的对抗者，而是资本主义最深厚和最牢固的基础”。^②1861年改革并没有改善人民的状况，而是使他们的状况更加恶化。人民群众同时受着资本主义和农奴制残余的压迫。

但是总体上说改革后的农业是发展了。国内国外市场的出现打破了封闭的自然经济性质。土地村社的稳定性被动摇

① 《苏联历史 1861—1917 年》1984 年莫斯科版第 44—45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146 页。

了。农村居民的流动性增大，活动范围拓宽。但是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广泛发展还遇到很多障碍，主要障碍是地主土地占有制和专制制度。

与此同时，农村社会两极分化的过程对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农民的分化为国内市场的扩大创造了条件。经济上强大起来的农村资产阶级不仅扩大了对日用品的需求，而且扩大了对农业机械、农村奢侈品和时髦用品的需求。农村贫民则不得不将自己的经济缩减到最低限度，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从事生产农民家庭必需品的副业（纺织粗布、制作毡靴）开始越来越不合算，贫农越来越多地到市场上购买廉价的印花布、靴子和其他用品。中农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货币大量涌入农村，农民家庭预算中的货币部分逐年增多。

农民社会两极分化过程的第二个结果是“农民本身的分化”出现了劳动力市场。由农村贫民组成了一支工业劳动大军，他们被迫到外乡，到城市，到工厂去挣钱谋生。尽管受到农奴制残余的限制，离开农村的人逐年增多，从而使企业主可以获得廉价的劳动力。

资本主义大工业需要资本。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原始积累过程仍在继续。沙皇政府不断掠夺新的土地，向外扩张。借助国家的力量对农民实行剥削，用各种苛捐杂税对他们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并将榨得的钱以政府贷款、官方定货、生产发展奖金的形式转到企业主手里。商业利润不断提高。赎金和土地租金使地主有可能获得大量金钱来过奢侈的生活和从事资本主义活动。

为国内工业和铁路建设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筹集资金的信贷制度发展迅速。70年代初已有39家私人银行，232家信用社和城市银行；1864年这些金融机构和国家银行的存款

(包括固定资本已达 2.78 亿卢布 而到 1879 年已经超过 10 亿卢布 亦即增加了近 3 倍。国家银行开始吸纳小额储蓄,外国资本大量涌入 从 1860 年到 1880 年国外对俄国股份企业的投资从 970 万卢布增加到 9770 万卢布 增加 9 倍 占全部股份资本的近 1/6。英、法、德等国的投资最多。

俄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 3 个主要阶段:1. 小商品生产,主要是农民小手工业生产;2.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3. 工厂(大机器工业)列宁曾写道:“许多大厂主与最大的厂主本人曾经是小而又小的手工业者 他们经历了从‘人民生产’到‘资本主义’的一切阶段。也许这一事实,就是各种依次相连的工业形式之间有密切的和直接联系的最突出表现之一。萨瓦·莫罗佐夫过去是农奴(1820 年赎身)牧人 车夫 织工 手工业织工 他曾步行到莫斯科把自己的产品卖给买主;后来成为小作坊主——分活站的主人——厂主。他死于 1862 年 当时他和他的许多儿子已有两个大工厂。在 1890 年 属于他的子孙的 4 个工厂中计有工人 39000 名 生产额达 3500 万卢布。”^① 这是俄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形象写照。

工业的布局也在发生迅速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工业区(顿巴斯、巴库)

1861 年改革后的头几年,由于农奴的解放,一些使用农奴劳动的部门工业生产有所下降。但是在 60 年代后期 大的工厂企业开始迅速增加。1866 年 拥有 100 名以上工人的工厂有 644 家,1897 年达到 852 家。工场手工业和手工生产在同工厂的竞争中被大工业吞并。

工业发展的特点是生产集中加强、大工厂数量增加。到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498 页。

1880年,大企业拥有100名以上的工人,总数增加近1/3,最大企业拥有1000名以上工人的数量增加1倍(从1866年的42个增加到1879年的81个)。① 1860—1880年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增长速度比英、法、德等国还高。工业的技术装备表明,俄国正在发生工业革命。手工正在被机器所取代;机械、技术和生产工艺不断完善。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断提高。60—70年代俄国工业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在工业发展、生产规模和居民人均产值方面它还远远落后于西欧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特点主要反映在某些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如纺织业、制糖业。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最为迅速,如1868年同1861年相比,生铁从1950万普特增加到2870万普特,钢从1240万普特增加到2120万普特,煤从2350万普特增加到21330万普特,石油从20万普特增加4040万普特。60—70年代,机器制造开始发展,机器制造业产品增加了2倍。

与大工厂工业发展的同时,运输业也发展起来。铁路建设和船运事业迅速发展。铁路建设对工业和农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对于扩大和发展国内和国外市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就是说,俄国资本主义已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资本主义俄国的发展使它在经济上日益接近欧洲其他国家,保证了国内的相对稳定和俄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影响,当然这一切都是为地主和资产阶级服务的。大生产在最主要的工业部门中确立起来。运输业的发展使产品的销售市场不断扩大。俄国在国际市场上向西方供应粮食和原料,向东方供应工业产品。它同欧洲最大国家(德、英、法)和亚洲国家(中国、伊朗等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巩固和扩大。俄国已经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资本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67页。

主义和工业危机也开始影响俄国，比如，1873 年西欧、美国和俄国几乎同时爆发经济危机。

在欧洲国家中，俄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从 1860 年的 7300 万增加到 1881 年的 1 亿。它拥有极丰富的自然资源：肥沃的黑土地、煤炭、铁、石油、森林等等。这些都需要投入劳动和资本进行开发。由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晚，没有彻底扫除封建主义的残余，妨碍了国家发展建设，使俄国在经济上落后于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这些先进国家来说，沙皇俄国成了一个有利的市场和投资场所。重工业部门（采煤、冶金、机器制造）逐渐落入外国资本家之手。

俄国经济沿着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迫使沙皇政府实行资产阶级经济政策。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关税制度、官方定货、贷款、奖励等等）财政政策（改善货币制度、借债、增加对人民的税收）都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沙皇政府经济政策越来越大的影响。国家预算反映了经济矛盾和发展的不稳定性。到 80 年代中期，用于弥补赤字的外债达到很大规模，按还债利息算，俄国在欧洲占第 2 位。俄国在经济上明显地依附于贷款国。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结构亦发生重大变化。拥有土地并掌握国家机构的贵族仍然是统治阶级。相当大一部分贵族在慢慢地适应资本主义发展。沙皇政府千方百计支持作为自己支柱的贵族阶级，从国库向他们提供贷款，帮助他们保持在各级机关中的官职，让贵族掌握军队的各级指挥权。

但是改革后的 20 年时间里，拥有土地的贵族数量在急剧减少，已降到整个贵族阶层的一半左右。工业资产阶级成了俄国资产阶级的骨干，正是他们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

1861 年改革后，工业资产阶级并没有获得特权，但是他们获得了劳动力，可以剥削在法律上获得自由但失去财产的从前的农

奴。资产阶级用无产阶级群众的血汗为自己创造了大量财富，增强了经济实力。沙皇政府不可能充分满足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它是一个贵族地主性质的政府。资产阶级只能“通过一群卖身求荣、横行霸道的官吏”^①影响政府，他们不可能公开发挥政治作用。但是专制政府维护资产阶级的财产利益，是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斗争的靠山。因此资产阶级不可能也不想成为专制制度的反对派和同沙皇政府斗争。正是这个特点决定了他们在后来阶级斗争中的作用。

到 80 年代初，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形成一个阶级。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自发行动中锻炼了阶级觉悟，加深了对自己利益和企业主利益的矛盾的理解。但是由于在沙皇制度下缺乏起码的政治条件，不久前刚刚离开农村的工人群众表现出了农民的局限性，无产阶级觉悟的提高受到了限制。随着大机器工业的蓬勃发展，农民脱离工具和生产资料的过程不断加快，出现了经常性的产业工人阶级。

由于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农民分化为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贫民，农民是工人阶级的主要来源。贫困的农民从农村跑到城市谋生。农村为工业提供了一支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大军和受过培训的人员。俄国中部各省很久以来就有发达的家庭手工业。纺织工匠、钳工、皮匠等祖祖辈辈从事家庭手工业，他们都有一定技能。手工业者对于俄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从 1861—1879 年，仅大企业和铁路部门的无产阶级人数就从 70.6 万人增加到 93 万人。废除农奴制以后，俄国一些民族地区也开始出现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工业造就的产业无产阶级

^① 《列宁全集 第 2 版第 2 卷第 91 页。

同前资本主义形态的雇佣工人和手工业工人有根本区别，他们更团结、有组织性。俄国无产阶级作为一股社会力量，最坚决、最彻底地参加了民主力量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

农民作为俄国主要劳动居民受着双重压迫——资本主义剥削和农奴制残余的压迫，他们的两极分化在发展。农村不断把破产的农民抛向城市，抛向工业部门。经济上受压榨，政治上无权的农民逐渐成长为一支社会抗议力量。因此，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希望通过农民革命实现自己的最近任务。

俄国知识分子的人数也在不断增长，因为国家社会发展要求不断扩大各行业、各部门熟练工作者的人数。1860—1900年，在中等学校学习和毕业的人数达120万而在高等学校毕业的只有8.5万人。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出身于统治阶级，但是这一时期反映劳动群众情绪和利益的民主派知识分子人数也开始增多。正是他们成了60—70年代革命运动的主要环节。

五、自由主义思想的传入

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俄国要早。尽管当时俄国历史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但是俄国不可能不受世界形势的影响。早在彼得一世时期，俄国就同西欧开始了频繁的往来。一部分俄国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在同西方交往过程中了解了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同时也认识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腐朽和落后性。沙皇政府竭尽全力维护专制政体和农奴制的稳定，使国内不受时代进步思潮的激荡。尽管如此，俄国人民反对沙皇、地主阶级的专横并争取解放的斗争的光荣传统仍不断发展。19世纪俄国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拉吉舍夫、十二月党

人、普希金、莱蒙托夫、赫尔岑等人。解放运动推动了俄国的改革并最终导致 1861 的农奴制的废除。

在这一运动中 俄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两个流派 西方派和斯拉夫派。西方派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主张实行英国式自由主义，走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他们认为通过缓慢的改革，套用资产阶级民主制，是拯救俄国的唯一办法。斯拉夫派赞成逐步解放农民，但同时又把农村公社理想化。他们提出了各个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统一由俄国沙皇政府保护的理論（泛斯拉夫主义）。斯拉夫派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和保守的贵族思想的大杂烩。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所推崇的是个人自由、人人平等、个人财产不受侵犯和实行立宪民主。这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国家的理论，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由于俄国专制统治的传统，19 世纪初的俄国不具备进行这种变革的阶级。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特点也与西欧不同，在资产阶级改良的速度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但是由于可以广泛利用外国经验和资本 国家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加快社会经济进步，俄国可以越过以往某些发展阶段，在国家的扶持下发展经济。正因为如此 俄国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一下子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私有制关系并没有在社会中充分扎下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是在专制国家的保护和控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同专制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资产阶级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他们只有在沙皇政府的保护下才能生存，他们的帝国主义胃口只有依靠专制制度的军事实力才能得到满足。他们是沙皇政府的宠儿，享受各种特权。所以自由主义在俄国没有合适的土壤和牢固的根基。连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党立宪民主党后来也宣称自己是“陛下的反对派”。他们只不过想依靠皇室的

保护发展资本主义，对他们来说，最理想的政体是立宪君主制。这种状况决定了自由主义在俄国的命运以及后来俄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俄国政治舞上的命运。

六、民粹主义与民粹派

俄国专制制度的统治激起了国内解放运动的发展。与此同时，专制制度的危机也加速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改造的进程。但是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资本主义就其本质而言，仍然建立在私有制、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之上，它并没有解决对立的社会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它自己的矛盾和腐朽性逐渐暴露出来。这使俄国先进知识分子非常失望，他们开始探索俄国社会改造的“特殊道路”。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了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这就是“农民社会主义”的理论，即民粹主义理论。

赫尔岑(1812—1870)认为，俄国由于村社的存在，可以避免“资产阶级化”的惨剧。有了全体成员一律平等的、实行农民自治的村社，就能保证较为容易地、没有痛苦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他在1851年写给法国历史学家米希勒的信中说：“俄国人民的生活直到目前还没有超出村社的范围，他们只承认自己对村社及其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村社以外的一切，在他们（俄国人民）看来都是以暴力为基础的……村社组织虽然严重地动摇了，但它还是坚持反对政权的干预，村社组织顺利地维持到了社会主义在欧洲发展起来的时候。这种情况对于俄国是极端重要的……从这一切您可以看到，村社没有消灭，个人所有制没有粉碎村社所有制，这对俄国该是多么幸运的事。俄国人民置身于一切政

治运动之外，置身于欧洲文明之外，这对他们该是多么幸运的事，因为这种文明毫无疑问会破坏掉村社……”赫尔岑认为“人同土地的关系”构成了俄国人民的特点，这一特点使俄国具有完全新的社会基础。由此得出结论：“俄国未来的农夫，也像法国未来的工人一样”。^① 赫尔岑认为，俄国村社并不像斯拉夫派所想的那样，是俄国不会发生革命的保证，相反地，它是社会主义革命正好应该在俄国开始的证明。

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又发展了关于村社、关于农民社会主义的理论。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是在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已经消失，“工人”即无产者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成为社会思想家的。他强调指出，在俄国的条件下村社被保留下来，这是发展缓慢的标志，落后的标志（这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胜过赫尔岑观点的地方）。但是在一定条件下，村社能够起积极的作用。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不是简单地由村社占有土地，而是要把这种占有同村社生产结合起来，从而使农业和工业溶合在一起，这才能够开辟通往社会主义的最好道路。他曾写道：“我们没有经历原始公社和社会主义公社之间的中间时期，我们没有像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这并没有什么关系。有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开始得比其他国家较迟，但却能够远为迅速地通过发展的全程。也可以说，它能够跨越过整个的时期。所以俄国也就可能越过资本主义时期而一下子进入社会主义时期。”

村社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种特殊的尝试，即企图利用历史上已形成的人民生活的组织形式来一方面唤起农民进行革命，另一方面保持住村社内存在的平均主义原则，直到革命后实行新的、社会主义的原则。

^① 《赫尔岑全集》（30卷本）1954年莫斯科版第7卷第326页。

这个思想成了 19 世纪 60—70 年代俄国平民知识分子运动的核心思想之一，是俄国民粹主义的核心内容。民粹主义在当时影响了一大批平民知识分子。赫尔岑在他主办的《钟声》杂志^①上号召农民进行反抗专制制度的斗争，号召民主派青年开展革命活动。《钟声》杂志还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赫尔岑在向那些因参加学潮而被政府赶出大学的学生发出号召时写道：“你们听……从我们辽阔祖国的四面八方，从顿河和乌拉尔，从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到处都是哀声不断，怨声四起，——这是在经过了可怕的令人厌倦的平静之后，孕育着暴风雨的、开始沸腾起来的大海波涛的最初怒吼。到民间去！走向人民！这就是你们这些因信仰科学而被驱逐的人应该去的地方”。^②在民粹主义思想的鼓舞和号召下，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投身到了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

值得指出的是，民粹主义思想家还提出了自己的历史观。彼·拉·拉甫罗夫（1823—1900）本是军事学院的教授，他后来成了民粹派著名理论家。他提出的历史观不仅影响了当时的革命知识分子，也影响到后来社会革命党的纲领和策略。拉甫罗夫认为创造历史的不是人民群众而是“批判地思考的个人”即知识分子。他认为历史本身毫无意义。赋予历史以意义的是研究历史的人，也就是历史学家本人。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又决定于他抱着什么目的和具有什么理想。拉甫罗夫说：“如果一个思想家相信自己的道德理想在目前或未来真正会实现，那么对他来说，为了实现这种理想而酝酿的那些事件就是全部历史的中心”。不言而喻，思想家不可能只限于对历史进行思考，他要努

^① 《钟声》杂志是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编辑出版的政治杂志，1857—1868 年在伦敦一日内瓦出版。

^② 《赫尔岑全集》（30 卷本 第 15 卷第 175 页）。

力把自己的理想实现到历史中去，影响历史进程。用拉甫罗夫的话来解释，就是“理想从个人的脑子里产生出来，然后从这个人的脑子传到另一些人的脑子里去。它由于在质量上提高了这些个人的智力水平和道德水平，在数量上增加了这些个人的数目，因而不断有所发展。当这些个人意识到他们的思想一致并决心一致行动的时候，这理想就成为一股社会力量”。这样说来，创造历史的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那么大多数群众呢？“大多数人注定必须为了别人的利益而从事千篇一律的、令人厌倦的和无休无止的和平工作，没有闲暇来进行思考，因此始终不会发挥自己的巨大力量，来替自己争取到提高文化程度和过真正人的生活的权利”。^①

这显然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但也不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因为它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民粹主义不是从企业主阶级当中产生的学说，而是从感觉到自己受企业主压迫而不能摆脱企业主思维方式的那个阶级中产生的学说。它是那种‘有文化的工头’的世界观，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因此民粹主义在历史上对工人和农民的吸引力并不大。

19世纪70年代中期，巴枯宁主义在民粹派中有很大的影响。米·亚·巴枯宁(1841—1876)原是一个贵族军官，后来走上了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道路。巴枯宁主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无政府主义学说。巴枯宁认为，国家是主要的而且就实质来讲是唯一的敌人，不管它的阶级属性如何。他否定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如同他否定利用现存政治设施一样，他认为这些东西只能给资产阶级带来好处。巴枯宁曾参加过第一国际，他在宣传社会革命口号时尽管也在复述马克思的某些思想，但是他对社会革

① 彼·拉·拉甫罗夫《历史书简集》1905年俄文版第84—96页。

命的理解却距马克思主义非常远。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革命就是对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其中包括摧毁压迫者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即劳动人民自己的政权。在巴枯宁看来，革命就等于“全面破坏”和消灭社会制度的一切现存形式，用那些独立而分散的自治单位（团体）的总和来代替社会这个整体。这实际上是一种反动的空想，这是从人类在生产力、经济联系和文化联系方面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向后倒退。实现巴枯宁的理想不需要革命先锋队领导的群众的自觉行动。“教导人民吗？这是愚蠢的。人民比我们更清楚他们需要什么”。^① 群众的处境越坏，他们就越有能力和越有决心去消灭剥削制度。因此，在巴枯宁看来，流氓无产阶级即劳动人民中丧失阶级性的那些阶层是最积极的革命力量。

列宁说：“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无产者的心理状态。“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② 改革后的发展也为在俄国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奠定了社会基础。但是这里的基础不同于西方，这里广大的小生产者群众是农民，农奴制给他们带来的苦难超过了资本主义。俄国的巴枯宁主义在这种条件下就带有农民革命民主派的色彩。巴枯宁的反国家的宣传听起来就好像是在号召人们消灭那令人痛恨的专制制度即沙皇帝国。政治节制的思想在民粹主义理论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政治”即在现存制度范围内进行合法活动，遭到民主派青年的公然鄙视。

由于所有的民粹派都认为自己最近的目的是进行农民社会主义

参看《巴枯宁文集》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 238 页。

②（列宁选集 第 3 版第 1 卷第 288—289 页。

革命以便同时消灭社会压迫和政治压迫，所以他们在长时间内并不认为反对政府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有什么独立意义。巴枯宁主义加强了这一倾向，在理论上发展了这一倾向，并使这一倾向同人民经常准备起义的幻想结合在一起。巴枯宁想要青年相信，只要他们到民间去，“把所有农村中的优秀农民联合起来”；把蓬勃发展的革命思想、意志和事业在各个村社之间加以沟通，那就足以使农民愤怒的零散爆发汇合成规模巨大的全俄范围的运动”。巴枯宁提出这一具体纲领，给急于干一番事业的青年平民知识分子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并且显然已成了促使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因素。虽然俄国民粹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巴枯宁的“轻举妄动”和从事革命冒险的倾向，但是其影响并未彻底根除。尤其在后来的俄国革命进程中，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客观上仍然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19世纪60年代末，俄国民粹派小组遍布于各大学中心，不仅彼得堡和莫斯科这些城市在基辅、哈尔科夫、敖德萨甚至在一些边疆区都出现了民粹派小组。他们在“到民间去”的活动中逐渐感觉到，必须把各个小组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于是1870年诞生了一个民粹派的秘密团体，后来取名为“土地和自由社”。这个团体的纲领要求把全部土地转交给农民并在那些用自己的劳动耕种土地的人们中间平均分配。纲领的政治理想表述得不够明确。土地自由派和过去一样主张所有村社实行充分的不受任何限制的自治。土地自由派认为要在目前实现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理想是不可能的，他们开始摆脱巴枯宁主义。

土地自由派在建立能够抵抗专制制度的革命组织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这个革命组织的原则是遵守纪律、同志之间互相监督、集中制和秘密活动。他们在各地进行革命工作，企图发动农民起义来反对沙皇政府，他们还出版和传播革命书刊，参加

70年代末彼得堡的一些罢工和游行示威。

由于对农村中革命运动日益感到失望以及政府迫害的加剧，在土地和自由社内部出现分化，一派主张把恐怖活动作为同沙皇政府斗争的主要手段，另一派则主张继续采取原来的斗争策略。1879年8月在“政治家（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等人）和“乡下佬（格·瓦·普列汉诺夫、米·罗·波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等人）之间发生了冲突。结果“土地和自由社”分裂成两个独立的组织：“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土地平分派坚持过去土地和自由社的纲领和策略并出版了《土地平分》杂志和《种子报》。后来土地平分派的一部分成员——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捷依奇和伊格纳托夫转向马克思主义，于1883年成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民意党人（以热里雅鲍夫等人为首）主张推翻专制制度，该党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民意党人继承民粹主义的传统，依旧认为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主张实行恐怖主义的策略，把暗杀沙皇政府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制度的主要手段。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给民意党人很高评价。马克思当时还认真阅读过民意党人的纲领。民意党人在解放斗争的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他们的功绩表现在对专制制度发动直接进攻，并为此目的试图把所有革命的和反政府的力量联合起来，利用普遍的不满情绪来打垮主要敌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俄国的情况。马克思曾指出，决定俄国未来的并不是村社，相反，村社本身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①，要看这个环境是贵族资产阶级的俄国，还是革命民主派的俄国，是资产阶级的欧洲，还是社会主义的欧洲。俄国的民粹主义和民粹派是俄国革命斗争史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于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它们的发展和作用受到了限制。但是他们仍然为推动俄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七、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革命思想体系产生于 19 世纪 40 年代，那时，西欧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制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重要基础。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劳动人民关于公正社会的美好理想第一次获得了真实的内容，空想社会主义者只是谴责资本主义社会，却看不到能够成为新生活创造者的社会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不同，他们首先注意去阐明无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他们研究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总结了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运动的经验，从而科学地证明：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批判地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造了剩余价值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435 页。

说在此基础上他们利用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矛盾和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特征的思想，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和共同劳动成果的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使日益扩大的生产规模同居民有限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发生冲突，从而导致经济危机。危机使劳动群众的状况更加恶化：失业人数增加、工资下降、小私有者更加陷于破产。资本主义必然使劳动群众贫困化。但是与此同时，它又产生了自身的掘墓人即无产阶级这一资本主义制度最彻底和最坚决的反对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其他阶级不同，它丧失了对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任何所有权，它是为消灭剥削制度和社会不平等现象而斗争的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将组织起来，为推翻资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

俄国革命民粹派十分敬重马克思，把他看作一位学者和革命家，并读过他的一些著作。但是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俄国现实。只是到了 19 世纪 80 年代，俄国解放运动的代表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才成熟起来。这一时期，脱离了民粹派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格·瓦·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政论家和宣传家。在革命民粹派中间他以对理论的严肃态度而出众。他成了一位公认的民粹主义运动理论家，在“土地和自由社”发生分裂后，他领导了“土地平分社”。他曾因从事革命活动而遭到沙皇当局的追捕，流亡到国外。在国外期间，他有机会认真而系统地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普列汉诺夫同自己的志同道合者巴·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等人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放弃

了民粹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普列汉诺夫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了解了西欧各国的工人运动，这就使他能够以新的观点去看待俄国的斗争。普列汉诺夫和他的同志们已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俄国避免不了资本主义阶段，因此工业无产阶级注定要成为革命斗争的主要力量。

研究《共产党宣言》是普列汉诺夫思想发展的转折点。他曾写道：“关于我自己 我可以学习《共产党宣言》构成了我一生中的一个新时代。我被《宣言》所鼓舞，并立刻决定要把它译成俄文。”^① 马克思曾为《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版专门写了一篇序言。

普列汉诺夫等人曾试图说服民意党人接受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他决定和自己的志同道合者一起创立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组织。这个组织就是“劳动解放社”。“劳动解放社”为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巨大贡献。“劳动解放社”的成员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回俄国。如捷依奇翻译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1886年查苏利奇翻译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1885年普列汉诺夫翻译了马克思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92年他又翻译了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

^① 《普列汉诺夫遗著》1940年莫斯科版第8集第1部分第17页。

社》和 1885 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普列汉诺夫用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民粹主义的思想体系，第一次在俄国著作中准确地确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的概念。

如果说普列汉诺夫是老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在 19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登上社会政治舞台的列宁则是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

列宁 (1870—1924) 中学时代就因参加反对专制制度的秘密小组而被流放。他青年时曾大量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进步知识分子的作品。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著作后立刻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逐步变成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不仅研究和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而且思考现实迫切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寻找答案。1889—1893 年乌里扬诺夫一家住在萨马拉时，列宁不顾警察的监视，认识了一些地方秘密小组的领导者。列宁曾在这些秘密小组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等等。由于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还没有翻译出来，列宁把他自己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传给大家看。90 年代初，俄国的政治生活普遍活跃，民粹派也积极起来。这时大多数民粹派已经转到自由主义立场上，走上了同沙皇政府妥协的道路。自由主义民粹派虽然已不再否认俄国存在资本主义的事实，但却认为资本主义是政府用人工培育出来的、在俄国土地上没有生根的“温室植物”。与此同时，他们企图使旧的农民社会主义理论适用于已经坚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俄国的经济关系。为了驳斥民粹派的错误理论，论证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来研究俄国的经济制度，揭示出各种经济形式，应

当把俄国‘现实作为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系给以完备的说明 应当指明劳动者在这个体系下遭受剥削和剥夺的必然性，指明经济发展所昭示的摆脱这个制度的出路”。^① 1894 年列宁发表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对民粹派的哲学观点和“民粹派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策略、经济纲领和政治纲领进行批判。这部著作是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真正宣言。

民粹派观点的基础是主观社会学。他们否认社会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认为历史完全是由“有批判头脑的个人”的意志和愿望决定的。列宁批驳了这种观点，指出唯物主义并不否认和贬低个人的作用，因为历史正是由个人的行动，由人民群众这些真正的历史创造者的行动构成的。但是个人的力量不在于同历史必然性背道而驰，而在于根据已经成熟的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行动。一个政党只有根据历史必然性并依靠先进阶级来进行活动 才能获得成功。

民粹派断言 既然资本主义闯进了农业 使农民群众遭到破产，那它就在缩小国内市场，消灭自己发展的基础。而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以销售商品的国外市场俄国又没有。这表明，资本主义在俄国只有死路一条。列宁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深入地研究了俄国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问题。指出资本主义不仅使农民遭到破产，而且还使他们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这一过程不是导致市场的缩小，而是导致市场的建立和扩大。自由主义民粹派是从小生产者的立场批评资本主义的。这就使他们看不到农民经济已经被纳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关系的轨道。他们想用一切办法保存和

^① 《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1 卷第 68 页。

永远保存小生产者，这在客观上是想保存资本主义的原始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是同最痛苦最残酷的剥削方法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剥削方法是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建立革命组织的最大障碍。

列宁这一时期的著作对革命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对在俄国革命中确立马克思主义起了促进作用。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开始对进步舆论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不能不考虑马克思主义日益发展的情况，尤其是工人阶级政党的形成过程比资产阶级快得多的情况。因此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便竭力想操纵工人运动，想利用马克思主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出现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政治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彼·伯·司徒卢威。“合法马克思主义”利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个别论点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论证，在批判民粹派的同时赞美资本主义，号召人们“承认自己的不文明并向资本主义学习”，抹杀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列宁敏锐地看出“合法马克思主义”是国际修正主义的萌芽，认为宣扬“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人是一些巧妙地伪装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列宁指出，在俄国“除了经过工人运动是不能有别的道路通向社会主义的”。但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并不排除争取民主改革和消灭所有一切农奴制残余而进行坚决的斗争，相反它要求首先进行这样的斗争。在俄国所有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争取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因为第一，无产阶级受到的政治压迫最厉害……第二，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实现政治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因为实行这种民主化，就会使工人成为这个制度的主人”。^① 列宁当时揭穿了自由派资产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147页。

阶级的假民主主义，以及它们为了阻挠工人运动而同专制制度相勾结的企图。

列宁不仅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而且积极准备建立无产阶级组织。1895年11月，列宁在彼得堡发起创立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由彼得堡的约20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联合而成，同年12月定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协会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实行集中制，有严格的纪律。其领导核心成员有列宁、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夫科夫、阿·亚·瓦涅耶夫和尔·马尔托夫。协会在俄国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完成了从小组内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到群众性政治鼓动的转变。协会领导了1895年和1896年彼得堡工人的罢工，印发供工人阅读的传单和小册子，并曾筹备出版工人政治报纸《工人事业报》，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1900年，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人在国外创办了《火星报》。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许多文章，阐述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巨大作用。1902年列宁发表了《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全面论述了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日益成熟。

第二章

俄国主要政党的出现及其纲领

一、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主要政治力量

19 世纪末 90 年代中期，俄国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无产阶级阶段：工人代替了平民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思想流派变成一种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着密切关系的积极的政治力量。列宁写道，在 90 年代，俄国两个深刻的社会运动汇合了：一个是工人阶级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另一个是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接受社会民主党的学说的社会思想运动。^①

但是，俄国工人运动是在劳动者毫无经济和政治权利的国家开展起来的。1894 年尼古拉二世即位。他在接见各地方自治局、各城市及各阶层的代表时宣称：“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215、216 页。

……将像我难以忘怀的亡父那样坚定不移地维护专制制度的基础。”一些地方自治局胆怯地向新沙皇提出关于吸收“社会人士”参加内部事务管理的请求，新沙皇把这种请求称作“毫无意思的幻想”。专制政府连对现存制度最微小的抗议都要残暴地加以镇压。沙皇政府对工人运动采取特别残酷的政策。内务大臣哥列梅金发出通令：“绝对禁止工人的任何集会，如果集会的目的是搞罢工，就要查明主谋，予以逮捕。”^① 1895年4月，军队在“平定”雅罗斯拉夫尔大纺织厂的罢工时，当场有18人被打伤，3人被打死。尼古拉二世在这次事件的通报上批示：“对军队在工潮中所采取的镇静而又坚定的行动非常满意”。^② 专制政府对人民的残酷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遭到人民的强烈反抗。罢工和抗议浪潮此伏彼起。

沙皇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仅在对内政策方面使用各种镇压手段，在对外政策方面也是如此。专制政府企图通过推行侵略性的对外政策和侵占新的领土来巩固自己的地位。19世纪末形成的国际局势给沙皇政府这种企图提供了方便。英国这个最大的殖民主义强国和海上强国由于在非洲进行扩张而使自己的力量受到牵制，在欧洲，法德对抗的局面依然存在，从而迫使法兰西共和国的统治阶级同沙皇俄国结成军事和政治联盟。沙皇政府利用这种有利的时机，在远东疯狂地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扩张。沙皇政府的反动政策受到了列宁的揭露和批判。

改革后发生的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动，为19世纪末的工业高涨做好了准备。这种高涨是世界性的，但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比其他国家较晚的俄国，工业发展的速度却最快。1891—1900

① 《19世纪的俄国工人运动》（文件和资料汇编）1961年莫斯科版第4卷第1册第830页。

② 同上，第81页。

年俄国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是 8.5%，德国是 4.9% 美国是 3.3% 英国是 2.4% 法国是 1.6%。^① 铁路建筑的规模是空前的。90 年代俄国铺设了大量铁路。欧俄境内的铁路几乎全是由私人资本即沙皇政府扶持的大铁路公司铺设的。与此同时，商业银行逐步深入到工业中去，垄断组织开始形成。但是由于俄国资本主义大工业是在沙皇政府的保护下发展起来的，所以俄国资产阶级是一支软弱的队伍，同专制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既反对沙皇制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又想寻求沙皇政府的保护，在反对无产阶级反抗的斗争中，俄国资产阶级往往同沙皇政府站在同一立场上。

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农民群众纷纷破产，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壮大起来。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形成过程已接近完成。根据列宁的统计，到 19 世纪末，俄国约有 1000 万雇佣工人。工人基本群众集中在彼得堡地区、中部地区、克里沃罗格—顿涅茨地区、巴库地区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和乌拉尔。工厂工人有一半集中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周围的一些地区。工人阶级受到企业主的残酷剥削。工厂中一方面在采用现代资本主义的技术，同时又使用着野蛮的剥削方法。工作日仍然过长，纺织企业的工作日长达 13 小时，有时甚至长达 15 小时。而工资却不能满足工人最低的生活需要。工人被禁止集会、结社、罢工。但是工人反抗浪潮从没停止。1897 年 6 月 2 日沙皇政府被迫颁布了关于把工厂的工作日缩短到十一个半小时，并规定节日休假的法律。无产阶级取得了很大胜利。这个法律的颁布表明，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发展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一些在罢工运动中被捕的工人常常被政府流放到农村，可

^① 《苏联共产党历史》1983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231 页。

他们却给农村带去一股强大的革命动力，他们唤醒了农民，使农民认识到必须为更好的生活而斗争。于是深受农奴制残余和资本主义双重压迫的农民反抗当局的事件日益频繁起来。

学生运动也在发展。受到革命思想影响和具有革命倾向的大学生积极参加抨击专制制度反对警察暴政、声援城乡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斗争。他们经常借用罢工这一无产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举行罢课。

俄国解放运动的发展使社会各阶级、阶层和集团都积极行动起来。他们为了维护本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纷纷成立各种政治组织、政治团体和政治党派。分析和研究这些党派的政治纲领和活动情况，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俄国社会的发展。

19世纪末 20世纪初，活跃在俄国政治舞台上的政党和政治组织有数百个之多。这里只能介绍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几个全国性政党。

二、君主制的卫士——黑帮和 10 月 17 日同盟

1. 黑帮

在中世纪的罗斯“黑帮”一词指的是城镇纳税居民没有任何贬义。^① 20世纪初，当人们把专制制度的维护者、爱国示威游行的参加者和搞大屠杀的人称为“黑帮”时，这个词就有了贬义。后来“黑帮”一词又开始指一些政党，如“俄罗斯人民同盟”。黑帮也不拒绝自由派和革命派给他们的这个称号。他们甚至说很

^① 黑帮 俄文是 черносотенцы 直译为“黑色百人团”。

荣幸地获得这一绰号，因为所谓“黑帮”，是指干粗活的普通工人。与此同时，他们更愿意称自己为“真正的俄罗斯人”、“爱国者”、“君主派”。

组织结构、人数、社会成分

第一个黑帮政党俄罗斯会议成立于 1900 年，其宗旨是维护斯拉夫和俄罗斯文化，成员大都是高官显贵和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但是黑帮始终没能联合成一个巩固的组织。

1905 年革命事件促进了黑帮运动的发展。1905 年春，莫斯科出现了以保守的《莫斯科新闻》编辑出版人弗·安·格林格穆特为首的君主党。1905 年 10 月 17 日诏书颁布后，右派分子的活动合法化了。黑帮组织开始迅速增加，几个月时间里有数十个黑帮同盟和政党注册登记：奥廖尔的法制和秩序协会、库尔斯克的人民秩序党、喀山的沙皇—人民协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专制君主党、下诺夫哥罗德的白旗协会、基辅的“双头鹰”青年爱国主义协会，等等。黑帮组织在名称上都突出民族主义和宗教色彩以及忠君保皇思想。

黑帮组织的最高机关是“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经常称为君主派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决议只具有建议性质。黑帮领袖们多次想整顿本组织的活动，1906 年曾试图建立统一的中央，但是没有成功。

1905 年 11 月在彼得堡成立的“俄罗斯人民同盟”是最大的黑帮政党。该同盟一开始是一个地方组织，但是由于后来影响越来越大，联合了大多数从前独立的黑帮组织。同盟的日常事务由一个总委员会（有 12 名正式委员和 18 名候补委员）主持。地方分支机构有省委员会、县委员会、市委员会和最基层的村小组。尽管同盟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和集中制原则，但始终是一个

不定形的组织，许多分部并不认为总委员会的指示和指令具有约束力。总委员会出版同盟正式机关报《俄罗斯旗帜报》各省也有黑帮的报纸和杂志。

政府的资助通过内务部秘密基金拨款，它是黑帮同盟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这些钱主要用于出版宣传鼓动材料和开展竞选活动。政府资助的具体数字始终是个迷。政府通过向黑帮提供资金来影响他们的政策。一些富商、贵族也向黑帮提供资助。黑帮们声称他们通过政党、同盟、协会、联合会等组织联合 300 多万人。但是黑帮的政敌说，黑帮最积极的力量不过 1—2 万人。

绝大多数极右组织成员都集中在俄国欧洲部分。然而在俄罗斯居民稠密的地区，黑帮的鼓动宣传并没有产生大的效果，因为缺少挑起民族纠纷的条件。他们在各民族混居的地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最为活跃。有一半以上的极右组织成员集中在 15 个“犹太人居住区”。

在俄罗斯人民同盟和其他君主派同盟中，上层领导人和普通成员之间有很大区别。最著名的黑帮领袖是地主普利什凯维奇和马尔柯夫。弗·米·普利什凯维奇（1870—1920）的曾祖父是一位神职人员，从他父辈起才成为贵族。普利什凯维奇在比萨拉比亚省的同乡甚至怀疑他“真正的俄罗斯人”的血统。尽管如此正是他成了贵族特权最狂热的捍卫者和“外族人”的迫害者。

普利什凯维奇毕业于新俄罗斯大学历史—语言系，攻读古希腊文学和历史。当俄国兴起革命运动时，他是俄罗斯会议的成员。但是他不满意这个组织的“学究”（他的用语）性质。他渴望有更广阔的活动天地，于是号召志同道合的人高喊右派口号走上街头，走向人民。普利什凯维奇是俄罗斯人民同盟的创始人之一。在第二至四届国家杜马中，他是极右党团的领袖之一。

他性情火爆 经常同政敌发生冲突 甚至发展到决斗地步。自由派瞧不起普利什凯维奇行为粗暴、经常恶作剧的作风。但是更敏锐的观察家则认为普利什凯维奇这个小丑的有着高明的政治家、聪明的策略家的潜质。

尼·叶·马尔柯夫(1876年生)是普利什凯维奇在极右党团的同事。他是库尔斯克的地主,19世纪著名贵族作家的儿子。1905年,他同库尔斯克一些地主共同创建了人民秩序党。在第三、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该党取得很大成功。马尔柯夫在政治上极其厚颜无耻。与多数黑帮不同的是,他公开承认专制制度的阶级属性,认为没有必要用漂亮的语言掩盖自私自利的目的。

黑帮领导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知识分子,有教师、医生、法学家、工程师。比如俄罗斯人民同盟总委员会主席亚·瓦·杜勃洛文是一位儿科医生、医学博士。总委员会成员 А. И. 索博列夫斯基是著名语言学家,科学院院士。君主派同盟领导机构中有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绝大多数人出身于底层,依靠资本原始积累的野蛮手段发了财;也有一些大地主和贵族代表。尽管当时禁止军人和官吏参加政党,但是黑帮组织除外。黑帮组织还得到教会的支持。

同上层领导人不同,极右组织的普通成员大都是无产者阶层。同盟领导人千方百计把更多的农民、小手工业者、工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高级僧侣支持黑帮的那些地区,常常是只要神父发布一个指示,整村整乡的人都参加俄罗斯人民同盟。但是,促使大批人加入同盟的主要原因是帝国边远地区的民族矛盾。因此,在多民族聚集地区和民族、宗教冲突严重的地区,同盟的活动最为成功。城市和“犹太民居住区”的手工业者往往把爱国主义团体视为防止同犹太手工业者竞争的保护伞。在这些地区,黑帮往往用各种反犹宣传把俄罗斯人团结起来。

右翼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

极右翼吸取了斯拉夫派的许多观点，他们的信条是“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极右分子从斯拉夫派学说中采纳的最主要的东西，是把俄国和西方截然对立起来。他们认为，西方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文明。极右分子不否认西方的技术成就，但是认为取得这些成就的代价是可怕的：精神贫乏、孤独空虚、物质上狭隘的自私自利等等。

黑帮分子同彼得一世以前罗斯时代的文人一样，认为一切罪恶都来自西方。他们对彼得一世的改革持否定态度，批评他企图把异己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移植到俄罗斯来。黑帮认为，俄罗斯又一次面临来自西方的主要危险之一是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学说是反基督教的学说，而且傅立叶或欧文的共产主义空想从来没有被实践检验过。不仅如此，所有按非宗教原则建立公社的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他们宣称，资本主义是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矛盾的根源，俄国有可能避免资产阶级奴役。

与政府旨在使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政策相反，极右分子认为，“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应该把俄国视为一个以农民和农业为主要的同家。”他们推崇小手工业生产，要求宣布俄罗斯各工业中心出现的垄断组织为非法组织。

黑帮认为，民主是西方世界产生的最大邪恶。他们绝对不相信民主价值，认为所谓言论自由一文不值。至于选举产生的机构，他们认为毫无益处可言，那些以多数票通过决议的民主程序是愚昧的，因为聪明人的一票可以胜过千百万愚昧的，或他们所说的“笨拙、恶毒的小人”的喊叫。黑帮主张实行独裁原则认为这种权力形式最符合俄国国情，君主派 H. H. 切尔尼亚耶夫

说：“俄国专制制度是把俄国 1.4 亿人统一起来的最好方式”。

黑帮纲领最大的弱点是土地问题。极右分子声明：“任何旨在改善农民生活的措施都不能触动土地所有制；黑帮首领们不同意各种各样的妥协方案（部分没收土地等等），他们主张仅限于向农民出售空闲的国有土地，发展租赁和改善信贷。这种立场使黑帮赢得了领地贵族的支持和执政集团的好感。在改善工人居民的状况方面，黑帮没有提出什么具体措施，尽管他们想在劳动与资本之间充当调停人。

民族问题在黑帮纲领中占有很重要位置。黑帮产生本身就是俄罗斯帝国民族矛盾的自然结果。黑帮所代表的俄罗斯人民的地位具有很鲜明的双重性。一方面，帝国的核心是俄罗斯，俄语是国家语言，东正教是官方宗教，在各民族边区实行粗暴的强制俄罗斯化政策，民族文化的发展受到限制。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俄罗斯居民并没有从沙皇政府的大国政策中得到什么好处；俄罗斯中部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并不比边区高，有时甚至还低。应该指出，黑帮根本不接受作为斯拉夫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基本思想的全斯拉夫统一的思想。他们指出，一旦斯拉夫人在俄罗斯庇护下联合起来，国家会遇到更多的麻烦。那样的话，一部分信奉天主教和习惯于立宪制度的民族就会涌入这个专制主义的东正教国家。

甚至在帝国内部，黑帮也没有想实现斯拉夫统一。他们认为，向往西方天主教的波兰人是俄国的潜在敌人。与此同时，极右分子认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完全是一个民族。这同官方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不认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是独立的民族，认为他们的语言只不过是民间土语。

黑帮的纲领性文献宣布：“俄罗斯民族是俄罗斯土地的采集者，是俄罗斯国家的创建者，是具有统治地位和领导地位的大民

族。”他们把国家领土分为“俄罗斯人的骨干州”和少数民族边区。俄罗斯人在使用、出售和租赁土地方面具有优先权，他们主张根据对俄罗斯民族的态度把其他民族划为“友好民族”和“敌对民族”并对其实行区别对待的民族政策。

黑帮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反犹主义。他们不仅拥护立法方面对犹太人规定的所有限制，而且要求进一步强化这些限制。黑帮建议剥夺犹太人的所有权利，把他们从有基督教儿童学习的学校中赶出去。与此同时，禁止犹太人创办自己的学校。禁止犹太人从事的职业和行业，几乎包括了所有人类活动项目。黑帮的目的是“让犹太人下决心尽快迁移到自己的王国，从事自己的营生”。

总而言之，可以把黑帮意识形态归结为：它仍是一些社会阶层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经济和生活中发生的巨变的一种独特的反应。这种意识形态既有保守成分，又有最激进的成分。它的社会基础是失去以往特权地位的领地贵族，还有相当一部分最贫困的居民，他们害怕习惯的生活方式被破坏，从而不得不去适应新的环境。黑帮的极端民族主义是俄罗斯大国意识即扩张主义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黑帮的命运是同沙俄专制制度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但是贫困居民一旦觉醒，势必会抛弃黑帮，投入到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去。

2. “10月 17日同盟”

严格地讲把“10月 17日同盟”(因“十月党人”而著名)称之为君主派政党并不十分确切，因为它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介于立宪民主党人和极右派之间的中间立场。但是，这些社会政治集团彼此之间界限并不十分明确。一些同十月党人有联系的组织和平革新党在实践中几乎同立宪民主党人融合了，而许

多具有十月党人色彩的政治组织（法制党、叶卡捷林诺斯拉夫的“十月党同盟”即人民党等组织）在实际活动中同极端保皇党的区别只在于称号不同。因此，“10月17日同盟”的左翼反对派认为十月党人同黑帮是一路货色，而黑帮又说十月党人暗地里搞立宪主义。

十月党人作为一股政治思潮是在地方自治机关城市代表大会的右翼少数派的基础上产生并开始形成的。1905年10月17日诏书颁布后，自由派阵营内部基本上完成了党的界限划分，未来的十月党人认为，俄罗斯已经具备了走立宪君主制道路所必需的政治条件，于是便开始组建政党并以沙皇诏书颁布日为党的名称。他们认为，诏书的颁布是“我们祖国命运中发生的最伟大的变化”。“10月17日同盟”的纲领性宣言中说：“从现在起，我们的人民在政治上将成为自由的人民，我们的国家将变成法制国家，我们的国家制度中将实现新的原则——实行立宪君主制”。^①

组织结构和社会成分

“10月17日同盟”是1905年11月在莫斯科地方自治机关城市代表大会期间成立的。代表大会期间，他们制定了纲领，选举了领袖。他们针对代表大会通过的一般性政治决议提出了“特别意见”主张支持政府建立秩序和立刻召开国家杜马会议，反对直接选举国家杜马和把杜马变成立宪会议。此外，他们还坚决反对波兰自治，反对在各地立刻取消针对革命形势搞的“非常措施和戒严状态”。

^① 《俄国政党纲领 19世纪末至 20世纪》1995年莫斯科版第 342页。

11月地方自治机关城市代表大会期间，十月党人推荐古契科夫兄弟之一——亚历山大为党的领袖。亚历山大·古契科夫（1862—1936）出身于莫斯科著名的企业家家庭，是世袭荣誉公民。从1902年起任莫斯科贴现银行行长。他曾声明，对他来说，划分政治“敌人”与“朋友”的标准是波兰自治和立法的非集中化问题。他本人坚决反对波兰自治和立法非集中化。亚·古契科夫的哥哥费多尔（1860—1913）在“10月17日同盟”中央担任财务主管，后来还任同盟中央机关报《莫斯科之声报》的领导。弟弟尼古拉是莫斯科市市长，任十月党人中央莫斯科分部委员。十月党人领导机关中有地方自治运动的首领、大土地所有者、企业家和贵族官僚阶层的代表。

除中央委员会各分部外，1905年底以前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首都还建立了“10月17日同盟”市委员会。在地方上还建立了60个同盟的支部。1905—1907年总共有260个支部，其中大部分是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期间出现的。这一时期共有党员7.5—7.7万人。

从地理位置上看，“10月17日同盟”的绝大多数地方支部分布在俄国欧洲部分贵族土地占有制相对发达的地方自治省。在其他非自治省，尤其在少数民族边区，十月党人的组织不多。在农村也有一些十月党人支部（30个左右）。

在组织方面，“10月17日同盟”是一个松散的结构。十月党人从一开始就允许具有双重党籍，可以同时参加其他政党和组织。参加“10月17日同盟”并不一定履行特别的义务，如缴纳党费。大多数普通党员把党看成一个辩论俱乐部，而不是一个应该遵守严格纪律和等级制度的组织。由于十月党人社会出身的缘故，他们从来不接受其他革命政党党员那种为党的目标而献身的精神。亚·古契科夫坦率地说：“在俄国国家制度方面，我

们是坚定的君主派……但是在我们党内制度方面，我们是彻头彻尾的共和派，甚至还有某些无政府主义倾向……我们很难在党内树立起必要的纪律”。

就社会成分而言，“10月17日同盟”是贵族或贵族化的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的政党。他们拥护君主制，又想实行一些有利于自己的改革。同盟的创立者曾试图吸收更多的居民阶层，首先是工人和农民入党，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尤其是经过两次选举运动以后，党的领导人终于悟出他们不可能得到大多数居民的支持。1907年在十月党人一次中央会议上，他们终于承认：“我们是贵族的党”。

主要纲领性原则

“10月17日同盟”制定纲领的工作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05年11月以前，制定了纲领第一稿，发表了由33名第一届中央委员签署的纲领性宣言。第二阶段是1906年至1907年上半年。1906年2月，“10月17日同盟”的纲领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加工修改后获得通过，1907年5月第二次代表大会又对纲领进行了加工修改。第三阶段包括两次党代表会议（1907年10月和1913年11月）和第三次代表大会（1909年10月）。在这一时期，某些纲领性原则得到具体化，并作为立法案提交杜马。

纲领的中心问题是俄罗斯国家权力的性质问题。纲领第一条指出：“俄罗斯帝国是一个世袭的立宪君主制国家，沙皇作为最高权力的代表者受基本法规定的若干决议的限制。”因此十月党人反对保存无限君主制。与此同时，他们坚决反对在俄国实行议会制，认为无论从历史还是从政治角度看，议会制都是行不通的。他们认为，保存君主政体是为了保证“同过去的联系”使

“国家的航船沿着正确的航向航行，防止无谓的风暴和颠簸”。十月党人还认为必须保证立宪君主的“专制”地位，认为这个地位是俄国的“历史财富”。

根据十月党人的构想，俄国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包括君主（实行统治和管理）和两院制的“人民代表制”。人民代表机构按有财产资格限制的选举制选举产生，在城市实行直接选举，其他地方实行间接选举。下院国家杜马按这种办法选举。上院国务会议的半数成员由君主任命。上院是一个有限资格的机关，其作用是，纠正和修改国家杜马的决议。在确定“人民代表机制”和君主的权力分配时，十月党人明显偏袒后者。没有沙皇的同意，任何法律都不能生效或废除；沙皇有权任命或撤换大臣，尽管理论上大臣对君主和“人民代表机关”负有同样的责任。实际上，立法院、上院和下院只能进行立法倡议、咨询和批准预算，没有真正的立法和监督权。

在公民权利方面，十月党人纲领中列举了自由派政党通常提出的那些原则，如信仰自由，人身和住宅不受侵犯，言论、集会、结社、迁徙自由等等。就其内容而言，十月党人纲领中这一部分最具有民主主义精神，但是他们在实践中根本不遵循这些原则，经常违反这些原则，尤其当涉及犹太人的公民权利时。他们在纲领中提出这些原则不过是赶时髦或做做样子而已。

在纲领的民族问题部分里，十月党人认为必须保存“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俄国，反对“任何直接或间接支解帝国的企图和联邦制思想”。但是芬兰可以例外，在一定条件下，芬兰可以拥有建设“自治的国家制度的权利”。在谈到少数民族的权利时，十月党人同意满足他们的文化“要求”，但是不同意满足他们的政治“要求”。在解决俄国尖锐的民族问题时，十月党人没能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大国主义思想的束缚。

“10月17日同盟”纲领中有很大篇幅谈社会问题，首先是土地问题。十月党人意识到少地农民的艰难处境，认为应该满足农民关于扩大土地的要求。他们提出如下具体方法：第一，国家通过专门的土地委员会将空闲的官地、皇室土地分给农民；第二，通过农民银行“鼓励农民从土地私有者那里赎买土地”。纲领还提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强制出让‘私有者的’部分”土地，同时对土地所有者给予必要的奖励。十月党人对农民说，赎买土地“应该价格公平，不能损害地主经济，不能无偿地掠取土地。这样不公平，也不会有好结果。”实际上，十月党人维护的是地主经济的利益，只有在形势的压力下才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10月17日同盟”是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组织，所以十月党人纲领中关于工人地位的问题阐述得非常模糊。他们先是谈提高工人的文化教育水平和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问题，然后才涉及到企业主和工人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停工是违背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他们严格禁止罢工。在关于工作日长度的问题上，十月党人的立场是努力维护企业主的利益，在纲领中只是非常笼统地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只谈“调节”“工作时间过长和”调整”加班问题。十月党人B.W.彼得罗沃-索洛沃沃在一本小册子中说：“当然，我们同盟欢迎缩短工作日，如果不影响工业和贸易的话，但是不能坚持必须……实行8小时工作制”。十月党人认为，由于俄国技术落后，而且宗教节日太多，同西欧相比，把工作日缩短到欧洲水平会使俄国商品价格昂贵并失去竞争能力。

十月党人的纲领显然在维护剥削阶级，而且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的利益。1905—1907年革命期间，他们就同劳动群众处于对立状态。他们的命运同整个剥削阶级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

三、陛下的反对派——立宪民主党

立宪民主党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自由主义运动发展的产物。俄国知识分子精英感到，落后的上层建筑——沙皇专制制度越来越不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当局和社会之间的冲突越来越严重。这种情况导致国内局势不稳，国家前途面临巨大威胁。他们希望通过议会道路对国家进行彻底的变革。虽然立宪民主党领袖帕·尼·米留可夫（1859—1943）声明立宪民主党是一个“非阶级的”“符合”俄罗斯知识分子情绪的政党，但是从立宪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判断，它无疑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党。

党的组织情况和社会性质

1905 年 10 月，立宪民主党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党章和党纲，选出了党的临时中央委员会。1906 年 1 月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立宪民主党最终彻底形成。此次代表大会决定在党的主要称谓“立宪民主党”之外再补充“人民自由党”的称谓。会上选出了新的中央，对纲领和章程作了某些修改。

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由两部分组成：彼得堡分部和莫斯科分部。彼得堡分部的主要职能是进一步制定党的纲领，制定向国家杜马提交的法案，领导杜马党团。莫斯科分部主要从事组织鼓动宣传工作和出版工作。而总体上，由中央委员会监督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领导党的地方建设，定期召开省委代表会议，确定党在当前的策略路线。

各省建立省委员会，由省党代会每年改选一次。省委有权

组建市、县和乡委员会。

根据党章第二条，“凡承认党纲，愿意服从党章和党代表大会规定的党的纪律”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1905年10—12月已经有72个立宪民主党组织。它们主要分布在“解放社”^①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协会”^②从前活动的那些地方。大多数地方的立宪民主党组织是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中产生的。1904年1—4月已经有224个立宪民主党委员会。1905—1907年立宪民主党人数达5—6万人。

立宪民主党同大多数俄国政党一样，在组织上相当分散。实际上，立宪民主党中央始终未能同地方组织建立起稳固的经常性的联系。省一级党的“事务”处于根本无人管理的状况。甚至在一省范围内，省委和县委之间的联系也带有一种偶然性质。立宪民主党领导机关通过的决议往往在很久之后才能下达到县级组织，更不用说乡级组织，因此跟不上形势的要求。

中央委员会和杜马党团之间的关系相当混乱。立宪民主党杜马党团是自治性质的，实际上不受中央组织的监督，往往根据议会形势和党团之间的关系制定行动路线。如果说第一、二届杜马期间立宪民主党中央尚能对党团进行监督的话，那么在第三、四届杜马期间杜马党团基本上是自行其事。

参加立宪民主党的主要是俄国知识分子精英、一些具有自由主义情绪的地主、城市中等资产阶级、职员、教师、医生、店员。立宪民主党的社会成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 ① “解放社”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1904年1月成立，由《解放》杂志周围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运动左翼代表组成。
- ② 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协会是俄国自由派地主、地方自治运动参加者的秘密的政治团体，1903年11月成立于莫斯科。

1905—1917 年革命期间，地方党组织中有很多“社会基层”代表工人、手工业者、职员，乡组织中还有农民。革命失败后相当一批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对立宪民主党在第一、二届杜马中的政治行动路线表示失望，纷纷退党。

1907—1917 年这一时期，立宪民主党内的城市中等阶级的代表人物不断增加。党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关系不断密切，包括商人、工业家和银行家。二月革命胜利后，党的社会成分又发生了变化。“10月17日同盟”进步党^①的成员和从前一些君主派组织的代表开始参加执政的立宪民主党，使党的成分更加混杂，党内形势更加混乱。

立宪民主党的领袖及主要理论家是帕·尼·米留可夫。米留可夫 1859 年生于莫斯科一位建筑师家庭，曾就学于莫斯科大学历史语言系。1892 年米留可夫通过硕士论文答辩，从此开始教授生涯。1894 年，米留可夫因参加解放运动被大学开除并被行政流放到梁赞。1897 年留放期满后，他被迫到国外，先后在索菲亚大学和波士顿大学授课。1899 年他回到彼得堡后参加了当时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展开的思想政治斗争。不久，米留可夫因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再次被捕并在拘留所和监狱关押一年。

作为历史学家和“极左派革命家”米留可夫在俄国和西欧社会各界享有很高声望。旅居国外期间，他经常会见各政党的

^① 进步党是俄国大资产阶级和实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地主的政党，1912 年 11 月成立。1915 年夏，该党同其他地主资产阶级政党的第四届杜马党团联合组成进步同盟。

领袖 彼·阿·克鲁泡特金、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①、维·米·切尔诺夫、弗·伊·列宁以及美、英、法、巴尔干各国的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

意识形态和纲领

立宪民主党人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进步的最佳方案。他们反对社会革命的思想，主张社会渐进发展。但是，他们也承认在某种情况下可能甚至必然发生政治革命。如果当局不能及时解决那些客观上成熟的历史任务，就会发生政治革命。他们认为，政治革命是政府“不理智”政策和不能及时进行改革的结果。

立宪民主党理论家认为，1861年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物质生产方式的基础。但是这次改革实际上没能触动政治上层建筑。当局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基础同旧的封建上层建筑之间的“剪刀差”。立宪民主党纲领中的基本思想是对旧的国家政权逐渐改良。他们要求用立宪君主制代替无限君主制，立宪民主党人的理想是英国式议会立宪君主制。他们主张实行立法、执行和司法三权分立，要求建立对国家杜马负责的政府，对地方自治和法院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主张在俄国实行普选制，实现一系列民主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要求严格遵守个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在当时俄国的形势下，立宪民主党的政治纲领具有进步意义。

- ① 彼·阿·克鲁泡特金（1842—1921），俄国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 ② 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1844—1934），俄国社会革命党组织者和领袖之一，曾参加到民间去运动和1905年革命。
- ③ 维·米·切尔诺夫（1873—1952），俄国社会革命党领袖和理论家之一。

但是，立宪民主党人仍然坚持大国主义，继续奉行俄国单一制的国家体制。他们不承认各民族的政治自决权。在民族纲领中，立宪民主党人只限于要求民族文化自治（在学校、法院等场合使用民族语言），认为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才可以实行区域自治。

在土地问题上，立宪民主党人认为，不部分地强制出让地主土地就不能解决俄国的土地和农民问题。他们准备牺牲大地主土地占有制。与此同时，立宪民主党人认为，也可以让那些独立经营的地主出让部分土地。他们主张通过赎买方式出让地主土地，主张由地主、农民和官吏代表组成的土地委员会解决土地问题。

因此，与试图维护大地主利益的十月党人不同，立宪民主党人主张更进一步“清除”土地制度中最粗暴野蛮的半农奴制剥削方式，建立“典型的”纯资本主义经济。

立宪民主党关于工人的纲领的中心内容是要求工人有言论、集会和罢工自由。他们希望把工联主义移植到俄罗斯的土壤上，认为建立合法的工人协会有助于和平地调节劳动和资本、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相互关系。当时已经在公开建立工会组织，但是其法人资格需由司法当局决定。工会可以捍卫工人的物质利益，利用罢工基金和失业救济金，有权建立工会联合会并完全独立于行政部门。立宪民主党人主张必须由工会同企业主签订集体合同，而且只有通过法律程序才能取消这种合同。

立宪民主党人主张在工人和资本家代表参加下由专门的仲裁机关（调停所、仲裁法庭和各种协商委员会等）解决劳动关系问题。他们认为，建立调停所可以防止罢工的发生。与此同时他们认为，在工会领导同资本家谈判未果的情况下，工人有权宣布罢工。

工作制和工人的社会保障问题在立宪民主党工人纲领中占有重要地位。纲领中提出逐渐实行 8 小时工作制、缩减成年工人的超时劳动，禁止让妇女和儿童超时劳动。立宪民主党人主张，工人由于不幸事件和职业病而丧失劳动能力时，应该对他们进行补偿。补偿费应该由企业主承担。应该实行养老、生病、死亡的国家保险制度。

立宪民主党提出了相当广泛的财政和经济改革纲领。纲领的基本要求包括：在大臣会议下设专门机构（吸收立法机关和实业界代表参加），研究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长期发展规划；修改过时的工商业立法，废除限制实业活动自由的琐碎监管制度；修改税制，缩减国库的非生产性开支；扩大国家杜马的预算权，建立国家监察总署，向私人资本开放铁路建设、矿业、邮电事业，取消或最大限度地缩减非赢利企业；对所有官办工厂实行所有税种的征税；建立工商会和交易法庭；扩大外贸，建立领事部。立宪民主党经济纲领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教育问题上，立宪民主党人在纲领中主张在入学方面取消性别、民族和信仰等各种限制，个人和社会团体有开办各种学校和校外教育机构的自由。纲领指出，必须在各级教育之间建立联系，以利于从低级教育向高级教育过渡。立宪民主党人还主张大学自治，高等学校教学自由，自由招收大学生，扩大中等学校数量和降低学费，实行普遍、免费和义务初等教育。纲领还指出，地方机关必须建立成人普通教育机构，建立大众图书馆、人民大学、发展职业教育。

从 1908 年起，立宪民主党纲领理论家开始重视制定对外政策纲领。他们对外政策纲领的实质是建立俄罗斯自由派世代所幻想的“大俄罗斯”。

总而言之，立宪民主党纲领反映了对国家进行民主改革的

一般民族利益。他们幻想建立一个没有不可克服的阶级冲突的“理想”社会，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为个性的发展创造理想的条件。但是俄国事态的发展表明，立宪民主党人在关键时刻都反映了他们同资产阶级的密切关系和对专制政府的暧昧态度。他们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民。立宪民主党经常表现出对君主制的忠心。党的领袖米留可夫曾声明：“只要俄国有监督预算的立法院，俄罗斯反对派依旧是陛下的反对派，而不作别人的反对派。”

四、农民社会主义的鼓吹者——社会革命党

社会革命党在俄国政党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它是人数最多、最有影响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很快便成为一股最大的政治力量，人数达到百万人，在地方自治机关和大多数社会团体中占有统治地位，在立宪会议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它的代表在政府中担任很多重要职务。稍详细地研究和介绍该党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20 世纪初俄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历史因素对当代俄罗斯的影响。

社会革命党的出现

社会革命党的形成时期相当长。成立大会是在 1905 年底至 1906 年初召开的，但是早在 19 世纪中叶就有一些组织以这个名称活动。1894 年在伯尔尼成立了“俄国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1895—1896 年在基辅出现了社会革命党人小组，萨拉托夫出现了“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

在俄国解放运动发展的新时期，无产阶级取代平民知识分

子成为主要力量，主要搞个人恐怖斗争和阴谋活动的民意党人的威信迅速下降。“民意党人”的称呼本身也越来越失去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民粹派分子开始使用“社会革命党人”的称呼。他们之所以使用这个名称，首先是为了同民意党人和自由主义民粹派拉开距离，同时也是为了同社会民主党人拉开距离。此外，“社会革命党人”的称呼是当时革命民粹派别和组织都能接受的称呼。

19世纪90年代中期在沃罗涅日、彼得堡、奔萨、波尔塔瓦等地又出现一些社会革命党组织。这些组织曾尝试联合起来并曾召开若干次代表大会（1897年8月在沃罗涅日，1897年11月在波尔塔瓦，1898年8月在基辅）商讨联合问题。

社会革命党人的主要理论家是维·米·切尔诺夫（1873—1952）切尔诺夫生于萨马拉省新乌津斯克市。祖父是农奴，父亲是出纳员，曾获个人贵族身份。1894年切尔诺夫在莫斯科大学法律系读书时因民权党人^①案件被捕。在经过一年半的监禁后，先被流放回老家，后又被流放到坦波夫市。在他的协助下，当时坦波夫省建立了俄国第一批革命农民协会。在他的努力下，1900年在外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土地同盟，任务是帮助俄国农村的革命工作。1901年底，切尔诺夫加入社会革命党，成为党的主要理论家，参加了社会革命党所有期刊的编辑工作，是党中央委员。切尔诺夫的理论观点既受西方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著的影响，也受民粹派经济学家弗·巴·沃龙佐夫和尼·弗·丹尼尔逊的著作的影响。切尔诺夫的理论观点对社会革命党意识形态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① 民权党是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秘密团体，全称是“社会革命民权党”，1893年成立，1894年被沙皇当局破坏。后来它的多数党员加入社会革命党。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社会革命党人运动史上的转折时期。由于工业危机、1901 年饥荒、工人和大学生骚乱的增加和政府镇压措施的强化，社会形势严重恶化。民粹派的著名活动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甚至提出恢复恐怖活动。很多人在这一时期加入社会革命党组织，有些是曾服过苦役的民意党人。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后来成为该党著名人物，如米·拉·郭茨、O. C. 米诺尔以及大批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如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阿·拉·郭茨、弗·米·晋季诺夫、И. И. 冯达明斯基。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的创建人、党的创建者之一的格·安·格尔舒尼放弃文化启蒙活动并加入秘密活动。这一时期出现一些出版物：在国外出版了《前夕》杂志（1899 年 伦敦）《俄国革命通报》（1901 年，巴黎）等等。

1897 年，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从萨拉托夫迁到莫斯科，不断扩大自己的活动区域，在彼得堡、雅罗斯拉夫尔、托木斯克等地都有一批拥护者。

1899 年，在明斯克成立了俄国解放工人党。党的纲领性小册子《自由》一书中指出，只有经常性的恐怖才能使俄国获得政治解放。

与此同时 国外的社会革命党人开始联合 各种流派的代表都在《前夕》杂志和《俄国革命通报》上撰稿。1900 年在巴黎建立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是走向联合的具体表现之一。切尔诺夫是建立同盟的发起人，他还为此写了一篇纲领性文章《革命事业的迫切问题》。同盟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农村工作并出版有关宣传品。这项具体工作使同盟联合了国外各种民粹派组织的代表。同盟还同社会民主党人的《火星报》编辑部达成协议 由《火星报》编辑部发行同盟出版物。

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在联合的问题上还有一些障碍，条件尚

不十分成熟，主要是存在一些分歧，包括理论、纲领和策略问题上的分歧，政治改革的规模和速度方面的分歧，各阶级在改革中的作用问题上的分歧，斗争方式和方法问题上的分歧，尤其是在恐怖问题上的分歧。在建党原则问题上也有分歧。俄国政治解放工人党和南方的党组织主张按联邦制原则建党。他们认为，在秘密活动条件下很难由“合适人选”组成一个中央，而中央被破坏的话势必导致整个事业垮台，就像民意党那样。但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领导人持另一种观点，主张把社会革命党人联合成统一的全俄政党。但是在建党原则问题上，他们既不主张联邦制，也不拥护集中制，认为党应该围绕共同的事业发展。所谓共同的事业，他们首先指的是出版报纸。

1901年12月联合会领导人M.Ф.谢柳克在柏林同格·安·格尔舒尼等人经过协商同意将南方的社会革命党人和联合会联合成统一的社会革命党。1902年1月在国外出版的《革命俄国报》报道了这个消息。《革命俄国报》和《俄国革命通报》杂志被确定为党的机关刊物。一般认为，上述消息的发表日期为社会革命党的建党日。后来，格尔舒尼回到俄国，说服许多俄国组织加入社会革命党，结果所有社会革命党人组织都联合起来了。

在19世纪90年代初的革命形势下，社会革命党人的威信不断提高，人数不断增加，地方组织不断发展。1905年初已有40多个委员会和小组。

社会成分和组织结构

秘密活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的人数很难确定，因为组织不稳定，也没有对党员进行登记。根据警察文件估计，第一次俄国革命前的10年里，有2—2.5万社会革命党人。按社会成分划分，

大部分人是知识分子，占 70% 以上，工人占 26%，农民占 1.5% 左右。据近年俄国出版的史学著作介绍，社会革命党不仅在世界观方面不同于其他党派，其思想方法、心理也与其他政党不同。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是些理智、稳健、性格内向的人，而民粹主义者（尤其是右翼民粹派）通常是些易于感情用事、在精神和道德上未得到满足的人。这种情况对党的发展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众所周知，政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其效率是由组织性决定的。社会革命党的组织性远远不如布尔什维克。据切尔诺夫说，他们同布尔什维克好像是处在两个极端，社会革命党人的缺点是“组织上的虚无主义，没有明确的组织界限”。在宣布建党时，根本没有谈组织结构问题。至今没有确切材料谈中央委员会成立的时间和组成情况，作为党的基础的地方组织、委员会和小组，是按地区原则建立的。每个组织中通常有宣传员协会、鼓动员会议和技术组（印刷组和运输组）从事出版、保存和散发书刊的工作。

社会革命党的战斗组织影响很大。这是负责搞恐怖的组织。1901 年秋，格尔舒尼开始组建战斗组织。1902 年 4 月战斗组织宣布正式成立，当时的任务是暗杀内务大臣德·谢·西皮亚金。战斗组织是一个集中的纪律严明的组织，其成员分散居住，随时听从组织领导的招呼。该组织在党内享有自治权，中央只是给它下达恐怖活动的任务，指出施行恐怖的合适时机。战斗组织有自己的金库、秘密接头地点、地址、住所。中央无权干涉其内务事务。在战斗组织的整个存在期间（1901—1908）总共有 80 多名战斗队员。战斗组织的领导人格尔舒尼（1901—1903）和亚捷夫（1903—1908）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组织者和最有影响的人物。但是亚捷夫实际上是沙皇政府警察司的奸细。

1902年，为了扩大党在农村的工作，建立了社会革命党农民联合会，1903年5月又成立了人民教师联合会。1903—1904年一些委员会中开始建立“工人联合会”，负责在工人中开展工作。

社会革命党地方组织之间，地方组织和中央之间的联系都很薄弱。联合初期，社会革命党人与其说是实现组织上的联合，不如说是由《革命俄国报》实行思想上的联合。

纲领、意识形态、策略、章程

早在1902年社会革命党人就开始讨论纲领问题，但是1904年5月纲领草案才在《革命俄国报》上发表。1906年1月初社会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纲领草案（第四稿）作了某些修改后被通过。维·米·切尔诺夫是纲领的主要起草人。

社会革命党人是旧民粹派的直接继承者。旧民粹主义的实质是俄国有可能通过非资本主义途径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社会革命党人根据20世纪初俄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的变化，对民粹派关于俄国特殊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作了重大修改。

社会革命党纲领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分析当时的资本主义；第二部分分析当时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第三部分分析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特殊条件；第四部分论述这一运动的具体纲领，各条款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国家与法律、经济和文化。

社会革命党纲领在分析资本主义时，特别注意资本主义消极破坏性和积极创造性方面的关系。这是社会革命党经济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一。消极方面指“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而积极方面指“内容本身”即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至于消

极方面和积极方面的关系，则被界定为在工业领域和工业发达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较好，而在农业领域和农业国家则不好。根据这个理论，这种关系越好，资本主义所起的创造性作用就越大，就会越积极地实现生产社会化，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创造物质条件，促进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和联合。社会革命党人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其创造性的、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倾向同黑暗的、野蛮的破坏倾向”之间的关系是最不理想的。在俄国农村，资本主义主要起破坏作用。不难发现，这里并没有否定旧民粹派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反动性的理论，只是针对农业作了某些修改。

社会革命党人认为，国内社会力量的组合是由资本主义积极和消极方面的不良关系决定的，是由存在专制警察制度、存在宗法制关系的事实决定的。同社会民主党人不同，社会革命党人不认为社会上有三个阵营，而认为只有二个阵营：一个是受专制制度保护的阵营，是贵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官僚；另一个是工业无产阶级、劳动农民和知识分子阵营。

贵族土地所有者阶级被认为是俄国专制制度的主要支柱。该阶级保存了第一等级过去所有的特权（除了可以拥有农奴的权利），但是，1861年改革后，这个阶级的基础在不断削弱。他们在失去主要财富——土地，人数在减少，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思想生活中的作用在降低。这个阶级中有进步情绪的代表在脱离它。极端的反动分子，即所谓的“死硬派”在这个阶级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贵族土地所有者阶级日益变成“国家的荣誉寄生虫”成为主张变革的社会力量所鄙视和仇恨的对象。他们感到了自己生存的危险，因此同独裁政权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支持和鼓励它的反动政策。

关于资产阶级被列为第一阵营，社会革命党人是这样解释

的，首先是因为资产阶级历史较短，政治上不成熟，产生的条件特殊。在欧洲，专制制度能战胜封建主义要感谢资产阶级；而在俄国则相反，资产阶级应该感谢专制制度。资产阶级实际上是政权的宠儿。他们享受各种特权 贷款、各种补贴、出口奖励、收入保障、官方定货、保护性关税，等等。俄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具有集中的特点，他们甚至脱离小资产阶级。

由于外资的引进，工业中出现辛迪加化现象，这使资产阶级组织中的政治联系得到加强。这些资产阶级组织往往能够得到政府的立法保护。因此，工商业资产阶级中层人物有“不成文的法律”特权 在经济方面 这种“不成文的法律”比针对所有人的宪法更优越。俄国国内市场较小，在国际市场上，俄国资本无法同发达国家资本进行自由竞争。它只有在俄国的领土上，在沙皇俄国的关税保护下才能平安生存。俄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胃口只有依靠专制制度的军事实力才能实现。因此资产阶级同贵族和上层官僚的关系非常好。资产阶级广泛吸收高官贵族参加自己的企业。专制制度成了资产阶级的保护人。

农民在社会革命党的理论和实践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社会革命党人认为，就其人数和经济作用而言，农民“几乎决定一切”而他们在法律和政治上又处于“根本无权地位”。切尔诺夫认为，他们同外界只有一种联系，即纳贡。社会革命党人不认为农民经济是小资产阶级经济，不同意农民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经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极分化才能走向社会主义的观点。在这方面，社会革命党人继承了民粹派经济理论家的观点，认为农民是稳定的，它可以抵抗大经济的竞争。社会革命党人认为，农村的村社—合作社关系培育了一种独特的劳动法律意识，这种意识很容易同先进知识分子宣传的农业社会主义结合

起来。^①

关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首先认为，同农村的贫穷困苦相比，城市工人生活得要好些，但是比西欧无产阶级生活水平要低得多。俄国工人没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没有规定改善他们生活的法律。因此任何经济性质的行动往往导致同当局的冲突，变成政治行动。由于工人没有合法的行业组织，工人的发动通常是由秘密的政党组织和领导的。社会革命党人承认，工人阶级人数少于劳动农民，但是优势在于他们集中在国内文化和政治中心 因此他们是“最活跃、积极和进步的社会阶级”是现存制度最危险的阶级。他们还非常重视工人同农村的联系。

社会革命党人认为，知识分子属于一个独立的社会范畴，是从事精神价值生产和传播的创造性劳动的社会群体，他们往往倾向于最能反映社会发展利益的阶级。社会革命党人认为，俄国知识分子是反资产阶级的。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大于创造性，因此资产阶级在精神方面是无所作为的，在政治和道德方面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对知识分子没有吸引力，他们那些不良品质倒会促使知识分子反对他们，使知识分子转向社会主义和劳动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

社会革命党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重要特点是土地社会化理论，这个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俄国社会主义应该从农村开始。社会主义的基础，它的早期阶段应是土地社会化。土地社会化首先是指废除土地私有制，但不是把土地变成国有财产，不是实行国有化 而是变成不能买卖的全民财产。第二 将全部土地转交中央和地方人民自治机关（包括用民主方式组建的农村和城市村社以及州和中央的有关机关）管理。第三，土地应该按照“平

^① 《俄国政党史》1994年莫斯科版第155页。

均一劳动”的原则进行使用，即所有劳动者都具有平等使用土地的条件。土地社会化最终将会导致农业社会化，即借助各种形式的合作社使农业生产社会化。

社会革命党人认为，社会主义的最主要条件，它的主要形式是政治自由和民主。切尔诺夫曾讲：“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就犹如一个没有灵魂的躯体”。政治民主和土地社会化是社会革命党最低纲领的基本要求。纲领还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实施各种公民权：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自由，人身和住宅不受侵犯，年满 20 岁的公民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纲领还要求对各州、城市和农村村社实行广泛的自治，尽可能广泛地在各地区之间实行联邦制关系并承认他们有绝对的自决权。社会革命党人比社会民主党人更早就提出了俄国的联邦制问题，他们还更大胆地提出了在选举机关内实行按比例分配代表和实行直接的人民立法、全民公决、提案权的思想。

在国民经济方面，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首先注重重新分配已有的财产和收入。具体提出了以下措施：在国家经济和财政政策方面实行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彻底免除低收入的税赋；取消间接税、保护税和针对劳动者的各种征税。在工人立法方面，要求用立法规定最长工时（8 小时工作制）和最低收入，由国家和工厂主为工人交纳保险并实行保险人自己管理的原则；建立工会并让其参加工业企业的劳动组织工作。在改造土地关系方面，社会革命党人主张，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和反对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斗争，应该依靠俄国农民的生活传统和形式、他们关于村社和劳动的观点，尊重农民关于“土地是无主的，谁劳动谁就有权使用”的信念。在实行土地社会化时，应该在付赎金的情况下将土地变成全民财产。

在社会制度改造方面，社会革命党人在纲领中首先要求召

开立宪会议。他们对专制制度持不妥协的态度，认为只有通过暴力，即革命手段才能推翻它。

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认为，由于现实生活复杂多变，策略方式应该多种多样，包括宣传、鼓动、和平的议会斗争和各种议会外的、暴力的斗争方式（罢工、抵制、武装示威、武装起义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社会革命党人承认个人恐怖是政治斗争的手段。他们并不认为恐怖是“唯一的和万能的斗争手段”，但认为它是“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最极端和坚决的”手段之一，恐怖是鼓动和唤醒社会、动员革命力量的有效手段。他们特别推崇针对有权势的、极端反动的国务活动家的中央恐怖活动。中央恐怖由战斗组织实施。1905—1907年革命前，战斗组织的活动最有成效，被他们枪杀或打伤的人有：内务大臣德·谢·西皮亚金（1902年4月2日被斯·瓦·巴尔马晓夫枪杀）和维·康·普列维（1902年7月15日被E.C.索佐诺夫杀害）哈尔科夫省省长伊·米·奥勃连斯基公爵（他曾残酷镇压波尔塔瓦省和哈尔科夫省1902年春季的农民骚动，1902年7月29日他被Ф.К.卡秋拉致伤）乌法省省长H.M.波格丹诺维奇（他因组织屠杀兹拉托乌斯特工人而于1903年5月6日在兹拉托乌斯特被O.E.杜列波夫枪杀）。1905年2月4日莫斯科总督、沙皇的叔父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被社会革命党战斗队员伊·普·卡利亚耶夫投放的炸弹炸死。

恐怖活动提高了社会革命党的知名度。但是在群众革命工作方面，他们明显逊色于自己的主要政治竞争伙伴——社会民主党人。根据警察司的材料，1901—1904年社会革命党人有37个印刷所而社会民主党人有104个，社会革命党人印277种革命书刊而社会民主党人印1903种。社会革命党这一时期在工人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明显不如社会民主党人。

社会革命党的组织章程（临时 1906 年 5 月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直到 11 年后在 1917 年召开的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才对这个章程作了一些重要补充。组织章程共有 8 条。第一条规定党员资格：“凡承认党纲，服从党的决定并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这一条中没有谈交纳党费的问题。章程也没有规定党员必须在党的一个组织中的具体工作义务。

党的最高机关是党代表大会，每年应至少召开一次。实际上这一条没能得到遵守。党存在的整个时期只召开过四次代表大会，两次在第一次革命时期，两次在 1917 年。代表大会选出由 5 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负责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领导党的活动。当选的中央委员有权增补中央委员，但总人数不超过 5 人。社会革命党第一届中央委员有叶·菲·亚捷夫、A. A. 阿尔古诺夫、尼·伊·拉基特尼科夫、马·安·纳塔松和弗·米·切尔诺夫。中央任命党的中央机关报责任编辑和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中央下设专门委员会或局，有农民局、工人局、军事局、书刊出版局、技术局，等等。

党章还规定建立党务会议制度。党务会议由中央委员、各州、彼得堡和莫斯科委员会的代表参加。党务会议根据需要由中央或一个州党组织倡议召开，讨论和解决策略及组织方面的迫切问题。第一次党务会议于 1906 年 5 月召开，最后一次第十次党务会议于 1921 年 8 月召开。

五、举黑色旗帜的无政府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学说产生于古希腊和中世

纪，具有悠久的历史。它作为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潮形成于 19 世纪 40 年代。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在这个历史中占有一定位置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米·亚·巴枯宁（1814—1876）和彼·阿·克鲁泡特金（1842—1921）。巴枯宁是暴力革命改造世界的理论的始祖；克鲁泡特金则创造了无政府共产主义（不要国家的共产主义）理论。从 18 世纪法国革命时起，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人就以黑颜色作为自由的象征，从那时起，黑颜色一直是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标志。

俄国无政府主义的形成

早在 19 世纪 40—50 年代 亚·伊·赫尔岑等思想解放的激进代表人物就表现出无政府主义思想成分。这一时期德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麦·施蒂纳和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波·约·蒲鲁东发表了阐述无政府主义理论的著作，对俄国有一定的影响。俄国无政府主义是 19 世纪 70 年代在巴枯宁思想的影响下作为一种群众社会运动确立下来的。无政府主义对民粹派的社会政治观点有一定的影响。

巴枯宁主张通过废除国家来实现社会革命。他认为，国家是一切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他在《国家与无政府主义》一书中写道：“我们是所有政权的敌人 所有国家的敌人”。巴枯宁只承认一种革命斗争形式——立刻举行工人群众的全民起义，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在它的废墟上自下而上地建立“自由生产者联合会”。他认为，举行全民起义的主要障碍是村社的封闭性和农民的分散性，因此应该打破农民的封闭性，在工厂工人和农民中间建立起联系，在此基础上建立一支牢不可破的、能立刻在全国进行社会革命的力量。

俄国早期的平民知识分子小组积极地接受了巴枯宁的思想。

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初起，克鲁泡特金也开始自称无政府主义者。他为当时的柴可夫斯基小组起草纲领性文献《我们是否应该研究未来的理想制度》，指出未来理想的制度是“无政府主义”即没有中央国家权力的“自由公社联盟”。

当时许多俄国青年信奉无政府主义。70 年代政府审理的几宗革命者案件中，最著名的被告都以自称无政府主义者为荣。

后来，克鲁泡特金进一步发展了无政府主义理论。19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初，他写了一系列著作（《一个反叛者的演说》、《夺取粮食》、《无政府主义的哲学和理想》、《国家及其在历史中的作用》等等）阐述了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他认为：“无政府主义乃是一种机械地理解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现象的世界观。”

克鲁泡特金非常重视革命理论问题。他认为人民对革命发动尚未做好准备，因此提出建立无政府主义政党，“以便进行冷静的思想准备工作”。他认为，社会革命乃是历史发展合乎规律的现象，是一次跃进，最终会导致彻底消灭所有国家设施和机构。在推翻旧制度后可立刻实行无政府共产主义。克鲁泡特金认为：“只有劳动者自己即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才能进行这场社会革命。他否认有必要建立革命政府，不承认任何革命思想。

20 世纪初的俄国，阶级斗争异常激烈，革命运动普遍高涨，为无政府主义的活跃创造了合适的环境。

组织结构和社会成分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最初是在国外开展活动。1900 年，日内瓦出现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流亡组织“国外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小组”。该组织发表了关于推翻专制制度和进行社会革命的

宣言。1903年，果戈利亚夫妇在日内瓦建立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小组‘面包和自由’小组对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运动有一定影响。在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帮助下，面包和自由派分子当年在国外出版了俄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机关报《面包和自由报》。

1900—1904年，在其他国家（保加利亚、德国、美国、法国）也出现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小组。1903年春，俄国国内开始出现无政府主义者小组。到1903年在西北、西部、南方的27个居民点共有29个小组。

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数量不断增加，1905年有125个，1906年有221个，1907年增加到255个组织，活跃在180个城市和居民点。

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社会基础主要有手工业者、商人、农民、一部分知识分子以及少数不满现存制度的工人。但是无政府主义组织中几乎没有产业工人。

1905—1907年革命期间，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是些18—24岁的年轻人，受过初等教育或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犹太人占50%，俄罗斯人不到41%，还有乌克兰人等等。年龄最大的当属运动创始人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理论家和领导人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

俄国无政府主义的主要流派

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俄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出现三个主要流派：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个人主义。

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克鲁泡特金和面包和自由派。他们的目标是实行“社会革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国家，代之以无政府共产主义。在政治方面，他们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国家杜马和立宪会议。在经济方面，他们主张实现工业的

非集中化，建立直接的产品交换和劳动一体化（城乡居民都可以耕种土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建立生产技术培训制度）。在土地问题上，克鲁泡特金等人认为，必须将通过起义得到的土地交给人民，即交给耕种土地的人，但又不是交给个人，而是归村社所有。

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思想家和组织者有雅·伊·基里洛夫斯基（丹·伊·诺沃米尔斯基）、鲍·纳·克里切夫斯基、弗·亚·波谢。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主要目标是使劳动完全彻底地摆脱各种形式的剥削和政权统治，建立作为劳动者主要的和最高组织形式的自由职业联合会。在各种斗争形式中，工团主义者只承认工人同资本的直接斗争，以及抵制、罢工、消灭财产和对资本家施用暴力等斗争形式。

无政府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有 A. A. 巴罗沃伊、O. 维肯特、H. 勃朗斯基。他们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认为这“既是出发点，也是最终理想”。他们主张把集体主义原则和个人主义原则结合起来，主张通过经常性的恐怖活动同专制制度斗争。

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与党内分裂

从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俄国工人阶级反对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风起云涌，罢工抗议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沙皇政府慑于罢工的规模，答应在 1897 年 1 月以前颁布缩短工作日的法律。1897 年 6 月 2 日，沙皇政府在拖延近半年时间后，终于在罢工浪潮的压力下，颁布了关于把工作日缩短到 11

个小时并规定节假日休息的法律。这件事表明，俄国无产阶级已变成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社会民主党通过实际接近无产阶级的斗争，开始引导无产阶级去认识工人的利益与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必须同沙皇制度进行政治斗争。

90年代的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都确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同西欧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当时领导进步的社会运动的是资产阶级）的命运是一样的。列宁则认为，俄国的情况与此不同。在俄国所有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争取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列宁还指出，社会民主党的使命是把工人的分散的经济斗争转变成整个工人阶级反对剥削制度的自觉的有组织的斗争。为此，就必须把无产阶级团结成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列宁认为，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在它的活动中要把理论工作与实际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形成的过程中，出现过形形色色的思潮。列宁为捍卫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同各种错误思潮和流派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潮之一是经济主义。经济主义和经济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科娃等人。经济派反对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提出政治要求，主张工人阶级只限于搞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此外，他们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定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否认从外部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的必要性，认为在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会自发产生社会主义思想。列宁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经济主义和经济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1899年）和《怎么办》（1901—1902年）著作中，对经济主义进行了批判。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

革命的运动。列宁通过分析工人运动中自发性和自觉性的关系，批判了经济派崇拜自发性的错误，指出社会主义学说是由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创立的，工人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列宁通过阐述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经济形式和政治形式的相互关系，指出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斗争不能局限于阶级斗争，而应通过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揭露来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使争取改良的局部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争。此外，列宁还阐述了众所周知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革命思想。

列宁不仅进行大量理论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还进行积极的革命实践活动。他为在组织上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做了大量工作。1895年11月他在彼得堡创办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是继1883年9月普列汉诺夫创办的“劳动解放社”后，俄国出现的又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组织，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列宁创办的《火星报》为在俄国建立战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列宁清醒地认识到，“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①他坚信：“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 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②列宁认为，党的核心应该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这些人要献身革命，具有坚定的理论信念和广阔的政治视野，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并无限忠于工人阶级。在秘密活动的条件下，集中制是党的最重要的组织原则。

《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414页。

② 同上第406页。

1898年3月1—3日(13—15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明斯克秘密举行。倡议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是列宁领导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早在1895年12月列宁就在狱中草拟了党纲草案,并提出了召开代表大会的主张。由于彼得堡等地的组织遭到警察破坏,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基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担任。代表大会选出了由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工人报》被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中央委员会在会后以大会名义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宣布了党的成立。但是这次大会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没有形成中央的统一领导,而且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大多数代表和中央委员遭到逮捕,所以统一的党实际上没有建立起来。

到20世纪初列宁创办的《火星报》编辑部当时已成为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领导核心。《火星报》在列宁的领导下为建立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加紧工作。编辑部为制定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原则做了大量工作。尤其在制定党的纲领方面,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都倾注了不少心血,他们分别起草了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虽然两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观点不同,但是都为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02年11月2—3日(15—16日)在普斯科夫召开的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上成立了组织委员会负责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大会。但是由于后来有2名成员被捕,组委会未能开展工作。1902年春天和夏天,列宁提出成立新的组织委员会并要求火星派在组委会中起主导作用。

1903年7月17日(3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成立代表大会召开,8月10日(23日)结束。前13次会议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后因比利时警察将一些代表驱逐出境,代表大会不得不迁移到伦敦,在那里举行了后24次会议。

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 26 个社会民主党组织。在代表大会上,43 名代表有 51 票表决权。按照代表大会的章程,每个享有全权的组织,不管它派来几名代表(2 名或 1 名)拥有 2 票表决权。23 个社会民主党组织有 2 票表决权。崩得,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拥有 3 票。2 个彼得堡组织各有 1 票。14 个人有发言权,其中 2 人是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代表大会上有时党内存在的各种思想派别的代表。有党内的主流火星派,也有火星派的各种反对派。

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在《火星报》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则基础和组织基础上建立真正的政党”。^①需要解决党的组织和党的活动的一些根本问题。大会的议事日程是:崩得在党内的地位、纲领和章程、党的地区组织和民族组织、党内工作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社会革命党人和俄国自由派的态度以及其他策略问题,选举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选举党的总委员会。

列宁认为代表大会对于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是把党内群众的意志变成法律的最高机关,他参加了所有最重要的决议草案的准备工作。他被选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纲领委员会和章程委员会的成员。列宁为使《火星报》的纲领和方针成为党的纲领和方针,为使《火星报》的组织计划能够在党章中固定下来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代表大会上,列宁得到了普列汉诺夫的积极支持。

在讨论崩得在党内的地位时,崩得分子主张按照民族主义原则,按照联邦制原则建党。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是为被压迫各族人民的团结和解放而斗争的战士,按民族特征把它分割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8 卷第 203 页。

开来，就会使它遭到削弱，因为多民族国家的统治阶级总是竭力使民族之间的不和永远存在下去，以此作为自己进行统治的基础。列宁提议，如果崩得分子一定要搞联邦制，那就立即散伙而单独召开会议。列宁主张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他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

党纲对工人阶级政党具有特殊意义：它决定党的本质、党的政治战略和策略。代表们一致决定以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所写的并由《火星报》和《曙光》杂志^①编辑部提交代表大会的纲领草案为基础。这个草案的特点是具有彻底的革命性，明确表达了党的最终目的和最近任务以及工人阶级在反对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党纲概括了俄国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

但在讨论党纲时与会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在讨论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问题时，与会代表阿基莫夫认为，无产阶级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看来大概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这个在今天看来已是明确的观点当时遭到普列汉诺夫的反驳。他说，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就是机会主义。普列汉诺夫说：“实际上，如果工人阶级的状况不断改善，如果越来越广大的群众现在也能得到这种改善，那么很自然，社会改良主义者便有一切可能和一切权利成为无产阶级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和维护者，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则只好站到机会主义旗帜下了。然而，不，阿基莫夫同志，我们不会站到那边去；越来越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的状况不断相对恶化和绝对恶化的事实，在召唤着我们站到

^① 《曙光》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

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之下。”^①

代表大会批驳了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贫困化的原理的做法。纲领中保持了下面这样一种提法：“危机和工业停滞时期使小生产者更加陷于破产，使雇佣劳动更加依赖资本，并更加迅速地引起工人阶级状况的相对的而有时是绝对的恶化。”

阿基莫夫还反对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写进纲领。他反对的理由是，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并没有类似的要求。他说：“当我着手研究我们现在所分析的纲领草案时……我发现几乎每一条都偏离了所有其他的纲领，有时是明显的，有时是隐晦的。”^②但是，《火星报》纲领草案的特点就在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纲领性文献之后，社会民主党第一次在这个纲领草案中明确地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列宁把阿基莫夫及其同伙的观点称之为社会改良主义观点。“他们发表了已经被称为被正确地称为机会主义的见解。他们已经达到了‘推翻’贫困化理论、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步。”^③

在审查纲领的一般政治部分的过程中，讨论到民主原则（普选权、国会选举等等）问题时，某些代表不顾革命斗争在某一阶段的具体阶级力量对比，想把这些原则绝对化。火星派代表指出，对待任何一项民主原则都应当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社会主义利益的角度出发。普列汉诺夫说，对于革命者来说，革命的成功是最高法则，如果为了革命的成功要求暂时限制某项民主原则的作用，比如普选权的作用，那么在这种限制面前停止下来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莫斯科版第131页。

② 同上第174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52页。

就是犯罪。革命的无产阶级可以限制上层阶级的政治权利，就像上层阶级限制它的政治权利那样。”^① 普列汉诺夫的讲话在代表中间引起强烈反响，赞赏的掌声和反对的嘘嘘声交织在一起。列宁高度评价普列汉诺夫的发言。1918年同考茨基论战时，考茨基攻击布尔什维克，说他们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那种所谓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看作神圣的东西，并且举了普列汉诺夫1903年的发言作例子。^②

在讨论民族问题时，列宁提出了全体公民不分民族完全平等、承认作为国家组成部分的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的纲领性原则，发展了各族工人联合成统一的阶级组织的原则。列宁所理解的民族自决是指有分离和建立独立国家的绝对权利。但是他强调，必须从阶级的立场、从国际主义的立场来解决民族问题，解决民族问题要服从无产阶级的任务。民族自决权——这首先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而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并不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分离。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纲领条文。

在讨论列宁所写的纲领的土地部分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列宁的纲领包括下列要求：废除赎金和代役租，废除限制农民支配自己土地的法律，把以赎金和代役租形式从农民手里勒索去的钱归还给农民，把1861年改革后从农民手里割去的并成为盘剥农民的手段的那部分土地归还给农民，成立农民委员会。不言而喻，实现这些要求就能够把农民从地主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就能够消灭农奴制残余并保证农村阶级斗争有自由发展的条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182页。

^②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637页。

件。

列宁的土地纲领的实质，就是要在全体农民作为一个阶级起来反对农奴制残余、反对地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建立并巩固工人阶级和全体农民的联盟。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支持并促使全体农民为摆脱地主霸道和专制压迫而斗争。列宁是从不仅为民主而且也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广阔前景来考察党的土地纲领的。他说：“我们相信，由于社会民主党现在为农民的利益进行了斗争，我们将来就会看到这样的事实：农民群众会习惯于把社会民主党看作他们的利益保护者。”^①

崩得分子、“经济派分子”等起来反对土地纲领。例如，马霍夫声明，土地纲领根本就不需要。他说：“如果说的是农民无产阶级，那我们可以拿出纲领总的部分；既然现在说的是农民的另一部分即非无产阶级部分，那我们就什么也不能给他们。所以，我建议将整个土地纲领全部否决。”^②马霍夫等人不承认农民的革命作用。他认为，无产阶级是唯一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他断言，农民革命即使发生，“那也不会是革命，而是反动”。^③他的观点受到大多数代表的反对。经济派分子马尔丁诺夫则批评纲领中关于“割地”的论点。他认为不能企图用归还农民割地的办法来纠正历史不公平现象。对此，列宁认为，把割地归还给农民这一要求的重大政治意义就在于，应当通过革命方式来实现这个要求，由被压迫阶级来实现这一要求。列宁还指出，把割地归还给农民只是解决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4页。

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230页。

③ 同上第225页。

土地问题的第一步。^① 在革命达到一定规模的情况下可以提出没收全部地主土地的要求。

土地纲领在代表大会上以多数票获得通过。

在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后，在一票（阿基莫夫）弃权的情况下，全体代表通过了《火星报》的整个纲领。这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普列汉诺夫在对纲领的讨论进行总结时说：“同志们 自觉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党 从现在起有了自己的纲领……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通过的纲领为我们无产阶级提供了一个同敌人进行斗争的牢固而可靠的武器。”^②

纲领确实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个重要文献，它回答了最广大的劳动群众所关心的问题，精辟地论述了资本主义及其所固有的社会对抗，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纲领着重指出，资本主义本身造就了工人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动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他们同剥削者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随着技术的改进、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的集中、劳动的日益社会化，造成了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前提。纲领中说：无产阶级革命将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将有计划地去组织生产，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消灭任何形式的剥削。

纲领指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特殊作用，即领导一切表现形

^① 后来，在谈到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纲领时，列宁指出了它的局限性。关于割地的条文的出发点是想把用于农奴制盘剥的土地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土地大致地区分开来。列宁指出，这样大致区分是错误的，因为实际上农民运动的矛头不可能只指向几种地主土地，而是指向整个地主土地所有制。

^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 258 页。

式的阶级斗争 阐明当前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条件 把劳动群众的所有阶层都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启发他们准备进行伟大的斗争。

纲领（最低纲领）宣布，党的最近的政治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并代之以民主共和国，这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即实现最高纲领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只有在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广泛民主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提到高级阶段，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变革的条件。因此纲领中要求实行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制，要求实行地方自治 要求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罢工和结社完全自由 要求教会同国家分立，学校同教会分立，要求废除等级，实行全体公民不分性别、宗教信仰、种族和民族一律平等。

此外，纲领还要求对法官实行选举，用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废除间接税，实行累进所得税和累进遗产税。纲领中还提出了旨在认真改善工人阶级和广大非无产阶级劳动阶层经济状况的措施。

纲领完全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和原则，指出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是无产阶级专政，有了无产阶级专政，才能镇压剥削者的一切反抗。在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这是唯一的包含了无产阶级专政要求的纲领。

此后，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与纲领有密切关系的关于策略问题的各项决定。

列宁向代表大会提出了党章草案，其中规定接纳党员手续，应根据党组织完备的代表选举制的原则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决议要经过简单的多数，要实行地方组织在地方事务上的自治。党章草案的基础是集中制思想，它从原则上确定了解决一切组织问题的方法。此外，党章草案根据俄国社会民主主义

运动的特殊条件(秘密状态)提出建立两个中央领导机关——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

在讨论党章第一条即关于党员资格的条文时，发生了严重分歧，列宁和马尔托夫都提出了一个条文。列宁提出的党章草案指出，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都可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列宁认为，只有那些能够为工人阶级的事业忘我地斗争并在群众中进行经常不断的工作的人才能入党。马尔托夫提出的条文是：凡是承认党纲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经常亲自协助党的，都可以成为党员。马尔托夫说，党员称号散布得愈广愈好。

马尔托夫的条文是把党和阶级混为一谈，贬低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领导作用。马尔托夫的条文得到一些人的支持，他们想为“党的外围”知识分子敞开党的大门。比如阿克雪里罗得说：“的确是这样 让我们拿一位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人并声明了这一点的大学教授作例子。如果我们采纳列宁的条文，就会把虽然不能直接吸收到组织中，但终究还是党员的那一部分人抛弃掉。”

列宁指出 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他进一步解释说 我们由真正的革命家组成的党组织愈坚强，党内的不坚定性和动摇性就愈少，党对于在它周围的、受它领导的工人群众的影响就愈加广泛、全面、巨大和有效。绝对不能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普列汉诺夫拥护列宁的条文。

马尔托夫联合自己的拥护者，使代表大会通过了自己的条文 但是以列宁为首的火星派经过努力 使列宁提出的其他党章条款获得了通过。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 262 页。

党章规定，党的最高机关是党代表大会，在可能的情况下，代表大会至少两年举行一次。党的总委员会在两次代表大会期间是党的最高机关。它的责任是使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活动协调一致。党章规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应该在思想上领导党，中央委员会则在实践上领导党。党章还规定了党中央机关同地方组织的关系，党员的权利等内容。

在讨论民族组织问题时，由于几个火星派分子不同意代表大会意见而退出大会，列宁的火星派成了多数派。在这种力量分布的情况下，代表大会开始转入选举中央机关。

列宁及其拥护者在选举中获得了多数。代表大会选举列宁、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为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成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弗·威·林格尼克和弗·亚·诺斯科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普列汉诺夫为党总委员会委员。总委员会由 5 人组成，由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各 2 名委员参加。从此，列宁及其拥护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即多数派），马尔托夫派被称为孟什维克（即少数派）。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列宁指出：我们第一次摆脱了小组自由散漫和革命庸俗观念的传统，把几十个极不相同的集团结合在一起，这些集团往往是彼此极端敌对……它们准备（在原则上准备）为了我们第一次在实际上创立起来的伟大整体——党而牺牲所有一切集团的特点和集团的独立性。^①

代表大会的主要成果是在俄国建立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列宁说：“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

① 《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1 卷第 524 页。

潮 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 是从 1903 年开始的”。^①

代表大会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

代表大会结束后，这种组织上的分裂活动并未停止，代表大会之后，两个派别各自出版书刊反对他们不久前的战友。与此同时，孟什维克在普列汉诺夫的帮助下控制了《火星报》编辑部并在党的总委员会中得到 2 个位置，争取到了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1904 年）的代表权。在派别争论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党的建设问题，孟什维克认为，应该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榜样建设工人政党。

但是，这种情况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1903 年列宁不仅是布尔什维克公认的领袖，而且已经成为一个非凡的领袖人物。有许多回忆作品描述列宁的吸引力和非凡才能。不仅仅列宁的战友们这样写 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切尔诺夫、瓦连廷诺夫等同列宁有分歧的著名革命活动家也这样认为，波特列索夫就曾坦率地写道：“无论普列汉诺夫，还是马尔托夫或其他什么人，都不具备列宁那种天生造就的对人的影响力，我甚至认为是统治能力。人们对普列汉诺夫是尊敬，对马尔托夫是热爱，只有把列宁看作唯一可以追随的、无可争议的领袖，因此在俄国条件下，只有列宁是一个非凡的人才，他有铁一般的意志，充沛的精力，他令人难以置信地相信运动，相信事业，也相信自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说：国家就是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列宁始终感觉到，党就是他，他身上集中了运动的意志。他也是据此而行动的。”^②

① 《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4 卷第 135 页。

② 转引自《俄国政党历史》1994 年莫斯科版第 266—267 页。

总的看来列宁这时已经感到自己对孟什维克领袖的优势。他信心百倍地为实现自己的原则而斗争。

1904 年是列宁及其拥护者最困难的年头之一。孟什维克在《火星报》编辑部内占据上风，因此在党的总委员会中也占据优势并严格限制列宁派的财权。由于同《火星报》的争吵，工作更难开展了。《火星报》发起了一场公开反对列宁的运动。普列汉诺夫在报上尖刻地说列宁搞“波拿巴主义”；马尔托夫出版一本小册子 批评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搞“戒严状态”。1904 年春，两名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在俄国被逮捕。到 1904 年夏 列宁在党中央和党总委员会中都成了少数派。由于害怕列宁的做法引起分裂，中央中的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对列宁的支持越来越不坚决 比如，1904 年初列宁就出版论战性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问题征求中央的意见。中央反对出版这本小册子。但是这部著作还是出版了，这引起中央多数人的不满。列宁提出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主张，也遭到中央的抵制。最后，1904 年 7 月 布尔什维克调和派和孟什维克针对列宁搞了一次“政变”他们通过特别宣言，禁止列宁代表中央讲话。

普列汉诺夫对列宁在党内处境的变化起了很大作用，由于普列汉诺夫在党内享有崇高威信，他倒向孟什维克一边使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列宁的变化。列宁评价普夫汉诺夫时说，1903 年夏他还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秋天时他左右摇摆，到年底他就成了一个狂热的孟什维克分子。

1904 年 8 月 列宁的拥护者聚集在日内瓦 要求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这次由列宁发起在日内瓦举行的共有 22 个布尔什维克出席的会议上 发表了一份《告全党书》，它成了布尔什维克为召集第三次代表大会而奋斗的纲领，会上选出了“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负责筹备第三次代表大会

的实际工作。此外还创办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前进报》。

1905年4月，一些代表冲破重重阻力来到伦敦参加代表大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孟什维克代表没有参加会议，他们认为这次代表大会不合法。几乎在同一时间，孟什维克在日内瓦召开了全俄党的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就其实质和作用而言，日内瓦代表会议相当于孟什维克代表大会。于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个主要派别在同一时间各自召开了代表大会。这是组织上的彻底分裂。实际上出现了两个党——布尔什维克党和孟什维克。

在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上，列宁的思想取得了胜利，列宁的党章第一条条文获得通过。领导机关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取消了党的总委员会，建立了统一的权威机关——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接受了列宁所有的理论和实践方针。此时第一次俄国革命已经开始，代表大会针对一系列策略问题作出了决议。

孟什维克代表会议也根据俄国已经开始革命的现实，通过许多策略决议，通过了新的组织章程，选举了孟什维克中央。

在实际活动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遵循的是1903年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但是孟什维克中间，除普列汉诺夫外，没有出现全国性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分歧，在最初阶段更多地表现为策略上的分歧。严格地讲，列宁派和马尔托夫派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

还有一种情况也值得注意，普列汉诺夫、列宁、阿克雪里罗德、马尔托夫、托洛茨基等活动家在国外流亡多年，第二国际各政党以及西欧生活特点不可能不对他们的心理和他们对于俄国现实的认识产生影响。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往往根据欧洲的情况思考问题，而列宁派更多地是根据俄国的生活方式思考问题。

总体上讲，列宁比他的政敌和思想上的反对派对俄国的了解更

深刻，所得出的结论和制定出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更符合俄国的传统和实际。这一点在 1905—1907 年革命和此后的事态发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三章

1905—1907 年革命的演习

一、1905 年革命的起因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垄断已成为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经济、政治生活以及世界政治中的决定性因素。世界已按殖民国家的势力范围被瓜分完毕，帝国主义为重新划分殖民地和各自的势力范围而不断发动战争。各国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在这一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在俄国，资本主义及其最新组织形式迅速发展，但是同欧美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相比，它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一方面，出现了银行和工业现代化的垄断组织，另一方面，在农村中居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大地主经济，它的经营方式为半农奴制。由于资金不足，沙皇政府开始向西欧财团请求贷款，让他们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因而俄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已大不如前。但是它同西欧帝国主义盟国之间却有着共同的利益，并同它们争夺

世界市场，尤其是对东方邻国推行殖民政策，参加对中国的侵略和扩张。

俄国并不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是帝国主义时代的所有矛盾，在它那里却表现得十分突出。在帝国主义国家的链条之中，它是最薄弱的环节。因此在 20 世纪初 俄国成了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

90 年代中期，俄国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步伐。过去数十年间，由于在南方建设了新的工业区，大兴铁路建设，使工业，尤其是金属冶炼和煤炭产量都有所增长。在国内市场上，本国生产的煤和金属这时已经基本上可以满足需要，而在石油开采方面，俄国甚至成了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总而言之，从 1893—1899 年 俄国整个大工业生产增长了一倍，各主要工业部门的生产增长了两倍。俄国工业生产能力仍然落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就其工业发展速度而言，已经超过了它们。就生产的集中程度而言，俄国也超过了西方各先进国家。

俄国本身的经济发展也是畸形的。经济生活中既有最新的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和先进的生产工艺，也有落后的中小企业，经常保持着前资本主义时期和资本主义早期的野蛮剥削方式。在包罗多种成分的经济体系中，手工业生产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资本主义发展速度的加快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俄国经济中早已存在的各种深刻的矛盾更加激化。1900—1903 年 俄国也发生了工业危机和“货币恐慌”不少企业倒闭 冶金工业和机器制造业一片凋零。政府支持银行收购濒临破产的公司股份、给以补贴，同时又自行通过各种渠道向它们提供贷款和资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这种干预意在控制资产阶级，从政治上巩固专制制度。

在农村，农奴制残余依然存在。绝大多数农业人口一贫如洗，国内市场因而大为缩小。这从根本上束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的农业生产并不是普遍具有商品生产性质，许多地方还保留着自然经济的特点。在俄国，土地垄断是地主的主要特权。在许多地区，大土地占有者根本不愿意亲自经营自己的土地，而宁愿把这些土地就近“借给”永远需要土地的农民。在萨拉托夫省，农民耕种的土地一半都是向地主租来的；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地主自己经营的土地只占他们全部耕地的 2%。俄国的大土地占有者与其说是农业企业主，不如说是土地高利贷者。他们与其说是经营自己的土地或剥削耕种他们土地的雇农的劳动，不如说是利用了自己的土地占有权和农民对土地的需求，这导致农村发生迅速两极分化的过程，使农民受到极大的痛苦。在俄国中部，破产的农民大多沦为雇农，除了一块份地之外，一无所有；同他们对立的是不法富农。俄国农村经常发生全体农民同地主的斗争、农村资产阶级同农村贫民的斗争。而前一种斗争表现得更加鲜明，更加尖锐。20 世纪初，农民反对地主的“骚动”事件频频发生。

农村的分化过程改变了俄国的社会结构，促进了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形成，农民忍受不了贫困和饥饿而逃离农村，补充了产业工人的队伍。劳动后备军的存在，使无产阶级本来已经十分困苦的境况更加恶化。封建地主的压迫、工人在政治上的无权，为企业主对工人进行剥削提供了方便。工人的生活苦不堪言。无产阶级所处的境况，自然会引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无产阶级逐渐成为俄国社会的革命主力军。20 世纪初无产阶级（连同家属）的人数已达 2200 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 18%。但是大型工矿和运输业中的工人，即产业工人人数并不

多不到 300 万人。无产阶级由于自身社会地位和行业特点，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有高度的阶级觉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工人阶级的力量越来越大。在反抗沙皇制度和捍卫自己权利的斗争中，无产阶级越来越成熟。早在 1902 年的罢工和政治示威中，无产阶级就已表现出它是一支在解放斗争中起领导作用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总之，除了农村中农民反对封建地主和农奴制残余压迫的斗争日益尖锐激烈外，城市中工人阶级的斗争也风起云涌。俄国革命的形势迅猛发展，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日俄战争的爆发大大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1904 年 1 月 26 日深夜，日本鱼雷艇向停泊在旅顺口港外锚地的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随后，日本军舰又袭击了朝鲜仁川港附近的俄国巡洋舰“瓦良格”号和炮舰“朝鲜人”号。于是日俄战爆发了。战争是日本在英、美支持下发动的，但不论从哪一方看，这都是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被沙皇政府内务大臣普列维一语道破，即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仆人企图利用“一场小规模战争胜利”来防止革命。但是这场战争并非小规模，而且沙皇政府也没有胜利。它不但没有防止革命，反而推动了革命事态的发展。1904 年 5 月在鸭绿江畔的一次战斗中，日军重创俄军，并进入满洲。同时日本开始从陆上进攻旅顺口。8 月和 9 月沙俄军队在辽阳城下和沙河上又遭到惨败。1904 年 12 月旅顺口被日军占领。

日俄战争中沙皇政府的战败，再一次暴露了专制制度的腐朽。由于战争的爆发，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在社会和政治激情达到白热化的情况下，甚至一个不大的事件也能激发群众，成为革命爆发的导火线。1905 年 1 月普梯洛夫工厂解雇几名工人就是这样的事件。工人为抗议工厂主的压迫，宣布于 1 月 3 日

进行罢工。罢工一开始就很有组织性，团结一致：1.3 万名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关闭了机床。法俄工厂的工人立刻参加到他们的行列中，随后参加进来的还有涅瓦造船厂、涅瓦纺织厂和叶卡特林哥弗纺织厂的工人。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采取措施将普梯洛夫工厂工人的罢工变成彼得堡无产阶级的总罢工。它向各区、各工厂发出号召。在号召书中把各个企业工厂的需要同革命无产阶级的总的要求联系起来。布尔什维克在《告普梯洛夫工厂全体工人书》的传单中写道：“是时候了 是我们摆脱警察和官吏横加在我们身上的无法忍受的压迫的时候了！我们需要政治自由，我们需要罢工、结社和集会自由，我们需要有自由的工人报纸，我们需要实行人民自治（民主共和国）！”

到 1 月 7 日傍晚，彼得堡参加罢工的工人已经超过 13 万。首都整个工业生产活动陷入瘫痪。城市没有照明，没有报纸，各区工人不断举行人数众多的集会。这是俄国前所未有的一次阶级斗争的大爆发。

专制政府企图扑灭革命的火焰，然而群众的不满情绪日益表现为公开的抗议。这时加邦神父提出了和平游行到沙皇的皇宫——冬宫并呈递陈述工人疾苦的请愿书的计划。游行定为星期日即 1 月 9 日举行。1 月 7 日和 8 日，到处都在讨论请愿书之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在各工厂的鼓动员向工人解释道：自由不应该用请愿的方法 而应该通过有组织的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去争得。1 月 8 日彼得堡委员会散发了《告彼得堡全体工人》的传单 传单向首都无产者反复说明 工人的解放是工人自己的事情 不要向沙皇请愿 而要“把沙皇从宝座上拉下来 并将全部专制匪帮连同沙皇一起赶跑”。传单中说：“自由要用鲜血来换取 自由要在残酷的战斗中用武器争取”。与此

同时，彼得堡委员会还印发了给士兵传单，号召他们不要向人民开枪并且要转到人民一边来。

沙皇当局决定镇压游行队伍，不允许人群靠近冬宫。1月8日，一批文学家和学者求见大臣们，恳请防止流血事件发生。但是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1月9日上午，工人队伍分别从彼得堡各工人区向皇宫广场进发。大约有15万人走上了街头。他们带着妻子儿女，手持沙皇的画像和教堂的旗幡。善良的工人们不可能设想会有一场屠杀在等待着他们，他们对沙皇还抱着一种虔诚和信任。当示威群众的先头队伍到达皇宫广场时，响起了一排枪声，随后枪声大作。在皇宫广场和通向广场的几条大街上发生了惨不忍睹的大屠杀。沙皇的爪牙残暴地扑向人群，人们遭到马匹的践踏，排枪的扫射，被军刀砍，刺刀刺。在那个星期日，彼得堡的街头染遍了工人的鲜血。“这是对手无寸铁的和平的人民群众的最无耻最残忍的屠杀。”^①有数千人在这一天被枪杀。人们对“沙皇陛下”的信任转变为仇恨。到傍晚，全城不少地区筑起街垒。成群的工人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布尔什维克的演说。“流血星期日”的消息激起了全俄各地人民的义愤和抗议。莫斯科举行了多次政治示威，里加举行了罢工和示威，华沙和梯弗利斯也举行了罢工。此后几乎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抗议“流血星期日”的事件。无产阶级用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来回答沙皇的暴行。“流血星期日”也使欧美的劳动者和先进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加强了同俄国无产阶级的团结，增进了对俄国人民的同情。

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爆发了。这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一次人民革命。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94页。

二、第一次革命时期的俄国政治舞台

1905—1907年革命前夕，在俄国政治舞台上三个阵营：民主派阵营，即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农民，他们是革命的动力，为推翻沙皇制度和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斗争；自由派资产阶级阵营（它力求实现君主立宪制，防止人民革命，政府阵营（沙皇政府和贵族），它竭力阻止社会变革，维护君主制。革命的爆发使这三个阵营都活跃起来。与这三个阵营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各政党纷纷发表各自对革命及其发展前途的看法，制定在革命过程中的行动策略。

革命无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的罢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为了平息革命的浪潮，沙皇政府委托由内务大臣布里根任主席的委员会起草了《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于1905年8月6日（19日）颁布，同时还颁布了沙皇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诏书。沙皇政府计划在1906年1月前召开咨议性国家杜马。由于上述两个文件是由布里根领导的委员会起草的，故这个拟成立的杜马被称为布里根杜马。但是根据《国家杜马选举条例》，大多数劳动者被剥夺了选举权。

人民并没有被沙皇政府关于建立杜马的消息所迷惑，10月10日，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决定开始举行政治总罢工。几天之内罢工就席卷这座城市几乎所有企业。彼得堡的罢工也发展成总罢工。首都停电，车辆停驶，电话不通。罢工迅速地扩展到全国。布尔什维克在各个工业中心、各城市和各铁路枢纽同其他革命政党联合行动，到处都建立联合罢工委员会。就连

自由派为了追求自己的目的，也宣布支持罢工，但是他们千方百计阻止罢工变成武装起义。罢工总人数达到 200 万人。“全俄政治罢工这一次真是席卷全国，它在最受压迫和最先进的阶级的英勇奋斗中，把万恶的俄罗斯‘帝国’的各族人民联合起来了。”

罢工带有明显的政治性质，并且是在下列革命口号下进行的：“打倒布里根杜马！”“民主共和国万岁！”无产阶级在罢工过程中，不经官方许可自己用革命的办法实现了言论、集会和出版等民主自由，在各企业中实行 8 小时工作制。当时经常不断地公开举行各种工人集会和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各革命政党的代表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俄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无产者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战斗团结日益发展和巩固。全俄政治罢工使受沙皇政府压迫的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沙皇政府最初企图用武力来结束罢工。10 月 13 日彼得堡总督特列波夫发布命令：“不许放空枪，不得吝惜子弹。”但是讨伐措施没有收到预期的结果。罢工势如破竹地发展起来。到 10 月中旬，国内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沙皇政府已经没有力量取胜，——革命还没有力量取胜。”^②在这种情况下专制政府决定耍点手腕，目的是通过立宪让步的办法分裂革命力量，使动摇分子放弃斗争，把自由派资产阶级拉到自己方面来，并借以镇压革命。10 月 17 日尼古拉二世发布诏书，声称“赐予”人民以公民自由：人身不可侵犯、信仰、集会和结社自由。沙皇答应“尽可能”让那些按照布里根章程草案而被剥夺选举权利的各阶级参加国家杜马。沙皇诏书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2 卷第 2 页。

② 同上 第 5 页。

的主要之点是：宣布今后“不经国家杜马同意，任何法律都不能生效”^①，也就是说承认杜马有立法权。这是革命的第一个胜利。沙皇政府在人民的强大进攻面前作了让步。10月17日诏书保证了某种程度的自由。俄国第一次出现了多党现象。从前处于秘密状态的政党纷纷走出地下，工会组织纷纷成立。

对于这种让步，列宁在《革命的第一个胜利》一文中写道：“沙皇的让步确实是革命的极其伟大的胜利，但是这一胜利还远远不能决定整个自由事业的命运。沙皇还远远没有投降。专制制度根本没有不复存在。它只不过把战场留给敌人，从战场上退却了，在异常激烈的战斗中退却了，但是它还远远没有被击溃，它还在集结自己的力量。”^② 诏书公布后没几天就证明了列宁对事态发展的估计。俄国的一些省和州并没有得到允诺的自由，而是一个接一个地宣布处于戒严状态。镇压和枪杀示威群众的事件不断发生。10月17日以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被杀害的就有4000人，受伤和致残的有1万多人。^③

十月事变表明，罢工本身不能推翻沙皇政府。要战胜沙皇政府就必须举行武装起义。革命的本能提醒先进工人，必须采取武装行动去冲击专制制度的堡垒并彻底摧毁它。这样总罢工就发展成为武装起义。

当时建立了起义机关和革命政权机关——工人代表苏维埃，这是革命人民创造力的最高成就之一。在举行全俄政治罢工以及武装起义已经酝酿成熟的情况下，革命人民感到需要建立一种机关，这种机关应能够得到革命人民的绝对信任，最全面地反映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且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和农民反对沙

① 《过渡时期 1904—1906 的法令》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23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6页。

③ 《俄国革命的半年》1906年莫斯科版第42页。

皇制度的公开武装斗争的领导中心。苏维埃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10—12月除了彼得堡和莫斯科外还有50多个城市和工人居住区出现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在莫斯科除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外，还成立了士兵代表苏维埃，而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还出现了工人和士兵代表联合苏维埃。在赤塔成立了士兵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在塞瓦斯托波尔成立了水兵、士兵和工人代表苏维埃。在许多农业地区，出现了农民委员会，它们实际上起着苏维埃的作用。11月份在特维尔省出现了农民代表苏维埃。

人民创建的苏维埃起着革命政权的作用。他们夺取印刷所，出版自己的机关刊物，发布决议和命令。苏维埃不经官方许可决定在企业中实行8小时工作制。在罢工期间，苏维埃对公用企业和商业企业的工作实行监督，密切注视产品的价格，逮捕阻碍实行革命措施的警官。后来列宁谈到俄国第一次革命最高潮时期的苏维埃时说：“这种不是知识分子的，不是密谋家集团的，而是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政权，在俄国已经有过了，在俄国革命进程中实际上已经存在过了。”^①

革命中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划分更加清楚。各政党的政治面貌充分展示出来。黑帮利用自己同专制政府的关系，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采取合法的和非法的斗争方式。暴力是这些极右分子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黑帮组织中有专门进行恐怖活动的组织——战斗队。1906—1907年阿尔汉格尔斯克、阿斯特拉罕、沃洛格达、戈美利、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基辅、莫斯科、敖德萨等地都有黑帮战斗队活动。在彼得堡，有一个全市性的战斗队，由俄罗斯人民同盟总委员会候补委员H.H.尤斯科维奇—克拉索夫斯基领导，下面有区级战斗队，各工厂还有分队。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31页。

参加战斗队的大都是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但是在一些大的工业中心参加者主要是招募工人和工厂基层行政人员。黑帮战斗队中也有其他政党的人，也有一些刑事犯罪分子和无业游民。黑帮认为，讨伐措施不能取得预期效果。因此他们试图独立开设法庭，镇压革命领袖。他们开列的革命者名单中甚至包括帕·尼·米留可夫、彼·阿·斯托雷平和伊·舍格洛维托夫^①。黑帮分子所干的最为轰轰烈烈的事是 1906 年刺杀立宪民主党农业问题专家米·雅·赫尔岑施坦教授和《俄罗斯新闻》编辑格·波·约洛斯。他们下一个暗杀的目标是大臣会议主席维特。极右分子非常憎恨这位国务活动家，因为他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并且是 1905 年 10 月 17 日诏书的倡导者。总而言之，黑帮及其战斗队所搞的恐怖活动对反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右翼分子政治活动中的主要任务是争夺国杜马的代表席位。

1905 年 12 月 11 日，沙皇政府公布了《关于修改国家杜马条例的命令》，这一命令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为选举布里根杜马而制定的不平等选举制。12 月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一再限制曾经宣布过的杜马权利，将国家政策的最重要问题置于杜马管辖之外。

第一届杜马选举于 1906 年 2—3 月举行。布尔什维克宣布抵制但是没有能够达到搞垮这次选举的目的。黑帮等极右势力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只获得 9% 的选票。第一届国家杜马共有 478 名代表，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杜马讨论过人身不可侵犯、废除死刑、信仰和集会自由以及公民权

^① 伊·格·舍格洛维托夫是俄国大地主，1906—1915 年任司法大臣，1917 年任国务会议主席。

利问题，但是占中心位置的是土地问题。在杜马会议上提出的土地纲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立宪民主党人于 5 月 8 日（21 日）提出的由 42 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它力图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转让用农民的耕畜和农具耕种的土地或已出租的土地；另一个是劳动派于 5 月 23 日（6 月 5 日）提出的《104 人法案》，它要求建立全民地产，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能力平均使用土地。这个纲领在某种程度上受了社会革命党的影响。

尽管第一届国家杜马很软弱，而且是由亲政府的立宪民主党人控制，沙皇政府仍在极右势力的压力下于 1906 年 7 月 8 日解散了杜马。与此同时，斯托雷平取代哥列梅金当上了大臣会议主席。政府认为羽翼丰满起来的右翼政党一定会改变未来杜马的组成。黑帮也满怀信心地要报上次失败的一箭之仇。俄罗斯人民同盟和十月党人主张对革命行动采取最严厉的措施。黑帮甚至建议对从事任何形式的革命活动的人，一律处以死刑。

第二届国家杜马于 1907 年 2 月 20 日（3 月 5 日）召开，共有 518 名代表。杜马的组成是：右派即君主派和十月党人 54 名，立宪民主党和靠近它的党派 99 名，各民族代表 76 名，无党派人士 50 名，哥萨克集团 17 名，人民社会党 16 名，社会革命党 37 名，劳动派 104 名，社会民主党 65 名。第二届杜马讨论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土地问题。但是政府看到杜马越来越激进，是一个“叛逆”的立法机构，于是大臣会议开始制定新的选举法。黑帮等右派也开始进行反对杜马的鼓动活动。同盟总委员会给地方组织发去指令：“一旦同盟机关报《俄罗斯旗帜报》上刊出十字标记，要立刻开始给沙皇和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发电，恳请甚至要求立刻解散杜马和务必修改选举法。”1907 年 3 月 14 日，

《俄罗斯旗帜报》第一版上刊出黑色十字标记，于是请示解散杜马的电报如潮水般涌进首都。1907年6月1日，斯托雷平要求55名社会民主党代表立刻从国家杜马会议上退场。黑帮立刻乘机发难。普利什凯维奇要求立刻将罪犯处以死刑。1907年6月3日，沙皇颁布诏书，宣布解散国家杜马。与此同时开始实行新的选举条例，明文规定统治阶级在杜马中占多数。史称“六·三”政变。

布尔什维克等左派政党放弃第一届杜马期间的抵制策略。参加了第二届杜马选举，利用杜马讲坛揭露专制政府的反动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07年秋天，根据沙皇解散第二届杜马时颁布的新的选举条例开始第三届杜马选举。11月1日（14日）第三届杜马开幕。这届杜马一直存在到1912年6日（22日）。这届杜马共有442人，先后任主席的有尼·阿·霍米亚科夫、亚·伊·古契科夫（1910年3月起）和米·弗·罗将柯（1911年起），他们都是十月党人。这届杜马按其成分来说是黑帮—十月党人的杜马，是沙皇政府对革命力量实行反革命的暴力和镇压政策的驯服工具。这届杜马中有极右派147名，十月党人154名，立陶宛—白俄罗斯集团7名，波兰联盟11名，进步派28名，穆斯林集团8名，立宪民主党人54名，劳动派14名，社会民主党人19名。因此它有2个反革命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沙皇政府利用前一个多数来保证推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在工人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对少数民族采取大国主义政策；而利用后一个多数来通过微小的让步即用改良的办法诱使群众脱离革命。

第三届国家杜马全面支持沙皇政府在“六·三”政变后的内外政策。它拨巨款给警察、宪兵、法院、监狱等部门，并通过了一

个大大扩大军队编制的兵役法案。第三届杜马的反动性在工人立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它把几个有关工人保险问题的法案搁置了 3 年，直到 1911 年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下才予以批准。但是保险条件比 1903 年法案还要苛刻。1912 年 3 月 5 日（18 日），杜马工人委员会否决了罢工自由的法案，甚至不许把它提交杜马会议讨论。在土地问题上，杜马完全支持斯托雷平的土地法，而拒绝讨论农民代表提出的关于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农民的提案。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它积极支持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通过一连串的法律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在对外政策方面，它主张沙皇政府积极干涉巴尔干各国的内政，破坏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

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沙皇政府的杜马政策表明，专制制度不愿意进行任何稍微削弱自己权利的改革。它不惜采用任何残酷手段对革命运动进行镇压。俄国资产阶级及政党对沙皇政府采取妥协的态度，妄图通过让步换取沙皇政府对自己的让步。实践表明，无产阶级和农民不可能指靠资产阶级。俄国劳动人民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推翻沙皇制制度才能获得自身解放。议会道路是走不通的，杜马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不过是进行鼓动宣传和揭露专制政府反人民政策的讲坛。显然，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来说，他们的主要斗争场所不在杜马，而在杜马以外的阶级斗争舞台上。

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策略分歧

1905 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开始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迫切需要制定自己的行动策略。但是这时党内两派的分裂已经成为事

实。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不仅在组织问题上有分歧，在革命的策略问题上也有重大分歧。他们对革命有不尽相同的认识，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由于孟什维克拒绝参加而成了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制定党在已经开始的革命中的策略路线。大会的议事日程上包括这样一些问题：武装起义，临时革命政府，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以及对其他政党的态度问题。

布尔什维克认为，已经开始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和领导者，农民则是他的可靠同盟者。代表大会明确地制定了党的策略路线，强调指出，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无产阶级应该同全体农民结成联盟，制止资产阶级的动摇，为争取民主共和制而斗争，同时要考虑到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代表大会给群众指出了推翻沙皇制度和争取共和制的唯一途径——这就是将群众性的政治罢工转变成武装起义。

代表大会讨论了武装起义问题，多数代表都坚持起义的方针，认为必须做好起义的实际准备。代表大会指出，武装起义问题是实际生活本身提出来的，因此党应该保证在群众中广泛宣传起义的思想，在党的委员会下面设立军事组织和战斗小组。在许多无产者集中的地区，工人表示坚决拥护武装起义，要求得到武器，要求建立战斗队并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列宁对客观形势作了估计，认为“起义无疑是要举行的”。^①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和政治觉悟程度。

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该决议指出：“组织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111页。

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来直接同专制制度斗争是党在目前革命时期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之一”。^① 决议责成各级党组织不仅要向无产阶级说明即将来临的武装起义的政治意义，而且要说明这一起义的实践方面和组织方面。决议指出，要采取最积极的措施来武装无产阶级，制定武装起义和直接领导武装起义的计划，必要时应设立党的工作者组成的专门小组来进行这一工作。^②

代表大会还讨论了关于临时革命政府问题。列宁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他在阐明争取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和建立作为这个专政的机关的临时革命政府这一斗争任务时，特别谈到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可能性。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列宁的草案为基础的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争取无产阶级最终目的的斗争，要求有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要求争取民主共和制。因此，决议强调指出，只有经过胜利的起义才有可能建立共和制，而成为胜利的起义机关的将是临时革命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能够召集立宪会议。这个政府的基本任务是实现我们的最低纲领即最近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代表大会在回答社会民主党人是否参加这个政府的问题时声明：“如果力量对比及其他不能预先准确判定的因素对我们有利，我们党可以派代表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以便同一切反革命企图作无情的斗争，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③ 代表大会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可以参加这个政府，其条件是：党必须对参加这个政府的全权代表进行严格的监督；完全保持社会民主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社

《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113页。

② 《苏维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87—88页。

同上，第89页。

会民主党力求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对一切资产阶级政党都采取不可调和的敌对态度。代表大会向各级党组织建议，无论社会民主党是否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都要在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使他们懂得，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为了保持、巩固和扩大革命的成果，必须经常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①

代表大会还讨论了“关于在革命前夕对政府策略的态度”问题。大会指出沙皇政府企图用让步和进行改良的诺言从政治上腐蚀工人阶级，引诱工人阶级放弃革命斗争。在革命的打击下，专制制度不得不对整个民主派，特别是对工人阶级做些真正的和虚伪的让步。社会民主党应当利用这些让步，“一方面为了使经济状况的每一步改善和自由的每一点滴扩大都为人们所享有，以便加强斗争，另一方面为了在无产阶级面前不断揭露政府力图分裂、腐蚀工人阶级并使工人阶级在革命时期忽视自己的迫切利益等反动目的。”^②沙皇政府绝对不可能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行改良。代表大会号召各级党组织团结无产阶级的力量，以便立刻用革命的方法实现 8 小时工作制以及工人阶级的其他要求，同时组织武装打击黑帮以及所有其他反革命分子。

代表大会对农民运动特别关注。列宁在就这个问题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农民运动日益发展和壮大，尽管沙皇政府企图阻止它，并用各种虚伪的让步来欺骗农民。他说，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拥护者。^③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声明，它将用一切办法支持发展着的革命的农民运动，并力求首先注重农民运动的革命民主方面。列宁强调说：“主要的任务是使农民运动具有政治自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1 分册第 90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0 卷第 117 页。

觉性。^①党应当力求成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并向农村无产阶级广泛地说明，它的利益同农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代表大会赞同列宁的决议草案。代表大会指出，争取割地的斗争现在已经不够了，应该在没收地主、官府、教堂、寺院和皇族的土地的口号下进行斗争。决议要求：“立即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以便实行有利于农民摆脱警察官僚和地主压迫的一切革命民主改革。”^②决议提出，要号召农民和农村无产阶级举行政治性游行示威，集体地拒绝交纳赋税，拒绝服兵役，并且不执行沙皇政权的命令。党的任务是保证把农村无产阶级独立地组织起来，并使它在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和城市无产阶级融合在一起。

代表大会还讨论了对社会革命党人的态度问题，坚决地谴责了这个党的策略。代表们指出，社会革命党人的主观唯心主义方针、他们对资产阶级妥协的路线和政治上的冒险主义，是不信任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忽视阶级斗争的结果。同时又不能不注意到，社会革命党人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翼，他们在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中，在部分农民甚至工人中间是有影响的。因此代表大会在有关决议中责成中央和各地方委员会“在必要时可同社会革命党组织达成临时的战斗协议，但是地方性协议只有在中央委员会的监督下才能缔结”。^③这样的协议无论如何不应当限制工人阶级政党的完全独立性。

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体现了党在革命中的战略计划和策略路线。这个计划规定要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完全的胜

《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148页。

② 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93页。

③ 同上第95页。

利，以使将来无产阶级能够进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无产阶级在反对沙皇制度的民主联合阵线中的领导权思想及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思想，是布尔什维克战略和策略的基础。

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开始后，孟什维克也制定了自己的策略原则。他们认为，1905年1月在俄国开始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任务是扫除农奴制残余并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充分条件。正如普列汉诺夫指出的那样，这是“代表……最新资产阶级社会的各阶级同时进行的并在某种程度上是共同进行的反对旧制度各种残余的斗争”。孟什维克强调革命的全民性质，他们认为俄国资产阶级关心革命的胜利。1905年他们同样认为无产阶级是解放运动的先锋，是“民族的解放者”，革命的“发动机和主要角色”革命的领导者。但是如果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追求的是对所有非无产阶级劳动阶层进行政治和组织领导，在革命胜利时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话，那么孟什维克对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问题有不同的理解。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是倡导运动，担负斗争的主要重担，在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方面作出榜样，代表所有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在政治舞台上活动，但是不追求做他们的领导者，不追求接管沙皇政府的权力。

孟什维克后来在评价1905—1907年革命的成果时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完全是象征性的，临时性的，1905年10月以后再谈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已经完全不合适了。一些孟什维克直截了当地声明在革命的“杜马”时期（1906—1907年）政治领导权已经转到立宪民主党手里。^①

孟什维克认为社会民主党人不应该“组织”革命，他们太软

^① 参看《俄国政党历史》1994年莫斯科版第227—228页。

弱)而应该帮助“发掘”人民中蕴藏的巨大潜力。同时应该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社会各阶层中进行反政府鼓动,集中在工人的政治和职业组织上,集中在领导罢工运动方面。1906年3月,俄国工会组织获得合法活动权利(当然有不少限制条件),布尔什维克组织努力使工会运动政治化并使它服从自己的影响,而孟什维克主张工会“中立”。孟什维克并不反对党和工会组织之间经常接触,不反对工会组织参加政治斗争,但是他们认为,工会应该首先维护工人的经济利益和把工人团结起来,不管他们属于什么党派。这样一来,孟什维克像旧的经济主义那样,把工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对立起来。总而言之,孟什维克当时反对采取激进措施。有趣的是,孟什维克在当时的工会运动中享有很高威信,他们的立场往往比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更受欢迎。

在对待农民的态度问题上,孟什维克承认农民从总体上比城市资产阶级更具有民主主义和革命精神,但是认为农民运动不仅有革命性,还有反动性:幼稚的君主主义、平均使用土地和保存村社的要求,等等。因此孟什维克在全力支持并鼓励农民反对现存制度的同时主张同任何“农民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而且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不可能同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更不可能建立联合的专政。

孟什维克根据自己对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的理解,提出了对政权问题的看法。他们认为,推翻专制制度后无产阶级不应该谋求政权,应该只限于起极端反对派的作用,促使资产阶级更彻底地解决面临的问题。孟什维克理论家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夺权”的冒险行为会导致马克思主义者蜕变为被迫放弃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1905年日内瓦孟什维克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夺取政权和参加临时政府》的决议所体现的就是这种精神。

日内瓦代表会议提出支持农民用暴力夺取地主土地的要求，支持农民抗租和逃兵役。孟什维克还主张在民主原则基础上建立农民委员会，以便消除农村中所有不平等的旧制度。

综上所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遵循 1903 年通过的党纲的条件下存在重大的策略分歧。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批判了孟什维克的策略。孟什维克观点的出发点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应当是资产阶级 就像 18 世纪和 19 世纪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列宁认为，孟什维克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他们不了解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特征，不了解新时期的本质，没有考虑到人类已经进入了“政治动荡和革命的时期”即各个阶级 首先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义和作用都发生了根本变化的事实。

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策略分歧的实质在于，是进行革命，还是进行改良。布尔什维克主张用革命推翻专制制度，并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孟什维克则主张用改良的办法改造俄国社会，由于不相信农民，因此他们主张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结成某种联盟。列宁批评他们忽视农民的作用，不懂得土地问题即农民问题是俄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

列宁关于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权的性质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是一种新的见解。如果说民主革命从前在西方导致了资产阶级专政，那么现在，当无产阶级已经变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则是为了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人民政权即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也是一种新的见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0 年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写道 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 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都消灭掉 直到

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不断革命的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般地提出来的，没有考虑到任何具体情况。列宁的新贡献在于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思想，创造性地对它作了解释。列宁从具体分析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条件和特点入手，同时认为资本主义在起过进步作用后已经成为一种反动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不会导致资产阶级的长期统治，而必定会为直接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打好基础。列宁认为，在俄国尽管有严重的农奴制残余，资本主义还是得到了比较高度的发展，而主要的是有了非常革命的无产阶级，它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下领导被剥削劳动群众为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俄国社会经济的明显特点是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斗争：一种是全体人民反对沙皇和地主、争取民主共和制的斗争；另一种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居于首位的自然还是全体人民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工人阶级的使命是领导全体人民、特别是农民，为争取完全的自由和彻底的民主革命、为争取共和制而斗争，然后是领导全体被剥削劳动者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

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托洛茨基也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思想。他在《1月9日以后》（1905年）《总结与展望》（1906年）著作中分析了俄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认为俄国缺乏像西欧那样从城市手工业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农民不能起独立作用，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而它只能在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中找到可靠的同盟者。革命一旦取得胜利，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必然在侵犯封建所有制的同时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这就会使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复杂起来，甚至同广大农民发生敌对冲突。托洛茨基认为，这个矛盾只能通过世界革命来解决，只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帮助俄国马克

思主义者摆脱这种局面。他写道：“在一个农民人口占多数的落后国家里，工人政府中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舞台上才能够解决”。

1905年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消除隔阂，团结起来，共同带领工人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在这种形势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两个派别终于同意召开统一的代表大会，双方都为实现组织上的统一作了可贵的尝试。1906年4月10日至25日（4月23日至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11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中孟什维克占62名超过半数。总之代表大会上的分歧多于妥协。只是在批准党章修正案时才出现意见完全一致的情况。采纳了列宁的党章第一条条文并开始使用“民主集中制”的提法，提出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崩得、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以享有自治权的身份回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一点变化确实具有统一的味道。大会决定选举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指定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当选的中央委员中有3名布尔什维克7名孟什维克，而选进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全部是孟什维克。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只是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仍然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各有其独立的组织，各自按自己的策略行事。这在对国家杜马的态度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对于第一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采取了抵制策略。当时社会革命党人也采取抵制策略，他们认为下一次革命高潮时一定会把按普遍、直接和平等选举权选举立宪会议的问题提上日程。

而孟什维克采取了半抵制的策略，即参加第一阶段选举，同时社会民主党人当选代表拒绝参加杜马。这种策略既满足了那些不

相信会选举真正的无产阶级代表进入杜马而主张抵制的多数工人，也满足了孟什维克想利用杜马、至少是利用选举运动为革命目的服务的愿望。后来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建议争取社会民主党人代表进入杜马，以便探索在这个舞台上进行活动的经验。结果有 18 名社会民主党人进入第一届杜马，他们全部是孟什维克。后来列宁承认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的策略是错误的。在第二届国家杜马时期，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参加了杜马的工作。孟什维克在杜马选举过程中曾同立宪民主党人一道反对右翼代表。第二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中有一多半人是孟什维克。党团领袖是 25 岁的格鲁吉亚人亚·格·策列铁里。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利用杜马讲坛批评斯托雷平政府，维护失业者和支持农民的土地要求。但是在第二届杜马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并没有齐心协力地合作。布尔什维克在执行和劳动派建立“左派联盟”的策略，而孟什维克则执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但是两派在苏维埃中的合作非常协调。当时的苏维埃是起义的机关。布尔什维克领导了全国大部分苏维埃，但是孟什维克在彼得堡有很大的影响，彼得堡苏维埃主席也由孟什维克担任。

总而言之，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为鼓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为促进俄国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发展无产阶级的组织形式作出了贡献。他们之间存在一系列重大的原则分歧，奉行不同的斗争策略。这些意见分歧在基层组织中表现得并不十分明显。但是这些分歧后来发展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影响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战斗力。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种分歧对后来俄国革命进程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四 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策略

社会革命党人对革命的认识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有很大不同。主要区别在于：社会革命党人不承认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他们主要是根据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和性质作出这种结论的。

社会革命党人认为，由于自身很薄弱和对政府的依赖非常大，俄国资本主义不可能对旧的社会关系发动这场引起全国危机的攻势。他们认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遇到的社会政治阻碍没有西欧国家资本主义革命前夕那样大。俄国没有行会制度，革命前夕也没有封建主义的所有制组织，没有被封建义务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而且资产阶级也远不是受专制歧视的等级。社会革命党人的结论是，俄国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革命。孟什维克关于革命的概念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但是社会革命党人认为布尔什维克关于革命的观点也不正确，尽管布尔什维克也否认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分歧表现在：社会革命党人不认为革命的任务是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扫清道路；他们不认为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否认无产阶级应该成为革命的领导者。

社会革命党人出版物上还有这样一种观点：俄国不可能有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它已经被“来自上面的革命”即 60—70 年代的大改革时代阻止了。这些改革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充分的条件，那时就已经发生“农奴制专制制度向贵族资产阶级官僚制度的转变”。

社会革命党人反对把革命叫作资产阶级革命，也不认为这场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认为这场革命是介于资产阶级革

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过渡性“社会革命”。这场革命的主要特征是，它不仅限于权力更迭和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重新分配财产，它还努力在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上打开一个缺口，这就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土地社会化。切尔诺夫曾声明：“我们好像在同时经历 1789 年革命、19 世纪 30 年代的革命、1848 年革命、1870 年革命 如此等等。”^①

社会革命党人认为 革命的动因不是‘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压力’而是‘粮食生产的危机’即农业危机。这场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 1861 年改革 当时没有给解放的农民创造改进农业栽培技术的必要条件。社会革命党人认为“农民起着巨大的革命作用”。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和那些与劳动群众利益一致的知识分子也是革命的动力。这三种力量的联盟是革命成功的保证。

社会革命党人在政权问题上的立场也与众不同。他们以批判的态度重新认识民粹派遗产 首先放弃了布朗基主义关于‘夺取政权’的思想。社会革命党人认为 专制制度被推翻后政权自然应该归资产阶级。比如，切尔诺夫在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解释最低纲领时说 最低纲领乃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形势下所采取的措施的总和。正因为如此，社会革命党人并不认为第一次革命过程中产生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是新的革命政权的萌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具体表现。他们认为，苏维埃不过是无产阶级的职业政治协会或这个阶级自己的革命自治机关，其主要任务是把分散的工人群众组织起来。

社会革命党人认为 革命的迫切任务是建立民主立宪制 争取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他们希望利用这些权利，通过民主选举 先在地方自治机关 然后在全国范围内 即在全民代表机关

^① 转引自《俄国政党历史 第 162 页。

——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他们认为立宪会议是国家政体的最终形式，是最高的立法机关。社会革命党人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的口号是“土地和自由”。这个口号包含了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召开立宪会议和土地社会化的要求。

革命使社会革命党人的策略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他们的活动范围大大地扩大了。他们开始更加广泛、更加积极地进行宣传和鼓动。扩大宣传书刊的发行，尝试公开出版中央报纸《祖国之子报》（1905年秋）和《思想报》（第一届国家杜马时期）；其次，党的恐怖活动也扩大了。如果说革命前只搞了6次恐怖活动，那么两年半的革命时期总共搞了200次恐怖活动。但是恐怖在党的策略中已经不占主要地位，工作重点转移到组织革命、培养革命群众的觉悟，转向各种革命表现形式，如罢工、示威、集会、抵制等等。社会革命党人还积极参加组建职业政治联合会。他们在铁路工会、邮电工会、职员和教师联合会中的影响很大。“全俄军官联合会”和“全俄士兵和水兵联合会”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发起成立并受他们影响的组织。社会革命党人在工人中的活动也大大超过了小组宣传的范围。但是他们在工人组织的工作仍然逊色于社会民主党人。切尔诺夫自己也承认，在各种工人组织和工厂中，“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通常是主要的”。

社会革命党人非常关心在农村的工作。他们为组织农民代表进入第一届国家杜马作出很大贡献。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据统计，社会革命党人建立了1500多个农民兄弟会。^①社会革命党人成功地组织了多次农民抗议行动，但大都是局部性的，而且持续的时间不长。但是社会革命党人还远远不能左右千百万俄国农民的行为。1905年夏以及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家杜马被

^① 参看《俄国政党历史》第164页。

解散后，社会革命党人曾尝试组织大规模的农民抗议活动，但是收效甚微。

和布尔什维克一样，社会革命党人也认为革命不仅需要组织，而且需要武装。他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比如，1905年1月，社会革命党中央建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寻找武器储存地、购买武器的资金，研究抢劫武器库的可能性，建立武器小组等等。但是委员会的工作没有开展起来，因为以И.М.鲁登堡为首的委员会成员1905年4月回俄国后被逮捕了。社会革命党人还参与了1905年夏用夏约翰·格拉夫东号船往俄国运输大批武器的行动，但是这些行动失败了。

莫斯科起义期间，社会革命党中央建立了一个由亚捷夫、萨文柯夫和丘特切夫组成的战斗委员会。他们在彼得堡成立了两个炸药厂，但是很快被亚捷夫出卖了。社会革命党的许多地方组织也搞制造武器和组建战斗队的工作。不过他们这样做多半是为了防备黑帮的暴行，进行恐怖活动和各种剥夺活动。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在1905年12月反对专制制度的武装起义中，尤其是在莫斯科的武装起义中，1906年夏天在喀琅塔得、斯维亚堡的武装起义中都起了不小的作用。

社会革命党人同革命民主派一起抵制了布里根杜马。他们参加了全俄国十月政治罢工。这次罢工导致了布里根杜马的解散，迫使沙皇政府颁布了10月17日诏书，许诺给居民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扩大杜马选举法，使杜马具有立法和监督职能。

社会革命党人对诏书的反应不一。大多数中央委员倾向于认为俄国已经成为立宪国家，因此应该全力以赴地为实现政府的许诺创造条件，组织人民群众解决党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党的策略作了相应的调整。大多数人认为，恐怖活动这种斗争手段同立宪制度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决定停止使用恐怖手段。战

斗队也解散了。多数社会革命党人主张采取‘不激化事态’的策略。同时他们反对公开实行 8 小时工作制和迷恋于罢工的做法，而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恰恰坚持这些要求。但是社会革命党人知道，苏维埃中多数人不在他们一边，为了遵守革命纪律，他们经常同意多数人通过的决议并尽力执行这些决议。比如在 12 月总罢工问题上，他们反对举行罢工，认为罢工会导致起义，而群众对起义尚没有准备，但是当罢工开始时，他们也参加了。

对于第一届国家杜马，社会革命党人同布尔什维克一样，采取了抵制策略。但是，当发现抵制的思想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特别是没有得到农民的广泛响应，形势表明杜马必然要成为政治斗争的中心时，社会革命党领导改变了对杜马的态度。努力对杜马施加影响。社会革命党对杜马中联合农民代表的劳动团影响很大，33 名代表向杜马递交的土地法案就是根据社会革命党土地纲领制定的。第一届杜马被解散，社会革命党人作出了强烈反应。他们号召地方组织立刻同政府开展武装斗争。社会革命党中央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劳动团、农民联合会、铁路工会、教师联合会一起在《告全俄农民宣言》上签字，号召农民为争取土地和自由而斗争。但是当时居民群众对解散杜马反应冷淡。这件事表明，俄国居民的社会情绪发生了变化，对革命开始感到厌倦。

在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期间，社会革命党人放弃了抵制策略，参加了选举。结果有 37 名代表进入杜马，但是其中没有一名党的著名活动家。社会革命党人代表在杜马中建立了社会革命党人议员团，而不是社会革命党党团。他们在杜马讲坛上积极发言，针对各种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社会革命党人提交杜马的土地法案征集到了 104 名代表的签名。但是社会革命党

对自己的代表在杜马中的活动并不满意，认为他们的工作“远不是卓有成效的”。第二届杜马开幕前，社会革命党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决定：如果沙皇政府驱散杜马，将举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社会革命党人杜马代表多次声明，他们不会屈从于对杜马施用的暴力，不会放弃代表权，不会解散，但是社会革命党中央最终并没有积极抵抗驱散第二届杜马的行为和“六·三”政变。

在革命中，政党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党员人数、党员的社会成分和党的组织结构决定的。与革命前相比，社会革命党人数增加许多倍，已经有 5—6 万人。地方组织的人数从几个人到数千人不等（在彼得堡有 6000 人，在莫斯科 3000 人）。党的社会成分也发生了变化：工人、农民占党员总数的 90%。但是领导机关中都是知识分子。

党员人数的增加、活动地域的扩大和任务的复杂化对党的组织结构产生了影响。1906 年底至 1907 年初是党的鼎盛时期，共有 356 个县级组织，78 个省级组织和 13 个州级组织。州级组织分别负责协调中部地区、南部地区、西南部地区、乌克兰、西北地区、伏尔加河流域、中亚、高加索等地区省党组织的活动。之所以要成立州党组织，是因为革命前夕和革命过程中地方组织发展很快，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从一个中心很难对它们进行领导。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的中央已逐渐变成了一个臃肿的机构，不仅不能促进地方组织的活动，反而会破坏地方组织的活动。当时的中央有 35—40 人。据马·安·纳坦松讲，没有一位同志能够记起所有中央委员，当时的中央委员斯列托夫讲，10 月 17 日诏书颁布后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这个时期建立的中央是非常荒唐的；中央分为彼得堡和莫斯科两部分，相互之间没有明确的职权划分，因此常常造成误解和冲突。比如，莫斯科派不

承认彼得堡派通过的关于暂停恐怖活动的决议；对每一个中央委员的义务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由于社会革命党人认为 10 月 17 日后的俄国已成为立宪国家 他们这时的策略是“不激化事态”于是他们在组织上试图同合法杂志《俄国财富》的一些温和民粹派政论家建立合法的民粹派政党。他们一起创办了第一份合法的民粹派报纸《祖国之子报》。但是社会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不支持建立公开的民粹派政党的思想 于是《俄国财富》的代表退出代表大会。1906 年他们建立了自己的人民社会党（又称劳动人民社会党）。他们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区别在于，他们推崇公开的组织 and 斗争形式，主张不是通过秘密的、革命的途径 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地在国家的帮助下进行变革，不是主张土地社会化，而是主张土地国有化。

综上所述，1905—1907 年革命期间，社会革命党人加强了自己的影响。他们同群众，尤其是同农民结合的过程非常引人注目，但是他们最终也没有充分掌握农民群众的运动。在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家杜马中，社会革命党人在土地问题上的影响不如人民社会党，因为他们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没有充分考虑到农民的私有本能。但是正如切尔诺夫说的那样，主要是社会革命党人“没能展示自己作为组织和实际领导者的才能”。

五 资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的态度

第一次俄国革命就其性质而言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俄国革命同以往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有很大区别。俄国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的，工人阶级已

经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法国发生革命时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尚未出现，法国无产阶级到19世纪初才出现，是革命产生的这个阶级。俄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时工人阶级已经有了自己的政党，而1848年德国革命结束时才号召人数不多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成立独立的工人政党，而且这个号召直到20年后才得以实现。俄国资本主义是在专制制度保护下发展起来的，因此俄国资产阶级同专制制度有一种特殊的关系。由于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成长起来，有了自己的政党，他们在革命过程中必然要提出本阶级的要求。所以同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相比，俄国的阶级关系要复杂得多。在俄国革命中，我们看到，当无产阶级开始成为革命者的时候，所有的资产阶级集团都毫无例外地鼓掌欢迎，而当无产阶级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时候，他们又都一致谴责它了。同样，当工人要求政治自由、反对专制时，资产阶级感到满意，而当工人为争取8小时工作制而斗争、触及到资产阶级利益时，工业资本立刻便同“镇压者”站在一起了。俄国资产阶级政党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

立宪民主党是在10月17日诏书颁布后建立起来的。它主张用和平的方式同专制制度斗争，觉得可以同君主制达成妥协，因此沙皇政府任何不同程度迎合社会愿望的措施都会使它受到鼓舞，感到希望。立宪民主党人对10月17日诏书总体上持肯定态度，但是他们并不像十月党人那样无条件支持政府。1905年10月18日立宪民主党成立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就实现诏书承认的新政治生活原则的条件而言，人们无法相信这些原则会得到充分和彻底的实现。”决议还指出，诏书要召开的国家杜马“不可能被认为是正确的人民代表机关”。因此党的最近任务“仍然是争取实现既定的目标——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

投票，没有性别、民族和信仰差别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决议贯穿的思想是，可以通过国家杜马召开立宪会议。

代表大会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改革的建议，立宪民主党领袖们认为，这些改革应该使国家走上和平的立宪建设道路。根据这些建议 政府应该实施下列措施 立刻着手实现 10月17日诏书中阐述的计划；取消所有专制法律；颁布召开立宪会议的选举法，立宪会议应该制定并通过选举法；从行政机关中清除那些人民憎恶的人员 建立临时的“有办事效率的内阁”，它在召开立法人民代表会议和建立由议会多数派组成的政府之前行使内阁职权；立刻对政治犯和宗教犯实行大赦。

立宪民主党人非常重视建立临时的“有办事效率的内阁”。他们提出这个要求是为了防止无产阶级可能公开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立宪民主党人希望由沙皇发起“从上面”来建立“有办事效率的内阁”，并且主要由自由派社会活动家和沙皇政府官吏中个别自由派代表组成内阁。1905年10月12日 立宪民主党在反动势力和革命势力中间采取中立的立场，米留可夫解释说，立宪民主党的主要任务是“将两个尖锐对立的对手永远地分开，并在不影响日常生活进程的较文明的框架内进行政治斗争”。

1905年12月11日选举法颁布后和武装起义失败后 立宪民主党领导决定把党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准备杜马选举上。在1906年1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立宪民主党领导人放弃了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号召积极参加杜马选举。米留可夫精辟地表述了立宪民主党策略的实质。他认为，立宪民主党路线的宗旨是使革命运动走上议会斗争的轨道。

为了把群众运动从革命道路转到议会道路，立宪民主党人使用了各种宣传手段。他们有相当好的条件：出版物（近70种报纸）口头鼓动宣传、“人民权利”俱乐部 等等。党的正式机关

刊物有：《言语报》发行量达 1.2—2 万份；《人民自由党通报》（1906—1907 年出版）。到 1906 年春，立宪民主党地方委员会在 44 个城市出版了 124 种小册子和传单。他们宣传只有通过和平的议会道路，通过杜马才能解决俄国现实中所有迫切问题。与右派和十月党人不同，立宪民主党人竞选的方法更狡猾：他们许诺要在杜马中同政府“算账”，要进行彻底的农民改革和工人改革，通过立法途径实现所有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这样就把那些具有民主主义情绪的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那些没有政治经验的民主派认为立宪民主党是反政府最坚决的政党，因此都投票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有 179 名候选人当选第一届杜马代表，其中有不少著名教授、律师、政论家。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著名法学家谢·安·穆罗姆采夫当选第一届杜马主席，中央委员彼·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和尼·安·格列杰斯库尔教授当选为副主席，中央委员德·伊·沙霍夫斯科伊当选杜马秘书。一些著名的立宪民主党党员成了杜马各部、各常设和临时委员会主席和秘书。立宪民主党人实际上左右了第一届杜马。

在第一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人发起并起草了给沙皇的呈文，阐述了他们的主要纲领性要求，他们提出了大部分立法草案，向沙皇政府提出质询。立宪民主党人在严厉批评政府的同时，千方百计同政府寻求妥协。1906 年 6 月他们就建立由沙皇警察总监德·费·特列波夫、内务大臣彼·阿·斯托雷平和外交大臣亚·彼·伊兹沃尔斯基组成的责任内阁问题再次同政府谈判，与此同时，他们批评左翼革命党团激进的立法草案和建议，否决了“104”名代表提出的土地法案，该法案要求实行土地国有化和公开建立农民委员会。他们还企图抵制社会革命党人和劳动派向沙皇当局提出的最尖锐的质询。

杜马的工作实践表明，立宪民主党的策略并不成功。他们

最终也没能说服政府必须履行 1905 年 10 月 17 日诏书的许诺。政府用刺刀回答了立宪民主党通过杜马进行社会改革的企图。这使群众对立宪民主党杜马用和平办法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的能力感到失望。立宪民主党的妥协立场客观上导致自己在左、右两个方面的孤立。

1906 年 7 月 8 日,仅存在 72 天的第一届杜马被解散,立宪民主党领导面临着一次选择:或者和平地解散,或者号召人民支持杜马。他们选择了第一条道路。1906 年 7 月 10 日,120 名立宪民主党代表同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人一起签署了著名的维堡宣言。这个文件的实质是号召居民消极抵抗:拒绝交纳税款,拒绝履行税民兵役制,不承认国债,等等。但是,立宪民主党关于消极抵抗的号召实际上不过是对政府的口头威胁,因为除号召外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措施。立宪民主党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国内出现新的革命爆炸的现实危险。到 1906 年 9 月,立宪民主党人就放弃了维堡宣言,开始逐渐使自己的策略适应斯托雷平体制。1906 年 10 月,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通过了第二届杜马选举的行动纲领,指出党进入第二届杜马是“为了立法,而不是在杜马中搞革命”。立宪民主党领袖决定改变党的策略,“在我们的策略和左派的策略之间”彻底划清界限。

在第二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比第一届杜马时期少了 80 个席位,但是他们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费·亚·戈洛文当选为杜马主席。同第一届杜马相比,立宪民主党党团一方面削减了自己的纲领性要求,不再‘滥用’质询手段,另一方面加强了同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派的思想斗争。立宪民主党人从他们提交第一届杜马的土地法案中删去了关于建立国家土地基金的条款,扩大了不出让的地主土地范围,让农民负担全部赎金。他们抵制左翼政党的质询策略。结果第二届杜马只进行

36次质询 不到第一届杜马时期的 1/10。

与此同时，立宪民主党不想同斯托雷平直接合作，因为那意味着放弃他们自己的纲领和同民主派彻底分裂。他们不满意斯托雷平纲领，更反对用暴力实施这一纲领。因此，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否决了政府的土地立法。

在第二届杜马存在的 103 天里，以及在杜马内外进行的激烈的思想政治斗争中，立宪民主党人既没能同俄罗斯官方找到“共同语言”也没能同俄罗斯民主派找到“共同语言”他们想在群众和统治阶级之间架设“桥梁”的企图再次破产。

立宪民主党人的所作所为再清楚不过地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它充分表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在俄国政治舞台上的作为是有限的。在无产阶级政党已经建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日益成熟起来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想利用革命来投机已经越来越困难。实际上资产阶级想在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这在西欧是行得通的，而在 20 世纪初的俄国，立宪民主党等资产阶级政党要走这条路则遇到了来自两方面的阻力。

事实上在“六·三”政变君主制获胜的形势下，立宪民主党的策略又作了调整。目的是进一步适应斯托雷平的政治方针。右翼立宪民主党人号召“同历史上形成的权力彻底妥协”。这一立场反映在《路标》文集中。文集作者根本否定任何革命，不仅反对社会革命，也反对政治革命。他们认为，在个性没有得到思想净化之前，任何革命变革都是没有意义的。路标派声称，俄国革命的主要罪魁祸首是那些感染上“反国家”、“反宗教”和“世界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对立宪民主党领导产生一定的影响，他们比以前更明确地划清自由派和左翼政党的界限。在第三届杜马选举运动中，米留可夫声明说：“我们和整个俄罗斯的敌人

来自左翼。”米留可夫认为，这个敌人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与此同时，立宪民主党领导决定暂时放弃“责任内阁”的口号，开始更多地强调自己对君主制原则的忠心。正是在这时，米留可夫声明立宪民主党人是“陛下的反对派”。在以后的事态发展中，立宪民主党同沙皇政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六 斯托雷平改革及其失败的原因和意义

俄国第一次革命被专制制度镇压下去了。列宁在革命开始时就没排除这场民主革命有可能失败的结局。这次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伟大历史意义是不容忽视的。革命第一次沉重地打击了沙皇专制制度，为新的决定性战斗奠定了基础。列宁指出：“没有 1905 年的‘总演习’，1917 年的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和十月无产阶级革命都是不可能的。”^① 革命没有达到自己的直接目的并且最后失败了。这首先是因为工人阶级在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没能同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农民行动分散，进攻力不强。无产阶级本身也缺乏必要的团结和协调一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队伍内部缺乏统一，组织上、思想上和行动上都不能团结一致。

但是革命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在人民的政治意识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俄国无产阶级以英勇的斗争迫使沙皇政府作出重大让步。无产阶级争得了（虽然时间很短）在俄国前所未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革命迫使沙皇政府建立了代议机构，这意味着沙皇制度沿着向资产阶级君主制度转变的道路

^① 《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3 卷第 794 页。

演变下去。无产阶级也争取到了一些权利，如在某些部门缩短工作日、降低罚金数量、提高工资等。沙皇政府被迫向农民作出让步，取消赎金，而地主则被迫降低了土地的租金和出售价格。

此外，要全面了解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影响，还必须分析革命后的斯托雷平政策时期，这样才能看到这次革命所产生的客观结果。

斯托雷平是大地主和贵族的代表，当时任大臣会议主席。他是以镇压 1905—1907 年革命和进行改革而闻名的。

专制政府对革命的参加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目的是消灭一切使人想起革命的东西。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农民横遭折磨、枪杀和绞刑。讨伐队到处肆虐。据不完全统计，从 1907 年到 1909 年受沙皇法庭审判的超过 2.6 万人，其中判处死刑的达 5086 人。1906 年 8 月 19 日，整个俄国都设立了战地法庭。任何一个公民，只要从他衣袋里搜出一支勃郎宁手枪，他就可以由几名部队军官任意处置，多半是被处死。斯托雷平时期，有数千人被战地法庭处死。而斯托雷平仍对战地法庭的“温和”表示不满。

斯托雷平在政治上是一个君主派，经济上是一个自由派。他要进行改革的目的有两个：（1）造就千百万富裕的农民私有者、农场主，以平息革命危机。他认为，“富裕农民永远是秩序和安宁的支柱”。（2）以此建立政府的支柱。这是一个在保存沙皇专制制度的前提下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的改革方案。显而易见，这个方案本身就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斯托雷平改革的政治考虑是，没有农民的参与，俄国不可能发生任何革命，因此要通过改革把农民拉拢过来。而经济上的考虑是，没有坚实的农业基础、发达的农业、廉价的食物，不把千百万从前的农民——廉价的劳动力投向劳动市场，俄国不可能有真正强大的

工业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斯托雷平改革的措施主要有两个：(1)破坏俄国农村传统的村社，建立独立田庄；(2)向东部空旷地区大量移民。

村社是俄国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制度。村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视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

这种制度维护了沙皇制度，但是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斯托雷平改革的目的是要破坏村社。1904年他任萨拉托夫省长时就曾给沙皇写过一份报告，在“追溯‘俄国农业发展的’‘祸因’”时指出：“村社土地占有制，即村社制度对于整个农民生活方式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这个制度在人民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不能说人民喜爱这个制度：他们只是不理解其他制度，认为其他制度是不可能的。同时俄国农民喜欢大家一律平等，使大家达到一个水平，但因为不能使群众都提高到最能干和最聪明的人的水平，所以优秀人物势必屈从于最坏的和怠惰的大多数人的见解和意愿……对土地的渴望，土地的混乱状态，其本身就要求采取措施使农民摆脱当前的不正常状态。个人所有制是对村社制的一个自然平衡力量。它也是秩序得以维护的保证，因为小私有者是国家赖以稳定秩序的细胞。”

在这个问题上，斯托雷平不是孤立的。1904年赫尔松省省长写的一份报告中也说：“在村社制度下，由于使用土地有临时性，所以不仅妨碍农业技术的改进，而且使所有权的概念不明确，因而成了发生纠纷、争执和互相倾轧的根源……为了使农民

的土地得到妥善安排，最好实行下列措施：规定一些便于从村庄土地占有制过渡到个体农户土地占有制的条件，并规定政府的奖励措施，使农民在其份地范围内分散居住，以便过渡到建立独立农庄经济。^①

斯托雷平当上大臣会议主席后，于 1906 年 11 月 9 日颁布的法令中规定：“村社占有土地的每个农户有权随时要求将这块土地中应该归他的那部分固定为自己的财产”。^②按照斯托雷平的计划 凡是 24 年来没有进行重分的地方，也就是在村社已经仅仅成了一种空洞的法律形式的地方，应该强制实行这种划分 即使在其他任何村社里 只要有 1/5 农户主（假如农户主不到 250 人 提出要求 或者只要有 50 个农户主提出要求 如果全部农户主在 250 个以上）也可以强制实行这种划分。如果进行重分，那么甚至每个单独的农户都可以要求划分土地。第二届国家杜马抑制了斯托雷平政府的政策，但是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政府在实力上占有了优势。根据新颁布的选举法选出的第三届杜马，地主阶级的代表在其中占多数，因此对政府是很顺从的。这对于斯托雷平实施自己的改革计划无疑是有利的。

截至 1916 年 1 月 1 日 在 280 万声明愿意退社的农户中，实际上退出村社的有 200 万多一点，退出的农户主占全俄所有村社制农户的 21.8%。属于他们的份地的土地占全部村社份地的 16.4%。但是这些数字并不说明村社在迅速解体。非黑土地带的地主一般都反对斯托雷平改革，因为工厂是他们最可怕的竞争者，他们完全有理由担心，一旦大部分农民都脱离土

转引自《俄国历史概要》1978 年三联书店版下册第 813—814 页。

② 《斯托雷平改革。20 世纪农村经济的资本化》1925 年列宁格勒版第 41 页。

地，他们势必会失掉村社所提供的廉价劳动力雇农。因此，在非黑土地带，退出村社的农民所占的比例不过 15%~17% 而在北部地区甚至低到 6%。在伏尔加河流域，退出村社的也不多。

斯托雷平认为 要彻底完成“改革”需要 20 年时间。由于从 1910 年起申请退出村社的农民不断减少，所以到 1914 年愿意退出村社的比 1909 年已经少了 4/5。从这个意义上说 斯托雷平的纲领远没有完成 甚至可以说“失败”了。但是 俄国中世纪土地占有形式在 1906—1910 年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从深度和广度来看斯托雷平改革可与 1861 年的改革相媲美。

斯托雷平采取的第二个措施是向东部空旷地区大量移民。这项措施也取得了某些效果。1900 年以前的 300 年间 往乌拉尔以东地区移居的俄罗斯人总数只有 500 万 斯托雷平改革时期 1906—1911 年 就移居了 300 万人，斯拉夫民族在东部所占的比重一下子提高到 85%。斯托雷平政府千方百计帮助富裕农民，通过农民银行向他们提供优惠贷款。与此同时，向农民提供实物性援助 比如修建基础设施 在移民区修筑铁路、公路、水井、水库、医院、学校等 向农民提供种子、农具 等等。当时很少提供资金援助，主要是担心现金被农民用来喝酒和挥霍，被商人、官吏和金融机构滥用。

斯托雷平采取的这些措施带来了如下结果。首先导致农民无产阶级化。在 200 万退出村社的农民中 有 120 万农民把自己的份地卖掉了，占总数的 60%。在中央农业区，出卖自己的份地的占全体农户的 7% 或退出村社的 1/4 以上 在新俄罗斯（即现在的乌克兰南部和克里米亚的一部分）甚至达到 12.3%，或几乎达到退社农民的 1/3。^① 出卖土地的是贫农。他们曾向

^① 《俄国历史概要》下册第 822 页。

往个体经济，但是很快就确信，要想在这样一小块地上经营农业是不可能的，尽管它已经成了“神圣的私有财产”。一位农民写道：“这项法律（11月9日命令）使富裕农民有可能购买份地而更加富裕，也使贫苦农民有可能出卖份地，因而贫农变成穷光蛋。而这并不是因为愚蠢或挥霍，只是因为倒霉。”而且份地与地主土地相比较，卖价非常便宜。在地主土地每公顷卖121卢布的地方，农民份地才卖97卢布；在地主土地卖124卢布的地方，份地才卖96卢布，如此等等。改革使相当一部分农民破产。他们不知道，这正是斯托雷平改革的初衷。其次，改革使播种面积扩大。如果把斯托雷平改革以前的1901—1905年同1911—1915年加以对比，就会发现播种面积扩大了，有的地方扩大了55%甚至高达75%。播种面积的扩大主要出现在“移民地区”（高加索北部、西伯利亚、草原边区），可见移民措施起到一定效果。

与此同时，斯托雷平开始不择手段地制造农村资产阶级。农业机器的进口从1909年的1710万卢布增加到1913年的2370万卢布。随着农业资产阶级的产生，市场扩大了，市场扩大又促进了工业的发展。比如，棉花的加工从1908—1909年度的32.4万吨增加到1912年的39.1万吨，炼铁从280万吨增加到460万吨，采煤从2630万吨增加到3630万吨。粮食出口比本世纪初几乎增加了1倍。俄国铁路货运量从1905—1909年的1740万吨增加到1910—1914年的2000万吨。其中运往国外的，1905—1909年占1240万吨，而1910—1914年只占1150万吨，即国内市场在1905—1909年占500万吨，而1910—1914年则几乎占1000万吨。

在列举上述成果的同时，不应该忘记，斯托雷平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官僚、警察施加压力实现的。斯托雷平时期也以残酷

镇压革命者而闻名，左翼政党的活动家们在这一时期遭到跟踪和迫害，当时的战地法庭可以不经审判枪杀公民。斯托雷平甚至禁止法学家参加战地法庭。但是高压政策并未保证斯托雷平改革成功，改革也并未平息人民的不满情绪。

斯托雷平改革的两个目的达到了吗？首先，斯托雷平想通过造就私有者，以平息革命危机。但是事实上，农民的反抗情绪从来没有被镇压下去。土地改革使相当一部分农民无产者化。虽然反革命猖獗时期公开形式的农民运动被粉碎，但是小规模农民反抗运动从来就没止息过，1907年全俄国有2557次运动，1910年有6275次增加一倍多到1911年有4567次。^①改革也没有缓解无产阶级同资本的矛盾，从1910年年中起无产阶级开始从反动势力给他们造成的严重挫折中恢复过来，并且转入进攻，罢工运动又一浪高过一浪地席卷全国，撞击着沙皇专制制度。至于想通过改革建立政府的支柱，这个希望也落空了。政府不仅没有得到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也没有得到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1911年9月1日斯托雷平在基辅被刺杀改革随之夭折。

斯托雷平改革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1)在沙皇制度下，斯托雷平搞改革需征得沙皇同意，改革的措施要得到沙皇的理解和支持，因此主动权并不在斯托雷平手里；(2)斯托雷平所要造就的千百万农民私有者并未表现出应有的积极性，其中富裕农民并不是改革的主体，而是改革的对象。其他农民也未从改革中得到好处。他们的出路是被迫移居。他们不仅自己对政府不满，还把这种不满情绪带到移居的边远地区；(3)专制制度和整个官僚集团很快明白了，千百万农民私有者最终会埋葬自己，

① 参看《俄国历史概要》下册第819页。

因为一个考虑到千百万人利益的政权不会是专制制度，而是共和国。这种前途既不符合官僚的利益，也违反沙皇的意愿；（4）俄国资产阶级根本不想走西方式道路，他们已经同沙皇官僚集团勾结在一起，靠其保护生存。资产阶级不想取消沙皇官僚，只是想更多地影响他们。总而言之，斯托雷平旨在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方针既不符合专制制度的利益、官僚的利益，也不符合俄国资产阶级、首先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和农民、无产阶级政党和其他左翼革命政党更是严厉谴责斯托雷平的政策。斯托雷平本人成了孤家寡人。俄国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沙皇本人也参与了谋害斯托雷平的“阴谋”。可见，斯托雷平改革失败是不足为奇的。

斯托雷平改革的失败表明，在俄国用改良办法改造专制制度、加快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已经被堵死，用新的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仍然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新的革命暴风雨必将再次来临。

第四章

战争与政党

一、大战的爆发及其对俄国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历史上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是所有参战强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发动的一场瓜分世界的战争。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和社会分化为对抗阶级而产生的社会现象。它是不同的社会阶级或国家为了某种经济和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有组织的武装斗争。战争就其本质来说，是某一阶级以暴力手段施行的政治的继续，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形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垄断组织。垄断组织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迫切需要新的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它们控制着本国政府，竭力向外扩张。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结果，一些过去落后的资

本主义国家很快超过了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因此需要根据实力对比重新分割世界。19世纪60年代，英法两国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分别占据第一和第二位，而到20世纪初则降到第三和第四位，原来处于第四位的德国却一跃而居第二位。经济实力发生如此巨大变化，但是双方所拥有的殖民地的状况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大战爆发前夕，英国占有殖民地3350万平方公里，人口3.935亿，而德国在这个时候仅有殖发地290万平方公里，人口1230万。新崛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要夺取殖民地，而旧的殖民帝国则拼命设法保住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列强之间争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激烈。

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与的军事集团，早在大战前就已形成。经过日俄战争和1905—1907年的革命，沙皇政府已经元气大伤，更加依赖西方。已经不可能提出一个远大的独立的侵略目标，并指望它能胜利实现。斯托雷平本人曾坦率地说：“国内形势不允许我们对外执行侵略政策。”俄国只得加入英法于1904年缔结的协约国。俄国同法国是老盟国，它只需调整同英国的关系。于是俄英两国于1907年签订协定，双方划分了在波斯的势力范围：北方是沙俄的势力范围，南方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沙皇政府对此非常满意，因为在此之前，它在波斯的经济扩张政策已经遭到破产，是抵挡不住英国的竞争的。

加入协约国以后，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扩张主义分子企图在远东和巴尔干实现自己的目标，因为德国和奥匈帝国在这些地区加强了自己的势力。这是沙皇政府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个大转折，虽然宫廷内部有许多亲日尔曼派。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继承传统，夺取黑海的两个海峡。持这一立场的有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和地主，因为俄国很大一部分输出，特别是粮食输出，要通过这两个海峡。支持他们的有外交家、陆海军专

家。这些人清楚地看到德国对土耳其的统治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战略利益上都会使俄国遭受损失。渴望夺取“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的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甚至把这项要求定为自己对外政策纲领的基础。

但是沙皇制度内部虚弱，不可能采用军事手段达到吞并的目的，而期望在英、法支持下通过纯外交途径顺利解决问题的企图也不可能得逞。1908年，俄国外交人士许诺奥匈帝国，对其合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将予以同意。这两个地方是土耳其的省份，居民是塞尔维亚人和霍尔瓦特人，早已被奥地利所占领。而作为交换，奥匈帝国则许诺俄国军舰可以自由通过两个海峡。德国和意大利答应对此不表示反对，但是沙皇政府的两个盟国——英国和法国表示反对。结果奥匈帝国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但是英、法并不支持俄国对两个海峡的要求，因此它白白地承认奥地利的吞并，落得两手空空。这是俄国外交上的一个惨重失败。战前最后几年，俄国在巴尔干和近东的政策，既服从于自身的侵略目的，同时也为了制止德国和奥匈帝国在这一地区扩大和巩固自己的势力。1912年，塞尔维亚、黑山、保加利亚和希腊在俄国外交的活动下结成所谓的巴尔干同盟。这个同盟于1912年秋发动了对土耳其的战争，前后只两个星期就打败了对手，德奥集团认为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结局是自己的严重失败，而巴尔干同盟的建立是俄国取得的重大优势，于是在外交上竭尽全力要拆散这个同盟。德国运用自己在保加利亚的强大影响，利用巴尔干各国的传统矛盾，伙同奥地利挑动保加利亚反对与俄国、希腊关系密切的塞尔维亚。1914年爆发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先后加入了塞尔维亚、希腊反对保加利亚的战争。保加利亚遭到了失败。此后俄国和德国在土耳其和巴尔干的角逐更加激烈。

1914年6月15日奥地利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被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刺死。这件事引发了一场列强之间的战争。1914年7月19日(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和俄国相互宣战,卷入了这场战争。列宁对这场战争的起因的评价是:“引起这场战争的是各大大国之间的帝国主义关系,即它们为瓜分赃物、由谁并吞哪些殖民地和小国的斗争,同时,在这场战争中居于首位的是两种冲突。第一是英德之间的冲突。第二是德俄之间的冲突。这三个大国,这三个拦路抢劫的大强盗是这场战争中的主角,其余的都是胁从的伙伴。”^①俄国的参战得到统治阶级的拥护,同时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

统治阶级怀着抑制不住的兴奋和沙文主义情绪迎接沙皇关于战争的文告。垄断资产阶级希望战争能成为他们的“摇钱树”,靠军事订货发财。企业主的狂热、有价证券的投机买卖、牟取暴利之心和“弄钱”的手法,在俄国从来没有像战争年代那样登峰造极。从1915年起,俄国军队的给养极其恶劣。不但炮弹供应不足,步枪子弹、乃至步枪都不敷供应。服装和鞋子也十分缺乏。甚至对战斗部队的粮食供应,都经常长期中断。

军事部门指望从官办工厂得到供应,动用战前的贮存,但战争开始不久后都落空了。而在战争的头9个月政府本来不打算动员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财力以满足战争的需要,明知加强资产阶级在战时经济的作用会助长他们的政治野心,但专制制度很快不得不出此一举。5月间成立了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业企业之间分配军事订货的权威组织。各地也成立了类似的委员会。战争一开始即已产生的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和全俄城市联合会被准许参与对前线的供应。政府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193页。

还建立了专门的机构以调节经济活动，这就是国防、燃料、粮食、运输四个方面的特别会议，都由相应的大臣负责主持。垄断组织或财团的规模越大，地位越重要，它在政府调节机构的扶助下所获得的利润就越多。而军事订货的分配暗无天日，贿赂公行。

与此同时，国内经济状况日益恶化，转眼之间燃料发生恐慌。煤的开采和运输明显地不敷需要。本来就已捉襟见肘的铁路运输，也感到燃料恐慌。军用物资和部队的运输、事关国计民生的国民经济货物的运输，都陷于瘫痪。这种状况加速了经济的总崩溃。

战争也使农业生产、农民状况和城市粮食供应状况恶化。有 1500 万成年男子上前线，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这种情况造成国内粮食供应困难，即使停止大量的粮食出口，加上 1915 年的丰收，也无济于事。农业生产下降，播种面积缩小，肥料、机器和新农具的使用大为减少。牲畜缺乏，因为大量马匹被前方征调。牲畜的总头数也在缩减。地主的经营由于缺乏劳动力而遭受损失。但国内粮食供应状况恶化的原因不仅在于农业方面。国内粮食还是有的，由于粮价不断上涨，手上有粮食的人们暂时把粮食都囤积起来。

粮食恐慌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后果。它在大工业城市中激起了革命情绪的高涨。劳动人民的贫困因战争而逐日加深。通货膨胀的日益加剧使工人阶级的生活负担越来越沉重。但是金融资本家和企业主却在大发横财，他们甚至加速卢布贬值。战争在俄国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和垄断过程。

前线战事对俄国也非常不利。1915 年 5 月和 6 月，俄军被迫放弃加里西亚。德军在其他战线如波兰和东普鲁士发动进攻。7、8 月间，俄军经过苦战，撤出了波兰和立陶宛部分地区。

后来敌方完全占领了立陶宛、拉脱维亚的一部分以及白俄罗斯的某些地区。1915年的战争结果令人十分失望。俄国人员伤亡惨重。战争开始以来，俄国伤亡和被俘人数共计350万人。国家丧失了大片在经济上和战略上十分重要的领土。军事失利加上经济崩溃，使国内政治危机更加严重。

战争使俄国工人阶级的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1914—1916年在俄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彼得格勒有17%的工人被动员去上前线，在其他工业中心，参军的工人就更多了。迅速涌进工厂顶替工人的，是那些逃避应征的小工商业主、酒馆老板和房主，以及城市的半无产阶级的代表——手工业者、清洁工、看门人、仆役等等。这种情况不能不对工人阶级的整个政治水平产生影响，使得它的觉悟程度和组织性降低。出身非无产阶级的新工人，带来了小资产阶级的情绪，扩大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工人阶级的社会基础。正因为如此，工人中相当一部分人感染上了护国主义情绪。工人罢工事件明显减少。因为参加罢工的人往往被送上前线。

但是从1915年夏季开始，罢工和工人示威又掀起高潮，运动规模越来越大，它的政治性表现得越来越明显。1915年5月，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爆发了罢工。6月，科斯特罗马纺织工人罢工，发生了枪击游行队伍的事件。8月，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发生枪击工人示威队伍事件。各地布尔什维克组织印发传单，号召举行群众性抗议罢工。从1915年秋季开始，工人和作战部队中的反战争情绪日益高涨。沙皇政府的威信日益低下，王朝风雨飘摇了。

二战争期间的黑帮和十月党人

大战前，在如何对待斯托雷平改革问题上，黑帮内部发生争吵并导致了一场分裂。以黑帮领袖之一的杜勃洛文为首的一派坚决反对斯托雷平改革，认为改革会危及君主政体。他们被称作杜勃洛文派。反对杜勃洛文的人，对斯托雷平改革采取理解和有条件支持的态度。他们被称作革新派。1911年斯托雷平遇刺身亡后，两派的分歧并没有得到弥合，所以大战开始时黑帮的势力和影响已经受到削弱。

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剧了国内的沙文主义情绪，黑帮打算利用这个机会。但是由于他们具有传统的亲德情绪，因此他们的立场并不坚定。开战前两个月，尼·叶·马尔柯夫在杜马讲坛声明：“与其同英国建立友谊，不如同德国结盟。”俄国同协约国一起参战迫使黑帮对自己的立场作一些调整。极右分子第一次提出兼并斯拉夫各国，瓜分奥斯曼帝国，甚至提出清除异教徒。

杜勃洛文派和革新派在策略上存在分歧。杜勃洛文派仍然拒绝同主张立宪的政党合作。他们认为，立宪民主党人仍然是“政治小偷、骗子和刽子手的政党”。他们用虚伪的爱国主义口号掩盖自己的罪恶目的。与此相反，革新派在战争开始时对“爱国主义团结”寄予很大希望。他们说：“我们俄罗斯人再不应该因党派不同而相互怀疑、甚至指责对方自私和背叛。”

1915年夏，俄国在前线的军事失利使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这一年5月莫斯科发生大规模破坏德国工厂、商店、住宅的事件。如果说1905年极右分子把这种破坏行为看作是人民

群众觉醒的标志的话 那么 10 年之后的这种行为则使他们非常担心，因为走上莫斯科街头的群众公开否定当局，侮辱皇室的代表。

黑帮认为，第四届国家杜马中进步同盟^①的成立是沙皇制度的敌人团结起来的标志。他们迅速采取措施建立“白色同盟”，以便对付自由派和右翼自由派政党的联合。1915 年 8 月，在杜勃洛文派的倡议下，在萨拉托夫召开了君主派会议，与会者要求沙皇和政府解散第四届国家杜马。

但是，黑帮组织没能克服阵营内部的分歧。1915 年 11 月，他们在彼得堡和下诺夫哥罗德并行召开两个君主派会议。首都会议的参加者主要是革新派，与会的还有教会主教和一些达官显贵。会议否决了进步同盟关于建立社会信任的内阁的要求，认为这个要求“违背俄罗斯国家的基本法律”。在下诺夫哥罗德召开的杜勃洛文派的会议上，反对进步同盟的呼声更高。但是两个会议在联合极右派方面都没有采取什么重要措施。

一些最大的黑帮同盟和极右派党团领导人没能在对政府的态度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尼古拉二世不顾杜马中多数党团的要求，没有任命自由派社会活动家，而是任命一些自称拥护极右派的人担任高级职务。如俄罗斯人民同盟成员阿·尼·赫沃斯托夫被任命为内务大臣，伊·格·格洛维托夫被任命为最后一任国务会议主席。但是，右派领袖们认为，政府庸庸碌碌，得到拉斯普廷^②支持的一些人受到重用，败坏了最高权力的威信。

大战期间 普列什凯维奇猛烈抨击后方的混乱状态、盗窃国

① 进步同盟是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党团联盟，1915 年 8 月由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等地主资产阶级的党团联合组成。

② 格·叶·拉斯普廷(1872—1916)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及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多罗夫娜的宠臣。

库行为 and 政府的软弱无能。1916 年 11 月 19 日他在杜马发言时大谈沙皇周围聚集了一伙“黑暗势力”。他的发言赢得了中间派和左派代表的掌声，但是没有得到右派代表的支持。以马尔柯夫为首的革新派谴责自己同行的行为，指责他是革命者的帮凶。这一切都表明，黑帮势力已经日暮途穷，大势已去了。

早在战前，十月党人就拥护政府的对外政策，支持政府同英国和法国结盟。他们主张摧毁德国的经济实力，俄国夺取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扩大和加强俄国在巴尔干和近东的影响。十月党人在报刊和杜马讲坛上积极鼓吹吞并这些海峡并占领君士坦丁堡，支持俄国的其他领土要求。在杜马国防委员会，他们坚决主张扩大用于武装力量现代化的拨款，实行更积极的对外政策。

战争开始后，十月党人宣布自己完全同政府站在一起并停止一切反政府活动。他们在《莫斯科呼声报》上写道：“所有政党间的分歧 所有纲领性问题和‘阶级矛盾’都应该放到次要地位。现在俄国只应有一个党——俄罗斯党”。在 1914 年 7 月 26 日的杜马会议上，十月党人郑重宣誓无条件地支持沙皇政府的军事努力。他们始终信守这一诺言。十月党人中央的活动性质也发生根本性变化，1915 年 8 月停止活动以前，中央几乎完全忙于为战争动员力量：出版小册子和宣传书籍，宣传战争的意义，采取措施帮助伤病员，募集药品和食品。1914 年夏，十月党人中央委员参加创建“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和“全俄城市联合会”。^①这两个联合会同军事当局密切合作，起初是做些救助

① 即“全俄地方自治机关援助伤病员联合会”和“全俄城市援助伤病员联合会”，这是俄国资产阶级和农场主的组织。

伤病员的工作，后来扩大为供应军队装备和补给，以及安置难民等工作。十月党人参加了政府专门成立的国防、食品、运输、燃料等组织。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实力的加强以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联合，导致他们同专制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因为专制政府没有能力克服战争造成的困难。从 1915 年夏开始 政治危机开始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沙皇政府不仅不能控制事态的发展，而且也不了解事态发展的意义。

在政权日益瘫痪的形势下，自由派内部的“爱国主义情绪”开始转变为“爱国主义恐慌”。十月党人也跟随进步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开始转入政府的反对派阵营。左翼十月党人和相当一部分地方自治人士十月党人不得不支持建立杜马信任的政府的号召，并同意加入进步同盟。该同盟联合了杜马中大多数温和的自由派党团 422 名议员有 236 人参加，还有国务会议的 3 个集团。进步同盟纲领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建立“社会信任的内阁”进行一系列改革 更新地方管理人员 部分实行政治大赦，等等。但是这个具有妥协性质的、极其温和的纲领也被政府否决了，这导致进步同盟各成员同沙皇政府关系的激化。但在反政府的程度问题上，进步同盟各成员的表现是不同的。大多数成员，包括地方自治人士十月党人，认为应提出“社会信任的内阁”口号。以第四届杜马主席米·弗·罗将柯为首的右翼十月党人则要求重新考虑地方自治制度，从立法上加强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城市联合会和合作社组织的法律地位。拥有亲自向沙皇报告权利的罗将柯在最后时刻企图说服尼古拉二世放弃臭名昭著的政府并建立一个得到“人民信任”的政府。亚·伊·古契科夫在进步同盟中采取了与众不同的立场。他认为，要想避免发生革命，只有进行宫廷政变。

二月革命前夕 自由派中间一直在进行关于‘社会信任的内阁’、‘向杜马负责的内阁’的政治表述的争论 准备新内阁组成的各种方案，大张旗鼓地宣传宫廷政变的思想。正当进步同盟领袖们在杜马讲坛上批评政府、说服沙皇成立“责任内阁”（从1916年11月起，这个口号已为所有反对派接受）、而“密谋家们”在制定宫廷政变的各种方案时，俄国君主制度崩溃了。

二月革命后，十月党人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流派，开始从政治舞台上消失。

三、立宪民主党在战争期间的活动

战争爆发后，立宪民主党对自己的意识形态、策略和组织实践工作都作了重大调整。首先，他们根据国际军事冲突调整了自己的立场。俄国参战后，立宪民主党用狂热的爱国主义代替了传统的和平主义。在战争爆发后的三年时间里，立宪民主党的主要口号是号召‘将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

立宪民主党人根据自己对俄国国家利益的理解，希望赢得战争的胜利，德国及其同盟者的失败最终会实现他们的对外政策理论 实现‘大俄罗斯’的思想。立宪民主党理论家们认为，一旦战争满足沙皇政府的领土要求，就可以巩固国家的战略地位，大大加强俄罗斯在巴尔干和近东的影响，刺激国家经济的发展。此外 立宪民主党认为 同协约国其他国家的‘密切联盟’会为俄国接近西方民主奠定基础。立宪民主党思想家们认为，军事上的成功有助于在国内进行政治改革。 1914年7月21日 立宪民主党中央发表声明：“不管我们对政府的对内政策持何种态度，我们的直接义务是保存统一的不可分割的祖国，保住国家在

世界强国中的地位，不让敌人夺取这种地位。让我们停止内部争吵，不让他们有丝毫的机会利用我们的分歧钻空子。”

1914年7月25日，立宪民主党中央和杜马^①党团研究了对战争的态度问题，一些左翼立宪民主党人，包括B.A.奥博连斯基和尼·尼·舍普金，建议根据沙皇政府对某些改革的态度来决定是否支持它。因为不进行这些改革俄国就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但是这个意见被大多数人否决了。阿·弗·梯尔柯娃在中央会议上发表了另一种观点，她说，国家面临的反对德国的斗争任务要求每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抛弃一切政治，做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梯尔柯娃是彼得堡著名的小说家和社会活动家，是立宪民主党内右翼代表人物。她因性格活跃、坚定和果断而被称为“立宪民主党中央唯一的男性”。她同其丈夫——几家不列颠大报驻俄国记者加罗德·威廉斯一起，在使立宪民主党领导同英国报界和统治集团建立稳固的联系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根据立宪民主党中央的决定，米留可夫在7月26日杜马紧急会议上代表党声明，完全拥护政府。米留可夫的发言引起一片欢呼声，沙皇政府所有成员都同杜马代表一起鼓掌。

战争开始后，立宪民主党人的影响开始不断扩大。但它不是通过增加党员人数，而是通过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团体的工作，首先是参加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和全俄城市联合会的工作来扩大影响。1914年7月30日在地方自治机构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全俄地方自治机关援助伤病员联合会，负责主管医院、仓

^① 指第四届国家杜马（1912年11月5日—1917年10月6日）。第四届国家杜马保留了两个多数派：右翼十月党人多数（283票）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226票）。杜马主席是十月党人罗将柯。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参加了这届杜马并在该届杜马中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党团。

库 准备疏散列车 后来还参加军队的食品供应。立宪民主党人参加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中央和地方机构的活动加强了他们同持十月党人观点的地方自治界的联系，促进了他们同地主反对派的接近。

1914 年 8 月，立宪民主党人发起成立了全俄城市联合会。该联合会的职能是募捐、疏散和征购军需物资、援助伤员和应征者家属、建立医院、饮食点，等等。立宪民主党人在联合会中非常活跃。立宪民主党人领袖们在全俄城市联合会领导机关中担任重要职务。莫斯科立宪民主党人米·瓦·切尔诺科夫当选总代表。参加联合会中央的有 5 名立宪民主党人、4 名进步党人 只有一名十月党人 即尼·伊·古契柯夫。立宪民主党党员通常还领导全俄城市联合会的地方分会，尤其是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大城市积极活动的那些分会。

1915 年 7 月，成立了全俄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联合会统一的军需供应总委员会。当年年底，两个联合会的规模都扩大了。立宪民主党人在战争年代建立的各种合作社组织中也发挥很大作用。1915 年 5 月，莫斯科大资产阶级发起建立了军事工业委员会，负责向工人灌输护国主义思想和协调各工业部门的活动，为战争服务。立宪民主党人积极参加了军工委员会的活动。他们参加了中央和地方的军事工业委员会，并领导顿河畔罗斯托夫、敖德萨、特维尔等城市的军事工业委员会。这一期间，立宪民主党人还加强了同地方工商界和进步党人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联系。

战争开始后，国内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反对派为了赢得战争胜利同政府精诚合作，这使立宪民主党人欣喜异常。但是这种兴奋心情没能持续多久。俄罗斯军队在 1914 年的东普鲁士战役中遭到失败。第二年他们又被迫放弃加里西亚、波兰、波

罗的海沿岸部分地区。面临食品、原料和运输严重危机的俄国在战争中损失惨重。于是，在经过短暂的平静之后，从 1915 年春天起，工人运动又活跃起来，农村又开始出现骚乱，城市中等阶层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强。在这种形势下，自由主义反对派不能再继续沉默了。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和城市联合会开始提出政治要求。1915 年 8 月，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等地主资产阶级政党在杜马中组成进步同盟，并开始积极开展活动。

立宪民主党人在建立这个跨党团体的过程中以及在这个团体中都起着主导作用。虽然同盟委员会名义上的主席是十月党人谢·伊·施德洛夫斯基，但是同盟真正的领袖是米留可夫。他起草了同盟纲领。进步同盟纲领是一个妥协性纲领。为了让中间党派、十月党人和部分民族主义者都进入同盟，为了保证同盟与国务会议进行合作，立宪民主党人不得不作出一些重大让步，他们用“社会信任的内阁”的提法取代“责任内阁”的口号。同盟宣言中没有提土地改革，而是要求农民权利平等；不再提政治大赦，而是要求停止审理政治案件；不提犹太人有平等权利的要求，而是使用一个模糊的提法“取消限制犹太人的法律”，等等。立宪民主党人认为，作出这些牺牲是应该的。他们认为，杜马党团之间达成妥协不是为了立法纲领，而是为了撤换政府，改变国家的管理方法，保证战争胜利。

8 月 18 日，由立宪民主党人控制的莫斯科杜马通过决议，要求建立“社会充分信任的”政府。其他城市杜马也开始仿效这一做法，纷纷通过相应的决议。全国各种社会组织也同莫斯科的发起人一道声援同盟。

但是，尼古拉二世拒绝走反对派指出的道路。他认为，反对派行动的目的是限制专制权力。1915 年 8 月底，前线形势有些稳定下来，在南方，俄罗斯军队转入局部进攻。受这种事态的鼓

舞，沙皇及其亲信认为，没有必要听从自由派改革家的建议。

1915年9月3日日益在政治上活跃起来的杜马被强行休会。

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和城市联合会在莫斯科分别召开紧急代表大会，讨论如何对待杜马问题，现在他们成了反对派运动的领袖。两个代表大会通过了相类似的决议，号召建立人民信任的政府，立即恢复杜马工作。当时决定派代表去大本营，向沙皇通报代表大会的决议。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领导人之一叶·尼·特鲁别茨科伊在解释这个决定时说：“我们将奉公守法，不会无视最高权力，无论地方自治人士向沙皇陈述多么大胆的言论，谁也不会说他们在国家处于危险的时候要搞革命”。但是这些代表没有机会陈述任何言论，因为尼古拉二世拒绝接见代表团。

正当人们觉得进步同盟有成功希望的时候，立宪民主党内多数人认为，必须同右翼党团保持密切联系，以便保持和加强跨党联合。这一时期，立宪民主党内的左派批评家们小心谨慎地缄默不语。但是杜马被强行休会后，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发表自己的见解。1915年10月召开的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上，B. П. 奥勃宁斯基亚·亚·基泽韦捷尔等莫斯科立宪民主党人向米留可夫的政策发起全面进攻。他们号召同士兵、工人、农民保持联系，在同政府的公开斗争中寻找新的同盟。1915年底，И. П. 曼德尔施塔姆、尼·维·涅克拉索夫等地方立宪民主党人开始主张同具有护国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政党积极合作，以便发动“来自下面的”革命。

地方立宪民主党人和彼得堡领导人之间存在观点上的差异，这是因为上层精英和地方立宪民主党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

① 实际上，第四届杜马是在1917年2月27日被沙皇解散的。强行休会后的杜马不久又恢复了活动。

同。地方立宪民主党人更了解俄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了解他们的情绪。1915年10月萨马拉和基辅的立宪民主党委员会，12月底科斯特罗马立宪民主党人都声明公开反对米留可夫的路线。

1916年2月18日，在立宪民主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彼得堡分部和米留可夫本人受到严厉批评。会上，左翼立宪民主党人批评中央和党团过于迷恋进步同盟，号召党努力扩大对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的影响，对军队的影响，要求党内更加民主些。

但是，尽管地方立宪民主党人发言中充满批评气氛，代表大会最终还是采纳了彼得堡领导人的意见。党的领袖之所以能够战胜自己的政敌，是因为对他的策略方针的批评虽然尖锐，但却是非建设性的，左翼立宪民主党人不能提出建设性的计划来代替现行方针。

米留可夫的路线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取得了胜利，新当选的50名中央委员中主要是米留可夫的追随者，主张纯议会的活动方式。1915年9月15日，《俄罗斯新闻》发表瓦·阿·马克拉柯夫的文章《悲惨的状况》，揭示了立宪民主党领导人拒绝激进的斗争方式的原因。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中央主张“待战胜外部敌人后再同当局算账”。

1915年秋至1916年秋，是立宪民主党和整个自由主义反对派政治积极性低落的时期。米留可夫后来解释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此时已经不具备议会斗争的条件，党又不承认其他斗争方式。

1916年秋，由于严重的食品危机，前线形势恶化，对“工人革命”感到恐惧以及政府缺乏使国家摆脱危机的能力，立宪民主党的反政府情绪又高涨起来。

1916年11月1日国家杜马会议是立宪民主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进步同盟在会上要求撤换新的大臣会议主席鲍·弗·施秋梅尔。他是拉斯普廷安插进来的一位庸才。米留可夫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对政府的军事和经济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这篇讲话是自由主义反对派同当局矛盾的顶峰。讲话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尽管书报检查机关禁止发表这篇讲话，但它还是一传十、十传百地广泛传播开来。11月19日彼得堡保安局指出：“最近立宪民主党人的政治影响出人意料地加强起来。”他们的领袖“成了当前的真正英雄”。

与此同时，国内形势越来越紧张。到1917年初经济危机已经波及所有经济部门：工业、农业、铁路运输。1917年初国家濒临饥饿边缘。革命形势不断发展，已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这种形势下，左翼立宪民主党人越来越不满意党的领导奉行“纯粹办公室内的策略”，主张采取更坚决的行动。但是在二月革命前，1917年2月4—5日召开的中央会议上仍然肯定了从前的路线，即同政府只进行议会斗争。立宪民主党人认为，这种斗争迟早会迫使政府让步的。

立宪民主党反对专制制度斗争的目的不是消除同沙皇政府的矛盾，不是推翻君主制，而是通过批评专制制度同当局达成分权协议，以便顺利地进行战争和防止革命。但是，当时国内对专制制度的憎恶情绪非常之高，反对派这些活动无疑也在促进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

四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战争期间的表现

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迅速战胜专制

制度的希望破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社会中的威信下降，马克思主义不再时髦。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方式引起某些人的反感，无产阶级群众中出现悲观、失望和冷漠的情绪。革命的失败迫使革命者或者转入地下，或者流亡国外。孟什维克的几位主要领袖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唐恩、马尔丁诺夫等人在俄国呆了不长一段时间之后，又到国外去了。孟什维克在组织上也受到削弱。1907年底，唐恩在向阿克雪里罗得介绍俄国相当一部分孟什维克的情绪时写道：“现在，作为有组织的孟什维主义在俄国已经不存在了，也不可能再把他们机械地集合起来。”阿克雪里罗得认为，旧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完全可以解散和死亡，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孟什维克波·伊·哥列夫（戈尔德曼）在莫斯科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上甚至号召彻底摧毁“被布尔什维克败坏了名声”的“旧党”。主张这种思想的人被称为取消派。取消派的主要特征是，不仅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旧的非法工作形式，而且主张只维护纯粹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全民族的利益，坚决放弃在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从1908年起，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一部分人要求保留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地下革命活动，恢复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加强同自由派的斗争，这部分人被称为护党派。但是护党派孟什维克没有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两派的产生并没有导致孟什维克内部发生严重的分歧或分裂。但是孟什维克内部有一种倾向：希望把西欧的工联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移植到俄国来。孟什维克这种策略上的调整并未得到工人的响应。工人更愿意进行坚决斗争，迫使工厂主接受自己的要求。当时孟什维克曾得到第二国际领袖的支持，他们在思想上受到第二国际，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孟什维克在组织上并未得到加强，在工人中的影响也不大。他们幻想建立一个欧化的工人政党，

主张革命形势渐进地向前发展。

但是大战的爆发使俄国渐进的发展过程中断了。

战争爆发后，欧洲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都卷入了民族爱国主义的自发浪潮，包括第二国际的模范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表现如何呢？

开战一星期后，在第四届国家杜马会议上，孟什维克杜马党团宣布了自己对战争的态度。1914年6月26日社会民主党两个杜马党团共同发表了反战宣言，宣布所有交战国政府都应该为开始的这场冲突负责，因此不应该谈俄国各族人民同沙皇当局一致的问题。在表决军事拨款时，所有社会民主党代表都退出杜马大厅。

与此同时在孟什维克倡议下宣言中写进了下列提法：“无产阶级是人民自由和人民利益的一贯保护者，在任何时候都履行自己的义务，并将保护人民的文化财富不受任何侵犯，不管这种侵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①后来，布尔什维克批评关于保卫文化财富不受外来侵犯的提法是向社会爱国主义让步。列宁劝告布尔什维克代表以后不要同孟什维克一起行动。

在孟什维克中间，既有公开的护国派，也有左翼革命的国际主义派。他们都对7月26日两个党团发表的宣言不满。在战争开始前，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在内部与社会主义者达成协议。俄国“上层”甚至在民族灾难的形势下也不愿意向人民作出让步，这使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同反政府的革命情绪奇妙地混杂在一起。

出乎意料的是，普列汉诺夫是孟什维克中狂热的爱国主义

^① 《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资料 and 文件汇编）1938年列宁格勒版第508页。

者。10年前，日俄战争期间他还持国际主义立场。他曾坚决支持遭到德国进攻的法国这个有着伟大的文化和革命传统的国家，他严厉地揭露德国帝国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以及普通党员的背叛行为。而对俄国，普列汉诺夫对沙皇政府的掠夺意图和在国内进行的民族压迫政策视而不见，认为俄国是防御的一方。他强调说，德国的胜利会使俄国经济情况恶化，会加强反动阶级的阵地，缩小俄国革命胜利的机会。

随着战争的发展和国内局势的恶化，普列汉诺夫越来越公开地号召实现国内公民和解，劝告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中投票支持军事拨款，甚至劝告工人放弃一切可能导致削弱俄国抵抗外来进攻能力的罢工等行为。到1915年秋连取消派孟什维克都不再宣传这些护国主义号召。普列汉诺夫开始提出一些相当模糊的观点，认为俄国可能在爱国主义旗帜下进行新的革命，因为沙皇政府不能保证战胜德国。

与普列汉诺夫观点相似的人还有彼·巴·马斯洛夫、格鲁吉亚孟什维克领袖诺·尼·饶尔丹尼亚、维·伊·查苏利奇等人。此外，1915年秋普列汉诺夫以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和护国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名义写的《告俄国自觉的劳动居民书》，曾得到沙皇政府内务部的赞许，并在俄国各种报刊上广为传播。巴黎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护国派报纸《号召报》发表一篇普列汉诺夫的文章《两条革命路线》引起很大反响。文章指出俄国革命发展的理想方案是将政权从沙皇政府官僚手里转到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手里，然后再转到劳动派类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手里，最后再转到社会主义者手里。

但是，连许多护国派孟什维克都认为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不宜在俄国工人中间传播。因此他们根据专制俄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爱国主义方案。波特列索夫、切列瓦宁、列文斯

基·马耶夫斯基和《我们的曙光》杂志 1915 年称《我们的事业》杂志, 1916 年称《事业》杂志)以及其他孟什维克著作家劝告自己的拥护者不要提出反战口号, 不要在俄国军队的后方搞罢工和起义, 同时还提出不要给沙皇政府提供军事拨款, 要批评沙皇政府的错误, 要组织社会力量帮助伤病员、难民和士兵家属, 等等。他们不否认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 但是认为, 同协约国各国, 尤其是俄国相比, 德国帝国主义犯的是“超级罪”。1915—1916 年这种护国主义发展成“自卫”的思想亦即将保卫国家的事业由沙皇政府手里转到俄国民主派, 包括工人和资产阶级手里。这些孟什维克认为, 赢得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是把所有反政府的力量协调起来, 同时无产阶级要放弃自己的“激进主义的抵制幻想”并承认资产阶级政党和组织的领导作用。

孟什维克“中央”(齐赫泽领导的杜马党团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委会)的立场是谴责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中央宣布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主张尽快签订公正的和约和“使俄国民主化”。但是他们同时又宣称, 在战争期间积极地进行群众性反战活动是不适宜的和危险的, 这一派孟什维克将党的工作重心转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工会、合作社、合法的自由主义民主派出版物。

其实, 齐赫泽党团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委会中既有国际主义分子, 也有温和的护国派分子。这给制定统一的策略路线造成极大困难, 降低了孟什维克的实际工作效率。

战争期间, 左翼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领袖是尤·马尔托夫。他严厉地谴责国际帝国主义、俄国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以及所有交战国的社会党人护国派。他号召为了民主和平采取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行动, 提出了进行反帝世界革命和俄国民主革命的口号。这一派别的思想中心是当时在巴黎出版的《呼声

报》、《我们的言论报》、《开端报》。为报纸撰稿的有孟什维克马尔托夫、弗·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格·契切林，还有许多前布尔什维克和托洛茨基。1916年春，托洛茨基逐渐取代马尔托夫担任《我们的言论报》领导，使报纸更加激进并充满了不断革命论精神。这些人的路线同布尔什维克的反战行动纲领有许多共同点，但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和托洛茨基反对将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国内战争和使本国政府失败的口号，反对建立新的共产国际，反对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同社会爱国主义者在组织上划清界限。

国外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正式的组织中心是组委会国外书记处 成员有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丁诺夫、伊·阿斯特罗夫、波韦斯和谢·谢姆柯夫斯基（勃朗施坦）1915—1916年 国外书记处出版了《消息报》、《战争和国际》杂志 还有给俄国孟什维克组织的指示信。

1915年11月在苏黎世起草并在俄国广为流传的文件《无产阶级与战争》，最集中和充分地表述了组委会国外书记处的行动纲领。组委会国外书记处声明，世界大战是包括俄国在内的列强进行帝国主义竞争的结果。在目前形势下，各交战国工人不应该支持本国政府，同时应该放弃革命的失败主义策略，在尽快结束战争、签订普遍、民主、没有割地和赔款的和约的旗帜下开展斗争。组委会国外书记处认为，在俄国现实条件下，主要口号应该是要求召开立宪会议，消灭专制政府和战争，而实现这一口号的手段是劳动者、首先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群众性革命行动，通过这种方式促进国际工人运动的复兴。1915年9月国际社会党人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除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外，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以及托洛茨基等人也参加了会议。

在俄国也有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的组织在活动，但是影响都不大。战争期间，俄国的孟什维克组织没有做多少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在 1914—1915 年只出版 3 种反战传单（布尔什维克出版数百种）原定于 1914 年 12 月召开的全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也没有举行。只召开过一些地区性代表会议。

战争期间 俄国孟什维克出版物先后有《北方呼声报》、《晨报》、《工人晨报》（彼得格勒，1915 年）《我们的呼声报》、《呼声报》（萨马拉，1915—1916 年）首都的杂志《现代世界》和《工人保险》，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孟什维克唐恩—策列铁里小组出版的（西伯利亚）杂志和《西伯利亚评论》（1914—1915 年）等等。

孟什维克杜马党团的活动很活跃。1914 年 11 月 布尔什维克代表被逮捕，后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此后，孟什维克杜马党团成了俄国无产阶级在国家杜马中的唯一代表。以齐赫泽为首的党团成员多次发表讲话反对战争，批评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经常拒绝投票支持军事预算，提出必须改善工人的经济和法律地位问题。他们还曾尝试在杜马外开展工作，但是后来为了安全而采取了谨慎的策略。

从 1915 年秋天起，无产阶级代表是否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问题，成了工人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主要问题。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出现是国内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征兆。委员会的任务是动员私营工业为战争服务，表明权力、劳动和资本联合起来保卫祖国。此外 还成立“工人团”作为新的军事工业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按照军事工业委员会创建人的构想，“工人团”可以帮助缓和国内的社会紧张情绪 在国防企业发生劳动冲突时充当调停人的角色，活跃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情绪。

由政府批准的“工人团”选举运动在各城市进行了整整一

年。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认为，工人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等于为战争辩护，因此一起抵制了选举，而孟什维克首先考虑的并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实际问题，认为不应该放弃使自己的活动部分地合法化、同资产阶级进行接触和提高工人政治积极性的机会。

普列汉诺夫和波特列索夫等护国派持这种立场，这是很自然的。而孟什维克中间派 组委会、齐赫泽党团 则认为 为了解决他们认为更重要的组织任务，可以牺牲某些国际主义原则。但是，这些孟什维克组织在选举运动中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积极性。

到 1917 年 2 月 在 244 个军事工业委员会中只建立了 58 个“工人团”，分布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萨马拉、顿河畔罗斯托夫、喀山、敖德萨、鄂木斯克、彼尔姆、尼古拉耶夫等城市。奇怪的是 往往是在一些小城市建立了“工人团”如萨拉普尔、索契等。而在布尔什维克影响较大的城市没有成立“工人团”，如梯弗利斯、哈尔科夫、巴库等。

彼得格勒的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最活跃。该“工人团”是 1915 年秋护国派和国际主义派经过顽强斗争后选出的。“工人团”主席是厄里克桑电话机制造厂工人孟什维克库兹马·格沃兹杰夫。他是一位农民的儿子，13 岁便开始在铁路部门工作，参加过社会革命党人小组，多次被逮捕。格沃兹杰夫在成年时期加入孟什维克。1917 年春他当选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执委会成员，同年 9 月任临时政府劳动部长。

共有 10 人被选入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他们中有著名的孟什维克格·叶·布雷多，E. A. 古德柯夫、弗·阿波罗西莫夫（后来发现他是沙皇政府的密探）等人。

“工人团”进行大量组织工作 千方百计阻止罢工发生 同时

也尽量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出版情况通报,下设 10 个委员会,包括工会委员会和合作社委员会,处理粮食、工人食堂建设等问题。地方“工人团”也大致从事这类工作。但是,“工人团”不仅遭到具有国际主义情绪的工人的强有力的抵制,也遭到不愿意向无产阶级作出让步的沙皇当局和许多企业主的抵制。结果,它们的许多计划(工人代表大会、劳动交易所、规定最低工资等)都没能实现。

“工人团”的纲领带有妥协性质,把“自卫”的思想(保卫祖国免受外来侵略)同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决议反映的和平主义号召混淆在一起,号召同资产阶级妥协和更严厉地批评无能的沙皇政府。随着国内政治危机的加深及当局转入公开镇压和逮捕某些“工人团”成员,格沃兹杰夫及其同事开始对政府持批评态度。

1916 年 11 月底,内务大臣亚·德·普罗托波波夫提出不能再容忍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继续存在。1916 年 12 月 13—15 日,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和 12 个地方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成员、组织委员会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工会、合作社和首都大工厂代表在彼得格勒召开会议。会议决议指出,当前的任务已经不是同沙皇专制制度的个别现象斗争,而是彻底推翻现存制度,使国家彻底实现民主化。

后来,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成员同意在 1917 年 1 月 9 日举行罢工以纪念“流血星期日”的牺牲者并定于 2 月 14 日、即杜马例行会议开会的当天,举行群众和平示威,要求将沙皇的议会宣布为临时政府。孟什维克为组织群众集会在彼得格勒成立了专门的演说班子。1917 年 1 月 16 日,叶·马耶夫斯基为工人集会写了若干发言提纲和题为《专制制度在扼杀国家》的宣言书。宣言书中说,必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该政府应该能够

“使国家摆脱困境和避免致命的崩溃 加强国内政治自由并按各国无产阶级都能接受的条件签订和约”。政府对此的反应是 决定将越来越危险的格沃兹杰夫领导的“工人团”同工人隔离开来。于是 1917 年 1 月 26 日夜，包括格沃兹杰夫在内的大多数“工人团”成员都被逮捕并被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

孟什维克的活跃是国内革命危机成熟的因素之一，但是不应过高估计他们在准备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他们力量分散 人数不多 实际上是自发的群众运动浪潮把他们带动起来。劳资冲突更加尖锐，资产阶级反对派领袖不可能成为民族领袖。1917 年 2 月专制制度被推翻至多是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共同行动的结果，而它们之间的根本分歧最终是无法克服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向社会革命党人提出了新的问题 诸如战争的性质 社会主义者对战争的态度 对政府的态度，等等。

战争不仅给社会革命党人的活动条件带来巨大困难，而且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思想分歧，使他们无法制定出统一的行动纲领。比如，1914 年 8 月 22 日在瑞士召开的社会革命党中央工作人员国外会议讨论在世界大战形势下的行动路线时，代表们就意见不一 分歧严重 当时党的很多著名活动家出席会议 如 Н. Д. 阿夫克森齐耶夫、А. А. 阿尔古诺夫、Е. Е. 拉扎列夫、马·安·纳坦松维·米·切尔诺夫等。在会上 纳坦松认为 劳动者没有祖国，社会主义者在战争期间也不应该忘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依然是对立的，因此社会主义者不应该站在民族团结的立场上。切尔诺夫则持中左立场。他认为，沙皇政府进行的不是防御战争 而是掠夺战争 捍卫的不是人民的利益 而

是王朝的利益，因此社会主义者不应该帮助它。他们应该反对战争 恢复第二国际 成为“第三种力量”向两个交战中的帝国主义集团施加压力，争取签订没有割地和赔款的和约。

多数与会者都是护国派。他们声称，既然战争爆发了，那么社会主义者就应该保卫祖国，抵御外国帝国主义，关于战争的反人民性质的思想对国防是有害的。他们不否认战争期间也应同政府进行政治斗争，但是强调指出，斗争的方法不应该直接破坏国防。

8月会议的参加者没有制定出统一的行动纲领。会后，流亡国外的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分歧更加严重。由于党中央国外代表团中的国际主义派和护国派人数相等，致使当时唯一的全党机关的工作全部瘫痪。

国际主义派、左派和中左派分子 马·安·纳坦松、波·达·卡姆柯夫、尼·伊·拉基特尼科夫、维·米·切尔诺夫等人 首先着手宣传自己派别的观点，在思想上把自己的拥护者联合起来。

1914年11月，他们就开始在巴黎出版《思想报》。报纸主要在外国流亡者小范围中发行，只有少部分偶然散发到俄国。

头几期报纸发表了切尔诺夫撰写的一组“提纲”：《战争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者对战争的评价》、《战争与社会主义者的“重新认识”》和《俄国社会主义者的状况》。这些提纲从理论上论述了社会革命党国际主义派在战争、和平、革命和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立场。切尔诺夫认为，战争的根源首先在于资本主义进入“民族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 资本主义在先进国家获得单方面的工业发展，而这又造成另一种不正常现象——单方面的工业社会主义 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作出了极其乐观的估计，而对资本主义的消极的、破坏的方面估计不足 把社会主义的命运完全同这一前景联

系在一起。切尔诺夫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认为，农业和农村只是蓬勃发展的工业的附庸，因此工业以外的劳动居民阶层被忽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确立了纯无产阶级的社会发展观，对任何不是自上而下由资本主义领导的社会化，而是自下而上由劳动者自己发起的社会化（村社土地所有制、合作社、市政社会化等）都持怀疑态度。这种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视为“既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也是朋友”因为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与无产阶级利害攸关。

切尔诺夫认为，战争是在拿欧洲各大国资本主义命运作赌注，也是拿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作赌注，因此无产阶级不可能对战争袖手旁观。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依赖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普遍的民族主义堕落”的主要原因。切尔诺夫认为，使欧洲国家卷入战争的当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片面工业主义造就了片面工业社会主义的代表，引起了社会主义危机和精神堕落。作为社会革命党主要理论家，切尔诺夫认为，克服危机的条件只能是，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克服资本主义发展的“片面工业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阶段”的各种不良现象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者美化无产阶级也属于这种不良现象。社会革命党《思想报》写道：“许多社会主义政党的民族主义堕落不是个别领袖的过错，其根源在于无产阶级自身的弱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描述的无产阶级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不能说只有一个国际无产阶级，它会不分种族、民族、性别、领土、国家、职业技能、生活水平而由阶级利益联合起来，对现存制度和所有剥削和压迫力量都深恶痛绝；而是有许多无产阶级，他们之间存在许多矛盾，并同统治阶级有不同程度的协作关系。结论是，社会主义者不应该把某个劳动阶级奉为偶像，社会主义政党不应该等同于无产阶级政党。切尔诺夫指出，只有劳动者的

联合力量才能够制止战争，争取签订没有割地和赔款的和约。因此每个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是把被战争分裂的社会主义力量团结起来。

根据这种考虑，切尔诺夫和纳坦松参加了国际主义者社会党人的两次国际代表会议：1915年9月的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和1916年4月的昆塔尔会议。^①10年后，切尔诺夫在回忆齐美尔瓦尔得会议时指出，会议参加者追求的是不同的目的。一些人（切尔诺夫认为自己属于这些人）把会议视为中止整个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梦幻的手段，另一些人（列宁及其拥护者）则想同国际决裂，建立更狭隘的“宗派国际”。只有纳坦松在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宣言上签字，切尔诺夫在他根据社会革命党对战争和社会主义的看法提出的宣言修正案被否决后，拒绝签署这个文件。

1915—1916年，主张护国主义观点的国外社会革命党人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在国外》和《新闻报》。这一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政策明显地反映了战争引起的解放力量重新联合的倾向。齐美

① 齐美尔瓦尔得会议指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于1915年9月4日在瑞士伯尔尼附近的齐美尔瓦尔得召开。到会者有俄、波、意、法、荷以及瑞典、挪威、瑞士等11个国家的38名代表。会议讨论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为和平而斗争的问题。会议通过一项宣言，认为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在这次会议上，以瑞士社会党人罗·格里姆为首的中派和半中派占多数，以列宁为首的左派占少数。这次会议形成了左派同中派和半中派的暂时性的齐美尔瓦尔得联盟。

昆塔尔会议指齐美尔瓦尔得联盟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第二次代表会议，1916年4月24日在瑞士伯尔尼开幕。25—30日在山村昆塔尔继续进行。出席会议的有德、法、意、俄、波、塞、瑞（土）奥、挪、葡等国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的代表43人。其中左派代表12人。会上，以列宁为首的左派主张使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在战争中失败，中派主张迫使统治阶级结束战争。

尔瓦尔得会议期间，他们在日内瓦同俄国的社会革命党人护国派召开会议。会议宣言指出“只有通过民族自卫的途径才能得到自由”。护国派用各种理由为“保卫祖国”的口号辩护。他们认为：首先，德国战胜俄国会使俄国变成殖民地，阻碍俄国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者觉悟的提高，最终会推迟沙皇制度的彻底灭亡；第二，俄国的失败会对劳动者的状况造成最恶劣的影响，因为战争赔款的义务将导致税收增加。因此护国派得出结论说，人民的切身利益要求社会主义者积极参加保卫国家的行动。

“保卫祖国”的口号受到列宁及其拥护者的严厉批评。

五、战争期间的布尔什维克 与列宁的革命理论

战争爆发时，有成千上万的布尔什维克在监狱或流放地。沙皇当局在准备战争时，加紧对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布尔什维克进行镇压。在战前的几个月里，巴库、巴统、戈梅利、敖德萨、波尔塔瓦、顿河畔罗斯托夫、图拉、乌法、雅罗斯拉夫尔等地的党组织遭到警察的残酷破坏。在战前的一个月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的近千名党员被警察逮捕。7月8日，当局查封了《真理报》。随着战争的开始，新的高压手段的巨浪猛烈地冲击着布尔什维克。沙皇政府竭力要使运动丧失领导，阻挠布尔什维克发动无产阶级进行积极的群众性的反战运动。仅在开战后的头五个月内，宪兵队就对彼得格勒、莫斯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基辅、敖德萨、巴库以及白俄罗斯许多城市的党组织进行了几十次的袭击。据列宁证实，在整个俄国“沙皇政府

逮捕和放逐了成千上万的先进工人——我们的秘密的俄国社会主义工党的党员。”^①

战争开始前，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是国内党的领导中心。布尔什维克对战争的态度，是当时唯一留在彼得堡的杜马代表阿·叶·巴达耶夫于7月上旬向首都各报记者发表的。他声明说：“工人阶级要全力进行反对战争的斗争。战争不符合工人的利益。恰恰相反，它的锋芒完全是针对着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在国际社会党巴塞尔代表大会上代表全世界无产阶级通过的决议中说，一旦宣战就进行坚决的反战争，‘用战争反对战争’——这就是我们的口号。我们，工人阶级的真正代表就要为这个口号而斗争”。^②巴达耶夫的声明同党团其他成员的观点是一致的。例如，当时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由杜马代表彼得罗夫斯基领导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也通过了一项明确的反战决议，号召俄国无产阶级“利用一切手段来反对已经开始的战争并且向各国无产阶级伸出友谊之手”。^③

杜马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决定在召开杜马紧急会议的7月26日，即批准军事拨款的那一天公开表示对战争的态度。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考虑到劳动人民共同的反战情绪，曾尝试同孟什维克党团和劳动派党团代表采取共同的反战行动。同劳动派未能达成协议，因为在谈判的第一阶段，劳动派党团的代表亚·费·克伦斯基便声明，劳动派将积极支持战争。而孟什维克党团同布尔什维克采取了共同的行动，尽管其领导人尼·谢·齐赫泽

（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532页。

② 巴达耶夫《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回忆录），1954年莫斯科版第344页。

萨莫伊洛夫《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诉讼案》（回忆录）192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4期第134—135页。

本人持护国主义立场。虽然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看法各不相同，谈判结束时还是制定了一致同意的宣言。这份宣言曾在杜马会议上宣读。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宣言表达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立场，坚决谴责了战争，并且宣告一切交战国的统治集团要为发动战争承担责任。国家杜马在讨论批准军事预算时，社会民主党根据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不赞成军事拨款是自己绝对应尽的社会主义义务。为了更有力地表示自己的抗议，他们退出了杜马大厅。两个党团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共同行动。

列宁从战争一开始就告诫党不要同沙文主义者进行任何形式的联合，他认为，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的使命是表达彻底的国际主义观点。

战争爆发时列宁正在波罗宁。奥地利宪兵早就知道了列宁的革命活动并且在监视列宁，7月25日8月7日他们搜查了列宁的住所，7月26日把列宁关进了监狱，使他受到审判的威胁。在波兰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和波兰作家的帮助下，列宁获救并举家来到中立国瑞士，在伯尔尼住了下来。

在1914年8月24—26日9月6—8日举行的布尔什维克伯尔尼支部的会议上，列宁第一次作了关于党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报告。会议通过了报告的提纲，并把它作为“社会民主党一个小组”的决议，决议的标题是《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后来列宁又将提纲改写成宣言以《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为题于1914年10月19日11月1日发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上。宣言明确地指出了这场战争的性质和意义，认为这是两个交战集团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的、非正义的、侵略性的战争。这场战争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长期以来推行的那种反动的帝国

主义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直接继续。“强占别国领土，征服其他国家 打垮竞争的国家并掠夺其财富 转移劳动群众对俄、德、英等国国内政治危机的注意力；分裂工人，用民族主义愚弄工人 消灭他们的先锋队 以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当前这场战争唯一真实的内容、作用和意义。”^① 宣言分析了导致统治阶级走上战争道路的真正原因，揭穿了帝国主义者把战争说成是民族解放战争、正义战争和卫国战争的企图。

列宁在宣言中还无情地批判了社会沙文主义者。宣言对各社会民主党没有执行自己的任务表示“万分沉痛”，指出第二国际首领们的行为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而第二国际最有力量 and 最有影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对这一背叛负有特殊的责任。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为自己支持战争的行为辩护，说他们这样做是在反对俄国沙皇制度。宣言说，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运动不需要这样的“助手”。近年来俄国工人阶级领导的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运动具有很大规模，推翻沙皇制度已经成为直接的斗争口号。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沙皇政府镇压革命运动的话 那就是这场战争。为了进行这场战争 沙皇政府从英、法、俄的银行家那里得到了财政上的支持。宣言指出，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所作所为只会对俄国无产阶级在完成自己的革命任务方面造成危害。宣言批判了中派分子 指出：“最能给无产阶级帮倒忙的，莫过于那些动摇于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中派’之类）这些人极力闭口不谈第二国际的破产，或者用外交辞令来加以掩饰。”^② 列宁写的宣言还揭露了“左”的机会主义者 即无政府工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403页。

② 同上第407页。

团主义者。列宁写道：“在目前的危机时期，作为机会主义天然的‘补充’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潮（同样是资产阶级的，同样与无产阶级观点即马克思主义观点相敌对的），其特征是同样恬不知耻、自鸣得意地重复沙文主义口号。”^①

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以及对公开的和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行为的分析，确定了国际无产阶级的策略。列宁提出的中心策略口号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他认为，战争加速了革命，但是并不意味着对于一切国家来说社会主义革命都提到日程上来了。在俄国，由于国家落后，由于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直接的斗争的目的仍然是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 8 小时工作制。此外，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个口号中又提出另一个策略口号，即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这个口号的根据是：政府军队在前线的挫折和失利有利于削弱旧制度，有助于解放受帝国主义者压迫的各国人民，有利于群众起来反对剥削阶级。促使本国政府在掠夺性战争中失败的策略的目的在于要变战争为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战争，赢得革命的胜利。列宁认为：只有沿着这条道路，无产阶级才能摆脱依附沙文主义资产阶级的地位，才能以不同的形式比较迅速地迈出坚定的步伐，走向各民族的真正自由，走向社会主义。”^②

列宁写的宣言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登载宣言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3 号发行 1500 多份，宣言还被转送到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以及瑞士、法国、英国、德国、瑞典的一些社会主义报刊的编辑部。

随着战争的继续，交战国劳动人民的战争负担越来越重，劳

① 《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2 卷第 408 页。

② 同上 第 410 页。

动人民开始要求和平了。列宁认为，群众要求和平的情绪，往往反映他们已经开始对战争发出抗议，表示愤慨，开始认识到战争的反动性质。一些有远见的资产阶级代表为反战情绪所震惊，由于害怕发生革命，也开始拥护和平。社会沙文主义者、中派分子也发出各种一般性的和平论调。托洛茨基反对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也鼓吹一切左派都在和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各种形式的和平要求掩饰了帝国主义者的政策，保护了帝国主义。这种和平要求，不主张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政府的革命行动，它传播统治阶级能够结束战争这样一种无法实现的愿望，从而引导群众离开革命斗争。对这一切现象需要有一个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的估计，尤其是国外有些党员已经陷入了和平主义，甚至是护国主义的情绪之中。

1915年2月14日(27日)布尔什维克党国外支部召开代表会议。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巴黎支部、苏黎世支部、伯尔尼支部、洛桑支部、日内瓦支部、伦敦支部的代表在伯尔尼聚会。列宁就最重要、最迫切的战争问题作了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宣言的观点，论述了战争与和平问题。1915年7—8月，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又合写了一本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有责任利用群众的和平情绪，“他们应当最热情地参加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一切运动和一切游行示威。但是他们不能欺骗人民，不能传布这样一种思想：似乎不进行革命运动也可以实现没有兼并、没有民族压迫、没有掠夺、不含现在的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之间的新战争萌芽的和平……谁希望得到持久的和民主的和平，谁就应该拥护反对政府和资产

阶级的国内战争”。^①

列宁制定的策略武装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它所影响的无产阶级及劳动群众。这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斗争策略。

在制定革命策略的同时，党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认清历史发展新的阶段，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斗争。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制定正确的政治方针的必要性也迫切要求对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中的新现象进行科学的概括，揭示革命发展的前途。为此，列宁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进行了认真的科学研究。

1916年1—6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期间，列宁研究并综合了大量有关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材料，批判地整理了数百本各种文字的外国书籍、文章、小册子、统计汇编等资料，写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他在这部著作中总结了马克思《资本论》问世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次深刻而科学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和政治实质，论证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

列宁提出了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所具有的五個基本特征。第一个基本特征是在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的基础上产生了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垄断组织变成了经济生活的决定因素。列宁把由生产集中而产生的垄断看作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的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和垄断组织的形成意味着生产的急剧社会化。列宁指出：“生产社会化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在形式上被承认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527页。

的自由竞争的一般架子依然存在，而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却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① 垄断组织靠掠夺城乡各阶层劳动人民获得巨额利润。与此同时，生产的联合、生产社会性的加强，为过渡到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前提。

帝国主义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日益溶合起来并在这一基础上产生了金融资本、金融寡头。银行业的集中导致银行和银行巨头变成拥有无数财富的势力极大的垄断者。在帝国主义条件下，银行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神经中枢。它们把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货币资金的周转集中起来，并对这些资金进行社会性计算。但是，银行的一切活动是受私人利益即受大的和最大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支配的。实行其经济和政治统治的金融资本的代表，组成了一个比较狭小的上层金融寡头，而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为这一金融寡头服务的。

帝国主义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资本输出。这种输出是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它代替了以前占统治地位的商品输出。“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② 资本输出导致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经济奴役。由于争夺有利的投资场所，各国之间的帝国主义矛盾加剧了，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加剧了。

帝国主义的第四个基本特征是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的形成。这些同盟是资本和生产的世界性集中的一个新的、比过去高得无可比拟的阶段。

（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593页。

② 同上第627页。

帝国主义的第五个基本特征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世界领土的过程已告结束。帝国主义时代开始的时候，世界领土已经基本瓜分完毕，列强之间的斗争具有新的性质，成为重新瓜分业已瓜分了的世界的斗争。这一斗争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战争，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寄生的和腐朽的资本主义。腐朽首先表现在经济方面，这是由垄断组织的统治所决定的。腐朽最明显地表现在垄断组织所固有的使生产力停滞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上。如果技术进步对于垄断利润不利，它在经济上就有可能人为地受到阻止。腐朽还渗透到了经济、政治、国家机关、文化艺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腐朽也影响到工人运动，促进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发展。

列宁在给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下定义时，称之为垂死的资本主义。他在 1916 年 8 月写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个特点分三个方面：(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①帝国主义时代矛盾的空前激化是迫切需要推翻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强大推动力。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历史作用在于，它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充分地创造了前提。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崩溃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②垄断组织的联合为从资本主义向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过渡准备了物质条件。而帝国主义战争加快了生产的社会化，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临近了。进行战争

① 《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2 卷第 704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6 卷第 121 页。

必须动员国民经济的一切资源，各交战的帝国主义大国政府便利用这一点对生产实行国家调节。战争促进了垄断资本主义把垄断组织的力量同国家的力量联合成一个为金融寡头服务的统一的机构。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系同时就是向社会主义物质前提成熟的道路上迈出的新的一步。列宁指出：“现代社会在何种程度上已成熟到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点恰恰已为战争所证明，因为在战争期间，为了集中人民的力量，不得不由一个中央机关调节 5000 多万人的全部经济生活。既然这一点能够在代表少数金融大王利益的一小撮容克贵族的领导下做到，那一定同样也能够在代表饱受饥饿折磨的十分之九的居民的利益的觉悟工人的领导下做到。”^①

因此 列宁得出结论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既然它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技术前提，那么它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

但是，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和理论家考茨基对帝国主义即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有另外一种认识。他认为，“从纯粹经济观点来看，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即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阶段……”^② 这个阶段“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③。在考茨基看来，走向社会主义要经过“超帝国主义”这是“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最终目的”以前要经过的最后一个阶段。考茨基认为，“超帝国主义”一定会为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进步发展创造条件。

此外，当时第二国际思想家之一希法亭于 1910 年出版了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8 卷第 348—349 页。

② 《新时代》杂志 1914 年第 2 卷第 21 期第 921 页。

③ 《新时代》杂志 1915 年第 2 卷第 5 期第 144 页。

《金融资本》一书。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出现一个总卡特尔，这个总卡特尔除了能消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产品分配上的对立之外，似乎还能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对立。^①后来，希法亭得出了将会产生一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从这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能够进化到社会主义的结论。

这表明，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特征及其前景的估计，同当时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和理论家的考茨基和希法亭有重大的原则区别。应当承认，考茨基观点在西方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甚至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都有相当的影响。考茨基生活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德国，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主要是基于对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认识和理解。众所周知，20世纪初那场资本主义危机发展的结果并未导致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列宁预言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并未实现。这为我们今天评价当年列宁同考茨基的争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能充分解释当年关于帝国主义问题争论的是非曲直。应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变化至少受两个客观因素的影响，即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及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压力和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作用。首先，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的确立使资产阶级看到，如果不缓和劳资关系，不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体制作些改良，无产阶级革命最终会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于是不得不向无产阶级作出某些让步，在工人劳动报酬和社会福利

^① 鲁·希法亭《金融资本》1959年莫斯科版第312页。

方面采取一些措施，用以缓解劳资矛盾，避免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其次，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大大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物质产品的增加，改变了现在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产品结构以及居民的消费结构，同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作用和影响，迫使生产组织、管理体制、工作方式、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一系列相应变化，从而使资本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的反动、腐朽本质暴露无遗。战争期间，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夺原料市场和殖民地、瓜分世界，动用了资本主义所有先进技术发明的武器，用来反对人类本身，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不仅如此，1929—1933年又发生了世界大萧条，紧接着又爆发了更加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都充分说明，当时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 and 判断是正确的。

然而，当时列宁同考茨基等人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对革命前途和革命道路的不同态度。考茨基根据自己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主张走改良主义道路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持列宁称之为“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而列宁是把帝国主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联系在一起的。

经济条件的成熟不会自然而然地引起革命。革命还需要客观政治条件的成熟，需要政治舞台上阶级力量的组合能够造成势如破竹地冲击旧制度的条件，即需要有革命的形势。

在世界大战期间列宁研究了欧洲出现的政治形势指出了革命形势的三个主要特征：(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 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

‘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①此外，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有一支由统一的意志和行动团结起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队伍。这支队伍形成的条件就是革命的觉悟和组织。列宁指出，没有组织，群众就会丧失统一的意志。为了团结群众，使他们觉悟，率领他们向剥削制度进攻，就需要有马克思主义政党，需要有党的领袖和党的领导者这样一些坚强的干部。

列宁关于革命的主客观条件的相互关系的原理，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重大意义。它们指引工人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实际准备。

这一时期，列宁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根据对帝国主义时代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列宁提出这个重要结论的根据，是他揭示的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

众所周知，不平衡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因为它是由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商业生产的本质决定的。列宁的功绩不在于揭示不平衡这一事实本身（这是马克思已经知道的），而在于研究了这一不平衡在帝国主义时代所表现出的特点，研究了那些对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点。

帝国主义猛烈地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使之成为冲突性的和灾难性的。垄断限制竞争，但不能消除竞争。竞争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263—264页。

新形式出现了。各种金融集团和工业集团的经济实力在垄断组织范围内和垄断组织界限外继续不平衡地增长着。竞争变得更加激烈，资本主义的一切内在矛盾也日益加深。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一些生产部门发展的不平衡还在加剧，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对比关系在不断变化。这种不平衡是同尖锐的利害冲突、同战争、同削弱和动摇帝国主义阵地的垄断组织之间、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斗争相联系的。与此同时，列宁还论证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发展不平衡正在加剧的思想。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表现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程度的巨大差别上，表现在一些国家革命运动的规模与其经济水平不相适应上。

列宁在进一步研究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时发现，决定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避免的那些矛盾，在各个国家的成熟情况是不一致的。在帝国主义体系里形成了一些矛盾的集合点。在这样一些集合点里，会首先出现革命的形势并为革命的爆发创造先决条件。在主观条件作了起码准备的情况下，那些矛盾特别尖锐的国家就成为帝国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这些国家产生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比任何地方都要早一些和容易一些。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加深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引起了冲突、纠纷和战争。所有这一切都在不断削弱帝国主义阵线，妨碍国际垄断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任何一个国家举行起义的无产阶级。

1915年8月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写道：“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①一年之后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554页。

文中又把这一思想具体化了，他写道：“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①

这样一来，列宁就提出了新的适应帝国主义时代的原理，来代替社会主义在一切或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旧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是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础。

既然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可能在少数或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那就会自然而然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它在哪些国家产生的可能性最大。在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有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一定是在生产力水平较高、无产阶级占居民的大多数、即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开始；也有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似乎首先在最落后的国家中胜利。列宁则证明说，为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具备一定的由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创造的物质前提。对于一个首先打断帝国主义锁链的国家来说，经济上至少要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使工人阶级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立即主宰一切经济命脉，并对生产过程进行社会调节。

沙皇俄国就属于那种为打破帝国主义体系的第一个缺口而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的国家。然而，俄国不能立即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沙皇制度和其他封建制度的残余还未消灭。首先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是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预先胜利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列宁在战争时期根据新的情况发展了自己以前制定的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在帝国主义战争使欧洲革命形势日益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722页。

发展的情况下，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列宁写道：“帝国主义战争把俄国的革命危机，即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基础上发生的危机，同西欧日益增长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危机联系起来。”^①因此列宁认为，对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三个主要口号（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和实行 8 小时工作制）必须加以补充，这就是要号召工人实行国际团结去争取社会主义、用革命去推翻各交战国政府、反对战争。

俄国民主革命如不打破帝国主义的锁链，不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就不能实现自己的任务。然而，这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在工人阶级为把民主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基础上，在同小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中才能实现。除此以外，别无其他的道路。列宁指出：“不抛弃资产阶级关系的基础……就不能从世界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和饥荒这个可怕的妖怪的魔爪中挣脱出来。”^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主运动，即农民争取土地、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各交战国的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变得日益波澜壮阔和声势浩大。列宁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前景出发，坚决支持各民族争取解放和独立的斗争，批驳形形色色的社会沙文主义。列宁的思想对俄国的无产阶级尤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俄国已经处于在帝国主义时代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

列宁不仅为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当前的革命策略，而且率领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无产阶级的目的而斗争。布尔什维克利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7 卷第 31—32 页。

^② 同上，第 29 卷第 35—36 页。

用一切合法和秘密的方式开展工作。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不断扩大，不仅在首都等大城市和工业中心，而且在边远地区和农村以及军队中都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党千方百计扩大自己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居民群众的影响，在他们中间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从 1915 年秋天起，罢工运动又掀起新的高潮，其中不乏政治罢工。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通过揭露护国派和发动群众进行新的革命战斗来贯彻自己反对专制制度的路线。这一点在选举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的运动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布尔什维克声明他们坚决拒绝参加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军事工业委员会。1915 年 8 月底，布尔什维克制定了对选举工人团的具体策略。策略的具体内容是：吸引尽可能多的工人参加第一阶段的选举（全厂大会）向他们公开说明自己的政治路线，力争选出布尔什维克提名的复选人，使他们能在全市会议上宣读布尔什维克的反战决议，声明拒绝派工人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以此实现对这些机关的抵制。尽管在贯彻这一策略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受到沙皇保安机关的迫害，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 244 个军事工业委员会中只有 58 个军事工业委员会下面设立了工人团，且这些工人团通常都是建立在那些不大的、从工业方面来说不重要的、只有少量先进工人的城市中。

布尔什维克在战争期间的立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在工人及其他居民阶层的工作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和罗曼诺夫王朝的崩溃。

第五章

二月革命后多党合作的尝试

一、二月革命爆发与君主制被推翻

沙皇政府企图通过发动战争，不仅满足俄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欲望，而且还“平定”后方，破坏日益高涨的革命，保存沙皇制度。然而这些打算全都落空了。俄国军队一再遭到失败，付出了惨重的牺牲。战争使一切社会经济矛盾尖锐到了极点，同时彻底暴露了沙皇制度的腐朽性。在所有交战国中，俄国所受到的经济震荡最大。

到 1916 年底，国家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边缘。彼得格勒有 39 家企业因缺乏燃料而停产，有 11 家企业因停止供电而停产。铁路连运输军粮的任务都无法完成。城市的粮食供应急剧减少。1917 年 1 月底，彼得格勒只剩下 10 天的面粉储备，肉类则完全无货。粮店门前从大清早就排起了长队。工人家庭忍受着饥饿的折磨，国民经济瘫痪状态日益严重，军事上的失利接连不

断，这一切彻底动摇了腐朽的政治机构。沙皇政府手足无措，竭力进行挣扎，妄图挽救局势。

统治集团惊慌失措，内阁不断更迭。战争期间总共更换了 4 个大臣会议主席、6 个内务大臣、4 个陆军大臣、3 个外交大臣。

俄国资产阶级已经不满意这样一个摇摇欲坠的政权。沙皇政府在他们心目中已经失去任何“信用”。但是大资产阶级又害怕同君主制度决裂。资产阶级的政治领袖们同尼古拉二世进行长时间的讨价还价。他们用革命和经济崩溃吓唬沙皇，就军事上连接不断的失败提出警告，企图用这种办法迫使沙皇同意改组政府，建立“信任内阁”。但是这场交易以资产阶级的失败而告终。“君主政府和农奴主—地主的立场是：宁愿和德国君主政府勾结也不把‘俄国交给’自由派资产阶级”。^①沙皇政府一方面继续高喊要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同时又设法同德国单独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被单独媾和的传闻弄得惶惶不安，同时又担心爆发革命，于是终于下决心采取行动。他们同军界开始策划宫廷政变，希望通过更换沙皇而保存和巩固君主制度。

与此同时，一些大公们慑于日益逼近的革命的壓力，多次劝说沙皇尼古拉二世进行一些局部改革。但是软弱无能的沙皇当时受皇后和宠臣拉斯普廷的左右，不愿意作出任何让步。于是这些大公们策划谋杀拉斯普廷并于 1916 年 12 月 16 日实施了谋杀计划。

但是这一切已经不能挽救沙皇制度了。人民已经行动起来，不满情绪已经忍无可忍。据克伦斯基自己回忆：“1916 年全国共发生了 243 起政治罢工而 1917 年 1—2 月就发生了 1140

^① 《列宁全集 第 2 版第 27 卷第 32—33 页。

起。’^① 沙皇政府完全陷于孤立，危机笼罩了全国。一方面，“上层”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它失掉了一切开发后备力量和支柱，另一方面“下层”也不愿照旧生活下去，继续容忍战争的灾难和沙皇政府的罪行。1917年初形成了直接的革命形势。

无产阶级站在了反对专制制度斗争的最前列。无产阶级不仅要求得到面包，他们在为自由、为革命而进行斗争。无产阶级运动同士兵自发的反战行动汇合起来。前线士兵不愿再为别人的利益卖命。士兵疲惫不堪，战事接连失败，给养经常不足，军官惨无人道，这一切使士兵群众的愤懑达到极点。军纪完全涣散，部队处于瓦解状态。农村中的革命骚动也活跃起来。城市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的不满情绪也很强烈，革命危机无论在后方或前方都迅速发展起来。

走在俄国工人阶级队伍最前列的是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6月份彼得格勒有17万工人罢工纪念1905年的“1月9日事件”。布尔什维克正确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号召群众走上街头走向涅瓦大街进行公开斗争。2月14日以后彼得堡委员会印发一份传单，号召“工人阶级和身着军服的农民携起手来，向整个沙皇集团展开斗争，永远结束俄国所遭到的耻辱”。传单说：“进行公开斗争的时刻到了！”2月23日（公历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布尔什维克利用这个日子举行各种群众集会，反对战争，抗议物价高涨和女工的困难境地。这一天成了革命的第一天。开完群众大会之后，许许多多男女工人扔下工作，走上街头，罢工自发地发展为游行示威。妇女们表现得很积极。她们奔走于各个工厂，呼吁工人们参加罢工。

2月24日，群众性的罢工和游行示威达到更大的规模。这

^① 转引自《王朝的毁灭》1992年莫斯科版第17页。

一天罢工的有 20 多万人，占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一半以上。工人们从一清早就在各个工厂中集合，举行群众大会，然后加入到游行示威队伍中去。维堡区的数万名工人聚集在利齐尧桥附近，许多人冲到涅瓦大街。纳尔瓦关卡的工人也冲到这里。到中午时，示威者的洪流已经挤满了兹纳姆斯卡亚广场。骑警队企图阻止示威队伍，但是没能得逞。直到当天夜晚，涅瓦大街上还在不停地举行各种集会，人们打出了“打倒沙皇政府！”“打倒战争！”的旗帜。警察对示威群众束手无策。调来增援的士兵和哥萨克行动消极，有时还对示威者表现出同情。在兹纳姆斯卡亚广场上，工人们驱散了骑警，当时在场的哥萨克对此保持了善意的中立。

2 月 25 日是转折关头。彼得格勒已有 80% 的工人参加罢工。一些警察所被捣毁。工厂内成立了战斗队。连续三天军队都没有开枪，人们开始胆子大起来。士兵也意识到长官的无能。他们已经明白，现在即使命令开枪也未必有人执行命令。这一天的工人运动发展成为政治总罢工。

2 月 26 日，政治总罢工开始转变成武装起义。整个彼得格勒变成了一座兵营。到处是巡逻队、岗哨、骑警队。通往市中心的道路被封锁得水泄不通。然而，到中午的时候，蜂涌而来的人群还是挤满了涅瓦大街。这一次，工人遭到了枪击。士兵们多半是朝天放枪，可是警察部队却无情地向示威群众猛烈开枪。彼得格勒无产阶级表现出罕见的大无畏气概和坚强不屈的精神。示威者英勇地进行自卫，用石块、木棍和铁块同警察进行斗争。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和妇女们积极在士兵中进行说服和开导工作。士兵们开始觉悟起来。巴甫洛夫团的一些士兵甚至走出军营，向骑警开火，公开站到革命方面来。

2 月 27 日，由于布尔什维克多年的工作和鼓动宣传，士兵

纷纷起义。工人和士兵甚至攻下军火总库，从这里缴获约 4 万支步枪和 3 万支手枪。士兵们积极地帮助工人武装起来。士兵的起义反映了农民对压迫者多年的仇恨。俄国农民多年来因饥饿、贫穷、无地和战争所带来的无穷灾难而郁积在心中的一切愤懑，此刻就像暴风雨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一个团又一个团接连倒向工人方面。到 2 月 27 日深夜已有 10 余万士兵站到革命旗帜下。

2 月 27 日晚上，工人和士兵差不多已经完全控制了彼得格勒。所有的要害地点和部门，如桥梁、车站、军火总库、电报局、邮政总局和一些最主要的机关都已转入工人和士兵手中。2 月 27 日，沙皇宣布解散杜马。当天夜里，起义的人民已经占领玛丽亚宫，政府实际上被驱散。罗曼诺夫王朝崩溃。3 月 2 日尼古拉二世退位。二月革命成功了。

沙皇俄国国内的阶级对抗、社会矛盾、沙皇政府的反动统治和腐败激起人民推翻了专制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这一进程。从当时的社会政治力量对比看，人民起来推翻沙皇的举动带有某种自发性，因为资产阶级并不想推翻沙皇，资产阶级政党想建立的是君主立宪制度。而左翼政党，布尔什维克党由于沙皇政府的迫害和镇压尚不能公开活动，其影响并不像十月革命前那样大。这从二月革命后事态的发展中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实际上基本未流血的二月革命背后却是罗曼诺夫王朝最后一个沙皇的血腥统治史：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1905 年 1 月 9 日“流血星期日”；1905—1907 年革命时期的冲突；第一次俄国革命后反动时期对革命参加者的残酷镇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人员牺牲、经济崩溃、数百万人长期离乡背井、人民的无权状况。人们把所有这一切都在 1917 年 2 月发泄到专制制度及其代表人物身上。人们渴望自由、解放，渴望新生活。俄国左翼力量，尤

其是布尔什维克党为推翻专制制度进行了多年的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这些工作终于在 1917 年 2 月有了结果。但是二月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二立宪民主党与临时政府

1917 年 2 月 27 日，正当彼得格勒人民走上城市街头，彼得格勒卫戍部队部分人也同人民站在一起的时候，塔夫利达宫里正在宣告解散杜马的命令。代表们静静地听着。革命之势迅猛异常，杜马领袖们对此的反应是惊慌失措和消极观望。左翼立宪民主党人建议立刻召集杜马会议，讨论局势问题。米留可夫当时说，由于不知道谁是事件的领导者，不能确定自己对当前事件的态度。

革命运动闪电般地发展和壮大，越来越多的部队同起义者站到一起。士兵、工人、大学生挤满了塔夫利达宫，杜马领袖们面临着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的选择。为了不违背沙皇解散杜马的命令，他们决定私下开会。会上采纳了米留可夫的建议，等事态性质明朗后再建立由国家杜马成员组成的临时委员会，以便恢复秩序和“同有关人士及机构联系”。后来米留可夫解释说：“这个并不精确的说法”的优点在于既满足了当前的任务，又不会给以后带来麻烦。

只是到了 2 月 27 日夜，当起义的人民已经占领玛丽亚宫，政府实际上被解散，起义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已经开进杜马后临时委员会成员（其中有 2 名立宪民主党人：米留可夫和涅克拉索夫）才不得不决定掌握政权。用舒利金的话说，他们这时的指导思想是：“可以有两个出路，一个是一切顺利，君主任命新

政府 我们再把权力转交给它，一个是一切都不顺利 这样的话，我们不掌权，别人就会掌权”。这种担心倒是根据的，因为 2 月 27 日，在塔夫利达宫同一栋房子里产生了另一个权力机关：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

新政府成立之前，临时委员会任命一些国家杜马成员为代表，一点一点地掌握国家管理权。被任命的 24 名代表中有 11 名立宪民主党人。为了阻止革命进程的发展，尤其是军队中革命事态的发展 向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皇村、喀琅施塔得 以及彼得堡要塞都派去了代表，其任务是阻止向工人发放武器。有趣的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代表陪同和保护着这些代表。2 月 28 日，米留可夫全天都在对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演讲。他号召士兵回到营房去，听从军官的指挥。

1917 年 3 月 1 日，临时委员会决定成立临时政府。格·叶·李沃夫任总理兼内务部长，立宪民主党成员组成了政府的核心。米留可夫任外交部长，盛加略夫任农业部长（这个职位对立宪民主党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可以调整土地改革的进程），涅克拉索夫任交通部长，《俄罗斯新闻》编辑亚·阿·曼努伊洛夫教授任教育部长 弗·德·纳波柯夫任临时政府办公厅主任。

本来，按事先的安排，立宪民主党人还应获得一个职位——司法部长。在革命事态发展的紧要关头，立宪民主党同意将这一职务交给社会革命党人亚·费·克伦斯基。立宪民主党人清楚，二月革命后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影响不断扩大的形势下，必须充当“民主的人质”的角色以便获得群众的同情和支持。1917 年 3 月底，米留可夫在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我们党自己独掌政权，大概会发生更多的磨擦和更大的困难。”

临时政府的全部立法活动都是由 1917 年 3 月成立的立法

会议来领导的。立法会议大部分成员是立宪民主党人（马克拉柯夫、阿杰莫夫、拉扎列夫斯基、诺利德、纳波柯夫）会议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费·费·科科什金。他是世界闻名的法学家，知识渊博。立宪民主党领导人非常重视科科什金的意见和建议，认为他是立宪民主党中最有洞察力的政治家之一。

3月1日夜，临时政府同工人代表苏维埃谈判期间，立宪民主党人在临时政府中的主导作用表现得特别明显。苏维埃代表之一、孟什维克苏汉诺夫指出，正是米留可夫代表整个杜马委员会在谈判，“看得出，米留可夫在这里不仅仅是领袖，而且是主人”……

米留可夫作为临时政府最有威望的代表，3月2日在塔夫利达宫叶卡捷林娜大厅代表刚刚组建的临时政府向水兵、士兵和工人发表演说。他在回答关于未来的管理形式问题时说：“政权将转交给摄政王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继承人将是阿列克谢。”^①米留可夫威胁说，否则的话，将发生内战并恢复已摧毁的制度。这个保存君主制的声明引起强烈不满，米留可夫不得不后退，说这是他个人的观点，国家制度的形式将由立宪会议决定。

立宪民主党中央多数人不同意米留可夫的观点。他们认为，保存君主制是没有前途的。但是米留可夫还是热心地说服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即位。立宪民主党领袖维护君主制的立场严重地破坏了他和群众中的威信，削弱了他在政府中的地位和影响。后来米留可夫的威信再也没有达到二月革命初期那样高的程度。

1917年3月25—28日。立宪民主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

^① 《俄国政党历史》第135页。

会。会上通过了关于党纲第十三条的修正案，提出俄国将成为一个民主议会制共和国。这样一来，就把所发生的变化用明文规定下来。倒是社会经济纲领问题更复杂些。二月革命结束后，社会问题立刻非常尖锐地提到日程上来。立宪民主党人必须面对这些问题。

革命的根本问题之一是土地问题。在立宪民主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有人提出必须改变纲领和承认土地国有化。但是这个建议遭到顽强的抵制。A. A. 科尔尼洛夫在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中和马·莫·维纳维尔在关于策略问题的报告中都强调指出，战争结束前农村居民都在前线，很难实现根本的改革，党的目标是“在不用无政府主义方式摧毁现存制度的情况下”给农民分配土地。

盛加略夫领导的农业部采取的实际措施仅限于没收已经属于国家财产的皇室土地。这个措施没有给农民带来任何好处。1917年3月19日，农业部起草的临时政府宣言禁止夺取地主土地，声明这个问题只能由立宪会议解决，盛加略夫在给地方土地机关的命令中指出，此前必须保证一切不变，并千方百计保证土地所有者的人身和财产不受侵犯。

立宪民主党第八次代表大会（1917年5月）根据中央提出的土地纲领草案认真讨论了土地问题。这时，代表大会参加者中间出现了更严重的分歧。连草案中提出的少数让步也遭到地主阶级代表的激烈反对。结果党的纲领中写进如下模棱两可的条款：土地属于所有“劳动的农业居民”。这就是说，不论是资本主义地主，还是富农，都是劳动农民。关于赎买地主土地的条款作了如下明确说明：赎金应“根据土地的正常收入”来确定。

党的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几乎没有涉及国家工业发展问题。在1917年7月23—28日举行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讨

论了亚·阿·曼努伊洛夫关于经济状况的专门报告，报告指出：“我们应该公开宣布，国民经济的发展应该建立在个人积极性基础之上。我们应该说，我们不反对在工业领域存在私有财产。”报告提出了制定实际经济纲领的任务。

1917年夏，工商业部代部长 B. A. 斯捷潘诺夫向内阁提交了临时政府关于经济问题的宣言草案和草案说明书。说明书指出，俄国目前不能用社会主义方式组织国民经济，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与此同时，考虑到国内实际局势，立宪民主党人不得不接受国家调节的思想。但是斯捷潘诺夫指出，在经济中贯彻这一思想时应该特别小心谨慎。他说，对整个经济进行调节的想法显然是充满幻想的冒险主义。宣言草案指出，只对主要生产部门进行调节，而且实行国家调节时不应动摇私有制，不应排斥个人积极性。

说明书主张广泛吸引外国资本，认为没有外资不可能大力发展生产力。立宪民主党人认为，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最近的历史时期内不可能实现工业化，因此唯一的发展道路是广泛调动外国专家的积极性。立宪民主党人希望在外国专家帮助下实现俄国“西化”的思想，即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方面实现“西方化”。

立宪民主党人的土地纲领和工业纲领受到社会主义政党的激烈批评。他们在工人问题上的立场（主张根据前线需要取消8小时工作制，反对提高工资和建立工人监督）和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主张民族文化自治，否定民族自决权）也都受到批评。在相当一部分群众眼里，立宪民主党是保守主义的象征，是进行改革的阻力。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 在二月革命后的头几个月 立

宪民主党的社会成分发生了变化，一些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甚至具有公开反革命倾向的人加入立宪民主党，而激进知识分子纷纷离开立宪民主党，投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布尔什维克。此外，立宪民主党队伍中还有许多官吏。1917年5—6月，全俄兴起要求立刻划分地主土地的农民运动，一些惊恐万状的土地所有者也纷纷加入立宪民主党。他们希望利用人民自由党的招牌保护自己的财产。

二月革命后，许多十月党人和进步党人也加入立宪民主党。甚至一些黑帮也积极参加立宪民主党。于是立宪民主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明显。

第一届临时政府是在立宪民主党的招牌下运转的。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印象中，临时政府同人民自由党是联系在一起的。新统治者不能克服日益严重的经济混乱状态，推迟进行迫切的社会变革，推迟召开立宪会议的责任，都应该由立宪民主党承担。

立宪民主党人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局势难以控制，他们所谓的理智改革同群众的要求相差甚远，他们同布尔什维克的冲突也达到顶点。立宪民主党越来越感觉到同人民在心理上已经无法达成一致。

这种心理上的不一致在临时政府对外政策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公众意识中，临时政府的对外政策是由外交部长制定的。米留可夫坚持继续进行战争，坚持要夺取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思想同群众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和愤怒。1917年4月20日，发表了外交部长给盟国的照会，表明临时政府完全同意与他们一道将战争进行到底。群众再也无法忍受了。爆发了政府危机，结果米留可夫被迫下台。

立宪民主党面临艰难的抉择 或者彻底放弃政权 秘密地为

建立资产阶级军事专政而斗争，或者在联合政府中同社会主义政党合作并不断地向这些政党施加压力，阻止革命发展。这场危机导致立宪民主党内发生分裂，以米留可夫为首的一部分人同党内右翼结合。以维纳维尔和纳波柯夫为首的另一部分人同左翼结合。两派的战略实质是一样的，只是策略有所不同。但是 1917 年事态发展错综复杂，要求能够对事态的变化作出迅速的准确的反应，因此策略问题非常重要，往往是重大分歧的根源。

立宪民主党人被迫同意自己的领袖退出政府，但是他们仍奉行其政治路线。1917 年 5 月立宪民主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代表大会选举新中央（66 人）对米留可夫及其亲信得票最多。代表大会“以沉痛的心情”同意立宪民主党和社会主义者联合执政。1917 年 5 月 6 日成立了联合内阁。

在第一届联合政府中安·伊·盛加略夫任财政部部长、德·伊·沙霍夫斯科伊任国家救济部部长、亚·阿·曼伊努洛夫仍任教育部部长。米留可夫最亲密的战友安·伊·盛加略夫任这些立宪民主党部长们的领袖。因此，同在上届政府中一样，仍然奉行米留可夫路线。而立宪民主党领袖本人在失去部长职位后，集中精力从事扩大和加强同各种社会组织和团体的联系，以便共同抵制苏维埃日益扩大的影响。

立宪民主党领导人希望通过市杜马和地方自治机关同地方苏维埃政权对抗。因此立宪民主党对 1917 年 5—6 月进行的地方自治机关选举非常重视。这是二月革命后俄国举行的第一次选举。尽管立宪民主党对选举作了充分准备，但是选举结果表明，立宪民主党在政治上输得很惨。在彼得格勒，立宪民主党获得 21.9% 的选票，在莫斯科只获得 16.8% 的选票。而在以前，立宪民主党在第一届杜马选举中在莫斯科获得 63% 的选票在

第二届选举中获得 54% 的选票 在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选举中获得 61% 和 65% 的选票；而在彼得格勒，在第一届获 61% 在第四届获 58% 的选票。

立宪民主党从这次失败中得出什么结论呢？他们认为：必须千方百计推迟召开立宪会议；不能迁就事态这样发展下去；不能等待 要行动起来。早在 4 月初，米留可夫就在彼得格勒同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私下进行多次谈判。这期间他还同陆军军官联合会建立了联系，军官联合会主席列·尼·诺沃西尔采夫中校是立宪民主党右派。

与此同时，立宪民主党人加紧在政府中对社会主义政党的执政伙伴施加压力。1917 年 6 月中旬，中央再次认真讨论了联合政府问题。米留可夫声明，由于社会主义者部长们的优柔寡断和他们对苏维埃的依附关系，联合政府不可能是一个“稳固的政权”。他要求立宪民主党部长们退出政府。但是几乎所有中央委员都反对米留可夫的建议。米留可夫在这次会议上明确表述了当前的局势：现在最危险的敌人是布尔什维克。会议决定，立宪民主党继续留在联合政府中，同时对日益严重的“无政府主义”采取了强硬措施。

6 月，俄国在前线的进攻失败，经济危机加深，食品供应状况恶化，失业人数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革命危机以迅猛的速度在发展。立宪民主党人清楚，不能再迟疑了。

立宪民主党人选择“乌克兰问题”作为摆脱困境的借口。 6

月底，临时政府代表团与乌克兰中央拉达^①在基辅进行谈判，提出批准内阁的宣言，确定由临时政府同中央拉达协商建立的总书记处管理乌克兰边疆区的事务。立宪民主党人反对宣言草案的内容。不仅彼得格勒的领导、《言语报》而且立宪民主党地方委员会都认为在基辅达成的协议是一个犯罪性质的文件，威胁到俄国的神圣性和不可分割性。

7月2日，立宪民主党部长们退出临时政府。此后发生了7月事件，彼得格勒街头死伤700多人，使政府危机进一步加深。立宪民主党报刊要求立即逮捕列宁及其同伙，恢复军队中的死刑（二月革命后曾废除死刑）。

七月危机期间，立宪民主党在士兵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旨在破坏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扩大立宪民主党人在军队中的影响。立宪民主党的要求得到满足，许多布尔什维克著名活动家被关进监狱，签署了关于逮捕列宁的命令。7月7日《言语报》满意地指出：“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死亡而且是突然死亡”。

7月8日，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成了临时政府的首脑。他的副手是涅克拉索夫。参加第二届联合内阁的立宪民主党人有神学教授安·弗·卡尔塔舍夫（正教院总监、宗教部长）、费·费·科科什金（国家监察长）、谢·费·奥登堡院士（教育部长）。第二届联合政府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它是独立于苏维埃的。《言语报》指出：“这个解放是所发生的变化全部政治意义所在。”

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掌握了政权，但是它并没有在俄国开创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期。它迷恋旧的君主制，自己无力掌

① 中央拉达是乌克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和组织的联合机构，1917年3月成立于基辅，十月革命后自命为“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充当德奥占领军的傀儡，1918年4月被德国占领者遗弃。

握国家政权。这充分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的特点。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的条件同西欧各国不同。在欧洲的法、英、德等国，资产阶级开始进行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时，无产阶级尚未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是最强大的阶级。正因为如此，它利用农民和工人的力量成功地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 20 世纪初的俄国，无产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有自己的政党。无产阶级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因此，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只解决资产阶级的要求，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它必须考虑到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由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和俄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决定了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临时政府中的表现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三、苏维埃的产生及孟什维克 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活动

1917 年 2 月 27 日夜，革命把彼得格勒的塔夫利达宫分成两半。大厦的一侧，以罗将柯为首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很快就要开始在这里办公，它已经决定接管国家权力。而在另一侧，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正在安顿下来。当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宣告成立。

孟什维克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占主导地位，36 名执行委员中有 14 名孟什维克。孟什维克尼·齐赫泽任苏维埃主席，劳动派分子亚·费·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马·伊·斯柯别列夫当选为

副主席。

为什么孟什维克此时有如此大的影响并能掌握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领导权呢？

这主要是因为，孟什维克在整个战争期间能够公开进行活动，尤其是他们有杜马党团这样的重要合法据点，而被迫进行极其秘密的地下工作的布尔什维克则没有这些条件。此外，战争期间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成分明显发生了变化。由于军工生产急剧增长，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加了 $1/3$ 以上 其中主要是来自城乡小资产阶级阶层。二月事变前夕，奥布霍夫工厂的 1.5 万名工人中几乎有一半来自农民以及因害怕征兵而躲藏到工厂里的小店主、商人子弟、清洁工。成千上万的新工人在战争年代也进了彼得格勒的其他企业。另一方面，由于经常动员参军，由于逮捕和流放，在革命中经过锻炼的彼得格勒血统无产者减少了。这些变化导致妥协派社会基础扩大。战争期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持护国主义立场，这也迎合了那些具有沙文主义情绪的居民。

苏维埃的成立和开始工作这一事实本身引起了所有民主力量，尤其是士兵群众的注意。听到苏维埃召开会议的消息以后，沃伦斯基团、巴甫洛夫团、立陶宛团和其他团的士兵都向塔夫利达宫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各代表团争先恐后发言，表达革命决心。

在群众革命情绪的影响下，彼得格勒苏维埃开始作为革命的政权机关进行活动。2月27日和28日苏维埃通过了一系列符合起义人民要求的重要决议。当时建立了粮食委员会。粮食委员会授权没收一切官方和公共储备的面粉，负责安排卫戍部队和首都居民的面包和其他食品的供应。苏维埃的委员们分别下到市内各区去组织基层的人民政权机关。根据布尔什维克

的建议，苏维埃采取了武装工人的措施。苏维埃指示在企业中组织有 1/10 的工人参加的工人民兵队。苏维埃号召工人“武装起来 储备子弹 不要把子弹白白地浪费掉。”^① 苏维埃决定立即中止旧政权对全部国家财政资金的支配，并对这些资金的支出实行监督。苏维埃决定出版自己的机关报《消息报》。尤·米·斯切克洛夫任该报的编辑。

2月28日，《消息报》创刊号出版。这一号的副刊上登载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还登载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号召彼得格勒和俄国的居民为彻底战胜沙皇制度而团结在苏维埃周围的呼吁书。呼吁书中谈到：“斗争还在继续：应当将斗争进行到底。旧政权应当被彻底推翻并让位于人民来管理。”^②

列宁认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一开始是“真正人民的代表机关”。^③ 它所作出的第一批决定符合革命人民的利益。在起义工人和士兵的推动下，把持苏维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不得不在首批文件中反映群众的革命要求，把革命在事实上已经实现的东西明文规定下来。

起义胜利后，争取军队的斗争变得尖锐起来。资产阶级竭力“使士兵俯首听命”，把他们赶回营房。当时颁布了罗将柯的命令，他代表国家杜马命令士兵回到营房，交出武器，对军官要绝对服从。这一命令极大地刺激了士兵群众。士兵要求建立革命组织的愿望更加强了。

2月28日，各部队的代表在布尔什维克的支持下迫使苏维埃执委会同意成立士兵部。次日，3月1日 士兵代表们陆续抵

^① 《消息报》1917年3月1日。

^② 《推翻专制制度以后的俄国革命运动》1957年莫斯科版第188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81页。

达塔夫利达宫。在有近千名工厂和兵营使者出席的情况下，召开了联合的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全体会议。有 10 名士兵和水兵代表被选进执行委员会，其中有两名布尔什维克。会议确认了士兵部的存在，建议卫戍部队按每连 1 名代表的原则把选举工作搞完。这样一来，在二月革命战火中形成的无产阶级和士兵群众的革命联盟从组织上得到了巩固。

在 3 月 1 日的会议上，来自各部队的代表谈到有人企图解除士兵的武装，恢复兵营的旧制度。他们要求苏维埃发布一项命令，将士兵争取到的革命成果正式肯定下来，并且按照新的原则，即在民主的基础上确定士兵与军官的相互关系。大家拟定了这一文件的基本原则。为起草这一文件，苏维埃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士兵委员会。3 月 2 日晨，《消息报》公布了以苏维埃的名义发出的《给彼得格勒军区卫戍部队的第一号命令》。这是一个具有巨大革命威力的文件。它包含以下内容：(1) 在所有的部队直至步兵连和炮兵连都成立由士兵代表组成的选举委员会；(2) 凡还未进行苏维埃选举的地方立即进行选举；(3) 在一切政治发动中士兵要服从苏维埃和自己的委员会，(4) 国家杜马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只有在它不同苏维埃的决定相矛盾的情况才能执行；(5) 武器应当置于连营委员会的监督之下，无论如何不得交给军官；(6) 在队列中和履行职责时要严格遵守军人纪律，在平常情况下则享有完全平等的公民权利；(7) 取消官衔称呼 禁止对士兵说话粗鲁 包括对他们称呼“你”。^① 第一号命令打破了资产阶级想解除革命武装的企图，它对士兵来说是真正的“自由宪章”在军队中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对军队的进一步革命化起到重要的作用。生活表明 军队不是跟着国家杜马走 而是跟着彼

^① 《推翻专制制度以后的俄国革命运动》第 189—190 页。

得格勒苏维埃走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是唯一为群众所承认的政权，是得到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士兵充分信任的机关。起义的群众认为，正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将组成临时革命政府，领导国家政权。

但是，虽然二月革命后成立的工兵苏维埃拥有实际力量，把持苏维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却宁愿把权力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指导思想和行为方式对苏维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虽然孟什维克仍然是社会主义者，但他们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俄国只有一个任务：在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进步力量实现广泛联合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他们根本不想在战争弄得满目疮痍的农民国家里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任何步骤，认为那是空想。所以当时普列汉诺夫说列宁的“四月提纲”是“一派胡言”。当时流行普列汉诺夫的一句名言：“俄国历史还没有准备好可以烙出社会主义之饼的面粉。”这意味着，工人除了同国家经济的主人——资产阶级寻求可以接受的妥协外，没有别的出路。二月革命胜利后，孟什维克一开始没有提出任何权力要求，只是说要“最大限度地”向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以便进行民主改革。

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采取妥协主义立场，政权落在临时政府手里。孟什维克中的护国派主张苏维埃的代表都参加政府。但是，齐赫泽、苏汉诺夫、斯切克洛夫等孟什维克分子则决定谨慎从事。于是执委会主张组织一个将在苏维埃监督之下工作的清一色资产阶级政府。但是临时政府四月危机^①表

^① 指 1917 年 4 月 20 日临时政府外务部给盟国发出照令，表明临时政府完全同意与他们一道将战争进行到底。这个照令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结果爆发政府危机，导致米留可夫下台。

明，清一色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不可能再管理国家。尽管 1917 年 4 月 28 日孟什维克组委会通过关于不参加李沃夫公爵内阁的决定，但是 5 月 1 日又决定建立联合政府。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会议上，有 44 人拥护社会主义者参加政府，19 人反对，2 人弃权。于是 1917 年 5 月 5 日孟什维克米·伊·斯柯别列夫被任命为劳动部长，伊·格·策列铁里被任命为邮电部长。

孟什维克参加临时政府的目的是促进国内和解，防止发生内战和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同时对临时政府施加影响。但是，仅仅抱着这种目的或愿望并不能说明参加政府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在政府的 15 个部长职位中，孟什维克只得到 2 个，而且不是重要职位。孟什维克并没有使资产阶级向人民作出大的让步。诚然，新政府向人民许诺尽快签订和约，建立对食品生产和分配的监督，对资产阶级的超额军事订货利润征税，加快召开立宪会议，等等。但是所有这些不过是漂亮的空话而已。生活表明，孟什维克不可能真正影响临时政府，而他们参加政府的事实却严重破坏了他们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

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中也起很大作用。除克伦斯基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外，当选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成员的还有亚历山德罗维奇、晋季诺夫和鲁萨诺夫。

在地方新政权机关中，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也很大。在尼古拉耶夫斯克，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社会秩序委员会；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社会保安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人 П. И. 契热夫斯基当选乌法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社会革命党人在士兵中特别受欢迎。他们在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察里津、伊尔库茨克等许多城市当选士兵代表苏维埃主席。

革命根本改变了社会革命党的活动条件和社会地位。它从

一个秘密的、经常受到迫害的、对国内政治生活影响很小的政党成了执政党之一。因此，党的战略和策略也发生了变化。党员人数、社会成分、组织结构都发生了变化。

社会革命党组织上的复兴在革命过程中就开始了。二月革命后两个月的时间里，党的领袖纷纷从流放地和国外回来：3月18日阿·拉·郭茨从伊尔库茨克回到彼得格勒，领导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社会革命党党团；4月18日弗·米·切尔诺夫、Н. Д. 阿夫克森齐耶夫、А. А. 阿尔古诺夫、伊·伊·布纳柯夫、丰达明斯基等人取道英国回到彼得格勒。

在组织活动方面，社会革命党超过了其他社会主义政党。3月2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社会革命党代表会议，选出了市委员会行使临时中央的职能同时决定出版《人民事业报》第1期于3月15日问世。

虽然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中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他们对临时政府寄予更大希望。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立即声明，他们既拥护临时政府，也拥护工兵代表苏维埃。他们号召建立地方苏维埃并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但是社会革命党人不认为苏维埃是政权机关、国家管理机关。他们认为，主要的国家管理机关是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是历史赋予的“继续革命和巩固主要自由和民主原则”的工具。而苏维埃的作用是“人民和社会主义力量连结的纽带”，是革命的发动机，推动临时政府沿着改革道路前进监督政府的活动。因此，在社会革命党人看来，不存在“两个政权并存”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社会革命党人积极参加各届联合政府。在第一届联合政府中，克伦斯基任陆军部长，弗·米·切尔诺夫任农业部长；在第二届联合政府中，克伦斯基任政府首脑，弗·米·切尔诺夫任农业部长，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任内务部长；在第三届

联合政府中任职的有克伦斯基和谢·列·马斯洛夫（任农业部长）。

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革命的态度，由于他们在苏维埃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二月革命后苏维埃并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所反映是两种势力的对峙。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都不会容忍这种局面长期存在下去。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态度不过是给资产阶级提供了更多的时间，使他们能够从容地对无产阶级及其革命组织采取行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中的活动不仅没有为自己赢得威信，反而在工人和士兵面前降低了自己的威信。这对他们的政治前途不无影响。

四、布尔什维克走出地下状态

战争期间，由于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党的领袖列宁被迫侨居国外，许多著名活动家被监禁或流放，如费·埃·捷尔任斯基、瓦·费·古比雪夫、格·康·奥尔忠尼启泽、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约·维·斯大林等等。各组织之间的联系及同领导中心的联系经常遭到破坏。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进行活动极其困难，它无法同中央委员会国外委员会（国外局）同党的领袖列宁保持经常的联系。

在二月革命的日子里，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起义工人打开监狱，救出了革命者。捷尔任斯基、扬·厄·鲁祖塔克等一大批革命家都是这时走出彼得格勒或莫斯科监狱大门的。

二月革命后，俄国成了欧洲最自由的国家。沙皇政府的政治犯都获得了自由。布尔什维克从服苦役的地方和流放地纷纷归

来。稍后，住在欧洲、美洲、澳洲各国的侨民也开始成批地或单独地返回祖国。这些人大多数都是经过艰苦的革命斗争考验和锻炼的人。

布尔什维克党一走出地下状态，就着手聚集力量，组织和巩固自己的队伍，并在群众中开展政治工作。首先，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担负起了中央领导工作。俄国局增加许多成员并选出了一个主席团。主席团成员有：彼·安·扎鲁茨基、马·康·穆拉诺夫、约·维·斯大林、叶·德·斯塔索娃、亚·加·施略普尼柯夫。俄国局很快同各地方党组织建立起十分牢固而经常的联系。

斯大林是 1917 年 3 月同加米涅夫一起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回来的。他们回到彼得格勒后，主动担负起领导《真理报》的工作。二月革命后，3 月 4 日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就出版《真理报》问题通过了一项专门决议，还决定发表为《真理报》募集资金的呼吁书。3 月 5 日即在沙皇政府垮台的第七天，《真理报》出版了。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到来之前，《真理报》的观点是比较激进的。他们到《真理报》之后开始实行温和的政策，只是号召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当时列宁写的一些信中谈到必须结束战争、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从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等内容。许多信件是在对内容作了删减之后刊载的。1917 年 3 月底至 4 月初召开了全俄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者代表会议。斯大林在会上竭力主张防止“加快事态的发展”，主张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甚至主张在温和的反战立场上同孟什维克联合。这种立场遭到工人的强烈反对，当时一些愤怒的工人曾要求将《真理报》编辑开除出党。^①

^① 《俄国政党历史》第 291 页。

这时 列宁在结束近 10 年的流亡生活，在进行了紧张的斗争和探索工作后从国外回到俄国。他是作为公认的领袖、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回来的。有人无条件地支持他，有人不同意他的观点，也有人想同他寻求妥协，但是都承认他是一位杰出的人物，无与伦比的理论家，而且国际社会民主党人都这样认为。列宁回国后，布尔什维克组织开始在列宁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布尔什维克组织不断发展壮大。

二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党的人数是比较少的。根据现有的材料，布尔什维克走出地下状态时大约有 2.4 万人 他们集中在 150 多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和小组里。其中最大的组织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组织，分别拥有约 2000 名和 600 名党员。许多城市中的布尔什维克小组有的只有几十个人，甚至几个人。但是他们大都是经受过锻炼和考验，对革命无限忠诚的人，无论是贫困和坐牢，或者是流放和苦役，都不能摧毁他们的信念。他们是一股中坚力量，是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核心。工人党员是党的基本力量，有 1.4 万人，占党员总数的 60% 以上 农民党员占 7.6%，职员，包括知识分子职业革命家占 25.8%。

布尔什维克一走出地下状态，就开始努力抓组织工作。当时需要把各地几乎遭到全面破坏的党委会建立起来，使它们同中央保持经常联系，需要制定合法条件下的工作方式和方法。3 月 2 日，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召开第一次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区组织的 40 名代表。^① 会议的任务是恢复被警察破坏了彼得堡委员会。当时建立了彼得堡临时委员会。此后，基辅、萨

^① 《1917 年第一届公开的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资料 and 记录汇编）1927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 1 页。

马拉、叶卡捷林堡和许多大城市都建立了临时委员会。4月彼得格勒、莫斯科、乌拉尔、北波罗的海地区、西南地区、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等地党组织和其他许多党组织都召开了布尔什维克党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公开代表会议，选出了党的各地方委员会。一些区级组织得到恢复和重建，选举了党的区委会。由于党的工作者不再需要遵守秘密工作的条件，委员会的人数增加了。选进委员会的除了职业革命家以外，还有最有威信的普通党员。

党委会都在积累合法工作的经验，并不断根据新的情况改善组织形式。为了同党的工厂组织和基层保持经常的联系，需要把一些城市的区划分若干个分区，并建立相应的党委会。在各个党委会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支部在各工厂和各部队纷纷建立起来并不断扩大。

二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时期，许多党委会号召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者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建立布尔什维克组织和创办刊物。但是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不同，布尔什维克接收党员有严格的标准和组织手续。1917年3月18日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章程通过了关于入党手续的决定，决定说：“凡承认党纲并参加一个组织的人才能被接收为党员，接收党员要有两名党员介绍。”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还制定了标准式样的党证。^①

到4月底布尔什维克党拥有10多万名党员。党组织也从走出地下状态时的150个增加到600个。布尔什维克开始成为群众性的工人政党。

布尔什维克还在军队里扩大自己组织。走出地下状态前

^① 《苏联历史问题》杂志 1962 年第 3 期第 152 页。

党在军队中只有很少一些小组 而到 5 月份 彼得格勒的军队就拥有 6000 名党员。

当时，在绝大多数工兵代表苏维埃里，布尔什维克都占少数，苏维埃大都是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控制的。但是布尔什维克经过努力工作，很快开始在一些苏维埃中发挥作用。3 月份已有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当选为苏维埃主席：巴库是斯·格·邵武勉 萨马拉是瓦·弗·古比雪夫，里加是尔·恩德鲁普。此外，在其他一些地方苏维埃中也有布尔什维克在工作，如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中有维·巴·诺根和彼·格·斯米多维奇，在明斯克苏维埃中有米·瓦·优龙芝和亚·费·米雅斯尼柯夫（米雅斯克扬）在萨拉托夫苏维埃中有米·瓦·瓦西里耶夫 尤任 和弗·巴·米柳亭 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苏维埃中工作的是安·谢·布勃诺夫，在基辅苏维埃中工作的是马·亚·萨韦利耶夫，等等。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还在工会、士兵、青年工人中开展工作，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在青年工人中的工作成效大为显著。4 月，在彼得格勒一些区和企业以及其他城市中都建立了青年工人的组织。4 月 5 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叶卡捷琳堡委员会建立了一个属于全国第一批的青年共产主义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是 14—18 岁的男女青年，其中主要是工人。

二月革命后，在不少地方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同处于一个组织之中。孟什维克认为，推翻沙皇政府以后他们与布尔什维克之间在策略上的基本分歧消除了，因而实行联合的障碍也就不存在了。这种情绪也影响了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到 4 月底 已经出现 150 多个联合组织 当时全国有 440 多个独立的布尔什维克组织。

布尔什维克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俄代表会议（1912 年）曾将孟什维克取消派开除

出党，主要原因是他们主张取消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建立合法的政党。1914年春天某些孟什维克活动家号召布尔什维克“在共同的策略的基础上”同孟什维克取消派联合起来的时候，列宁写道“统一，这是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口号！但是，工人事业所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反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统一……同谁统一？同取消派吗？那我们没有必要在一起”。^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孟什维克采取了护国主义和同资产阶级公开妥协的立场。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原则分歧更加严重。正因为如此，二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立即坚决地警告党不要同孟什维克实行联合，就此他曾于3月6日电告那些从中立国启程回国的布尔什维克。^②

在已出现的联合组织中，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歧，尤其是在战略和策略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列宁的四月提纲的发表，尤其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七次全俄（四月）代表会议对于克服联合情绪和从组织上解决联合问题起了决定性作用。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各联合组织开始急剧地土崩瓦解。

推翻专制制度后，布尔什维克党所面临的最重要任务是，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和现有的阶级力量对比，制定出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首先必须明确对工兵代表苏维埃和临时政府的态度。

列宁在国外得知二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后，从3月7—12日给俄国写去了四封《远方来信》：《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新政府和无产阶级》、《论无产阶级的民警》、《如何争取缔结和

《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81页。

② 同上，第29卷8页。

约?)。3月20日,即列宁动身回国的前夕开始写作第五封信《革命的无产阶级国家机构的任务》但是没有写完。^①

列宁所得出的主要结论就是革命第一阶段已经结束。当时形势的特点就是要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相当出色地解决了国家的政权问题,第二阶段则应当把政权转交到工人和贫苦农民手中。列宁号召:“工人们,你们在反对沙皇制度的国内战争中,显示了无产阶级的人民的英雄主义的奇迹,现在你们应该显示出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组织的奇迹,以便为革命的第二阶段上的胜利作好准备。”^②

列宁认为,在革命过程中即将诞生的新政府,应当按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式样来组织。这样的政府已经有了,这就是“非正式的、还没有发展成熟的、比较弱的工人政府,它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城乡全体贫苦人民的利益。这就是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它正在努力联系士兵和农民以及农业工人……”^③

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列宁在3月初给回国的布尔什维克的电报中就已经扼要地提出来了,他说:“我们的策略是完全不信任新政府,不给新政府任何支持;特别是要怀疑克伦斯基;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这是唯一的保证;立即举行彼得格勒杜马的选举,决不同其他党派接近……”

但是在列宁回国前,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和地方党组织对临时政府采取了较温和的甚至妥协的立场。例如,彼得堡委员会在3月3日的决议中说:“只要临时政府的行动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民主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它就不反对临时政府这个政权,

① 《列宁全集》第2版 29卷 53—55页。

②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11页。

③ 同上 第8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8页。

同时又宣称，它决心进行最无情的斗争，反对临时政府以任何形式来恢复君主制管理形式的任何企图。^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区域局和莫斯科委员会都采取了这样的立场，他们主张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这种状况直到列宁回国后才有了转变。

总而言之，二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走出地下状态，获得了合法活动的机会 可以直接走向人民 走向工人、士兵和农民 宣传自己的纲领和策略，发展和壮大自己的组织。可以说，在这个方面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布尔什维克几乎同所有政党都存在分歧，它走出地下状态后，还面临着为自己的理想而斗争的艰巨任务，而这个理想就是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五、战争和土地问题

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后，人民渴望迅速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但是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及其临时政府不想结束战争，立宪民主党人外交部长米留可夫甚至公开声明继续履行对盟国的义务，将战争进行到底。这种态度是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因为反正战争的负担是落在劳动者和普通平民身上。立宪民主党对战争的这种态度使他们日益遭到越来越多人的反对。

应该说，二月革命后决定俄国事态发展和影响各政党立场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仍在进行的战争。除上面提到的立宪民主党人的立场外，其他各政党也都明确表明了自己对战争，确切地说

^① 《真理报》1917年3月7日。

是结束战争的态度。社会革命党人很清楚，如果革命不能结束战争，那么战争就会扼杀革命。因此，他们提出了“让全世界实现民主和平”的口号。社会革命党理论家认为革命的俄国是肩负结束战争使命的“第三种力量”的前哨和支柱。这决定了社会革命党的主要活动方针：在对外政策中，同交战国帝国主义斗争，恢复国际；在对内政策方面，保卫和努力巩固革命的成果。社会革命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对战争的态度》的决议，号召各交战国人民迫使本国政府放弃掠夺性要求，开始和解的事业；同时声明，俄国民主派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掠夺性要求。代表大会提出的最近任务是：促进尽快恢复革命国际和召开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恢复劳动者的团结，制定和解的条件和实施这些条件的措施；要求临时政府采取措施重新考虑和废除沙皇政府和盟国签订的秘密条约。与此同时，决定指出，只有所有交战国全体劳动人民联合起来才能实现这些任务。决议坚决反对单独媾和和休战。只要战争还在继续，必须保证“与盟国战线的战略统一，使军队做好充分的作战准备”，把军队变成能够实现俄国革命和俄国对外政策任务而积极战斗的力量。因此决议指出，不允许在军队中进行不服从革命政府命令的“蛊惑性宣传”。由此可以看出，虽然社会革命党在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同立宪民主党人有所不同，或者说有分歧，但仍然是从护国主义立场出发来看待这一问题的。

孟什维克在二月革命后基本上是按所谓“革命护国主义”精神解决战争问题的。其明显的例子是3月14日发表的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执委会《告世界人民书》。《告世界人民书》中指出俄国民主派反对本国统治阶级的掠夺政策，号召欧洲各国人民为了世界和平的利益共同采取坚决的行动。与此同时，《告世界人民书》作者声明俄国革命决不会在占领者的刺

刀面前退却，不会容忍外国军事力量压迫自己。

布尔什维克对战争问题的态度在二月革命胜利后仍然没有改变。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即使在推翻沙皇政府之后，俄国所进行的战争也不是正义战争，而是帝国主义战争。中央委员会俄国局 3 月 22 日通过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指出：“不仅要迫使俄国临时政府放弃任何侵略计划，而且要迫使它立即公开表达俄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向各交战国提议在解放所有被压迫、被压制和没有充分权利的人民（自决权）的条件下缔结和约。”^① 列宁也明确地指出，党要详细地、坚持不懈地、耐心地向受“革命护国主义”影响的劳动人民说明即使在沙皇政府垮台以后，俄国资产阶级进行的战争也仍然是非正义的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只有以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式解决了政权问题，才能着手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当时唯一能够摆脱世界性大屠杀灾祸的道路，就是使全部政权转归工兵代表苏维埃。只有对掠夺其他民族和保护资本家利润不感兴趣的工人和贫苦农民，才能真正立刻采取有效措施来停止战争和缔结民主的和约。在这里，列宁把结束战争同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政权问题联系起来，实际上也表明了列宁对临时政府的态度。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战争和和平问题的态度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和心声。与此同时，这种态度也使布尔什维克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

此外，土地问题也是二月革命后各政党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之一。土地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问题。上面谈到过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对土地问题的态度。他们显然是从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来解决土地问题，所要维护的是大

^① 《真理报》1917 年 3 月 26 日。

土地占有者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因为如此，立宪民主党人逐渐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对于社会革命党人来说，土地问题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纲领中关于土地问题的提法使他们赢得了人民的欢迎。社会革命党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乃是社会革命党社会主义的特点。社会革命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指出，党仍然坚持自己的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把土地变成全民财富，取消赎金，由劳动者平均使用土地。代表大会还指出，立宪会议应该通过包括这些原则的土地法。立宪会议通过有关法律之前，必须将全部土地转交土地委员会管辖，土地委员会应该关心使农业生产保持在应有的水平之上，发展土地共耕制，尽可能平均地和正确地在各农户中分配土地，对牲畜和农具进行登记以便更好地加以利用，按民主原则改造土地委员会，等等。社会革命党人在土地问题上的态度在俄国有很大影响。以往的史学研究作品曾不公正地把社会革命党人在土地问题上的策略同临时政府的土地政策混为一谈，说社会革命党人的策略是等待立宪会议解决农民和土地问题。事实上，社会革命党人在召开立宪会议之前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比如，他们积极参加组建农民委员会和土地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人农业部长切尔诺夫和马斯洛夫在 1917 年 6 月和 10 月两次向临时政府提出法案，但是法案没有被接受。

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布尔什维克在土地问题上的态度最鲜明。列宁是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和解决政权的角度来谈土地问题的。列宁指出，只有首先做到使绝大多数农民在没收地主土地和把全部土地收归国有的斗争中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在最近的将来获得胜利。列宁在二月革命胜利后指出，只有兵农代表苏维埃才

能够不顾地主的利益、不用官僚的方式来解决重大的土地问题。^① 掌握全部政权的苏维埃应该没收地主的土地，把全国的土地收归国有。这些土地将由各地的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实际支配。在这些苏维埃的监督下，由公家出资经营，把地主的大庄园建成模范农场。

二月革命后，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战争仍在继续，土地问题仍未解决，工人还在挨饿，农民还在受无地或少地之苦。但是二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尚无一种力量可以控制国内局势，可以在政治舞台上占据绝对优势。因此，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从容地贯彻自己的纲领和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战争与和平，还是土地与面包的问题，都很难立刻解决。事实上，随着事态的发展，各种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发展和变化，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景也在逐渐明朗。历史将把机会赐予那些最强大、最能代表历史发展潮流的力量。

六、俄国形成了多党制吗？

二月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各政党都获得了合法存在的权利。在二月革命前，虽然一些政党也在杜马中活动，但那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政党。它们的存在只不过是沙皇制度的一点装饰。这些政党没有任何权利，沙皇政府可以随时取缔它们。这些政党的存在只不过是一种现象而已。俄国不曾存在过政党制度。

那么二月革命以后俄国形成了多党制吗？最近俄国有些研究著作认为二月革命后俄国形成了多党联合政府，建立了多党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87页。

制。如果不是布尔什维克后来夺取政权，俄国就会沿着资产阶级共和制、议会制、多党制的道路走下去。

如上所述，政党是随着资产阶级制度的建立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得最早，因此最早的政党产生于英国。政党反映社会上的阶级划分，政党制度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产物。在政党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资产阶级政党制度，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重要手段。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政党在形式上并不是国家机关，也不是国家组织，许多国家的宪法甚至对政党地位也没有作任何规定，但是实际上，资产阶级对整个国家政权和全国政治生活的控制，通常都是通过政党来进行的，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和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不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又有不同的形式，有一党制、多党制和两党制几种形式。所谓一党制，就是由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控制国家政权和政治生活，不允许其他政党活动。多党制条件下一般有多个政党参加资产阶级议会，而由一个取得多数议席或普选胜利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组织政府。两党制则是有两个大的资产阶级政党参加议会，由其中一个政党负责组织或主持政府。两党制的显著特点，是资产阶级让其两个主要政党轮流上台，操纵国家政权，控制国家机关的各个环节。在这两个政党以外，虽然还可能还有其他政党的活动，但是这些政党根本不可能掌握国家机关的权力，有的即使在议会中占有少数席位，其作用和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

由此看出，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一党制、多党制、两党制，都是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手段。1858年，马克思在评论英国的议会斗争时曾经指出，英国资产阶级的寡头政体“不是靠把政权经常保存在同样一些人手中而使自己永存下去，而是采用这样的办法：它轮流地使政权从一只手中放下，又立刻被另一

只手抓住”。^①这段话形象地向我们说明，两大政党同是资产阶级有意识地轮流使用两只手来统治人民的方法。马克思还指出，议会斗争的技巧恰好在于“在短兵相接的格斗中打击的不是职位，而仅仅是当时占据职位的人，并且在进行打击的时候，要这个人在作为大臣下台以后，马上又能作为大臣的候选人而上台”。^②这进一步向我们指明，在两党制中，两大资产阶级政党表面扮演着互相反对的角色，但就反对党来说，它反对的并不是政府，亦即资产阶级政权本身，而是当时在这个政权中执行权力的党，同时自己也随时准备去执行权力。这样一来，两大政党之间的关系是：在台上的党是现职政府，在台下的党是预备政府，两者随时准备互相替换。

从马克思的分析中我们了解到，两党制（原则上讲，多党制亦然）中的两大政党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而不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如果它们分别代表不同的阶级，那么不可能协调一致，有条不紊地轮流掌握国家权力了。此外，两党制或多党制中各个政党，除轮流上台执政外，还起着互相竞争、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作用。

综上所述，政党制度是资产阶级确立自己的统治后实施统治的工具。它是直接为资产阶级及其阶级利益服务的。其他阶级即使在议会拥有若干席位，仍然不会妨碍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换句话说，其他阶级政党的存在以不损害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为限度。

那么二月革命后的俄国如何呢？

俄国的情况与欧洲发达国家不同，欧洲发达国家发生资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1卷第399页。

② 同上。

阶级革命时，城市工人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资产阶级是最强大的阶级，所以它能利用工人和农民起来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在俄国则不同，20世纪初，俄国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已经拥有自己的政党。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要解决土地问题，而且要解决雇佣劳动问题，不仅要满足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要解决无产阶级的问题。俄国资产阶级既是强大的，又是软弱的。所谓强大的，是因为资产阶级，尤其是垄断资产阶级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所谓软弱的，是因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一直依赖于沙皇政府，资本迅速集中和垄断的发展历史使资产阶级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少数，俄国始终未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阶层。另一方面，俄国广大劳动居民在社会心理上不仅是反对专制制度的，也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正因为如此，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虽然形式上掌握了政府，但是并没有掌握实际上的权力。俄国出现的是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所代表的是不同的阶级和利益，所追求的是不同的社会发展前景和社会制度。

所谓政党制度，如上所述，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就是说，只有当一个阶级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之后，才能谈到建立为自己统治服务的政党的问题。在谁战胜谁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管理形式问题尚提不到日程上来。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表明，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取得统治地位，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尚没有准备好夺取政权，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思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917年3月至10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俄国有过四届政府，其中有三届联合临时政府，分别成立于1917年3月2日（15日）、5月5日（18日）、7月24日（8月6日）、9月25日（10

月 8 日)。在后三届联合政府中，除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外 参政的还有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等政党的代表。

但是，这种联合执政并不表明俄国已经建立了多党制。阶级斗争问题尚未解决 国体的问题尚未解决。在这种情况下 任何政府 清一色的资产阶级政府也好 联合政府也好 都不过是一种过渡形式而已。政体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国体问题解决的结果。事实上，当时俄国立宪会议的前途问题尚不明朗。

“两个政权并存局面”中的临时政府掌握着形式上的权力，而工兵代表苏维埃则掌握着事实上的权力。“毫无疑问，这种‘交织’是不能长久保持下去的。一国之内决不能有两个政权。其中必有一个要化为乌有。”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只是反映了革命发展中的一个过渡时刻，这时革命已超出了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 但是还没有到达‘纯粹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①

列宁的这段话准确地指出了俄国当时的形势的实质。正因为如此，二月革命后阶级斗争更加激烈 俄国的整个资产阶级在各地拼命用各种办法排除、削弱和消灭工兵代表苏维埃 以求建立资产阶级的单一政权，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也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积极地为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政权而斗争。总而言之，政权问题将由阶级大搏斗的最终结局来解决。

① 《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3 卷第 41 页。

下
篇
苏
联
一
党
制
的
建
立

第六章

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

一、列宁的《四月提纲》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策略

1917年4月3日，列宁结束流亡生活，回到俄国。4月4日，列宁在塔夫利达宫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四月提纲。同一天，列宁还在参加全俄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联席会议上作了报告。

列宁在四月提纲及一些补充、解释和发展提纲的著作（如：《论策略书》、《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 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等^①）中回答了俄国革命中提出的各种问题 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对一些迫切问题的看法，如关于从民主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过渡问题，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待战争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关于苏维埃共和国问题，

^① 参看《列宁全集 第2版第29卷》。

关于在苏维埃中争取多数的途径问题，关于在城市和农村实行迫切的经济改革问题，关于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任务等问题。四月提纲是列宁根据俄国工人运动和世界工人运动以往的经验，在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方面向前迈出的新的一步。提纲中论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的方针。

列宁说：“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①这一简短的结论不仅明确地说明了俄国当时局势的基本内容，而且明确地指出了能够实行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过渡的社会力量。

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的关于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的问题，同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有可能首先在单独一个国家获得胜利的结论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这个结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列宁坚信俄国具备一切条件能使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起来突破世界帝国主义阵线的链条。在俄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被奴役各民族同帝国主义压迫者之间的矛盾，要比其他国家表现得更尖锐。战争空前地加剧了这些矛盾。此外，俄国无产阶级具有自己的先锋队组织——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政党。在多年阶级搏斗的烈火中，在两次俄国革命的街垒战中，锻炼出了一支伟大的革命力量——工农联盟。

在列宁的争取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计划中，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作为革命政权的现成形式，占有重要的位置。早在 1905 年工人代表苏维埃出现时，列宁就认为

^① 《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3 卷第 14 页。

它不是简单的罢工斗争的机关，而是起义的机关，是新政权即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萌芽。

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列宁对未来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和形式问题进行了研究。1916—1917年他认真地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著作，还摘录了卡尔·考茨基、安东尼·潘涅库克、爱德华·伯恩斯坦的著作，并作了批注。列宁把收集到的资料汇集成一个笔记本，取名为《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30—222页）俗称“蓝皮笔记”。这些资料反映了列宁对巴黎公社和俄国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的观点。二月革命前夕，列宁在撰文论述1905年群众创建的苏维埃时，把苏维埃看作是巴黎公社社员的创举的继续。那时他就已经得出结论说，苏维埃同公社一样，其使命也是用自己来代替被无产阶级打碎的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这一切大致可以简单明了地表述如下：用工人代表的苏维埃和他们的受托人代替旧的‘现成的’国家机器和议会。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①列宁根据世界和俄国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确信苏维埃共和国是俄国无产阶级国家最适宜的形式。4月4日他说“成立工兵苏维埃就等于‘向社会主义迈出的一步’”。^②列宁在四月提纲中宣布“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共和国。”^③

关于临时政府，列宁提出了“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的口号。但列宁并没有号召人们去立即推翻临时政府。当时如果发出这样的号召，也不会得到广大劳动者阶层的支持，因为大多数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85页。

② 同上第29卷第108页。

③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15页。

人对政府还抱有一种不自觉的轻信态度。

列宁根据国内阶级力量的实际分布情况，提出政权转归苏维埃的唯一可行的道路是革命和平发展的道路。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在一些个别国家中“工人能够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认为革命的和平发展是合乎愿望的事，尽管这在历史上是极其少见的。二月革命后俄国出现了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

这主要是因为 在当时阶级力量对比的情况下 临时政府不能采取暴力行动。尽管人民中相当一些阶层还信任这个政府，但是临时政府的地位还是很不稳固的，因为苏维埃在劳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陆军和海军都站在苏维埃一边。列宁指出：“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 没有外力强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开辟并保障了整个革命和平向前发展的道路。”^①

在革命和平发展的条件下，政权有可能在布尔什维克还没有在苏维埃中争得多数之前就转归苏维埃。在这种情况下，各政党的斗争将在苏维埃内部进行。群众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较快地作出选择。在这样的条件下实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 会以和平方式取消资产阶级的政权 使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取得胜利，就会废除旧的政权机构而代之以新的真正民主的苏维埃机构。

布尔什维克党认为，通过实行符合劳动人民需要和愿望的政策 将可靠地获得他们的同情和信任；人民将利用民主的选举制和召回代表的权利把真正维护他们利益和执行他们意志的人选进苏维埃。无产阶级政党通过这种途径就能在苏维埃中争得多数 改变苏维埃的政策 把苏维埃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

^① 《列宁选集 第3版第3卷第86页。

在苏维埃单独掌权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会不断加强自己在苏维埃中的影响。一旦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占据领导地位，就能在苏维埃的基地上建立起新的政府，开始实现自己的纲领。这是通向社会主义的一条最无痛苦的道路。

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争得领导权就能保证顺利地向社会主义改造过渡，就能完成二月革命所没有解决的那些民主主义任务 如摆脱帝国主义战争、争得公正的民主的和平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改善无产阶级的物质状况 废除地主土地占有制 把俄国各族人民从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

四月危机期间，彼得堡委员会的巴格达季耶夫等人提出了推翻临时政府的左倾冒险主义口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 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提议谴责了这个冒险主义口号。中央委员会在 4 月 22 日的决议中指出：“只有在工兵代表苏维埃赞成我们的政策并且愿意掌握政权的时候，我们才会主张把政权转归无产者和半无产者。”^①“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充其量不过是一句空话 搞得不好 还会促使无产阶级过早地发动 给反革命提供镇压无产阶级的机会。布尔什维克中央曾召开三次会议讨论党在四月危机时期的策略，在列宁起草的各项决议中极其明确地阐明了这一策略。当时必须利用临时政府给盟国的照会来揭露政府的反人民的帝国主义实质，把自发的群众的愤慨情绪和群众运动引导到为使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而进行自觉的有组织的斗争道路上去。这一策略得到了首都工人的热烈拥护。4 月 21 日 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举行了游行示威 他们高呼着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没有割地没有赔款的和约！”“公布秘密条约！”“全部政权归苏维埃！”首都无产阶级的行动在全国各地引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9 卷第 320 页。

起了强烈反响。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领袖们害怕同资产阶级的联盟破裂，害怕政权转到苏维埃手中。与此同时，四月危机也使资产阶级看到，靠由资本家和地主的代表组成的政府来推行反革命的对内政策和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是不可能的。于是，由资产阶级政党和妥协政党的代表人物组成联合政府的设想产生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人，紧接着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和全体会议先后接受了关于成立联合内阁的建议。

4月24日在彼得格勒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这是布尔什维克党第一次公开的代表会议。会议的任务是讨论列宁关于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方针，并使这一方针成为全党的方针。列宁在会议开幕词中指出，向资本主义旧世界发起冲击的伟大任务已经光荣地落到了俄国无产阶级身上。他说：“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 我们才能确定自己的任务。”

代表会议对一系列极其重要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决定。这些问题是：目前形势（战争和临时政府）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态度、修改党纲、国际的现状和党的任务、社会民主党国际组织的联合、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立宪会议、各地区的报告、选举中央委员会。研究得最详细的是关于目前形势问题。它包括一些极重要的现实问题：对俄国政治形势的估计，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态度和对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态度，等等。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出现了不同观点。代表们听取了列宁的报告。加米涅夫作了补充报告。

在如何估计时代的性质，即俄国目前究竟是处于继续进行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340页。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呢，还是进入了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时期，在这个问题上，加米涅夫的观点同列宁的观点发生了冲突。加米涅夫在补充报告中说：“在我看来，列宁同志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结束了，这是错误的。我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没有结束 我们的分歧就在这里。”^①他指出：“说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潜力已经用尽 还为时过早。”^②巴格达季耶夫也支持加米涅夫关于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完成的论点。他说：“我也认为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结束，所以加米涅夫的决议案对我来说是可以接受的。”^③

在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上，列宁和加米涅夫的观点也发生冲突。列宁号召不给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要集中精力为建立单一的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加米涅夫则相反，他主张实行由苏维埃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并对它进行监督的政策。列宁主张彻底揭露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联盟在苏维埃中实行的妥协政策，而加米涅夫则主张对这个联盟采取调和态度，以便“利用这个联盟，支持这个联盟，在不破坏这个联盟的基础上制定我们的策略”。^④

在这场争论中还有一些人采取了动摇的立场。例如 弗·巴·米柳亭和安·谢·布勃诺夫就是这样，他们要求除由彼得格勒苏维埃从上面对临时政府实行监督外，还要通过劳动者举行广泛的游行示威从下面对临时政府实行监督。彼·格·斯米多维克对“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四月提纲的中心口号表示怀疑。他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记录》1958年莫斯科版第80页。

② 同上 第90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认为“既然‘无产阶级组织的影响在扩大，工会运动在发展，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影响和作用在减弱，政权就不会转到苏维埃手中，但是却可以建立一些完全不同的机构’”。^①

由于对当前形势的性质有不同的估计，加米涅夫主张二月革命后党应当为最低纲领而斗争，他抱怨说，列宁只醉心于俄国革命的前景，却使积极的实践家们处于“没有最低纲领”的状态。^②巴格达季耶夫在发言中把这一思想表达得更完整，他建议把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最低纲领上，因为用他的话说，只有德国爆发革命，我们党才能实行最高纲领即实行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③

这样，在关于俄国当前处于什么样的革命阶段以及应当为什么样的纲领而奋斗的问题的争论中，又产生了另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俄国工人阶级是否能够在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发挥革命首创精神呢？在这个问题上，加米涅夫同意孟什维克的观点，认为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因此，只有西方那些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才能首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阿·伊·李可夫支持这一观点。他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实现最低纲领即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改革问题。至于社会主义革命纲领，那只有在西方给予推动之后才能着手去实现，因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首创精神并不属于我们。我们没有力量，没有实现这一点的客观条件。”^④

列宁指出“这种论断是错误的，同活生生的、创造性的马克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记录）》第 90 页。

② 同上 第 85 页。

③ 同上 第 91、92 页。

④ 同上 第 107 页。

思主义是背道而驰的。他说：“李可夫同志说，社会主义应当从其他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产生。这是不对的。不能说谁来开始和谁来结束。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拙劣的模仿。

马克思说过，法国开始，德国人完成。可是现在俄国无产阶级的成就比谁都大。”^①

李可夫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最多的欧洲国家中，人民群众不会同情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反驳道，李可夫同加米涅夫一样，他不考虑，占农民大多数的农村贫民能够并且一定会跟工人阶级一起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此外，中农也一定跟着工人阶级走，因为只有走这条道路，他们才能实现世代渴望得到土地的夙愿。列宁说，党如果提出口号说：不要沙皇，而要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会跃过小资产阶级。但我们说的是要通过工兵代表苏维埃帮助革命。”^②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俄国取得胜利的思想，在《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中得到了反映。决议指出，“在向人民解释必须立即采取若干实际上已经成熟的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骤方面”^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

代表会议在《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决议中指出，必须进行长期的工作来启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团结城乡无产者，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政权转到苏维埃手中。鉴于四月危机的教训，代表会议指出，立宪民主党组织了反革命分子，企图杀害工人，这种事件的重演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必须抛弃信任临时政府的政策，组织和武装无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同军队的联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361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443页。

系，这是保证政权和平地过渡到苏维埃的最重要条件。而《关于联合内阁》的决议说：“无产阶级政党声明 凡参加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内阁的人，不管他们的愿望多么善良，都是资本家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同谋者。”^①

四月代表会议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将其转交给农民委员会支配以及将全国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的要求。代表会议把实行根本的土地改革同解决政权问题联系在一起。

四月代表会议除通过一系列决议外，还讨论了关于修改党纲的问题。列宁提出的关于党纲理论部分和政治部分的修改草案在代表会议专门选出的小组中进行了讨论。列宁提议将关于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阶段的说明加进党纲中分析资本主义的理论部分，并对最低纲领政治和经济部分中某些过时的原理进行修改。其中包括用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共和国的要求来代替议会制共和国的要求，用苏维埃来代替议会制代议机关。根据列宁的提议 通过了《关于修改党纲》的决议，决议确定了修改党纲必须遵循的方针。代表会议委托中央委员会起草新党纲草案，并将草案提交党代表大会批准。

总而言之，代表会议的全部工作都贯穿着列宁的思想。会议使党得到了巩固，使党的组织工作走上了正轨。会上还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在党处于地下状态的年代，从 1912 年布拉格代表会议以来，中央委员会没有进行过改选，而是通过自行增补的办法补充的。许多中央委员不断遭到逮捕。此次会上以秘密投票方式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他们是弗·伊·列宁、格·叶·季诺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记录）第 251 页。

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弗·巴·米柳亭、维·巴·诺根、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伊·帖·斯米尔加、约·维·斯大林、格·弗·费多罗夫。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动用了全部宣传工具来宣传四月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到处都在讨论列宁制定的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纲领。

布尔什维克党在工人、农民和士兵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各地方委员会十分注意补充和团结党的队伍。党的队伍迅速发展和扩大。在四月代表会议以后的三个月内，党组织的发展情况从以下数字中可以看得到。

彼得格勒组织 从 1.6 万人发展到 3.6 万人；

莫斯科组织 从 7000 人发展到 1.5 万人；

中部工业区组织：从 2.3 万人发展到 5 万人；

乌拉尔组织 从 1.6 万人发展到 2.5 万人；

顿涅茨—克里沃罗格矿区组织：从 1 万人发展到 1.6 万人。

在这段时间里，工人、士兵、水兵、贫农和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纷纷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有许多人起初曾站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方面，后来开始转向布尔什维克一边。

由于布尔什维克队伍的发展和壮大，布尔什维克在各级苏维埃中的代表人数也在增加。例如，3月初彼得格勒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团只有 40 人左右，到 7 月初已增加至 400 名。现在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工人部中占有将近一半席位，在士兵部中占有将近 1/4 的席位。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化过程一直在向前发展。与此同时，如前所述，布尔什维克在武装工人、组织工人近卫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按照布尔什维克的计划，工人近卫军按工厂的班组织起来，组织严密、纪律严格。总而言之，在革命和平发展的形势下，布尔什维克作好了夺取政权的各种准备。

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 革命前途的认识及其策略

四月危机期间，彼得格勒无产阶级高呼“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上走上了街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依据他们对革命前途的认识，却参加了联合内阁，心甘情愿地送给资产阶级一块社会主义的招牌。孟什维克认为，俄国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因此必须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管理国家。社会民主党人只能对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孟什维克参加联合内阁的目的正是如此。

联合政府向人民许诺加快签订和约，建立对食品生产和分配的监督，对资产阶级的超额军事利润征税，加快召开立宪会议等等。但是所有这些不过是漂亮的空话而已。生活表明，孟什维克不可能真正影响临时政府，而他们参加政府却严重损坏了自己在人们心中的威望。

1917年5月9日从国外归来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领袖尤·马尔托夫对此看得非常清楚。他像在1905年一样，认为无产阶级应该把政权让给资产阶级，但应该对他们施加压力并进行监督。马尔托夫认为，工人只有经过长期政治斗争壮大起来，成为一种不仅能够偶然地夺取政权，而且能够巩固政权时，才会自然地，而不是人为地出现一种形势，使社会民主党人变成执政党。由此得出结论：不应该进行任何过早的实验，不应该搞任何暴动，应该有计划地在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为普遍的民主和平而斗争。

但是，马尔托夫等人没能使孟什维克基本群众跟自己走。

1917年5月7—11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俄孟什维克统一组织代表会议上，策列铁里—唐恩派取得了优势。这时孟什维克队伍中已有近10万人，同布尔什维克相当。走出地下状态后，孟什维克和其他革命派一样，迅速通过吸收工人、职员、知识分子和部分士兵、军官来扩大自己的队伍。但是孟什维克队伍中根本没有实现统一。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派”在代表会议上因不满意孟什维主义的“半列宁主义”的和平主义立场而公开同官方的孟什维主义分道扬镳，而马尔托夫领导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抵制了组织委员会的选举并拒绝派自己的代表参加孟什维克中央机关报《工人报》编辑部。

尽管在代表会议上国际主义派提出批评，会议代表还是以51票赞成，12票反对，8票弃权支持孟什维克参加临时政府。他们再一次宣布在各民族享有自决权的基础上为争取没有割地和赔款的普遍民主和平而斗争。但是代表会议决议中还有一条：在国际无产阶级没有结束战争以前，革命民主派应该全力以赴地加强军队的战斗力，以便全面地保卫国家不受外来威胁。

孟什维克固执地维护临时政府越来越不受欢迎的政策。在1917年6月全俄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在俄国军队应协约国请求在西部战线发动六月进攻受挫时以及在七月政治危机^①时期，孟什维克都没有放弃支持政府对列宁及其同事采取镇压行动。只有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没有这样做，马尔托夫谴责对布尔什维克的迫害。

1917年7月政治危机以建立克伦斯基新内阁而告结束。孟什维克入阁的有A.M.尼基京 邮电部长 和马·伊·斯柯别列夫(劳动部长)。在1917年8月莫斯科举行的国务会议上孟什

^① 即七月事件 参见本书第 237—238 页。

维克支持政府的路线再次表现出来。普列汉诺夫在会上号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民族和解相互作出让步，苏维埃执委会主席齐赫泽代表“统一民主派”发表的宣言中郑重地保证无产阶级不谋求政权并准备全力以赴地组织国家的防卫工作。当时孟什维克领导人中多数人赞成同资产阶级政党组建联合政府。

1917年8月19—2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了期待已久的孟什维克统一代表大会，这是孟什维克作为“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单独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他们终于明白无法同布尔什维克一道工作。这时孟什维克队伍中共有约20万人。孟什维克的力量主要分布在高加索——4.5万人，莫斯科和中部工业区——3万人，顿巴斯——2.85万人，北部地区——1.57万人，敖德萨及其周边地区——1.05万人，基辅地区和伏尔加河流域分别有1万人等等。

孟什维克代表大会代表的社会组成情况是：工人占27%，知识分子占46%，其他为职员等。同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相比，孟什维克中工人的数量减少了，而知识分子的比重大大增加了。因此1917年9月策列铁里承认大多数无产阶级并没有跟孟什维克走。

在八月代表大会上代表146个党组织的22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立刻分成4个派别以波特列索夫为首的极端护国派以策列铁里和唐恩为首的革命护国派；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以一些拥护彼得格勒《新生活报》的人（尼·尼·苏汉诺夫等人）组成的左翼国际主义派。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力量没有实现联合：彼得格勒区联派和拥有近千人的拉林派很快转向布尔什维克；“新生活派”在秋天开始着手建立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的独立政党，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在八月代表大会上得到35%的选票从1917年9月起他们

开始在彼得格勒出版自己的报纸《火星报》提出如果党的路线背离阶级斗争和国际主义原则，他们有权批评党的正式路线。右翼的孟什维克护国派于 9 月在彼得格勒开始出版《工人思想》杂志，他们同普列汉诺夫派保持联系。普列汉诺夫派在 5 月底举行的会议上决定今后自己称为全俄社会民主党统一组织。

在统一代表大会上，策列铁里—唐恩的路线取得了胜利。大会批准孟什维克参加联合临时政府，批准了他们“保卫祖国”和开展“争取普遍和平的国际斗争”的方针。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派中央的有 16 名护国派分子（伊·格·策列铁里、尼·谢·齐赫泽、弗·伊·唐恩、米·伊·李伯尔、康·米·叶尔莫拉耶夫、安·伊·伊苏夫、列·米·欣丘克等人）和 8 名国际主义派（尤·奥·马尔托夫、亚·萨·马尔丁诺夫、谢·尤·谢姆柯夫斯基、拉·阿·阿布拉莫维奇、尼·亚·罗日柯夫等人），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当选党的主席。

后来发生的科尔尼洛夫叛乱进一步加剧了孟什维克之间的分歧。叛乱使孟什维主义的所有派别，从普列汉诺夫到马尔托夫都吓破了胆，使他们看到俄国年轻的民主政权多么脆弱。1917 年 8 月孟什维克队伍中一片混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派）中央在 8 月 31 日竟然提出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继续参加政府。至于左翼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马尔托夫清楚地反映了他们的情绪，他声称，不将国家机器交给民主派，俄国不可能赢得和平，不可能战胜经济崩溃和反革命。因此他宣布一个口号：“全部政权归民主派！”^①

但是，孟什维克中央拒绝了布尔什维克关于合作的建议。9 月 8 日，孟什维克中央已经承认愿意吸收“有资格的分子”即立

^① 参看《俄国政党历史》第 258 页。

宪民主党人参加政府。结果，孟什维克库·安·格沃兹杰夫、П. Н. 马良托维奇和 А. М. 尼基京同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参加了第三届临时政府。

马尔托夫 1917 年 9 月在民主会议上发言时要求同地方自治机关、军队组织、工厂委员会、工会、合作社、土地委员会等机构密切联系起来解决将权力交苏维埃的问题。但是，不论是大多数孟什维克，还是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没有支持这个立场。马尔托夫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抱怨道：“群众不愿意支持我们，宁愿从护国派转向布尔什维克。”^①

广大群众越来越同情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苏维埃在迅速布尔什维克化。临时政府已经丧失最后一点威信。在这种情况下，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还企图防止发生内战。比如，10 月 24 日即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开始的当天，马尔托夫要求克伦斯基立刻开始媾和谈判，将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并保证不停止军队的民主化过程。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预备议会）^②会议多数参加者和苏维埃执委会也同意马尔托夫的意见。但是克伦斯基不愿意听马尔托夫这个建议，不想掌握 10 月 25 日即将开幕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主动权。下面的问题只能靠步枪、机枪和装甲车来解决了。

1917 年决定俄国事态发展和影响各政党立场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仍在进行的战争。社会革命党人很清楚，如果革命不能

① 参看《俄国政党历史》第 258 页。

② 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于 1917 年 9 月 20 日或 10 月 3 日由民主会议决定成立，作为立宪会议召开以前俄国各政党的“代表机关”目的是诱使群众脱离革命。10 月 25 日或 11 月 7 日被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解散。

结束战争 那么战争就会扼杀革命。因此他们提出了“让全世界实现民主和平”的口号。社会革命党理论家认为 革命的俄国是肩负结束战争使命的“第三种力量”的前哨和支柱。这决定了社会革命党的主要活动方针 在对外政策中 同交战国帝国主义斗争，恢复国际；在对内政策方面，保卫和努力巩固革命的成果。社会革命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1917年5月25日—6月4日通过的《关于对战争的态度》的决议 号召各交战国人民迫使本国政府放弃掠夺性要求 开始和解的事业 同时声明 俄国民主派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掠夺性要求。代表大会提出的最近任务是 促进尽快恢复革命国际和召开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 恢复劳动者的国际团结 制定和解的条件和实现这些条件的措施 要求临时政府重新考虑和废除沙皇政府和盟国签定的秘密条约。与此同时 决定指出 只有所有交战国全体劳动人民联合起来才能实现这些任务；决议坚决反对单独媾和和休战。只要战争还在继续 必须保持“与盟国战线的战略统一”使军队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 把军队变成“能够为实现俄国革命和俄国对外政策任务而积极战斗”的力量。因此决议指出 不允许在军队中进行不服从革命政府使命的“蛊惑性宣传”。

土地问题是社会革命党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纲领中关于土地问题的提法使他们赢得了人民的欢迎。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指出 党仍然坚持自己的要求 消灭土地私有制 把土地变成全民财富，取消赎金，由劳动者平均使用土地。代表大会还指出，立宪会议应该通过包括这些原则的土地法。立宪会议通过有关法律之前 必须将全部土地转交土地委员会管辖 土地委员会应该关心使农业生产保持在应有水平上 发展土地共耕制 尽可能平均地和正确地各农户中分配土地；对牲畜和农具进行登记以便更好地加以利用；按民主原则改造土地委员会，等等。

社会革命党人农业部长切尔诺夫和马斯洛夫于 1917 年 6 月 29 日和 10 月 19 日两次向临时政府提出关于将土地交土地委员会管辖的法案 但是该法案没有被接受。

社会革命党人不仅在土地问题上，而且在其他一些社会经济问题上也与临时政府的政策有分歧。第三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 主张政府实行对生产进行调节、对贸易 对内贸易和对外贸易 和财政进行监督的政策。他们主张实行粮食固定价格 并在此之前实行工业品固定价格。他们还主张由政府调节原料分配 监督信贷、外贸、股票和证券发行、成本和价格结构 等等。但是这些主张受到 资本家部长们 的敌视。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1917 年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害怕掌权。在第十次党务会议 1917 年 8 月 上 左翼领袖玛·亚·斯皮里多诺娃建议在国内建立社会革命党一党政权（当时是最大和最影响的政党）但是这个建议未得到支持。这同该党关于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理论有关。该党理论认为，革命的目的不是夺取政权，而是通过民主途径逐渐将资产阶级排挤出政权。

社会革命党人崇尚立宪会议，认为立宪会议会解决政权问题。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 1917 年 6 月 3 日 召开）上有一段插曲。当时孟什维克首领策列铁里试图使大会相信 俄国目前还没有一个政党会说 把全部政权交给我们 请你们走开，我们来占据你们的位置。策列铁里在沉静的大厅里叫嚷：“在俄国没有这样的党！”列宁即席给予坚决驳斥：“有这样的党！”随后列宁走到大会的讲台接着说道：“他说 俄国没有一个政党会表示决心要掌握全部政权。我回答说：‘有的 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会放弃这样做 我们的党也不放弃这样做 它每一分

钟都准备掌握全部政权。’”^①而切尔诺夫则声明：“再过4个月最多5个月就要召开立宪会议了，怎么能讲夺取全部政权呢？”^②

在1917年的关键时刻，切尔诺夫作为社会革命党的政治领袖，表现得软弱无力，这对社会革命党产生很大影响。

三、立宪民主党人与反动将军叛乱

1917年四月危机之后，又发生了六月危机。俄国军队在前线六月攻势的失利，激怒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和陆海军士兵。同时前线的失败成了反动势力在国内发动进攻的借口。资产阶级认为结束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有利时机来到了。

1917年7月3日(16日)由第一机枪团带头自发的游行示威从维堡区开始，并有发展成为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起义的趋势。鉴于当时俄国革命危机尚未成熟，布尔什维克党不赞成搞武装行动。7月3日(16日)下午4时，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决定劝阻群众。但是示威已经开始，制止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7月3日夜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又同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军事组织一起决定参加游行示威，以便把它引导到和平的有组织的方向上去。当时正在内沃拉村休息的列宁闻讯后于7月4日(17日)晨赶回彼得格勒。7月4日这天参加游行示威的共有50多万人。列宁在克舍辛斯卡娅公馆的阳台上向游行的水兵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77页。

② 《俄国政党历史》第192页；《苏联简史》1972年俄文版第2卷上册第26页。

发表了演说，要求群众沉着、坚定和警惕。示威群众派代表要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夺取政权，遭到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领袖们的拒绝。军事当局派军队镇压和平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在市內好几个地方同武装的反革命分子发生冲突，死 56 人，伤 650 人。在人民意志表达以后，布尔什维克党于 7 月 5 日发表了停止游行示威的号召书。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等城市也发生了反政府的游行示威。临时政府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积极支持下，随即对革命人民进行镇压。7 月 5—6 日（18—19 日），（真理报》编辑部和印刷厂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办公处所被捣毁。7 月 6 日（19 日）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工人被解除武装。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被调出首都，派往前线。七月事变后，政权完全转入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里，苏维埃成了它的附属品，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革命和平发展时期告终，许多布尔什维克著名活动家被关进监狱。7 月 7 日《言语报》满意地指出：“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死亡 而且是突然死亡。”

1917 年夏，立宪民主党人在团结反革命力量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同社会主义者的联合执政是迫不得已的步骤，是对自己反革命意图的一种掩护。8 月 11—12 日 即克伦斯基在莫斯科召开国务会议前夕，立宪民主党召开中央扩大会议，在莫斯科的所有立宪民主党人都参加了会议。米留可夫在发言时说：在革命已经开始的现阶段，临时政府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有军人独裁才能拯救俄国。米留可夫认为，在这个独裁的第一阶段可以由克伦斯基和俄军最高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共同掌握政权，在科尔尼洛夫组织的军事压力的影响下，克伦斯基将作出让步并解散苏维埃。20 多名中央委员中只有 4 人反对军人独裁，其他人都认为军人独裁是唯一的出路。在 8 月 20 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这个意见被全体委员接受。

科尔尼洛夫加紧策划发动叛乱。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可夫同科尔尼洛夫频繁地秘密接触。米留可夫后来回忆说：“科尔尼洛夫没有告诉我他要采取行动的任何细节，但是希望立宪民主党能够支持他，哪怕以立宪民主党部长们在关键时刻辞职的形式来支持他。”在科尔尼洛夫发动叛乱的当天，立宪民主党人要制造内阁危机，使科尔尼洛夫有可能在不推翻政府的情况下根据阴谋者们的意愿组建政府，以此使国家接受新的合法政权，新政权的继任人是克伦斯基。

1917年8月25日9月7日科尔尼洛夫发动叛乱 调动第三骑兵军扑向彼得格勒。彼得格勒市内的反革命组织也准备起事。尽管事态的发展出乎意料，克伦斯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于8月26日宣布科尔尼洛夫“背叛”立宪民主党部长们仍然准时履行诺言 集体辞职。

科尔尼洛夫一面使部队向彼得格勒附近集结，一面给陆军部萨文柯夫拍电报说：“骑兵军将于8月28日傍晚在彼得格勒近郊集中。我请求于8月29日宣布彼得格勒实行戒严。”^①在实行戒严的同时，科尔尼洛夫要求把所有军政大权都移交给他。

在彼得格勒周围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反革命军队要从南面、西面和北面三路进攻首都。叛乱得到了卡列金将军的支持。他在顿河流域发动了哥萨克。立宪民主党人部长们退出政府后，克伦斯基接受了临时政府的特命全权，他解除了科尔尼洛夫最高司令官的职务，并宣布彼得格勒实行戒严。然而，他除了下达严厉命令外，再也无能为力了。北方战线的政委弗·别·斯坦凯维奇后来回忆说，科尔尼洛夫发动进攻时，“众叛亲离的克伦

^① 《1917年8月的俄国革命运动。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文件和资料）1959年莫斯科版第439页。

斯基孤零零地独自坐在彼得格勒的冬宫里。”^①

在这种危急关头，布尔什维克党为发动劳动者投入平息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斗争，为把一切革命力量聚集在自己的周围进行了大量工作。布尔什维克认为，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之间的斗争是吞噬人民成果的两种方法之间的斗争，科尔尼洛夫则是最凶恶的敌人。布尔什维克党根据当时的情况，没有号召推翻同科尔尼洛夫发生冲突的克伦斯基政府，而是集中主要力量去平息科尔尼洛夫叛乱。列宁当时解释道：“我们跟克伦斯基的军队一样，要同而且正在同科尔尼洛夫作战，但是我们的支持克伦斯基，而要揭露他的软弱性。这是差别。这个差别相当微妙，但是非常重要，决不能把它忘记。”^②

布尔什维克一面发动群众去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同时还加强了鼓动工作以实现如下革命要求：逮捕叛乱的组织者米留可夫和罗将柯，武装工人，把土地交给农民，建立工人对生产和分配的监督，实行军队民主化，释放布尔什维克，停止对革命者的一切迫害，恢复革命所争得的自由。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包括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代表，慑于军人独裁的前景，要求布尔什维克采取共同行动。他们企图把布尔什维克拉进这样的联盟，一旦加入这个联盟，布尔什维克也就不能在革命中执行自己的路线了。然而布尔什维克看出了这种联盟的一切企图，虽然不拒绝同他们进行合理的妥协。布尔什维克认为，这些妥协派同叛乱分子发生冲突，并不是要把革命从反革命中拯救出来，而是要把垮台的克伦斯基政权从科尔尼洛夫叛乱中拯救出来。因此，布尔什维克在同孟什

① 《科尔尼洛夫叛乱》（白卫分子的回忆），1928年列宁格勒版第126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16页。

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采取共同行动来粉碎阴谋时，实行了独立的具有原则性的、组织革命力量的政策。

布尔什维克党执行得到广大群众支持的路线，促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反对阴谋家方面采取了比较积极的行动。布尔什维克在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斗争中，善于领导工人、士兵、农民 其中包括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下层”从而促进了劳动者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布尔什维克巧妙地执行自己的策略，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动员群众和准备力量，以便进行决定性的打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 中央委员会发出了《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在书中解释说，科尔尼洛夫将军企图借那些愚昧无知、受他欺骗的人之手来镇压革命，临时政府对付不了将军们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势力。中央委员会号召：“士兵和工人们！在二月事变血泊中团结起来的人们，结成兄弟的联盟，向科尔尼洛夫分子表明，不是科尔尼洛夫分子压倒革命，而是革命要把资产阶级的一切反革命企图彻底粉碎，并从地球上扫除干净。”^①

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首先起来反对反革命叛乱。在各无产者区 大家都动员起来了 到处都成立了工人义勇队、赤卫队。它们是由各区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们踊跃参加赤卫队。在同科尔尼洛夫斗争的第一天，就有数千名彼得格勒工人报名参加赤卫队。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在三天内就收集了 100 多门火炮。工人们制造大炮、机枪、手榴弹 吸收了 700 多名军事教员来训练赤卫队员。各个党组织、工人委员会、

① 《1917年8月的俄国革命运动。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文件和资料 第475页）。

工会都在从事实战工作。在彼得格勒城郊 工人们挖掘占壕 设置障碍。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 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士兵和赤卫队员当中做了大量工作，这些部队的士兵们表示 他们将荷枪实弹 只要一声令下 就去保卫革命。科尔尼洛夫部队所经过地区的党组织领导革命群众奋起反抗叛乱者。

战斗的无产阶级义勇队和革命士兵的团队开去迎击科尔尼洛夫部队。铁路工人们纷纷拆除科尔尼洛夫的军用列车所要经过的线路上的钢轨；报务员们不转发叛乱者的电报和命令。数百名鼓动员潜入科尔尼洛夫部队，向那些受骗的士兵们解释事实的真相，告诉他们不是去同德国人打仗，不是消除无政府状态，因为首都一切都很平静！而是去镇压同他们一样的士兵，“制服”那些要求自由、和平和面包的工人。布尔什维克鼓动员们的号召，在前线战士的心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到 8 月 30 日 即发动叛乱的第四天 科尔尼洛夫军队中已没有一支部队同意进攻革命的彼得格勒了。资产阶级用武力扼杀革命的尝试破产了，几乎一枪未发就把科尔尼洛夫的军队阻挡住了。反革命叛乱遭到了彻底失败。

在平息科尔尼洛夫叛乱的过程中，工人和士兵的阶级意识发生了重大转变，无产阶级运动和支持它的劳动者表现出巨大的力量和觉悟。在反革命阵营中是根本没有这种情况的。资产阶级和军阀把希望寄托在进行欺骗、掩盖自己真正的目的、下达严厉的命令、凭借资本的实力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上面。由于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发动的国内战争“彻底破产

……一开始就烟消云散 没有展开任何‘战斗’就破灭了。’^①

四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准备

鉴于革命发展过程中出现突然转折，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 8 月 31 日通过了《关于政权》的决议。中央委员会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呼吁，要求它脱离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积极组织者和所有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立宪民主党人的政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于 8 月 31 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体会议上以压倒的多数票通过，9 月 5 日莫斯科苏维埃也通过了这一决议。

9 月 1 日，列宁写了《论妥协》一文。他分析了新的政治形势的特点，论证了同把持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实行妥协的可能性。这一政治行动的实质在于，布尔什维克支持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苏维埃的基础上成立没有资产阶级参加的、对苏维埃负责的政府。这个政府应当保证把各地的政权也转到苏维埃手中。布尔什维克并不希望加入这个政府，也不立即提出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但却坚持在争取实现自己纲领的斗争中保留进行鼓动自由的权利。列宁着重指出，这种妥协能够保证革命获得和平向前发展的极好机会。他说：“现在只是在现在，也许只有几天或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内，这种政府可以完全和平地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2 卷第 174 页。

成立并得到巩固。’^① 为了利用这种少有的并且极其宝贵的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为了最顺利地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这一主要目的，布尔什维克可以而且应该实行这种妥协。列宁写道：“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不可能绝对不妥协 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如果妥协不可避免）始终忠于自己的原则 自己的阶级 自己的革命任务 忠于准备革命和教育人民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事业。”^② 如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采纳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议 那就排除了国内战争的可能性 因为在当时，对得到绝大多数人民和革命军队支持的苏维埃政权的任何抵抗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又是由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社会革命党一孟什维克领导人的过失，政权和平转归苏维埃的最后机会也错过了。这些领导人宁愿同资产阶级合作也不同意布尔什维克妥协。早在 8 月 31 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拒绝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关于政权》的决议。同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又急忙支持成立克伦斯基等 5 人组成的所谓督政府（即五人委员会）这样 妥协主义者就“又滚到卑鄙无耻地勾结立宪民主党人的泥坑里去了”^③，而这些立宪民主党人却在准备新的科尔尼洛夫叛乱。列宁发表在 9 月 6 日《工人之路报》上的《论妥协》一文 遭到了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首领们的猛烈攻击。

实际上，布尔什维克从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建议实行妥协的时候起已经恢复了暂时取消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但是妥协中断以后，这个口号就变成为建立无产阶级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2 卷第 132 页。

② 同上 第 130 页。

③ 同上 第 256 页。

专政而举行武装起义的口号，因为实现它的其他道路已经没有了。革命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日益临近的社会大搏斗把一系列理论问题提到首要地位，如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前提和条件；革命民主变革同向社会主义迈进的相互关系；无产阶级对一般国家特别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态度；苏维埃的历史作用，等等。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制止帝国主义战争和消灭经济破坏的迫切任务。

在 1917 年秋，不仅布尔什维克活跃起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在积极活动。他们仍然说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他们称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是“冒险主义的”、“不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方针注定要破产。

这一时期第二国际的思想家也很活跃，考茨基等人宣扬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愈来愈由“统治的国家”变为“管理的国家”因此无产阶级没有任何必要用革命暴力来推翻它。

俄国无产阶级准备夺取政权的现实，要求在理论上解决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列宁在决战前夕写了 60 多篇文章和书信 其中有《大难临头 出路何在》、《国家与革命》、《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论修改党纲》等著作。他在这些著作中，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全面论证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规律性及其在俄国爆发的必然性，集中揭示它的首要任务。在此前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论欧洲联邦口号》等著作中，列宁就已经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进程正在准备着社会主义 在帝国主义时代 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为社会主义革命首

先在几个甚至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创造了条件。列宁这一时期的著作分析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指出国内已经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前提。

孟什维克认为俄国只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而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列宁则认为，国家的落后对于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是强大的阻力，但决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因为一个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前提是否成熟不仅取决于生产力的水平，而且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取决于是否具有对生产进行社会调节的机构。俄国则拥有银行、辛迪加、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组织这种调节生产的机构。

俄国在 1917 年前夕，虽然整个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农业及其他许多经济部门还非常落后，但它却是一个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冶金、煤炭、石油等主要工业部门已经在垄断组织中联合起来并且“社会化”了。按照列宁的说法，俄国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是整个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战争空前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而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①

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地主和资产阶级的野蛮掠夺而造成的经济破坏到 1917 年秋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大规模的物质生产面临完全崩溃的威胁。工业总产量锐减。1917 年工业产量比上年度减少 36.4%。^②生铁产量由 1913 年的 420 万吨降到 1917 年的 290 万吨^③。钢产量的缩减大致也是这样。1917 年

① 《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3 卷第 266 页。

② 《统计通报》1923 年第 14 册第 152—153 页。

③ 《苏联工业》(统计汇编)1957 年莫斯科版第 106 页。

10月 俄国南部 65 个高炉只有 33 个投入生产，平均负荷量为 65%。102 个平炉 只有 55 个投入生产。^① 原料和燃料保证部门也在衰落。到 1917 年底 顿巴斯这个主要煤矿区的采煤量低于战前 1913 年的水平，而全俄的采煤量降到 1911 年的水平。轻工业生产也在下降，日用品奇缺。破坏最严重的部门是运输部门。到 1917 年 10 月，最重要的铁路干线都呈半瘫痪状态。临时政府滥发纸币，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战争使农业遭到严重破坏，播种面积和粮食总产量缩减，牲畜头数减少，饥荒笼罩全国。甚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公开承认：“一切都遭到破坏，一切都每况愈下 供应减少 生产下降 无论花多少钱买都买不到一点东西……经济生活显然到了崩溃的边缘……”^② 劳动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陷于严重的贫困和苦难之中，他们不得不在死亡线上挣扎。

为此 列宁在《大难临头 出路何在？》一书中提出了拯救国家免于经济破产的完整的革命纲领。

同经济衰退作斗争 就其客观内容来说 是一般民主主义的斗争，它坚决要求采取对付资本家的革命措施，这些措施将为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创造条件。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来扫除一切旧的东西，在经济上革新俄国，改造俄国”^③。列宁提出了一整套经济措施。这实际上是一个详尽的、通过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对国家经济进行革命改造的纲领。

列宁提出的主要措施有国家实行监督、计算、调节生产和分配。为了保证监督的有效性，要求做到：(1) 银行国有化；(2) 辛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夕的俄国经济状况（1917 年 3—10 月）》1957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 2 分册第 142 页。

② 《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1917 年 10 月 1 日。

③ 《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3 卷第 269 页。

迪加国有化；(3)取消保护特权和资本利润的商业秘密；(4)强迫实行辛迪加化，即强迫工业家、商人和一般企业主合并为各种联合组织。^① 当时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所有这些，在资产阶级制度下，虽不意味着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实质，却能同经济破坏和饥荒进行有效的斗争。用革命手段实行上面的措施，就会使它们的意义发生重要变化。这些措施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列宁在强调指出它们的这个特征时写道：“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从垄断组织……向前进。”他接着写道：“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已经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② 列宁的重要理论结论是，在消灭所有特权、实现最完全的民主制的真正革命民主国家的条件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必然地意味着走向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银行国有化和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国有化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措施中的“新式基本措施，因为把垄断资本的这些支柱国有化，就会给垄断资本的统治以最严重的打击。

为此 必须把国家政权转归苏维埃 这是恢复和革新国家经济的杠杆，是使劳动群众的生活得到实际改善的保证。列宁特别强调指出，临时政府不能实现这些措施。他严厉批评了政府执行的经济政策，并揭露了这种政策的阶级根源。“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府，或者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政府，都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玩弄了一套官僚主义的改良把戏，连一个革命民主的步骤也不敢采取。”^③ 临时政府害怕发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238页。

② 同上第265、267页。

③ 同上第245—246页。

挥工人的独立自主精神 害怕触动私有制的“神圣性”害怕触动一小撮资本家和地主的暴利，甚至害怕大难临头。

那么摆脱大难临头的出路何在呢？结论：只有通过夺取和巩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的真正革命政权，才能找到这种出路。

这样一来，革命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重心必然要从经济领域转到政治领域。正因为如此，列宁在论证俄国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摆脱绝境的唯一出路时，特别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前提已经具备。革命使俄国在自己的政治制度方面赶上和超过了先进国家，使人民得到了战时少有的革命民主自由，激发了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就是在其他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的走向社会主义的强大推动力。列宁在提出这种形势时写道：“在用革命手段争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 20 世纪的俄国，不走向社会主义，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就不能前进。”^① 俄国劳动群众面临着抉择 或者灭亡 或者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革命阶级及其政党，以便迅速而彻底地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这是《大难临头 出路何在》的最重要思想之一。

这一时期，列宁还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撰写了《国家与革命》这部著名的著作，为无产阶级建立新型国家政权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列宁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再次证明，国家只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随着阶级的消灭，在形成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过程中将会发生逐渐走向“国家消亡”的过程，即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变为社会自治机关。他在《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准备材料中说国家发展的辩证规律是：“从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民主；从资产阶

^① 《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3 卷第 266 页。

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从无产阶级民主到没有任何民主。’^①

在列宁的理论分析中，占中心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国家的态度问题。他仔细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有关著作，着重指出了对无产阶级及马克思主义政党极其重要的结论：无产阶级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打碎和消灭资产阶级创造的压迫机器——资产阶级国家，才能彻底推翻资产阶级。^②首先必须消灭主要的暴力工具——军队、官僚机构、警察、监狱、法庭。

但是，无产阶级破坏资产阶级国家，决不是一般地拒绝国家，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无产阶级应当建立新的即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这种国家的使命就是保证建立不受资本支配、没有人剥削人现象的社会。

在革命后的一定时间内，只要社会上还存在敌对阶级，存在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表现为只是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形式。^③这个思想源出于马克思。他在 19 世纪中叶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④

列宁在评价这个发现的长远意义时写道：“马克思从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历史中得出结论：国家一定会消失；国家消失的过渡形式（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将是‘组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⑤无产阶级专政同以往某一时期当权的剥削阶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1 卷第 156 页。

② 参看《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3 卷第 142—143 页

③ 同上 第 140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314 页。

⑤ 《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3 卷第 159 页。

级专政的根本区别在于，资产阶级及其他有产阶级的专政，总是对人民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捍卫革命人民的利益的政权。

列宁在描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时揭示了它的实质：无产阶级建立的国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半国家”。^①因为它来说主要的不是暴力而是创立新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劳动组织。列宁在研究国家发展过程时，一方面指出无产阶级国家的消亡过程是长期的，同时强调指出这种消亡是必然的。一方面，消灭剥削阶级和给劳动阶级以最广泛的民主；另一方面，大大发展生产力。这两方面为使国家机关逐步丧失政治性质的职能并使它们变成具有管理经济职能的机关准备必要的前提。与此同时，列宁强调指出了苏维埃作为无产阶级政权形式的最重要意义。

此外，布尔什维克党还进行了认真的组织准备。在革命发展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空前迅速地发展起来。到 1917 年秋，它已经成了全国最有影响的政党。从走出地下状态到 4 月党的队伍扩大了 3 倍多 到第六次代表大会时扩大了 9 倍 而到十月革命前夕扩大了 14 倍。到十月革命时约有 35 万党员。先进工人在党员中仍占多数（约 60%）。可以说，布尔什维克党为革命做好了充分准备。一场革命暴风雨即将来临。

五、十月革命的爆发及其历史意义

到 1917 年秋 革命发展的主要政治结果是 劳动者对临时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3 卷第 124、147 页；《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1 卷第 161 页。

联合政府和执政党——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政策感到失望。革命群众根据自己的自由选择自觉地站到了布尔什维克方面。列宁在评述这个过程的意义时指出：“我们……根据群众选举苏维埃的经验切实地知道：9月和10月初绝大多数工人和士兵已经转到我们方面来了。我们……看出：即使在农民中联合也破产了就是说我们的事业已经赢得了胜利。”^①与此同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不得不承认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化的事实。9月底，社会革命党的《人民事业报》确认：“多数大城市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已转到布尔什维克手里”^②。《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社论也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争取到了“多数工兵代表苏维埃”^③。

劳动者转到布尔什维克一边，这就使政府和参加政府的政党失去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孟什维克不仅内部发生分裂，而且实际上失去了在工人中的影响。9月24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指出“孟什维克党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几乎已完全消失”^④。社会革命党这个所谓的农民党“口头上宣传没收地主土地，事实上却拒绝执行，因而在土地问题上遭到了破产”^⑤。社会革命党组织的普通党员纷纷同党决裂并提出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社会革命党依靠它的左翼，基本上还能影响一部分农民和士兵。例如，在改选苏维埃和士兵委员会时，一般来说，左派社会革命党是仅次于布尔什维克的第二大党。

执政党的危机 联合政府的危机 是‘上层’即各政党统治集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360页。

② 《人民事业报》1917年9月30日。

③ 《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1917年10月5日。

④ 《工人之路报》1917年10月10日。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88页。

团的尖锐危机的绝对标志。他们显然不能再按旧方式，即在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联合的基础上管理国家了。他们表现出自己完全没有能力解决国家面临的最迫切任务。

资产阶级继续执行战争政策，但是迫于日益临近的革命的威胁，资产阶级内部也在加紧讨论单独媾和的主张。资产阶级准备放弃彼得格勒，从而给革命以致命的打击。

国家和国内形势的各种事实雄辩地表明，革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转折时期，全国性的危机已经成熟并且具有空前的威力。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考虑到革命的飞速发展以及统治阶级和政党在政治上的孤立，勇敢而满怀信心地率领劳动群众去坚决战胜资本政权。

列宁当时在芬兰处于地下状态。他于9月12—14日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写了《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两封著名的信（后一封信是只写给中央委员会的），列宁在这两封信中提出了武装起义胜利的条件问题。

列宁说：“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密谋，也不是靠一个党，而是靠先进的阶级。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① 这三条结论包含了几代人的斗争经验，世界工人运动的经验，特别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俄国革命期间无产阶级的斗争教训。列宁在他十月革命前的著作中把马克思主义的起义学说提高到了新的阶段。工人阶级、农民和民族解放运动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274—275页。

斗争的性质和形式 士兵群众的政治情绪 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化，这一切构成了革命发展新阶段的特征。列宁详尽地分析了这些情况以后，得出几条基本的结论：

“现在阶级的大多数 即能够带动群众的革命先锋队、人民先锋队的大多数已经跟我们走了。

现在人民的大多数已经跟我们走了……

现在我们的党所处的地位也对我们有利……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胜利的保证……’^①

这样 在起义已经完全成熟的情况下 起义的成功就取决于它的组织方面和军事技术方面。首先要武装起工人阶级的先遣部队即它的赤卫队，并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党把赤卫队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突击力量。

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卫戍部队的革命战士，首都附近的西方战线和北方战线革命战士以及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都参加了战斗编队。布尔什维克把革命几个月来所准备的突击力量全部动员起来 组成强大的突击兵团 以便在决定性的地方、在决定性的时刻首先取得胜利。

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全国主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取得起义的胜利，对于革命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两个城市集中了俄国将近 1/3 的经过阶级斗争锻炼的工厂工人，集中了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最大的党组织。这里驻扎有最大的卫戍部队，它们与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结成了紧密的联盟。

与此同时 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也是反革命的政治中心 这里有临时政府、各资产阶级政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及军事司令部各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278页。

种军官学校、许多资产阶级—地主的组织。列宁就是根据这些情况选定主要打击方向的。

选择开始起义的时机，是对革命中的群众斗争实行战略和策略领导的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1917年7月）制定了不经号召就拿起武器直接行动的起义方针。9月中旬，起义问题已经作为党的直接实际任务提出来了。至于起义的狭义日期：开始的日子和时刻，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它“只能由那样接近工人和士兵、接近群众的人共同来决定”。^①

10月初列宁从芬兰秘密回到彼得格勒。这一时期中央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武装起义问题。列宁第一次参加了10月10日的会议。他明确地指出：“政权转移问题在政治上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应该谈到技术方面的问题。关键就在这里。”^②

十月革命前的日子里，布尔什维克党及其中央委员会集中致力于起义的军事和组织方面的工作。所采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步骤就是成立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

10月1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在内部会议上通过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章程。10月16日苏维埃全体会议批准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及其章程。10月20日军事革命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活动是在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参加委员会日常实际工作的，除布尔什维克外，还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巴·叶·拉季米尔和格·恩·苏哈里科夫。

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但是临时政府还试图扭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33页。

② 同上，第384页。

转事变的进程。它向全世界大肆宣扬所谓“布尔什维克的阴谋”，企图动员一切力量来粉碎革命。就在资产阶级政府彻底崩溃的前夕，它的首脑克伦斯基还夸口说，他准备做完使布尔什维克暴动失败的祈祷。他说：“我的力量绰绰有余。他们一定会被彻底镇压下去。”^① 陆军部长维尔霍夫斯对形势的估计与此不同，他承认他手中没有足够的军队去同布尔什维克斗争。

克伦斯基的好战狂热得到协约国使节们的支持。美、英、法各国军事使团团团长 10 月 21 日在美国红十字会会址召开的会议上，一致呼吁克伦斯基“向布尔什维克开枪！”^②

根据克伦斯基的命令，司令部加紧从前线向彼得格勒调集部队。到 10 月 24 日已经动员近 2000 名士官生守备冬宫。最高指挥部大本营在莫吉廖夫和北方战线司令部在普斯科夫）接到了要求把军队不断从前线向首都调动的严厉命令，首都实际上已处于戒严状态。反革命准备将革命淹没在恐怖之中。

但是，任何东西都已经阻挡不住群众坚定的革命步伐了。

10 月 24 日临时政府公开出来反对革命。清晨，士官生袭击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报》的印刷厂。临时政府继续调集部队，发布把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交付法庭审判的命令，已准备好进攻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军事革命委员会所在地——斯莫尔尼宫。

10 月 24 日早晨，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列宁当时还处于地下状态。中央委员会决定，所有中央委员会没有中央的特殊决定不得离开斯莫尔尼。委托军事革命委员会立即把士官生赶出印刷厂，并保证对印刷厂的警卫。利托夫团和工兵营迅速而准确地

① 《俄国革命文库》柏林版 1922 年 第 1 卷第 36 页。

② 《布尔什维克的宣传。美国第 65 届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上的听证》1919 年 华盛顿版第 779—781 页。

执行了革命司令部的命令。拿起武器夺取的政权的斗争开始了。

10月24日，彼得堡委员会通过决议：立即推翻政府，并把中央和地方的政权转交工兵代表苏维埃。

根据列宁的起义计划，赤卫队员、士兵和水兵必须保卫工厂、桥梁和涅瓦河渡口，保卫斯莫尔尼，封锁反革命的策源地，必须占领铁路车站、电话局和电报局，对它们建立切实的监督，保卫通往城市的要道，以便阻止政府调来的军事进入首都，并切断他们与前线的联系。最后，必须派精锐部队占领政府机关——冬宫、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等。起义迅猛发展。“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无线电台曾被用来转播军事革命委员会致保卫通往城市各个要道的卫戍部队的呼吁书。呼吁书指出：你们行动“要坚决谨慎，在需要的地方毫不留情。”

10月24日黄昏已经很晚了，中央还没有同意列宁走出地下状态。列宁焦急万分，晚上他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他写道：“我力劝同志们相信，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决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各族人民，只有群众，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天晚上，今天夜里逮捕政府成员，解除士官生的武装，如果他们抵抗，就击败他们）如此等等。

不能等待了！等待会丧失一切！！”

列宁继续写道：“政府摇摇欲坠，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彻底击溃它！”

拖延发动就等于自取灭亡。^①

天已很晚的时候，列宁在中央委员会联络员的陪同下，到起义的指挥部——斯莫尔尼宫。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430—431页。

列宁的到来，加速了时局和事态的发展。10月24日夜，斯莫尔尼宫频频收到胜利的消息，占领了中央电话局、市邮政总局、波罗的海车站和尼古拉车站、彼得格勒市行政长官公署等等。

列宁的起义计划迅速地、有步骤地、完全没有流血地实现了。这一点甚至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也不得不承认，他在10月25日的报告中说：“没有紊乱，而是有步骤地占领了机关、车站，进行了逮捕。任何命令也没有执行。士官生没有反抗就交出岗哨投降了……”^①

临时政府在街垒的掩护和士官生的保护下，还躲在冬宫里面，但是它的末日就要到了。它已经没有实权了。10月25日早晨，克伦斯基离开了冬宫。他乘坐挂着美国国旗的汽车跑往北方战线去了。

10月25日成了伟大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

当天发表的列宁写的《告俄国公民书》宣告：“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业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

立即提出缔结民主的和约，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工人监督生产，成立苏维埃政府，人民为之奋斗的这一切事业都有了保证。

工人、士兵、农民革命万岁！”^②

10月25日晚10时40分，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大礼堂开幕。代表大会代表劳动人民宣布革命胜利了，宣布全国政权转归苏维埃，成立第一届苏维埃政府，通过了列宁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

① 《红色文献》1927年第4期总第23期第14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页。

彼得格勒起义的枪声迅速席卷全国。

震撼世界并影响整个 20 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

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俄国摆脱战争、探索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道路创造了条件。

但是，当此书撰写过程中，十月革命的故乡又发生一次剧变 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崩溃 国家解体 东欧国家也纷纷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仍应该对十月革命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和认识。我们在客观地评价十月革命时，应该注意到以下几个重要方面。首先，列宁当时并没有想在俄国立刻实施社会主义。他在评价工人对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对银行和辛迪加实行国有化 取消商业秘密 没收地主土地和全部土地国有化等措施时指出 这些措施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 但它们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但是在“战时共产主义”实践过程中 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的确表示出某种急躁冒进情绪和乌托邦思想。第二，列宁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资本是一种国家力量 要想彻底战胜它 也需要国际范围内的工人共同行动起来”。他告诫俄国无产阶级不应当忘记，“俄国无产阶级的运动和革命仅仅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只有许多国家结成联盟 战胜国际资本 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开始我们的事业时 就把全部都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①。第三，无产阶级革命并非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预料的那样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 而是在相对落后的俄国首先获得胜利。列宁指出：“我们所以走在前面 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国家的工人能干，不是因为俄国的无产阶级比别国的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9 卷第 339—340 页 第 31 卷第 287—288 页 第 358—361 页。

工人阶级高明，而仅仅是因为我国曾是世界上落后的国家之一……我们的落后使我们走在了前面。’^① 由此决定了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列宁曾指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来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② 社会主义革命起始条件的不同，决定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历史条件对俄国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说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解决史无前例的在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这个任务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答案，只能在实践中寻找答案。列宁生前进行了“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两种实践，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苏东剧变后国际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十月革命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如果不发生十月革命，俄国会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道路，似乎十月革命之前资本主义有一个“光明的过去”，十月革命之后资本主义也有一个“灿烂的未来”。这种观点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

十月革命前俄国的情况本书已经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十月革命前西方资本主义也是如此，不仅不是“光明的”而且是“黑暗的”。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是靠残酷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获得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的。生产社会化和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4 卷第 219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4 卷第 777 页。

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导致资本主义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一方面是千百万人的贫困，另一方面是无止境的剥削欲望。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垄断组织形成，出现了金融寡头，资本超出国界，向国外扩张，争夺国外市场，并逐渐形成了瓜分世界的国际垄断同盟。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和帝国主义同殖民地国家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并导致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动用了资本主义所有先进技术发明的武器，用来反对人类本身，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总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暴露出了其反动性和腐朽性，它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遭到所有被剥削、受压迫的人民的民族的反对。十月革命之后，世界上又发生了瓜分世界的凡尔赛和约、1929—1933年的世界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都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正因为如此，才发生了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试图推翻并改变这个不平等的世界，推翻反动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十月革命乃是推翻这种制度的成功革命，是建立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的伟大尝试的开始。人民摆脱了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成了国家主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向往的国家。

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苏联建立初期的经济发展速度充分显示了新制度较之资本主义的优越性。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期间，两种制度的差别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因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有一批国家摆脱资本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世界上出现了两个阵营。

应当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大大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物质产品的增加，改变了现存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产品结构以及居民的消费结构，同时对社会经济

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作用和影响，迫使生产组织、管理体制、工作方式、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个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一系列相应变化。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看到，如果不缓和劳资关系，无产阶级革命最终会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于是不得不向无产阶级作出某些让步。在工人劳动报酬和社会福利方面采取一些措施用以缓解劳资矛盾，避免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组织通过输出资本，剥削第三世界国家，使自己在国内受到的“损失”得到补偿，使劳资矛盾转移到国外，变成民族间、国家间和地区间的矛盾。在经济管理方面，资本主义各国也不同程度地吸收了计划原则，以解决生产的无政府状况及其带来的后果。但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并没有改变，而是变本加厉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向第三世界各国输出资本，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发了横财。但是他们的自私自利破坏了世界环境，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

而战后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在经历了恢复时期的迅速发展后，开始放慢速度，扩大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这主要是因为：(1)在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中决策权过于集中，计划过死，忽视市场作用；(2)政治体制上缺乏民主，限制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发挥；(3)执政党内不同程度地存在腐败问题，脱离人民；(4)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中落伍，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5)在东欧等国家不顾具体国情照搬或强行推行苏联模式。正是这些因素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发生。

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中遇到的这些问题以及出现的这些变化，我们应该进行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但是，无论如何，20世纪初的十月革命对世界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能忽视和低估的。十月革命仍然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

第七章

国内战争时期的集中制试验

一、是立宪会议，还是苏维埃

十月革命胜利后 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工作后，国家管理权交给了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人民权力机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从此开始了建立新型国家权力机关的进程。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技术成就、管理经验给予高度重视的话，那么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国家机器则是完全否定的。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巴黎公社式的国家取而代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资产阶级的议会制、普选制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服务、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和利益的工具。列宁也认为，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本质是“每隔几年决定

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①。资产阶级的代表机构是“清谈馆”。马克思认为，作为新型国家政权形式的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②

十月革命胜利后，对立宪会议的命运问题提上日程。布尔什维克党对立宪会议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在谈到党最近的政治任务时指出，要“建立人民专制，即国家整个最高权力掌握在立法会议手里，立法会议由人民代表组成，它是单一的议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坚信，只有推翻专制制度并召集由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才能完全、彻底、巩固地实行……各种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③

1905—1907年革命时期，群众创造了苏维埃组织。列宁对苏维埃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新型的无产阶级政权的雏形。二月革命后，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掌握相当大一部分实际上的权力。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同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同一类型的政权”^④。因此，作为资产阶级政权形式的立宪会议已不再被布尔什维克党重视。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明确宣布“不要议会制共和国”。

当时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都拥护立宪会议，希望由立宪会议解决国家政权问题。孟什维克认为苏维埃不过是一个“临时的简易木房”，立宪会议才是“坚固的大厦”。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15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77页。

③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38、41页。

④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19页。

列宁认为，苏维埃具有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双重特点。无产阶级专政的现成形式——苏维埃，是由劳动者自己从下面建立起来的、以他们的首创精神为基础的政权。它不同于议会制共和国那种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苏维埃同群众的密切联系使无产阶级国家能够在阶级社会里实行最广泛的民主，获得前所未有的稳定和巩固。苏维埃有可能做到兼有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的长处，并在自己的活动中把立法的职能同执行职能结合起来。“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①但是列宁指出，苏维埃只有在夺取全部国家政权之后，才能充分发挥自己全部的天资和才能。

十月革命后，正是根据这些原则进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苏维埃两届代表大会间隔期间具有苏维埃国家最高的立法、执行和监督机关的全权。

起初，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机关是作为多党的机关建立起来的。同布尔什维克一起参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还有未退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些政党和团体的代表。他们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派、最高纲领派、乌克兰社会主义者。虽然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离开了代表大会，但是他们并没有被剥夺在苏维埃中的代表资格。所以，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失去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机会。

人民委员会是苏维埃国家内外政策的中央国家管理机关。根据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的人民委员会，是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296页。

由主管政治和经济生活各个部门的委员会（人民委员部）的主席（人民委员）组成的机构。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同，苏维埃政府最初成立时是一党政府。

由于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就没有建议他们参加政府。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派很快就效法右派小资产阶级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起初也不接受向他们提出的这种建议。他们的首领之一卡姆柯夫对于拒绝的原因作了如下解释：“向我们建议参加人民委员会的时候，我们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对事业有所帮助，……我们只是要以此表明，我们不想与一切其他的民主派结成联盟……我们曾经与布尔什维克想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意图进行过斗争，并提出‘民主派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相对抗。”^①但是后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还是参加了苏维埃政府。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如何对待立宪会议的问题。

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曾指定在 1917 年 11 月 12 日（俄历）进行立宪会议选举。布尔什维克掌权后，没有改变这个日期。但是选举结束后，布尔什维克千方百计将立宪会议开始工作的时间推迟到 1918 年 1 月 5 日即召开全俄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在 68 个选区中，布尔什维获得 24% 的选票，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各民族地区政党的代表共得 59% 的选票，立宪民主党和比立宪民主党更右倾的政党得的 17% 的选票。在立宪会议 703 个席位中，社会革命党人得 229 席，布尔什维克得 168 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得 39 席，立宪民主党人得 17 席，孟什维克得 16 席。^②

①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国家派）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1918 年莫斯科版第 43、73 页。

② 《俄国政党历史》第 318 页。

布尔什维克及其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犹豫不决，是驱散立宪会议宣布它的组成。社会革命党竞选名单有“作弊行为”，还是把立宪会议中的左派（布尔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组成革命公会。许多人根据 1789—1794 年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来看待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因此他们建议建立作为工人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机关的公会，就不足为怪了。但是，当时俄国已经有工人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即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只需通过全国的代表机关使它的权力合法化。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需要立宪会议，苏维埃例行代表大会完全可以通过俄国宪法（基本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反对工人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人，对立宪会议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希望立宪会议能从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那里把政权夺过来，并按照议会民主国家的模式来组建政权，即有一定任期的当选议员是立法权力的唯一代表者。从原则上讲，当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性：由于社会主义政党代表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立宪会议同意十月革命后通过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来组建政权，而自己只是根据国内社会革命日益发展的需要从事制定最重要的法律的工作。

社会革命党人在关于国家制度的法案中，要求保证“俄国各民族和地区的公民都有人权和公民权，公民一律平等，消灭等级，实行言论、信仰、结社、集会和罢工自由”实行“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举制”。

立宪会议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团委员会反对在俄国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经济生活。比如，孟什维克党团委员会认为，只有工业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长为生产社会化创造了必

要条件，大多数人民都关心社会主义革命时，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并不反对国家坚决地干预经济生活，国家调节生产、运输和分配，对最重要的消费品实行专卖制。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党团委员会准备在必要时用武力、拿起武器保卫立宪会议。1917年11月初，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了保卫立宪会议委员会，负责领导口头和报刊的鼓动宣传工作，支持及时召集立宪会议。

但是，多数工人和士兵是忠于人民委员会的，于是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决定驱散立宪会议。1918年1月3日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彼得格勒苏维埃和保卫彼得格勒非常委员会采取紧急措施制止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进入备战状态。通往塔夫利达宫和斯莫尔尼宫的路口都部署了保卫部队，加强了对国家机关的保卫和街头巡逻，从“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和“共和国”号装甲舰上调来“可靠的水兵”在塔夫利达宫执勤。

社会革命党和保卫立宪会议委员会领导决定尝试“在道义上解除”忠于布尔什维克的部队的武装，在召开立宪会议那一天组织和平示威，声援立宪会议。但是示威游行被驱散，死伤近100名示威者。这一天在莫斯科也发生武装冲突，保卫立宪会议委员会在莫斯科也组织了示威活动。但是在其他大城市，保卫立宪会议委员会没能组织起示威活动。

1918年1月5日16时，立宪会议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开始举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宣布俄国立宪会议开幕，然后宣读前一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①这实际上是向立宪会议社会革

^① 《列宁选集》第3版卷第386—388页。

命党多数发出的最后通牒 或者承认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 或者反对苏维埃政权。当选的立宪会议主席、社会革命领袖切尔诺夫在发言中试图缓解对社会革命党党团最后通牒式的严厉态度。他拥护普遍民主和平的思想 甚至欢迎“俄国劳动群众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意志”。他建议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宣言》作为议事日程上的问题之一付诸讨论和表决。

会议就日程问题表决。立宪会议多数派拒绝讨论《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于是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要求暂时休会,以便召开党团会议。两党领导人决定让大家随便发言 但是第二天不复会 而是宣布立宪会议解散并建议代表各自回家。复会后 布尔什维克党团代表首先发言 然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代表发言。他们宣读了退出立宪会议的声明,并退出会场。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后,会议继续按议事日程讨论 讨论了土地问题、和平问题和国家制度问题。社会革命党党团领导决定在就这些问题通过有关决议之前不散会。

1918年1月6日早晨5时 塔夫利达宫卫队长走到会议主席跟前 要求大家退场。会议主席没有服从命令 建议不经过讨论就通过社会革命党起草的一些法案。比如 通过了“土地法的主要部分”宣布废除土地私有制 通过了给交战国政府和人民的关于立即开始和谈的呼吁书和《关于俄国国家制度》的法律 宣布俄国是“民主联邦共和国 在联邦宪法范围内享有主权的各自由民族的联盟”。

1月6日(19日)人民委员会审议了解散立宪会议的问题。在会议前一天,列宁写了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提纲初稿^①。在会议召开前,列宁又在初稿的基础上写成了法令提纲。人民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451—452页

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提纲。1月6日夜，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多数票赞成，2票反对，5票弃权，通过这项法令并在苏维埃报上公布。

1918年1月10—18日，全俄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举行。会议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587名代表中只有1/10的人不属于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代表大会批准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完全赞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政策，并决定从苏维埃立法中删除有关内容，使苏维埃成为真正的立法机关。

因此，在立宪会议和苏维埃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胜利。立宪会议被取消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又受到一次打击，使他们在政治舞台的作用再次缩小。

苏维埃作为一个全新的政权机关，它的作用和效率将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巨大影响。而在十月革命后的1918年，虽然苏维埃取代了立宪会议，但是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工作刚刚开始。

二、围绕布列斯特和约的斗争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面临着消除战争的迫切任务，因为人民已被战争折磨得疲惫不堪，苦不堪言。

但是，苏维埃政府在解决和平问题时遇到很大困难。尽管1917年11月底俄奥德和俄土（土耳其）战线上实现了暂时停火，但是苏维埃政府提出的签订没有兼并、没有赔款的和约的建议，既没有得到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国（协约国）的支持，

也没有得到敌对国（四国同盟）的支持。协约国各国主张俄国继续参战，四国同盟想单独签订对自己有利的和约。1917年11月20日由布尔什维克阿·阿·越飞、列·波·加米涅夫、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A. A. 比参柯和谢·德·马斯洛夫斯基率领的苏俄代表团抵达当时德东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第一轮谈判达成在1918年1月1日前暂时停火的协议。1917年12月12日，开始第二轮谈判。德方声明不会从它占领的领土上撤军。此外，四国同盟各国还利用苏维埃政府宣布的民族自决权，要求承认乌克兰拉达的代表为享有充分权利的谈判代表。当时乌克兰的政治自决过程刚刚开始，哪种政治力量会占上风，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还是民族爱国主义的乌克兰拉达占上风，形势尚不明朗。尽管如此，苏维埃代表团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在德国和奥匈帝国之后承认乌克兰拉达的代表权。

从1918年1月9日起由外交人民委员列·托洛茨基领导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苏维埃代表团。他肩负着极其艰巨的任务：在起草和约时尽可能少地向德国帝国主义者让步，同时尽可能利用德国的领土要求和其他要求向世界舆论揭露其帝国主义的实质。作为一个出色的演说家和雄辩家，托洛茨基完成了自己使命的第二部分，但是他拒绝接受德方提出的和约条件。根据德方的条件被吞并的俄国领土将达15—16万平方公里包括波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一部分以及乌克兰人和白俄斯人居住的大片地区。苏俄代表团要求暂停谈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召托洛茨基回彼得格勒讨论业已形成的局面。他在出发之前声明，不可能按德国人提出的条件签订和约。

无论在苏维埃政府内部，还是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集团内部，在是否接受德国条件问题上，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

一开始就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认为，应该签订和约，使德国人没有借口对已经被削弱的和涣散的俄国军队恢复军事行动。许多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包括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党组织）、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以及此时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中起合法反对派作用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反对按德国人的条件签订和约。列宁及其拥护者的立场遭到主张同德国人进行“革命战争”的人组成的强大政治阵线的抵抗。这些人认为，同德国的战争最终会推动欧洲革命形势的发展。

在围绕布列斯特和约问题进行争论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内发生了分裂，主张同德国进行“革命战争”的人组成了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左派共产主义者”很兴奋地认为，由于军事失利和食品供应状况恶化，德国和奥匈帝国内部的和平主义运动已经活跃起来，有可能发展成为政治总罢工。1918年1月底，仅柏林一市就有近50万人罢工。德国政府威胁将罢工者征兵并在工业中心设立军事法庭以及进行大规模逮捕，才在1918年2月初暂时稳定了国内政治局势。正是考虑到德国和奥匈帝国内部这种一触即发的局势，托洛茨基（他不认为自己是“左派共产主义者”）主张“不妨考验一下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军队，因为他们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宣布结束战争的工人革命，另一方面是命令向这个革命进攻的霍亨索伦政府”。所谓“不战不和，解散军队”的说法就是从这里来的。苏联史学著作中经常把这种说法评价为荒唐的和背叛的言论。但是在1918年1月24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会议上，这个说法被大多数人接受，而号召按德国人提出的条件签订和约的列宁成了少数派。列宁嘲笑那些原则上否认同资本主义国家缔结和约可能性的人。客观现实使苏维埃政权不得不签订和约。

列宁指出，可以说出许许多多保卫革命的祖国之类的漂亮词句，但如果没有大炮和机枪，如果士兵们成千上万地离开前线，那就没有力量、也不可能击退德军的进攻。列宁深切地体察到穿着军装的农民们的情绪和处境，知道他们疲于战争，渴望和平。

托洛茨基回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他本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的决定行事即“停止战争 不签订和约、复员军队”。与此同时 他得到列宁一个口头建议 尽量拖延谈判 而一旦德国提出最后通牒，就必须签订和约。然而，托洛茨基没有执行这些建议 当德国人提出最后通牒后 他竟于 1918 年 1 月 28 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会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声明：“苏维埃俄国拒绝签订和约 准备停止战争 复员自己的军队。”德国方面认为，苏维埃代表团的立场实际上是撕毁停火协议。但是德国人没有立刻表态，而是等待俄国军队按托洛茨基的说法撤出前线。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却说，德国人不敢发动进攻。然而，1918 年 2 月 18 日 德国人开始进攻 在推进的过程中，实际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数万德军进逼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几天时间里，俄国失去数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数百亿金卢布的军事物资和储备。

就在德国人发动进攻的当天晚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召开会议，在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后，会议决定通过无线电广播通知德国人同意签订和约。“左派共产主义者”再次对此表示反对。布哈林退出中央，辞去《真理报》编辑的职务。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多数成员都声明不接受和约的条件。据官方报纸报道 他们认为：“俄国革命能够经受住考验 决定抵抗到底”。与此同时，德国人的要求更加苛刻。他们要求苏维埃政府同意芬兰、库尔兰、里夫兰、爱斯兰和乌克兰独立 有权自由地免税向德国输出矿石和其他原料，放弃针对四国同盟的任何鼓动宣传，等

等。列宁要求立刻同意德国人的条件，否则他将辞职。1918年2月2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例行会议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决定接受德国的最后通牒。与此同时，中央还决定“立刻准备进行革命战争”。在当时情况下（军队瓦解、经济崩溃等等）这个决定显然只是向“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口头让步。

1918年3月6—8日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讨论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这时党内已经拥有30万党员。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46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58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大会代表着约17万党员。当时相当多的一部分组织没有来得及选派代表，或者由于某些区域的部分领土暂时被德国人占领而不可能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上的主要人物是列宁和布哈林。在对待和约和进行反德“革命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上，他们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代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中承认“俄国在历史上进行解放的、卫国的和社会主义的战争不可避免性”，但是又承认“鉴于我们没有军队，前线上士气沮丧的部队已经疲惫不堪……须利用一切即使是最短促的喘息时间”^①。现在进行这种战争是不合适宜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投票反对这个决议，认为和平喘息时间给国家带来的好处，同布列斯特和约给无产阶级革命和俄国经济带来的损失，是不能相比的。俄国失去了乌克兰的粮食和煤炭。“左派共产主义者”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并声明有宣传自己的观点及在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中建立自己派别的权利。

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所造成的政治影响是巨大的。和约的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520—521页。

签订使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政治同盟破裂，成了1918年7月6日事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刺杀德国驻莫斯科大使米尔巴赫，以及此后发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的前奏。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加强了德国帝国主义的经济和军事战略潜力的确不同程度的阻碍了德国和奥匈帝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与此同时和约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也产生了影响战争的结果不是像俄国“革命战争”拥护者所期望的那样爆发欧洲革命，而是一个帝国主义集团（英法）战胜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德奥）。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使德国受到的掠夺和蒙受的耻辱并不亚于布列斯特和约对俄国的耻辱（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将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 萨尔煤矿归法国所有 德国的殖民地由英、法、日等国瓜分 德国向美、英、法等国交付巨额赔款 德国承认奥地利独立 限制德国军备 把莱茵河以东 50 公里的地区划分为非军事区。此外 苏维埃俄国遵守布列斯特和约的各项条款 而德国方面则不断破坏这些条款 这使苏维埃政府在部分公众眼中成了“民族背叛的政府”。最后 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被占领使俄国的国民经济实际上处于瘫痪。

那么，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呢？从军事观点看 情况是明朗的 德国军队由于没有遇到强大的抵抗 会占领更多的领土，给俄国经济造成更大的物质损失。由于德国人向彼得格勒方向进攻，1918年2月，苏维埃政府被迫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德国人可能还要向东推进，苏维埃还可能失去一个又一个社会基地，即工业中心和城市无产阶级。由于其他政党的活动日益活跃，每个政党都有可能在群众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中夺取政权，苏维埃政府被推翻和自然垮台的危险不是不存在的。当然，群众民族解放运动将对德国占领军给予重创。这将有助于德国社会主义者以革命方式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

总而言之，有可能出现另一种发展结局，国家有可能出现另一种前景。

列宁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为保住苏维埃政权而吞下了布列斯特和约这颗苦果。他甚至为此准备作出更大的牺牲。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以后，德国人继续奉行扩张政策。1918年5月6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苏维埃俄国的国际形势。会议决定继续向德国人让步，同时“全力以赴地保卫乌拉尔—库兹涅茨克地区，以防德国人和日本人”，立刻将包括国家有价证券印刷厂在内的所有重要设施向乌拉尔地区疏散”。托洛茨基回忆说，作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担心德国人进攻莫斯科。当时列宁已经准备“继续东撤，撤到乌拉尔……库兹涅茨克煤田蕴藏着丰富的煤炭。我们建立乌拉尔—库兹涅茨克共和国，依靠乌拉尔的工业和库兹涅茨克的煤炭、乌拉尔的无产阶级和从莫斯科、彼得堡带来的那部分工人……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还可以东撤，撤到乌拉尔以东，即使撤到堪察加，我们也要坚持”。^①

由于列宁的决心和勇气，苏维埃政权终于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机，站稳了脚跟。1918年7月10日，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红军》的决议。决议提出实行普遍兵役制，并决定动员不同年龄段的工人和农民入伍。代表大会指出，必须在政治委员的监督下广泛利用旧俄军官中的军事专家的经验 and 知识，政治委员是“红军和整个工农政权紧密联系的维护者”，“纯洁的革命者”，“为无产阶级和农村贫民的事业而斗争的坚强战士”。到1918年9月底，红军已有80万人，组建了40个师，合计10个集团军，建立了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

^① 列·托洛茨基《论列宁》1924年俄文版第88—89页

1918年11月10日，传来了德国爆发革命的消息，资产阶级容克政府垮台，威廉二世被推翻。德国也像俄国一样，出现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实际上同临时政府分掌政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苏维埃政府废除了布列斯特和约，要求立即将德国军队撤出前俄罗斯帝国的领土。德国军队匆忙从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和波罗的海撤走。

实践表明，列宁主张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立场是正确的，同时充分显示了他所具有的无产阶级战略气魄和胆识。

但是，围绕布列斯特和约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布尔什维克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这对后来俄国政治舞台政治力量的变化产生了影响。

三“战时共产主义”实践与契卡的活动及其影响

德国爆发革命，布列斯特和约被废除。但是，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期待已久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举进攻的时刻并未到来。协约国各国（英、法、美、意）千方百计阻止苏维埃共和国加强其国际国内地位，于1918年11—12月出兵在北部（摩尔曼斯克、阿斯特拉罕）和南部（新罗西斯克、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尼古拉耶夫、赫尔松）登陆。与此同时，他们对邓尼金、克拉斯诺夫、尤登尼奇和米列尔将军指挥的白卫军给予大量的财政和物质技术援助，使他们能够加强现有的军队和组建新部队。美国也援助高尔察克领导的西伯利亚政府，协约国各国政府承认高尔察克是全俄国合法的“最高统治者”。残酷的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开始了。

为了同国内外敌对势力作斗争，苏维埃俄国变成了一个军

事营垒，一切为了战争的需要，组织经济的办法亦发生了变化。国家实行粮食贸易垄断，收缴一切余粮，禁止私人粮食买卖。在工业方面，加速实行国有化，不仅大工业，连中小工业也收归国有，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生产资料，提高劳动生产率，把工业品集中在国家手里。整个国家机构实行严格的集中化。这便是著名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当时，国内经济形势非常严峻。其实，早在十月革命前经济已经开始崩溃。十月革命胜利后，尖锐的社会问题不可能立刻得到解决，由于军事订货剧减和许多大企业停产，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下降，出现大规模失业，不满情绪与日俱增。1918年4—5月，大工业中心和西北地区、中部工业区和乌拉尔各消费省出现粮食危机。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经常出现面粉储备只够2—3天的情况，迫使当局削减已经很少的最低食品配额。出现粮荒的原因是：由于德国的占领，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停止向苏维埃共和国供应粮食；旧的粮食采购机构已经不存在，而苏维埃领导的采购机构尚未开始工作；运输业混乱不堪，铁路运载能力锐减。主要原因是工业品价格太贵，不能刺激农民按临时政府时期规定的固定价格出售农产品。苏维埃政府想用实物（鞋、布匹、五金制品等）同农民交换粮食，但是这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和良好的经济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城市居民不致饿死，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可能唯一现实的决定：依靠工人专门的武装队伍和农村贫农委员会（贫委会）强行征收余粮。根据1918年夏天粮食人民委员会机关颁布的命令，征收余粮的工作（理论上）将按照如下办法进行：征粮队来到一个村子，召集农民和从前的前线战士开会，让他们选出一个由5—7人组成的委员会，赋予该委员会全权并发给它20—50支枪。然后开始进行挨门挨户

地仔细收缴武器和粮食 命令粮主在 3 日内将自己的全部粮食运到附近的收购点，凡销毁或隐藏不交者，以叛国罪就地处决。粮食应按固定价格上缴 收缴的粮食先满足农村贫农 无偿地给他们一定数量的粮食。征粮队视情况而定，在当地留下 30—50 人，然后去另一个村子继续用这个办法征粮。对武装抵抗者 征粮队就地予以处决。

这种做法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和顽强抵抗，包括武装抵抗，同时也使农民和城市工人的关系紧张起来。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对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府的粮食政策提出了严厉批评 他们认为 这种做法只能加剧社会紧张局势，使国家陷入内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尤其反对建立贫委会。当时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农村苏维埃中占多数。1918 年 3—7 月 在 31 个省的 96 个县级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代表总数的 1/4。^① 当时他们无疑有可能争取到大数代表的支持。成为多数派党，因为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和威信由于国内粮食危机而开始下降。

那么，当时布尔什维克的政敌有其他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吗 既有 又没有。说有办法 是因为他们提出的经济措施 商品交换，实行灵活的价格，对向国家交售粮食的人实行物质鼓励 在采购粮食方面给合作社更大的自主权和优惠 等等) 比强制征粮更有效。之所以说没有办法，是因为上述措施不可能收到强制办法带来的快速效果，不可能在短期内装上一列车粮食发往指定地点，如莫斯科或彼得格勒。

当时布尔什维克党正在经历最尖锐的困难时期，党内状况也很严峻：“左派共产主义者”在闹分裂 多数党组织因党员干部

① 《俄国政党历史》第 400 页。

进入国家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而受到削弱。1918年5月22日《真理报》发表的中央指示信中谈到了党内的这种状况 号召党组织在目前的困难时刻加强自己队伍内部的纪律和团结。两天后，《真理报》发表的列宁在《论饥荒 给彼得格勒工人的信》^①中再次强调指出了这一点，并指出苏维埃政权有被推翻的危险。

5月29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又向党员发出一封信，再次指出党目前面临的危机“非常非常严重”党员人数在减少 党员质量在下降 党内冲突增加 党的机构的完整性受到破坏 党的行动统一不复存在；一向严整的纪律性被削弱 党的工作全面下滑 组织在解体。

6月15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格·季诺维也夫通报西西伯利亚、乌拉尔和欧俄东部面对捷克斯洛伐克军^②和右派社会革命派人联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形势时说：“我们被战败了 但是我们不会屈服……我们宁愿同敌人同归于尽”。

了解当时俄国国家和执政集团面临的危机，可以使人更好地理解苏维埃政府的行为逻辑。

当时军事化的管理方式非常普及，征粮队虽然隶属于“民政”部门——粮食人民委员会，但却是一种准军事编制。党组织本身也在“军事化”向党员发放武器、服装等物品。

国内战争时期，全俄肃反委员会对于贯彻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起了巨大作用。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成立于1917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334—341页。

② 捷克斯洛伐克军是俄国临时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在俄国建立的军队，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俄军俘虏的奥匈帝国军队中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组成。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允许该部队开往东方 绕道海参崴回欧洲 该部队在英法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同自卫分子和富农在伏尔加河中游和西伯利亚一带发动武装叛乱。1918年9、10月，叛乱被平息。

年 12 月。1917 年 12 月 6 日，人民委员会听取了“关于全俄范围内政府机关职员罢工的可能性”问题的报告，决定“委托捷尔任斯基同志组建一个特别委员会，以制定镇压罪恶总工行为的办法”。^①于是成立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总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成立之初，主要任务是同总工工作斗争。列宁在契卡成立时给捷尔任斯基写的便条中，谈了契卡同反革命、总工、饥荒和酗酒闹事的组织者斗争的庞大计划。但是列宁当时没有提到对反革命分子施行恐怖手段。按照列宁的想法，对反苏维埃政权的最严重犯罪所采用的惩罚手段只有监禁和罚款。

契卡的任务是调查和肃清反革命阴谋活动，把总工者和反革命分子送交革命法庭审判，制定同总工和反革命斗争的必要措施。契卡有很大权力。契卡的惩罚措施有“没收财产、剥夺配给证、公布人民的敌人的名单”等等。契卡最初只负责搜查和预防犯罪。侦查和起诉由革命法庭的侦查委员会负责。但是，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1918 年 2 月肃反委员会获权就地决奸细和破坏者。契卡最初没有针对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敌人行使这个权利，但是从 1918 年 9 月起，它开始对政治敌人使用这个权利。各地也成立了肃反委员会。1918 年上半年已有 40 个省和 365 个县成立反肃反委员会。

1918 年秋，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白色恐怖笼罩全国。8 月 30 日，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领导人莫·乌里茨基在彼得格勒被杀害。当天社会革命党妇女范·卡普兰刺伤列宁。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居民书：“工人和农民将以对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大规模的红色恐怖来回

^① 《全俄肃反委员会历史文件集》1950 年莫斯科版第 72、78 页。

答工农政权敌人的白色恐怖。”^①

此后，恐怖手段成了对敌斗争的主要手段。但是，在国内战争和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时期（在落实社会经济措施（从征粮到普遍劳动义务制）时，也不适当地采用了恐怖手段。尤其是契卡机关和军事法庭不经审判和调查，单凭怀疑某人参与“反革命活动”，就判处死刑，而且不许上诉。受到迫害的不仅有反革命分子，还有那些不同意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其他政党党员，甚至普通群众。这种做法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来苏联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消极影响。

由于布尔什维克采取“战时共产主义”措施，粮食征购工作有相当进展，1917—1918年度征购粮食4700万普特，1918—1919年度达10800万普特，1919年度上升到21220万普特，1920—1921年度提高到36660万普特。所征集的粮食主要用来满足军队需要。1918—1919年除供应部队外，粮食人民委员会只能满足国内粮食需要的40%，居民所需其他食品的供应量更少。1919年和1920年初，城市居民凭证领取的食品只是他们实际需要量的20%~25%。其他商品也都主要或全部用于军需。1919—1920年，有40%的棉布拨给军队，其他的布匹用于军需的占70%~100%，男鞋占90%，糖占60%，烟占100%。^②由于采取这样的措施，苏维埃国家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保卫了苏维埃政权。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措施即使在当时也遭到了农民的反反对，各地不时地发生农民骚动。

列宁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验教训时，除强调实施这一政策的特殊条件和这一政策对于苏维埃国家的胜利所起

① 《全俄肃反委员会历史文件集》第179—180页。

② 格·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苏联经济建设的十年（1917—1927）》1928年莫斯科版第67页。

的积极作用外，还坦率承认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实施这一政策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及头脑中存在的乌托邦思想。

列宁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①这一时期，包括列宁在内的布尔什维克党主要领导人都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想法，认为可以比较快地消灭商品货币关系，从而更直接地过渡到完全的产品分配制度。1918年8月，列宁在为俄共八大拟定的党纲草案中指出：“在分配方面，苏维埃政权现时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目的是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统一的消费公社网中，这种公社能把整个分配机构严格地集中起来，最迅速、最有计划、最节省、用最少的劳动来分配一切必需品。”又指出：“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为消灭货币做好准备，首先是以存折、支票和短期领物证等等来代替货币，规定货币必须存放在银行等等。”^②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写的著作对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前景过于乐观，想法过于简单，有不少空想、幻想成分。虽然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对自己这一时期的思想进行过理论反思，但是他这一时期的许多论述仍然被后人作为经典运用到社会主义实践中去。

“战时共产主义”原则并不是共产主义原则，它是战时特殊条件下组织国家经济生活的办法，一种在同样情况下任何国家都可以采取的办法。把“战时共产主义”原则当作共产主义原则，这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曾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影响世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76页。

②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748、749页。

界社会主义实践。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 布尔什维克党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尤其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分歧和斗争更加尖锐起来。

四 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摩擦

国内战争爆发后，苏俄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和政治党派的立场又一次面临考验。立宪会议被解散后，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关系更趋紧张。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度处于非法状态。例如，1918年6月16日苏维埃政府宣布两个星期后开始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此前进行地方苏维埃选举 但是不允许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参加。

事实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很难同布尔什维克对话，因为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及其代表的苏维埃政权有不少“犯罪”行为。1918年夏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雷宾斯克、穆罗姆、雅罗斯拉夫等地组织很多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地方武装暴动。

1918年8月30日，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开枪把列宁打成重伤。尽管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中央千方百计证明自己没有参与这些恐怖活动并决定将有关人员开除出党，但是并未改变布尔什维克对他们的态度。

然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毕竟是布尔什维克最强劲的政治对手。为了分化反政府的各种社会主义政党，防止白卫分子在立宪会议问题上同他们联合起来，布尔什维克领导决定向从前的政敌作某些让步 只要他们改变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 他们就可以合法活动。

孟什维克首先接受了这个条件。1918年10月17—21日，

孟什维克中央通过决议，承认“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历史的必然”。尽管孟什维克中央发表《告所有真正的革命者》书，呼吁他们“坚决彻底地同无产阶级断绝关系，无条件地反对外国强盗的干涉”。

根据这种情况，1918年11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指出，孟什维克及其领导中心已经放弃“同俄国和外国资产阶级政党和团体结盟”。因此苏维埃政府决定：“认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6月14日决定中有关孟什维克的部分不再有效”。^①与此同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出，此决定“不适用于那些仍然勾结国内外资产阶级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孟什维克”。

社会革命党的合法化过程比较复杂和困难，因为该党领导人中有不少人反对同布尔什维克和解。1918年12月5日社会革命党某些中央委员会在乌法开会，决定“停止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斗争，发动所有民主力量反对高尔察克叛乱”。但是，1918年12月10日社会革命党中央通过决议，认为上述决定是错误的，警告党员“千万不要因为反动派在西伯利亚取得胜利而去同布尔什维克和解”。决议还指出，必须在两条战线上开展斗争，“既反对西伯利亚反对派也反对布尔什维克反对派”。1919年2月8日，苏维埃俄国领土上的社会革命党组织在彼得格勒召开代表会议，会上社会革命党中央在关于同布尔什维克和解问题上的立场再次动摇。社会革命党代表声明，他们反对“用武装斗争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做法”，认为协约国各国以消除无政府

^① 1918年6月1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定，指责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组织“反对工人和农民”的武装暴动。这表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作为合法政治组织的时代已开始完结。决定指出：“把社会革命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的代表开始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建议所有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把这些派别的代表驱逐出去。”

状态为名干涉俄国内政的做法“是对俄国劳动阶级利益的致命威胁”¹⁰，坚决拒绝同资产阶级政党结盟和联合”。代表会议指出，党的主要任务是“克服城乡劳动群众的冷漠和涣散，把他们联合在过去的阶级组织中。劳动人民只有团结起来和组织起来才能捍卫自己的利益，抵抗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反民主政策，切实防止反动派的复辟行为”。会议建议社会革命党党员“积极参加工人和农民代表苏维埃选举运动，为恢复民主自由、增加工人阶级在苏维埃中的代表名额而斗争。

苏维埃政府认为，社会革命党的这个态度符合苏维埃宪法原则。1919年2月2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对愿意执行1919年2月8日社会革命党代表会议决议的社会革命党人，不使用1918年6月14日通过的决定。决定允许他们“参加苏维埃工作”，命令苏维埃政权的行政和司法机关释放在押的社会革命党人。

但是，那些反政府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活动并未完全合法化。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地方机关没有执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合法化的决定，仍千方百计阻止他们利用出版、言论和集会自由反对苏维埃政权。

事实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没有同苏维埃政权，同布尔什维克和解，尤其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高尔察克被击败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地方组织曾试图建立由自己控制的行政权力机关。

这一时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纲领和策略也作了某些修改。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使俄国政治和经济生活发生重大变化。对广大劳动者来说，苏维埃政治制度比建立在普遍、平等和无记名选举制、三权分立、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基础上的共和民主制更具有吸引力。通过苏维埃这种群众

政治组织形式 俄国实现了大规模的土地革命 废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其他形式的土地私有制。几乎所有耕地都转归农民协会管理。农民协会根据平均主义原则、地方劳动定额和消费标准、以及农户间土地分配传统来使用土地。在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领导下 俄国还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 取缔了私人的和股份制的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公司，将公司财产和公司所有者在私人和国家银行的存款收归国有。国有化的工商企业最初交工会管理，后来又转交专门成立的国家机关—经济委员部、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各种跨部门委员会管理。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作为主张社会主义选择的政党，不能不承认消灭土地私有制和工业、商业、运输业中主要生产资料的大私有制的合理性 他们看到 主要生产资料国有化同苏维埃制度一样，是一种历史现实。他们应根据自己的社会主义观把这个现实反映在自己的纲领性文献中。

1919年6月18—21日，社会革命党召开第九次党务会议。此前，切尔诺夫起草了社会革命党纲领修改意见。切尔诺夫认为 旧的自由的私人资本主义正在变为民族组织的、由国家保证和控制的资本主义 变为超资本主义 应该限制资本主义 即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创造性 抑制它的破坏性 在资本主义不能发挥组织作用的农业等部门，采取措施保证劳动农民按照平均主义原则顺利发展，实行土地社会化，对过多使用土地者加强征税 实行级差地租 保证劳动农户走社会化的道路 鼓励从小经济向大经济过渡 逐渐实行消费合作化 调整国家供应和分配活动 不断扩大国有的、地方自治局的和市政的经济 削减资本主义经济 消灭资本家的工厂专制主义 发展工厂立宪主义 等等。党的第九次党务会议基本上肯定了这些观点。后来，切尔诺夫把他的观点概括为“建设性的社会主义”。

1919年7月17日，孟什维克中央也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经济纲领。主要内容有：将地主和国有土地分给农民集体或个人使用；取消贫农委员会；公平地分配国有农具和种子储备；取消现行的粮食专政制度。建立以下列原则为基础的新制度：(1)国家按合同价格购买粮食（广泛实行直接的商品交换）以低价向城乡贫困居民出售粮食，国家对差价进行补贴。国家通过自己的代理机关、合作社或私商按代购代销原则采购这些粮食。(2)在产粮省按生产成本向较富裕的农民征收一部分余粮。(3)由合作社和工人组织采购粮食并将采购到的粮食交给国家粮食机关；在国家掌握大工业企业的情况下，允许按租让制原则使用私人资本，但必须有助于改善、扩大生产和降低生产成本。彻底放弃小工业的国有化；国家调节最重要的大众消费品；除少数专门规定的专卖商品（如药品等）外，允许合作社和个人自由经营。改善信贷制度，以保证商业、工业和农业领域的个人积极性；同投机和商业欺诈行为作斗争；工会完全独立于国家机关；根据消费品的物价指数提高工资和规定最低工资。撤销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

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孟什维克的社会革命党人同布尔什维克的分歧。他们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时共产主义”措施。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实行战时动员式措施事实上并没有取消传统的买卖关系和货币流通。这些关系仍然秘密地和半公开地存在，并且不仅对居民的粮食和工业品供应（城市居民消费的粮食有一半是在“黑市”上购买的）而且对国有企业的原材料供应，都产生很大影响。布尔什维克政权采取各种措施同这一现象进行斗争：关闭地方市场，逮捕和处决投机商人，在铁路和其他运输干线上设置“拦截队”以防止“小贩”贩运商品，但效果甚微。1919年1月11日，孟什维克中央委员、著名历史学家尼·亚·罗日柯夫写信给列宁说：“请不要对任何一种食品、甚

至粮食实行贸易垄断。供应工作可尽力而为之，但是应该允许进行自由贸易，请命令所有地方苏维埃撤销所有关于输出输入的禁令 解散所有拦截队……不应在 20 世纪把国家变成一个中世纪封闭的地方市场的大杂烩。”社会革命党人 B.K. 沃尔斯基曾建议重新研究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的非司法机关的权限问题，主张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权限限制在事先调查的范围内，建议给拥护苏维埃政权纲领的政党以行动自由。沃尔斯基特别谈到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他指出：“劳动农民过去和现在都是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生活的，显然，任何强制措施，任何警察机关的措施都不可能使政治组织代替商品生产”。因此沃尔斯基强调指出，必须用实物税代替农产品征集制。^①

由于国内战争的形势和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关系，他们的意见没有被重视，对于反对派社会主义政党的批评，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的总结发言中指出：“其实这里丝毫没有社会主义的气息”人们“又向我们宣传资产阶级的旧观点”。列宁认为，不镇压从商品生产中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 就不可能有任何“纯粹的”民主。他说：“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一个农民家里有几百普特的余粮，不肯贷给工人国家救济挨饿的工人，而要拿去做投机生意——这是什么呢？这不是资产阶级吗？资产阶级不是从这里产生的吗？”^②

在以后的事态发展中，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都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真正和解的希望越来越小。值得指出的是，布尔什维克在军事成绩的鼓舞下越来越充满信心，相信自己政策的威力和正确性，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越来越

^① 参看《俄国政党历史 第 340—341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7 卷第 398、401—402 页。

显得悲观 充满失败主义情绪。

但是国内战争结束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弊端显得越来越突出，工人和农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农民暴动事件不断发生。形势迫使布尔什维克党调整自己的政策。

五、积极参政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及其命运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俄国政治舞台上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们是唯一与布尔什维克进行过认真合作和联合执政的人或政党。

左派社会革命党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在 1917 年底 但是从社会革命党中分裂出来的过程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了。作为社会革命党中的国际主义派，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并在战争期间进行了大量的反战宣传工作。在对战争的态度上，他们同中央有严重的分歧，他们不是“主战派”而是“主败派”。战争年代 他们参加了协约国社会党人伦敦代表会议（1915 年）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1915 年）和昆塔尔代表会议（1916 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因进行反战宣传活动曾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

二月革命以后，社会革命党中的左派同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密切起来。在 1917 年 9 月的民主会议和预备议会^①上 左派社会革命党都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在这一时期，左派社会

^① 民主会议即全俄民主会议，1917 年 9 月由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领导集团召集。预备议会是这次会上产生的“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10 月 25 日（11 月 7 日）被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解散。

革命党人领袖之一斯皮里多诺娃曾声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对政权的态度同布尔什维克一样，认为唯一可以挽救俄国的办法是将权力转交苏维埃”。9—10月，地方上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开始同布尔什维克合作。他们还在军事革命委员会^①中合作。中部地区有41个军事革命委员会，在其中37个军事革命委员会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布尔什维克是协同行动的。值得指出的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②主席就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巴·叶·拉季米尔。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诚恳地建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与执政。结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及其常设委员会中获得了1/3的代表资格和名额。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按平等原则共同承担了全俄执行中央委员会最重要的工作机构即各局的领导工作。比如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和B. A. 阿尔加索夫领导外埠局，弗·沃洛达尔斯基和И. К. 卡霍夫斯卡娅领导鼓动局，莫·乌里茨基和普·普罗相主管民族问题。玛·斯皮里多诺娃领导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农业部。

众所周知，布尔什维克主张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的统一，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则主张分权原则并一贯主张实行议会制，要求人民委员会在重大问题上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1917年12月中旬以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向政府进行了下列质询：10月27日——关于军事革命委员会违反公民自由，占领彼得

- ① 军事革命委员会是十月革命期间为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各地方组织领导成立的，附属于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战斗机关。
- ② 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是十月革命期间成立的第一个战斗司令部，由彼得格勒苏维埃于1917年10月12日（25日）成立，同年12月5日（18日）撤销。

格勒市杜马；11月4日——关于未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预先讨论和批准颁布若干法令；关于查封许多报纸；11月14日——关于在立宪会议选举运动中苏维埃报刊进行亲布尔什维克的片面宣传；11月21日——关于未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审理和批准颁布人民委员会关于解散彼得格勒杜马的法令；11月24日——关于逮捕立宪会议中央选举委员会成员；关于迫害报刊；11月27日——关于逮捕莫斯科粮食组织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苏维埃代表；12月1日——关于逮捕立宪民主党领袖；关于粮食工作、运输工作状况和国内工业生产下降问题；12月7日——关于同中央拉达（乌克兰）冲突的原因和同中央拉达谈的进程。

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询，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波德沃伊斯基、粮食人民委员施利希特尔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最高总司令克雷连柯不得不出面给予答复。答询通常都伴随着激烈的辩论。11月4日和21日两次质询过程中，甚至提出了对政府的信任问题。虽然布尔什维克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占多数，但是作为执政党不能不考虑反对派的意见，结果释放了一些被逮捕的人，允许一些被查封的报纸重新出版，组织有关人民委员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报告工作。

在联合执政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也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作出过一些让步。在组建联合政府时，根据两党达成的协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领导下列人民委员部：俄罗斯共和国国有产业人民委员部（费·亚·卡列林）、农业人民委员部（安·卢·柯列加耶夫）、邮电人民委员部（普·佩·普罗相）、地方自治人民委员部（弗·叶·特鲁托夫斯基）、司法人民委员部（伊·扎·施泰因贝格）；B. A. 阿尔加索夫和 A. И. 布里利安托夫还获得“无任所人民委员”待遇，在有关部务委员会工作，阿尔加索夫在内务人民委员

部，布里利安托夫在财政人民委员部；他们都出席人民委员会会议并拥有表决权。

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着一些非常重要的部门。唯一例外的是俄罗斯共和国国有产业人民委员部，这是一个因人而设的建制，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来说，不过是在政府会议上多了一票。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积极地、富有建设性地参与执政，参加几乎每日举行的人民委员会会议。尤其是阿尔加索夫、特鲁托夫斯基、普罗相和施泰因贝格，表现出特别积极的工作热情。在联合执政的不长时间内，特鲁托夫斯基签署了 41 份政府法令，阿尔加索夫签署了 17 份，普罗相签署了 14 份，如此等等。这只不过是 1917 年 12 月至 1918 年 3 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人民委员参与制定的政府法令和决定的一部分。

当然，联合执政过程中并不是没有摩擦。但是双方都认为工作得很和睦。这种和睦关系当然也反映到两党关系方面，当时左派社会革命党内部曾热烈讨论将两个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联合起来的问题。

但是，批准同德国签定的布列斯特和约给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的顺利合作以沉重的打击，甚至是致命的打击。此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积极支持俄德谈判进程，并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俄国代表团。但是，事实表明，他们主张绝对国际主义，不允许单独媾和，认为单独媾和会推迟世界革命到来。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 1918 年 3 月 14—16 日止，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党团投票反对批准和约并从政府中召回自己的人民委员。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人民委员会，但是仍然留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等机关。到 1918 年夏，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由于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粮食政策，双方的矛盾再次激化，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浪潮也再次掀起。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坚决反对《关于粮食专政》和《关于贫农委员会》的法令。首先，他们作为“纯粹民主派”不仅反对粮食专政，而且反对任何专政。第二，他们反对粮食专政法令中所体现的管理粮食事业的集中制思想，主张非集中化，让地方苏维埃实行粮食政策。第三，在关于粮食专政的法令中，不仅讲到“农村资产阶级”、“富农”，而且还讲到所有“粮食持有者”。这使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非常气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拥护反对富农的斗争，但是担心这一斗争会打击到中、小农民，因为法令中要求所有“粮食持有人”交出粮食，并宣布“所有拥有余粮和不将粮食运到粮食收购站的人……是人民的敌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主张实行按收入来源区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路线。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根据自己的阶级理论，不承认农村贫农是一个阶级范畴，因此他们对“贫苦农民委员会”持否定态度，认为把农村贫民同其他阶层、同劳动农民对立起来是没有意义，甚至是粗暴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认为农村贫民具有创造精神，他们称“贫苦农民委员会”是“痞子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有一定的正确成分。的确，当征粮队进村时，引发了农村的暴力事件，苏维埃遭到破坏，中小农民离开了布尔什维克。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承认，由于苏维埃工作人员没有经验和问题的复杂性，“对富农的打击往往落到了中农头上”。^① 1918年底，贫苦农民委员会停止活动。

随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俄共（布）矛盾的加深，1918年6月28日至7月1日，左派社会革命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对俄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786页。

共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代表大会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指出：“实行高度集中制，用专政代替官僚机关，成立不受地方苏维埃监督和领导的征粮队，搞乱了农村的阶级关系”。卡姆柯夫在总结发言时号召“再次进行武装起义……以恢复被践踏的革命成果。我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这场斗争中将起主要的和决定性的作用。世界革命将由于我们进行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起义而爆发”。^①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认为，1918年春夏布尔什维克采取的那些不受欢迎的措施都是由于德国压力的结果。于是党的上层越来越认为有必要恢复“中央恐怖活动”。6月24日党中央决定“认为可以针对德国帝国主义的一些重要人物组织一些恐怖活动”。实际上，这里指的是刺杀在乌克兰的德国占领军司令埃赫根和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中央对此作了周密部署，试图以此破坏布列斯特和约，甚至引发世界革命。

7月6日，德国驻俄国大使米尔巴赫被勃留姆金刺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勃留姆金在全俄肃反委员会是负责德国大使馆安全的。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情绪看，他们搞这次恐怖活动的初始目的并不是反苏维埃的暴乱行动，如后来苏联官方史学著作写的那样。他们最初的意图是通过刺杀米尔巴赫使政府面对破坏布列斯特和约的事实。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德国并不急于撕毁布列斯特和约。于是这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竟去逮捕捷尔任斯基等布尔什维克，以免自己被他们逮捕。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党的领袖之一、任邮电人民委员的普罗相的举动大大超出了他们事先约好的范围，他竟占领电报局，向全俄发出通令，宣布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掌权……

^① 转引自《俄国政党历史》第364页。

这一天，历史的公理无疑都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布尔什维克国务活动家们对这种有可能破坏以高昂的代价得到的和平喘息时机的做法，采取了坚决而果断的措施。当时正在召开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1918年7月4—10日）参加代表大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的全体成员被逮捕。一个强大的政党两天时间里失去了政治空间和统一的领导，变成一群乌合之众，各奔东西。

首先分裂的是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有一部分人坚定地转到布尔什维克一边，同自己的中央保持距离。此外，1918年7月6日的行动如晴天霹雳，震惊了左派社会革命党基层组织。许多组织匆匆忙忙地同中央划清界限。地方苏维埃中的许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纷纷退党，许多人加入布尔什维克党。

7月6日事件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许多地方苏维埃中被驱逐出去。到秋天，只有31个县的苏维埃中还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而在1918年11月6—9日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100名代表中只有一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上届代表大会上他们的代表比例是30%）。此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政治影响每况愈下。

这个结局是很令人遗憾的，这表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并不成熟。十月革命前后，他们同布尔什维克曾有过很好的合作：1917年7月一起转入地下，10月在军事革命委员会中合作，在第二届和第三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同工作，在人民委员会（1917年12月至1918年3月）中密切配合。所有这一切使两党间及个人之间建立了稳固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很难割断的。引人注意的是，斯皮里多诺娃后来在克里姆林宫牢房中还给左派社会革命党第四次代表大会（1918年10

月代表写信：“但是同志们，当我们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宣传，同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时，决不能忘记他们已经干出了伟大的事业，在国外，全世界都站到了他们的旗帜下；决不能忘记我们和布尔什维克有共同的敌人和朋友”。最后，她还沉痛地补充道：“这是我们党的主要悲剧。”

但是，此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布尔什维克的关系日益紧张，他们之间已不可能再进行合作了。这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六、俄共（布）第二个党纲

1918年3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改变党的名称的决定。党开始称作“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还决定“在已经开始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修改党的纲领。

一年以后，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第七次代表大会党纲修改委员会起草的党纲草案。

党纲草案分两部分：理论部分和党在各个活动领域所面临的具体任务部分。理论部分对时代作了总的评价，而对党的主要任务的阐述包括党在一般政治、民族关系、军事、司法、国民教育、宗教关系、经济、农业、分配、货币和银行、财政、住宅问题、劳动保护和社会保证、人民保健事业方面的任务。

新党纲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十月革命胜利的历史现实，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准绳，提出了俄共（布）的行动指南。列宁为新党纲的制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写的《俄共纲领草案初稿》

的大部分论点几乎原封不动地得到采纳。

理论部分强调，俄国的十月革命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为人类发展史上的新时代——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时代奠定了基础。党纲草案中指出：“只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不论革命有什么样的困难，可能遭到什么样的暂时失利，不论反革命掀起什么浪潮，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①

党纲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和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前夜的思想，同时指出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在这个问题上，布尔什维克理论家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布哈林认为，在整个文明世界中，从无组织的、无政府的资本主义向在全国人有组织的、可调节的资本主义过渡已经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因此，小商品生产必然要遵循生产和资本集中的铁的规律。只有利用现代工业技术和现代科学技术成就的大工业和农业生产，才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而小商品生产和在这一范围内进行的私人交换同大生产是对立的，已经失去历史意义、必然会慢慢地痛苦地死去。因此布哈林“援引旧纲领”有关部分“只限于对帝国主义作出评述而‘完全抛开’对资本主义作分析。”^②布哈林认为“金融资本主义是‘决定新时代性质的最典型的东西’”。^③实际上，分歧的实质在于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的同盟者问题有不同的见解。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735页。

②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记录（1919年3月）》1959年莫斯科版第45页。

③ 同上。

列宁坚持在纲领中写进关于对帝国主义的分析 and 论述、对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基础的分析。代表大会采纳了列宁的意见。列宁认为，哪里存在着小商品生产，哪里就必然会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因素。布尔什维克不得不长期考虑到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心理和传统的影响。此外，俄国没有建立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经验，而曾经存在的一些因素也因经济破坏的影响而消失了。

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民族问题。布哈林和皮达可夫反对民族自决权的提法和民族政策。他们认为，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进行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能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民族自决权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又是多余的，因为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使各民族溶合起来。布哈林主张用各民族的劳动阶级自决的论点来代替民族自决的提法。列宁认为，“我们的党纲不应当说劳动者自决，因为这是不正确的……既然各个民族还处于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或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无产阶级的民主的道路上的不同阶段，那么我们党纲中的这个原则便是绝对正确的”。^① 列宁指出，正确地解决民族问题，是吸收俄国所有民族的劳动者捍卫革命成果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从国际解放运动的观点来看，共产党只有始终不渝地捍卫各民族有直到分离出去成立国家的自决权，才能加速无产阶级团结的进程和加强遭受着民族压迫和殖民压迫的群众的革命斗争。但是后来列宁又强调，承认民族自决权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分离。而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的观点占了上风。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在国内战争条件下召开的。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762页。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使农民遭到很大损失。因此，代表大会关于农民，尤其是关于中农的决议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代表大会建议对中农这个社会阶层采取灵活的政策：把他们同富农区分开，关心他们的需要，在确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时向他们让步。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中号召党员说：“任务不是剥夺中农而是照顾农民生活的特殊条件，向农民学习向更好的制度过渡的方法，决不可发号施令！”^①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工农关系日益紧张的环境下，这个决定无疑是非常及时的。

党纲草案中占有很大篇幅的是经济部分。这一部分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经济原则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法，反映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这一时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此时正值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布尔什维克党为保证苏维埃政权的胜利，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个历史实践也不同程度地对党纲有关部分的内容产生了影响。

在列宁提出并最终被代表大会基本采用的党纲草案中指出：“要实现共产主义，绝对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把劳动最高度地最严格地集中起来，这就要首先克服工人在职业上和地区上的散漫性和分散性。”根本的任务是“按照一个全国性的计划把国内所有经济活动最高限度地联合起来；使生产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亦即按每个部门和几个部门将生产联合起来”。“在分配方面，苏维埃政权现时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目的是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生产消费公社中，这种公社能把整个分配机构严格地集中起来，最迅速、最有计划、最节省、用最少的劳动来分配一切必需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785页。

品。”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立即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但是“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为消灭货币作好准备，首先是以存折、支票和短期领物证等等来代替货币。”在农业方面苏维埃政权已着手“实现一系列旨在组织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办法。”其中最主要的办法是国营农场、农业公社和共耕社。^②

这些措施不仅仅是国内战争形势下被迫采取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这一时期确实有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想法，这些措施乃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具体办法，是自觉采取的措施。列宁曾设想通过实施这些措施，在实践中检验“哪些措施是最适当的”以便进行广泛的推广。

纲领中还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在军事、司法、社会保证等方面的任务。这个纲领是布尔什维克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指南。

众所周知，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第一个党纲到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第二个党纲前后历时 16 年时间而从 1919 年通过第二个党纲到 1961 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第三个党纲，前后历时 40 多年时间。所以第二个党纲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第八次代表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3 卷第 720—731 页；《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1 分册第 526—534、540—544 页。

② 农业公社是苏俄当时农业生产合作的一种形式。在农业公社里，所有生产资料以及土地使用一概实行公有化。社员没有副业，公社内部不按劳动而按人口进行分配。而在共耕社里，集体劳动只限于耕地和播种，其余农活由农民个人分别完成。社员拥有农具和自己那份土地上的产品的私有权。

大会在讨论党纲草案时，虽然布哈林等人在时代特征的表述和民族关系方面发表一些不同看法，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基本原则问题上认识是一致的。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宣传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纲领而撰写的小册子《共产主义 ABC》曾被译为多种文字在世界出版。这本小册子曾得到列宁的好评。小册子中所反映的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有关商品、货币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思想，被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所否定。但是俄共（布）第二个党纲所起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第八章

新经济政策时期： 经济民主与政治集中的探索

一、新形势下布尔什维克与各党派的关系

1919 年底至 1920 年初，红军在国内战争各条战线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西方民主舆论纷纷表示反对协约国各国干涉俄国内政，迫使这些国家从俄国领土撤出干涉部队。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等白匪政权由于失去协约国的直接军事援助，抵抗不住红军的进攻。在经济战线上，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领导的强大的粮食机构迅速从农民手中搞到大量粮食并运往工业区。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工人的粮食定额大幅度增加。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有了提高。1920 年春天和夏天 工业开始增加日用品生产。1921 年的生产计划几乎提高一倍。1920 年初 以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为首的国家电气化委员会集中 200 名位科学家和工程师，开始编制第一个国民经济长期计划。同年 12 月 22—

29日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批准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提出的《全国电气化计划》。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正在到来。

但是，国内战争时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还在继续发挥作用。这种体制是建立在对农民进行剥夺的基础之上的。内战时期，苏维埃政权“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用这些粮食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列宁说：“我们当时不这样就不能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里战胜地主和资本家”。^①那时，农民主要是中农，对此尽管不乐意，但尚可以暂时忍受。正如基洛夫讲的那样：“农民从地主那里夺得了土地，只经过一个播种季节就已经习惯于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当他听说地主来了，立即拿起枪，参加了红军，把自己的余粮交给了红军和居民。因为他知道，卷土重来的地主强加给他们的制度要比共产党人的粮食垄断更严厉。”^②不过，即使内战时期，这些措施也不是所有农民都能接受的，余粮征集制遇到各种形式的反抗。根据苏俄中央统计局的数字，1920年农民隐瞒的实际播种面积超过2000万英亩，占播种面积总数的14%；隐瞒的收获量占粮食总收获量的33%。^③

随着内战的结束，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政策越来越不满。事实上，1920年粮食人民委员部搞到的大批粮食仍然是按余粮收集制的办法强行征收的。1920年农民反对粮食垄断和余粮收集制的活动达到高潮，因为1920年夏天俄国许多地区歉收，而粮食征购任务并没有减少。各地不断传来农民暴动的消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501—502页。

② 《基洛夫文章和演说选》1957年莫斯科版第141页。

③ 《1917年以来苏联的经济发展》1953年伦敦版第116—117页。

息。以往的史书大都把这些农民暴动说成是反革命政党，尤其是社会革命党搞的叛乱。从社会革命党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同布尔什维克的关系以及社会革命党同农民的传统联系来看，不排除社会革命党人参与和组织这些农民暴动的可能性。但是，仅靠欺骗手段是不可能动员起那么多农民反对苏维埃政权的。

在众多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农民暴动中，最著名的是 1920 年秋季发生在坦波夫省的农民暴动（史称“安东诺夫叛乱”），这次的农民反抗活动席卷坦波夫省的很大一部分地区以及沃罗涅日与萨拉托夫省的一些地区。参加者约有 3 万人之多，历时 5 个月。结果暴动被镇压下去。但是苏维埃政权也向农民作出重要让步，在省内停止一切征粮活动，召回征粮队，组织对农民发放种籽。1921 年 2 月 8 日，列宁给中央政治局会议写了《农民问题提纲初稿》，建议“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即收走余粮）的愿望”，扩大他们将纳税后的余粮投入地方经济流转的自由”。^①此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多次以口头和书面形式强调必须采取这些措施。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唐恩也提出此问题，但是当时布尔什维克没有决心取消余粮收集制，反而要农民服从国家播种委员会的命令。

1921 年 2 月 28 日，彼得格勒附近苏维埃共和国在波罗的海的主要海军基地——喀琅施塔得爆发反对当局、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起义。水兵们不服从长官的命令，建立了自己的革命委员会。事件最初发生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主力舰上，随后起义者在市内举行群众大会，会上提出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0 卷第 338 页。

了建立“没有共产党人的苏维埃”“贸易自由”等口号。大会决议中还提出了给予左派“社会主义”团体和无政府主义团体行动自由的要求。苏维埃政府认定这次事件是反革命叛乱，于是决定采取镇压措施。但是，全俄肃反委员会关于这次事件的原因的调查结果却表明，事实并非如此。调查报告中说：“喀琅施塔得卫戍部队和工人的起义本年3月1—17日是2月下旬彼得堡某些工厂骚乱和罢工发展的直接逻辑结果……起义的工人不仅仅是要求扩大粮食配额……总体上讲，运动是在取消共产党专政和建立自由选举的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下进行的。彼得堡的运动之所以没有组织性，没有普遍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及时和迅速摧毁了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俄共（布）喀琅施塔得组织大多数党员很快都脱离党，拿起武器同叛乱者并肩作战……起义领袖都声明自己不属于任何政党……调查没有发现叛乱发生前要塞指挥员中有反革命组织或协约国间谍活动的迹象。①这份报告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性质。当时喀琅施塔得水兵中几乎有80%的人来自对余粮收集制不满的农民，主要是中农。这说明作为苏维埃政权基础的工农联盟已经面临崩溃的威胁。为了平息喀琅施塔得起义，当局派出红军部队，党组织派出几千名共产党员去喀琅施塔得。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300名代表也奔赴彼得格勒，准备参加战斗。

3月16日夜，即起义爆发半个月之后，当局派出的部队向要塞发起猛攻。在付出重大的伤亡代价后，起义的要塞终于被制服。这次事件对布尔什维克党触动极大。布尔什维克党开始认真分析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原因。列宁写道：“1921年春天的

① 转引自《俄国政党史》第426—427页。

经济转变为政治：‘喀琅施塔得’。^①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期间发生的这次事件对于俄共（布）调整政策重新认识“战时共产主义”实践起到了促进作用。

布尔什维克认为，在这一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反对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事件中，都有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等“小资产阶级政党”参与。因此，在平息各地的突发事件的过程中，苏维埃政权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组织进行了镇压。到1921年3月初，肃反委员会在全国逮捕了数千名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积极分子，并把他们关进监狱和集中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组织都转入地下。

孟什维克地方委员会还在活动，但已不是公开活动。地方委员会原来都是在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现在开始搞补选，或在小范围内选举产生。党中央委员会因无法召开全俄党代表大会而连续几年没有改选。孟什维克中央委员大都流亡国外，在组织方面只是出版党的政治读物。马尔托夫和阿布拉莫维奇在柏林编辑出版《社会主义通报》杂志。

社会革命党1921年初的确参加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喀琅施塔得和坦波夫等地的农民起义或暴动都有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结果，这一时期有一大批社会革命党人或在同现政权的武装冲突中被打死，或被捕后处决，或被关进集中营。但是直到1922年夏，社会革命党人在许多省的居民中仍然有影响，包括阿尔泰、沃罗涅日、维捷布斯克、叶尼塞斯克、西伯利亚、萨拉托夫和坦波夫等省。由于在这些省份社会革命党组织很活跃，1921年初布尔什维克在这些地方实行了戒严状态。社会革命党随即转入地下。1922年6—8月在莫斯科举行了对“社会革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383页。

命党中央委员会和社会革命党其他组织成员案件”的审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法院指控在各个时期被全俄肃反委员会机关逮捕的社会革命党领袖阿·哥茨、Д. Д. 顿斯基、Д. Я. 格尔施泰因、米·雅·亨德尔曼—格拉波夫斯基、М. А. 利哈乔夫、М. Н. 伊万诺夫、Е. М. 季莫费耶夫等人图谋推翻苏维埃政权，帮助白卫分子和外国干涉者，并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领导了这次审判活动。审判案的目的是杜绝社会革命党人可能搞的恐怖活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被告判处极刑，但暂缓执行。这样一来，这些社会革命党的前领袖便成了政治人质，用他们可以防止其他社会革命党人恢复革命前的恐怖活动传统，防止他们暗杀当局要人。被镇压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最好的结局是自愿或被迫流亡国外，但这大都是少数最有影响的人物，其他人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和偏远地区的特殊集中营。

国内战争结束后日益激化的工农关系以及农民群众同苏维埃政权的关系，在政治斗争进程中被转化为布尔什维克党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等反对党之间的关系。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采用新经济政策后，苏维埃政权同农民的关系得到改善。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因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或直接参与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行动而受到镇压，布尔什维克党在同反对党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可以说，国内战争结束后，国内已经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可以和布尔什维克并驾齐驱平分秋色。从此以后，俄国政治斗争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二、俄共(布)十大与新经济政策

1921年初,共产党已经拥有了相当雄厚的力量,有2万多个支部、73万余名党员。其中约有35万人在全国各城市工作,农业地区集中了约20万人。红军中有16万余人。

在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都建立了共产党,它们都是俄共(布)的组成部分。如乌克兰共产党有6万名党员,年轻的白俄罗斯共产党有3000名党员,阿塞拜疆共产党约有1.5万名党员,亚美尼亚共产党有7000名党员,如此等等。

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年代,俄共(布)的成分有了显著变化。只有10%的党员是十月革命前入党的,其余都是1918—1920年入党的。党内工人占44%,农民同手工业者和手艺人共约占24%,职员和属于其他社会集团的人约占30%。1921年初俄共(布)成员中约有7%来自其他政党。但是这些党员大都在以后的清党运动中被开除出党。

为了加强俄共(布)对各部门的领导,中央派出数千名党员去加强各省委和经济机关。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进行了改组。它的执行机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开始主要抓恢复国民经济的问题,如燃料、开采、运输工作、农业状况、粮食供应等等。中央委员会也非常关心工会、共青团和苏维埃的工作。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十分重视经济建设重点地区党的力量配置。当时中央全会、政治局和书记处所审核的全部问题的一半以上,组织局会议所讨论的问题的3/4以上,都涉及到干部的挑选和分配问题。总而言之,俄共(布)的地位得到了全面巩固。

在这种形势下,俄共(布)中央和列宁认真地研究了过去几

年国家在社会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发展的结果，总结了劳动人民从事创造性活动和在“战时共产主义”的特殊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批判地评价了在那个时期形成的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和经营方法的概念，从而为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

“战时共产主义”是企图用“正面进攻”的办法消灭城乡资本主义通过捷径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说：“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①列宁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分析既包括肯定“战时共产主义”是动员国民经济保卫国家的政策，也包括对“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形成的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那些概念错误的分析批判。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12月22—29日）开会期间，列宁参加了非党农民代表的会议，并且像他所说的那样：“从他们对农村生活中最棘手的问题……的讨论中，我得到了很多东西”。^②所有发言的人都反对保留余粮收集制，认为必须让农民感到有利可图，不然农业就无法搞下去。列宁记下了代表们的发言。1921年2月4日莫斯科五金工人扩大代表会议通过决议，指出余粮收集制“不仅不符合农民群众的利益，而且对工人群众的状况也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希望“以一定的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③列宁在会上发表演说，首次提出重新考虑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问题。^④调整布尔什维克党经济政策，调整工农关系的问题终于在俄共（布）第十次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82页。

② 同上第40卷第170页。

③ 《共产主义劳动报》（莫斯科）1921年2月16日。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316页。

代表大会上得到实现。

1921年3月8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包括如下一些基本问题：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工会及其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党在民族建设方面的当前任务，党的建设问题，关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和党的宣传鼓动任务，关于军队的改组，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状况，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代表大会对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问题的讨论以及通过的有关决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开始。列宁解释说，实物税的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它的实质在于巩固工农联盟，这两个阶级的关系决定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①

新经济政策的任务是，吸引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为此而采取农民最能理解和最合心意的方式、方法。“小农只要还是小农，他们就必须有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小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和动因。”^②

列宁明确回答了由于实行粮食税而产生的问题：能不能在国内有一定的周转自由，同时又不至于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削弱社会主义基础呢？他指出，全部问题在于确定周转自由的范围。如果无产阶级把政权掌握在手里，搞好工农业之间正确的经济周转，那么，国家除了政治权力之外就又有了经济权力。^③

列宁在代表大会上建议立即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执政党的代表大会已经基本上决定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从而给小

①（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444页。

② 同上第449页。

③ 同上。

农许多刺激 推动他们来扩大经营 增加播种面积 ”代表大会相信，在新政策的基础上 “ 一定能够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起牢固的关系。’^①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标志着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放弃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开始冷静地考虑俄国的现实，制定符合客观条件要求的政策。

所谓粮食税，它与余粮收集制的最大不同点就在于，它是从农民对个人利益的关心上来促进生产的发展。粮食税额低于余粮收集额。农民事先知道应该交多少税，缴税后剩余的粮食可以自己支配。这表明工农联盟的军事政治形式将被经济形式所代替。

众所周知，工农联盟中的核心问题是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或者说是通过什么途径领导农民和使农民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应该说，粮食税本身并不是目的，仅靠粮食税这种具体办法也不可能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我们理解，粮食税只是一种标志，标志着工农军事政治联盟形式的完结，标志探索新的经济联盟形式、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法的开始。

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法令执行一个月后，列宁发表了《论粮食税》一文，第一次把粮食税作为一项新政策来论述其意义。列宁指出 同“战时共产主义”相比较 粮食税乃是向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在小农国家内，无产阶级正确的政策是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而粮食税就是向这种粮食政策的过渡。

实行新经济政策 取消余粮收集制而改行粮食税 这意味着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459页。

允许发展商业，允许周转自由。因此在起草俄共（布）十大关于粮食税的决议草案时，列宁强调应明确规定小农有周转的自由，但是要改变传统观点是不容易的，当时的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就不同意在决议草案中写上周转自由的说法，为此列宁曾专门写信给瞿鲁巴作说服和解释工作。但是瞿鲁巴等人在起草的决议草案第二稿中，仍对农民的周转自由提出如下限制：既允许在农村联合组织（村社）的范围内，也允许在这个范围以外进行交换。但在后一种情况下，交换只能通过粮食委员会机关进行。在所指定形式以外的任何其他形式的交换。都要作为投机行为予以追究。虽然后来由于列宁的坚持，文中取消了对农民处理余粮的上述限制，但保留了“允许在地方经济周转范围内实行交换”的提法。

其实，在向周转自由过渡的问题上，开始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他们认为农民的周转自由只能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不能放开市场，所以要把小农周转自由限制在地方范围内。所谓商品交换，按当时列宁的理解就是：设想“在全国范围内，或多或少要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①。1921年春天，列宁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商业、市场问题的重要性，还不打算一下子退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他当时设想把买卖自由、贸易自由纳入合作社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列宁这时所说的商品交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产品交换，还不是商品的自由买卖，不是现金交易。他在1921年5月还认为：“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已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决不单纯是商品，已不是商品，已不再是商品。”^②因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28页。

② 同上，第41卷第276页。

此,1921年3月至10月,只允许农民在地方经济周转范围内实行交换,这同列宁和当时党内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

新经济政策实行半年以后,列宁发现这种商品交换实际上行不通。因为工业品价格定得太高,农民对此不满意。在这种情况下,私商的活动范围大大地扩大了。再把周转限制在地方范围内,限制在国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范围内,是不可能的。于是列宁说,这种商品交换关系失败了。实际情况超出了原来的设想,经济发展的结果,私人市场比社会主义商品交换强大,通常的商品买卖、货币流通代替了商品交换。根据这种情况,列宁在1921年秋天提出:“我们还退得不够 必须再退 再后退 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①亦即用通常的买卖、贸易来代替产品交换。到此,列宁比较彻底地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那种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法。

当然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 从“战时共产主义”向后退却不仅表现在粮食问题上,不仅仅表现在农村和农业领域。工业和商业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工业领域出现了非国有化倾向,扩大了租让制和租赁制的实践范围,商业领域的合作制、代购代销、合营股份公司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一种经济形式确定下来。

采取这些措施调动了农民和各种生产者的积极性,使危机深重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粮食、燃料等极为紧迫的问题得到缓解。新经济政策尤其促进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和农村市场的活跃 使“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一度处于危机边缘的城乡关系、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605页。

工农关系重新获得改善并得到巩固。

私营商业的不断活跃扩大了国家财政的税收来源。到1923年第一季度，国家从私商征收的税款占税款总额的79.8%。到第二、三季度私商所纳税款仍占税款总额的75.7%。私营纳税额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国家征收税款的增长速度。对此列宁曾指出：“我国的商业活动已经使我们得到了一些资本。诚然，目前还是很少的，才2000万金卢布多一点。但总算有了一个开端，我们的商业使我们得到了资金，我们可以用来发展重工业。”^①

商业原则在新经济政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列宁认为，商业是工农关系的结合点，是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的联结纽带。这表明苏维埃国家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开始从行政命令的领导方法向经济方法过渡，即向民主的、发挥广大群众积极性和主动精神的方法过渡。这也正是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所在。

还应该看到，俄国革命是一次复杂的革命，它不仅仅是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也是农民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如何处理两种不同革命任务的关系，决定着未来革命的发展。革命前的俄国，虽然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84%以上的人口在农村，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俄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因此，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比反对资本主义的任务更艰巨。所谓农民反封建的革命，其使命是把农民彻底地变成自由的商品生产者，恢复或建立积累财富的自由和货币的权利，使基本农民群众能够自由地走向市场，去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剥削。如果在国内战争结束后继续阻止小商品生产者走向市场，就是阻碍发展小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724页。

私有经济的生产力，其结果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的冲突，造成无产阶级革命和农民革命脱钩，从而发生喀琅施塔得之类的事件。小生产者农民由于其所处的经济地位，不仅从经济上，而且从心理上也不可能一下子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点已经在实践中得到证明。因此必须经过一个中间环节。新经济政策所规定的所有退却措施正是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

当然，通过新经济政策来解决农民反对封建的任务，同一般农民反封建革命是根本不同的，因为新经济政策是在无产阶级国家的指导下实行的。因此，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也好，发展市场也好，允许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剥削也好，其范围都是受控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其目的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向资本主义过渡。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后，经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挫折之后，进行的一次较成功的实验，是社会主义史上一次伟大的实验。正是通过这次实践，列宁声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①这句话具有极其深刻的含义。它包含着对过去实践中的成功与挫折的清醒估计，也包含着对未来的深沉的思索；既包含着对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途经的看法的改变，也包含着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看法的某些改变。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巨大贡献。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概括了他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但是新经济政策反映的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当时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水平。这个认识是建立在实践的提示基础之上的，因此是有时代局限性的。这样评价丝毫不影响列宁及其思想的伟大和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773页。

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的贡献。列宁当时强调要认真地长期执行这样的政策，但同时强调并不是永远执行这样的政策。在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的主要理论家布哈林也多次讲，“我们贯彻新经济政策的方针是认真的和长期的，但不是永远的”；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可逾越的，这就是共产主义前景”因此新经济政策无非是“一种战略手段”。这个思想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是很有代表性的。列宁也认为新经济政策将搞一二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1922年11月20日他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讲话时指出：“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将来，或者什么抽象图景，或者什么圣像问题了……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之中，无论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①

还应该指出的是，新经济政策原则同俄共（布）第二个党纲中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原则是相矛盾的。当时始终没有提出修改党纲问题，也表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没有打算把新经济政策作为社会主义原则而更加长期地执行下去。这使斯大林在20年代末能够轻而易举地“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吧！”^②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社会主义是不断改革和发展的社会，任何墨守成规、僵化教条的做法都会阻止社会的发展。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 development 过程比作一场接力赛的话，那到列宁出色地完成了自己这段接力棒的任务。他给我们留下了正确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原则立场。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后向社会主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737—738页。

② 参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2卷第171页。

义过渡过程中思想认识上一次从空想向现实的转变。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巩固了俄共（布）在社会中的领导地位，改善了工农关系。但是新经济政策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探索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道路的任务远没有完结。

三 《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及其影响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是按照‘关于工会’的争论期间形成的各个纲领派进行的，这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当时代表大会上以列宁为首的‘十人’纲领派以布哈林为首的‘缓冲’纲领派以奥新斯基和萨普龙诺夫为首的‘民主集中派’纲领派以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为首的‘工人反对派’纲领派等等。

1920年底到1921年初，俄共布党内发生了一场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的争论。当时苏俄国内战争临近结束，从战争转向经济建设的任务已经提到日程上来，围绕工会在经济建设中的任务和工会在苏维埃国家中的作用问题，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了分歧。

1920年11月2—6日，召开了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列入会议日程的问题有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报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工会的生产任务、粮食运动与工会、工资政策与工人的物质供应、工会目前的组织任务及其实现的方法、工会参加工农检察院等问题。俄共布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改变工会的工作方法即用民主的方法代替行政命令的军事方法以适应社会主义和平建设的任务的问题。会上，托洛茨基反对采用新的工作方法。他主张对工会采取强硬命令式的“整

制‘政策要求‘拧紧螺丝’和实现‘工会国家化’。12月25日托洛茨基发表纲领性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阐述他的观点。他主张：工会国家化，即按各工业部门把经济机关同工会立即融合起来，赋予这个联合体以管理经济的行政职能，把工会变成国家机器的附属品；工会军事化，即实行托洛茨基在领导铁路和水运员工联合会中央委员会时采用过的强迫命令方式。

工会问题争论中的工人反对派形成于1920—1921年，但是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则早在1919年就已开始形成。在1920年举行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施略普尼柯夫提出一个关于俄共（布）苏维埃和工会之间的关系的提纲，主张由党和苏维埃管政治，工会管经济。柯伦泰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出版小册子《工人反对派》，详细阐述其纲领。它要求把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加入各产业工会的生产者代表大会，由他们选举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各国民经济管理机关也分别由相应的工会选举产生，而且党政机关不得否决工会提出的候选人。^①工人反对派的纲领曾得到部分工人的支持。

另一个派别集团是民主集中派，1919年开始出现，1920年最终形成。民主集中派否认党在苏维埃和工会中的领导工作，反对在工业中实行一长制和厂长个人负责制，要求在党内有组织派别和集团的自由。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年3—4月）上，民主集中派提出了《关于委员制和一长制的提纲》。他们要求党中央“无条件地承认委员制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一切环节的建设原则。”^②他们反对一长制、主张委员制的主要论据是：委员制是反对苏维埃机关的本位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有力

① 参看《工人反对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54、100—101页。

② 《“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页。

武器，是能保证广大非党群众和工人参加管理的制度。

1920—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中还出现一个以布哈林为首的‘缓冲派’集团参加者有尤·拉林、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缓冲派”试图缓和列宁与托洛茨基在工会作用和任务问题上的分歧。

列宁积极参加了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他在1920年12月30日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不久即以《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为题出版了单行本），后来又发表小册子《党内危机》、《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等著作，批判反对派在工会问题上的观点。列宁认为，工会应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工人阶级，是群众获得必要的经营和管理经验的学校。工人通过工会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对根据一长制管理生产的经济领导者的活动实行监督。工会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劳动纪律、开展社会主义竞赛而斗争。列宁指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所犯的政治错误就是‘使我们党离开经济任务 离开‘生产’工作’。^①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夕中央工会委员会制定了《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草案》（即著名的‘十人纲领’），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姆斯基、加里宁等人在这份文件上签字。该‘纲领’在1921年1月18日的《真理报》上发表。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根据‘十人纲领’通过了《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②，对工会问题的争论作了总结。代表大会批评了托洛茨基等反对派的观点，反对在组织和生产管理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410页。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72—90页。

问题上把国家权力交给工会。决议肯定了列宁关于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这一评价，并强调指出，工会只有在吸引最广大的劳动阶层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的条件下，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代表大会再次强调工会不应当作为一种独立的、组织上孤立的力量，而应当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国家的基本机构之一。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日程上并没有专门规定讨论党的统一问题。由于会上在讨论各种问题，尤其是党的建设问题时，各派别之间发生激烈的争论和斗争。为此列宁在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专门为代表大会起草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①列宁的决议草案得到代表大会大多数人的赞成。《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作出的主要政治结论是：党的统一，党员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团结一致，是党内生活不可违背的准则，是党的革命改造活动赖以取得成就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决议草案要求解散所有小集团，而且今后也不容许任何派别活动。凡是不执行这项决议的，就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中央委员会授权对破坏党的统一的共产党员采取一切党内处分办法，直至开除出党；而对中央委员则把他们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开除出党的极端措施。

《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及其规定的严厉措施虽然保证了党在形式上的统一，但是开创了党内有意见分歧就是分裂党的先例，使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也不能开展。当时就有人反对这个决议。第十次代表大会也决定当时不公布有关处分办法的条款。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是以实行新经济政策、放宽经济活动中的限制、扩大各种经济成分的经营自由而著名的。《关于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469—472、477—484页。

党的统一》的决议强调的是集中。这是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一个矛盾现象也是新经济政策年代的一个矛盾现象即经济上放开，政治上强化控制。这个现象的产生在史学界引起很多争论。尤其是近年来，研究人员认为，《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的通过给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反对党内过分的集中制甚至独裁造成了困难，使各级领导者的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受监督和控制。后来斯大林正是利用或滥用了第十次代表大会有关决议，排斥异己，建立个人集权。到1922年底列宁才惊奇地发现“斯大林同志……掌握了无限的权力”。^①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列宁当时曾认为这是一项临时性措施，因为看到了这个决定可能导致的后果。

但是，《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的通过同当时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态度有密切的联系。

当时列宁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有危险的，“新经济政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危险”。而这种危险同苏维埃共和国以往遇到的危险相比，要严重得多。列宁说：“在解决建立苏维埃政权和解散立宪会议的问题时，危险来自政治方面。这种危险是微不足道的。在全世界资本家所支持的国内战争的时期到来后，出现了军事上的危险，这种危险就比较严重了。而在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后，危险就更大了……资本主义的恢复、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关系在商业领域的发展等等，这些就是我们目前的经济建设所遇到的危险，就是我们目前逐步解决远比过去困难的任务时所遇到的危险。”^②

此前，布尔什维克党在同其他政党的竞争中巩固了自己的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745页。

② 同上第608页。

执政党地位，在围绕布列斯特和约的斗争中赢得了喘息时机，在同国内反苏维埃政权的势力的斗争中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列宁认为，这些危险都是可以克服的。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资本主义的活跃，尤其是农民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威胁，这个危险是空前的。因此需要布尔什维克党步调一致地迎接各种严峻考验。应该说，在苏维埃的历史上对农民的认识始终是不公正的。在强调工农联盟、改善工农关系的重要性的同时，始终认为小农经济是苏维埃政权的危险。正是这种认识导致苏联历史上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始终处理不好。而在当时对农民的这种认识更加绝对。认为小农经济的活跃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活跃，这对无产阶级政权是巨大的威胁。当时不仅禁止党内出现各种派别，而且还对党组织进行了清洗，以此来加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从 1921 年 8 月到 1922 年初约有 13.6 万名党员被开除出党 占全体党员的 1/5。这些人大多在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成为执政党时期入党的，据说被开除者中 11% 是“因拒绝执行党的指示”而被开除的，其中很多人无疑是真正的或潜在的反党派。其他被开除的理由有“表现消极”(34%)、钻营之徒、酗酒、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 25% 和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等 9%)。^① 清党工作是正确的，但也有一些发表不同意见的人被开除出党。

列宁希望今后在情况变化时能够恢复党内活跃的民主生活。即使当时，列宁也提出要“采取一切手段并试验各种新的办法来反对官僚主义 扩大民主。”^② 但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在苏共的历史上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而在这方面，《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① 参看《俄共布中央通报》1922年3月第40期。

②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471页。

四、无政府主义者的命运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在十月革命后仍然开展了积极的活动，尽管他们的影响没有其他政党那样大。从总体上讲，俄国无政府主义运动是在 20 年代初消失的，所以在这一章里介绍一下无政府主义者在十月革命后的活动。

1917 年夏，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组织者 И. М. 盖茨曼曾说，在当前和最近的将来，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无政府主义者能否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明确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态度；第二，对立宪会议的态度；第三，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态度。对于第一个问题，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应该争取使血腥的残杀变成“世界革命”并在俄国军队士兵的帮助下彻底打垮德国反动派。无政府主义者对待立宪会议的态度也是明确的，他们认为立宪会议是“革命的阻力”，并不期望它的召开会带来什么积极的成果。对于第三个问题，伊尔库茨克无政府主义者的举动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不打算参加“革命正式机关”——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工作。他们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在革命中应该与起义的人民共同前进；他们的道德要求他们同革命群众共同前进，而不是爬到上面去统治革命群众。他们不当统治者，那些把统治者赶下台的人才应该成为统治者。

但是，在对苏维埃的态度方面，情况比较复杂。一部分人主张参加苏维埃并同它进行合作，利用苏维埃进行宣传（阿·尤·格耶、А. А. 卡列林、А. Г. 热列兹尼亚科夫等人）。另一部分人持左右摇摆的立场，总体上承认苏维埃是人民革命机关，但是不支持布尔什维克政府采取的措施（Х. З. 雅尔丘克、И. Х. Ш. 勃列

伊赫曼等人)。还有一部分人疯狂反对苏维埃和政府(戈尔金兄弟、И. М. 沃林等人)。他们希望苏维埃成为群众组织,不履行任何政府职能,不服从布尔什维克。

十月革命后,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建立革命工会,即由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组成的工厂公社和农村公社。他们试图得到工会运动的支持。他们的活动基地是彼得格勒、莫斯科、哈尔科夫等地的个别工厂委员会。无政府主义者试图在这里具体实现工团主义思想,即革命胜利后立刻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建立社会和睦。他们千方百计阻止工厂委员会同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工会联合。工团主义者建议用工会联合会代替国家机关,建立“松散的联邦社会”。

这一时期活跃在党际斗争舞台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依旧是无政府共产主义派、无政府工团主义派和各种无政府个人主义倾向的代表。

在俄国无政府主义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他们想把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团结在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旗帜下。但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中间出现了分裂,一些自称无政府合作社派的人脱离了正统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派,并组成了“创举”集团,拥有同名的出版机构和杂志。

无政府合作社派认为可以不经无产阶级专政,而经过合作社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1918—1920年间,克鲁泡特金多次会见列宁。这位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在会见时总是提出合作社作为实现革命解放任务的手段问题,足见这个思想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

十月革命胜利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曾试图比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更积极地行动。原因是:第一,与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不同,工团主义者经常在工人中间(工会、工厂委员会、合作社联合

会活动更了解劳动者的需要和困难 第二 工团主义者的领袖 В. М. 沃林、阿·莫·阿尼克斯特、Х. З. 雅尔丘克、Г. И. 马克西莫夫等人把国外的一些经验运用到俄国实践中。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认为 在社会革命胜利的第二天就应该消灭国家政权 建立由工会联合会领导的新社会，负责组织生产和分配。

1918 年，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中又分化出无政府联邦主义派 其领袖是 Н. И. 普罗费朗索夫和 И. К. 列别捷夫。他们宣布同以往所有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决裂，主张以非集中化和联邦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纯粹的工团主义”。他们认为，社会革命成功后，应该根据合同和协议的原则把个人联合到公社里，以此来建立社会生活。

十月革命胜利后，除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外，无政府个人主义者也很活跃。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弗拉基米尔·戈尔金和阿巴·戈尔金兄弟。他们的口号是泛无政府主义，即主张普遍和立即实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这是针对无业游民和流氓无产者“发明”的思想。1920 年秋 阿·戈尔金宣布创立泛无政府主义的新分支——无政府普遍主义 其主要内容包括了各种无政府主义流派的观点，包括承认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思想。阿·戈尔金这种思想曾引起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注意，因为当时他们正面临着选择：是跟布尔什维克走，还是宣传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

无政府主义者的各种思想不断翻新，以致一些无政府主义思想家觉得‘经典’无政府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于是又提出无政府生物宇宙主义，认为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是个人和全人类在将来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为此必须把自己的力量扩大到宇宙的无限空间中去。生物宇宙主义的追随者们还承认个人永生的原则，承认在宇宙的生存权和死人可以复生。

此外，还有新虚无主义和马哈伊斯基主义。前者否认任何社会制度，而后者（代表人物是马哈伊斯基）反对布尔什维克专政，认为在这种专政条件下，工人阶级和农民将会面临困境，如此等等。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与其他政党的主要区别是成分宠杂、思想混乱、组织涣散。这种状况使无政府主义者根本无法统一起来。

俄国无政府主义领袖在许多著作中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做法抱着一种复杂的心态。如克鲁泡特金主张将无政府联邦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统一起来。他反对布尔什维克巩固自己权力的做法。他写道：“让他们去建设工业兵营和集权共产主义的教堂吧。我们认为，社会将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我们要的是个人自由”。克鲁泡特金的目标是建立没有国家、没有国家设施的社会。社会不应该用统治手段，而应该由相互间的契约联系起来。个人自由地联合成团体，团体自由地联合成协会，协会自由地联合成联合会。他认为，“为了在村社内部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其他公民群众之间建立和睦关系”，必须实行联邦制原则，即各居民区、工会、消费和交换协会等组织自由地进行联合。村社联合会是唯一正确的“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新社会里将不存在私有制和惩罚制度，道德会得到复兴。人类只知道公共财产分配将实行‘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的原则。在无政府主义社会 农业和工业将实现联合 每个人都同时‘既是农民，又是工人’，不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

A. A. 卡列林主张对俄国社会实施另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改造方案。他在一系列文章和《国家与无政府主义者》（1918年莫斯科版）这本小册子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卡列林认为，未来的理想是一个以自由村社联盟（联邦）为基础的建制。“自由村社、

自由城市、自由州和世界上自由国家的联盟和大联合体，应该取代现在的国家地位。”他认为在这样的社会中 由于有充分的自由和平等的物质条件，所有的人都会得到幸福。但是，为此必须采取以下措施：首先，把所有土地交给人民并由人民管辖，而不是由“人民选出的机关管辖”。所有工厂、作坊交给工人并由工人管理 而不是由国家管理 如此等等。

总而言之，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中充满幻想和荒唐。无政府主义作为一股社会思潮，它反映了在资本主义已经占据统治地位、无产阶级崛起的历史条件下，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没落阶层的绝望心理。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不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 他们在如何改造社会 在对待剥削的根源、国家的性质、地位与作用、人性的本质、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等现实社会问题上，存在着极其错误的看法。比如在国家问题上，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无论什么国家都是万恶之源，人世间的幸、罪恶都是由国家造成的。他们只想打倒国家，而不去触动私有制。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在批判无政府主义时，深刻地揭示了无政府主义的特征：无政府主义“除了讲一些反对剥削的空话外，没有提供任何东西”他们“不懂得剥削的根源”，不懂得社会的发展——大生产的作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发展”。^①

由于无政府主义的这些特点，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流氓和刑事犯罪分子，他们认为，所谓无政府主义就是可以随心所欲 无法无天 他们曾组织战斗队 搞暴动 反对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1918—1919 年底 无政府主义者及其组织大都被肃反委员会逮捕或监禁。1921 年 2 月 克鲁泡特金逝世后 无政府主义运动分裂。部分人加入俄共（布）。

^① 《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1 卷第 288 页。

第九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社会中的地位

一、布尔什维克一党制的确立

二月革命后，俄国曾一度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其实更确切地说，专制制度崩溃后俄国曾短时间地出现一个权力“准真空”状态。这是因为，在专制制度的高压控制下，各种政治力量都还没有成熟和壮大到立刻接管政权的程度。随时准备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由于自己的领袖流亡在国外，很多革命者在监狱和流放地，也没有能力接管政权。

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准确抓住历史提供的宝贵时机，发动群众起来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阻止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建立了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政权。

十月革命后，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一度是一个多党参政、执政的机构。布尔什维克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曾在政府中进行过愉快的和睦的联合执政实践。但是经过“战时共产主义”、

布列斯特和约、国内战争的考验和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布尔什维克党逐渐同其他形形色色的政党分道扬镳。最后确立了布尔什维克党一党执政的局面。

随着布尔什维克在政治舞台上确立自己的执政地位，其他政党纷纷从苏俄政治舞台上消失。这些政党的消失，同它们对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态度有必然的联系。如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根本反对布尔什维克一党执政和苏维埃，它们主张搞西欧式的议会民主。在同布尔什维克的争论和争斗中，它们不惜采用暴力和暴动手段。而布尔什维克对这些政党也采取了势不两立的立场。布尔什维克认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等政党均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运动内部的敌人。列宁对此有过详细的论述。

列宁认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开始就实行叛卖政策 直接或间接地为‘保卫祖国’即保卫本国资产阶级强盗辩护。后来他们又进一步实行叛卖，同本国的资产阶级联合，同本国的资产阶级一起来反对本国的革命无产阶级。他们在俄国起初同克伦斯基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同盟，后来又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结成同盟，他们同帝国主义强盗妥协，自始至终都表明他们已沦为帝国主义强盗的同盟者。^①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克领袖也提出批评，认为他们是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者在饱受专制制度摧残条件下绝望的产物，同无产阶级是不相容的。

值得指出的是，不仅仅布尔什维克领袖对其他政党采取这种态度，大多数布尔什维克也都持这种态度，当国外有人批评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俄国搞一党制、不允许其他政党存在和活动时，托姆斯基曾并非开玩笑地说，不对，我们这里不只有布尔什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149页。

维克一个政党，我们这里还有许多政党存在，所不同的是，我们这里是一个党在执政，而其他政党在监狱。

列宁逝世后，对其他政党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政策。1922年8月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指出，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各反苏维埃党派企图利用苏维埃的合法机会来为自己的反革命利益服务，俄共应该采取正确的策略，采用镇压措施，在较短的时期内彻底消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这些政治力量。^①代表会议提出的这个任务无疑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在多党竞争中确立自己的执政地位，有各方面的原因即有主观原因（党的自身建设）也有客观历史原因。

在主观方面，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无疑是最出色的。且不说黑帮、立宪民主党等大地主和资产阶级政党意识形态的腐朽和没落，即使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也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虽然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都以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为指导原则，但是孟什维克在策略上，甚至在一些纲领性原则上，受第二国际某些理论家的影响太大，提出的策略和观点往往脱离俄国实际，而布尔什维克党领袖列宁虽然也常年流亡国外，但是他始终关注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对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传统进行过科学的系统的研究并根据俄国的实际来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制定党的斗争策略。正是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斗争策略引导布尔什维克走向胜利。

在客观历史方面，俄国专制制度的传统对俄国一党制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俄国历史上没有民主的传统，没有建

^① 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234—239页。

立民主制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上没有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私有者阶层、中间阶级。政治上实行沙皇君主专制，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垄断资本主义。因此，严格地讲，革命前缺乏民主设施和民主文化传统，居民也不具备相应的社会心理。在推翻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后，甚至同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尤其是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间，也无法达成协议，不能相互理解，经常用暴力和恐怖手段解决分歧。这也是苏俄最终形成一党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布尔什维克党内有铁的纪律也是该党能在众多政党中脱颖而出的重要条件之一。列宁在总结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原因时明确指出：“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①那么这种铁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呢？列宁指出：“第一，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②一个革命政党，要真正能够成为必将推翻资产阶级并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没有上述条件，就不可能建立起纪律。在1917—1920年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布尔什维克仍能顺利地实现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从而保证布尔什维克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这正是布尔什维克与其他政党的不同之处。而其他政党，从立宪民主党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135页。

② 同上第136页。

到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从一开始就处在不断的分歧和分裂之中，没有形成统一的策略和行动。

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是布尔什维克成功的主要条件之一。这是布尔什维克的主要特点。这个特点不仅决定了布尔什维克组织的特点，也决定了他们的执政特点。在革命前的地下活动年代，布尔什维克依靠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保全了自己的组织；在国内战争和武装干涉的时期，布尔什维克党依靠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不仅针对党员）保卫了十月革命的成果，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成了布尔什维克的工作作风。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苏维埃政权给小农某些自由，允许农民在市场上自由出售缴税后的剩余农产品，这种做法曾在党内引起不解和不同程度的抵制，认为这是违反社会主义的。在这些人看来，“战时共产主义”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才是社会主义。他们已经适应、熟悉和喜欢上这种政策和工作方法。这对执政党后来的政策有巨大的影响。

二、执政党与国家政权

苏维埃俄国的国家政权建设是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列宁早在十月革命前很久，就批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虚伪性和反动本质，认为议会不过是一个“清谈馆”，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弊病，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制冠冕堂皇地宣布一切公民平等，而实际上却伪善地掩盖剥

① 参看《无产阶级专政的七年》1925年莫斯科版第227页。

削者资本家的统治，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似乎能够真正平等的思想欺骗群众。’^① 列宁认为，苏维埃是真正的民主制度，是比任何完善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都更加民主的制度，它使一切劳动者真正享有平等权利，使大多数人即劳动者实际参加国家管理而不是像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那样实际管理国家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按照列宁的构思，苏维埃把立法权力和行政权力合而为一使国家机构接近劳动群众保证工农群众比在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度下有更大的可能并用最容易最方便的方式来选举和罢免代表。^②

在实际生活中，苏维埃政权的确是这样组建起来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两届代表大会间隔期间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2年苏联成立后各加盟共和国也建立了相应的权力机构。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不仅是立法机关，也是执行和管理机关。它负责组建政府，制定政府活动的总方针，监督宪法的贯彻执行情况。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既参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同时也在各苏维埃机构和企业中工作，把实际工作经验带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活动中来。

最初，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常设办事机构，几乎经常不断地开会（通过简单的多数解决各种问题）从1918年秋天起改为定期开会而到1919年由于其所有成员都到前线作战就无法开会了。

苏联成立后，建立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开始是一院制从1923年7月起为两院制。两院具有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722页。

② 参看《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722—733、738页。

平等的权利 分别进行表决。最初 两院是分别讨论问题 共同讨论问题的建议经常得不到支持。从 20 年代末起 经两院同意 经常召开联席会议。这同 20 年代末的政治形势有很大的关系。

根据 1924 年的苏联宪法和 1923 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有关条例，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范围非常广泛：批准有关政治和经济生活准则的法令；通过苏联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建立全苏的税收制度，建立统一的货币制度；解决各加盟共和国之间有争议的问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权废除各加盟共和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违反苏联宪法的决定，建立土地规划和土地使用制度，确立司法制度的司法程序。在对外政策方面，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权举借外债 批准条约。^①

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临时工农政府——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列宁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成立后，建立了苏联人民委员会。这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管理机构。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后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多党参政机构。在各政党的权力竞争中，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发动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到各级苏维埃开展工作，1918 年 9 月 21 日 布尔什维克中央向地方党组织发出指示信，论述党接管国家权力的任务。此前，1918 年 5 月布尔什维克中央发布命令，要求各级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及其执行委员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服从地方党委会的指示。中央命令中指出：“鉴于党团、党的委员会和小组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中央提醒各级苏维埃及其执委会党团

^① 参看《苏联国家机构史》1986 年莫斯科版第 50—61 页。

的全体党员同志，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机关的指示。中央提醒大家 党团是党组织的一部分 其领导中心是党的委员会。”这是 在多党执政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党确立的自己同权力机构的关系。

1919 年 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党纲的报告时，谈到了国家管理问题。十月革命前和十月革命后的初期，列宁曾设想通过苏维埃吸引全体劳动人民参加国家管理，从而实现最完备的民主制度。但是在实践上不得使用旧的官僚来参加国家管理工作。不久列宁改变了过去那种认为厨娘也可以管理国家的想法，而是把国家管理同文化任务和教育任务联系起来。列宁讲道：“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①

这样一来，实际上明确了由无产阶级政党来代替劳动群众进行国家管理的思想。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对此作出了更加明确和详尽的规定。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共产党要特别力争在当前的国家组织——苏维埃中实现自己的纲领和自己的全部统治……在所有的苏维埃组织中，绝对必须建立严格服从党的纪律的党团。在该苏维埃组织中工作的全体俄共党员都应该参加这种党团”，俄共应该把自己最坚定忠实的党员提拔到所有苏维埃中，取得“政治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并对苏维埃的全部工作进行实际的监督。”^②

这是第一个较系统地论述党和苏维埃关系的文件，该文件中同时指出，无论如何不应当把党组织的职能和国家机关即

① 《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3 卷第 770 页。

② 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1 分册第 570—571 页。

苏维埃的职能混淆起来。党努力领导苏维埃的工作，但不是代替苏维埃。

根据这样的原则也建立了苏维埃国家的其他机构包括行政—政治机关、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以及军队，等等。

在理论上，共产党是实行一般政治和政策性领导，即通过制定政治路线来解决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问题，把自己的政策变成国家机关必须遵守和执行的法律、法令、决议等贯彻下去，并通过党员保证这些法律、法令、决议的执行和监督。

在这种情况下，干部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列宁曾多次强调，干部的选拔和配备不仅是组织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于是各级苏维埃，国家管理机关和社会团体的领导人都由党组织推荐，实际上是任命。此外，还在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国家和社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采取兼职的形式。比如，区党委第一书记都在同级苏维埃执委会中兼职。俄共认为，这种做法可以更好地协调党和国家机关的行动。当时列宁就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共产党和各级权力机关的这种相互关系自然而然地使党内的纪律和领导作风推广到苏维埃及其他管理机关中去。这种工作作风的典型特征就是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以及行政命令。此外，“百分之九十九的负责的共产党员被派去干的并不是他们现在就胜任的工作，他们不会干自己那一行”^① 这更加重了行政命令的工作作风。这种状况导致党、苏维埃和其他国家管理机关职责不清，经常是以党代政，官僚主义现象严重。

1920年底列宁承认，“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端的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698页。

工人国家”。^①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虽然无论是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还是列宁本人，都一再强调不能混淆党和苏维埃的职能，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1922年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在我们党同苏维埃机构之间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关系”。^②很多具体小事都要弄到政治局去解决。而从形式上规定不允许这样做又很困难，因为国家是由唯一的执政党在进行管理，执政党内部又实行严格的集中和纪律。列宁曾坦诚地说：“在这一点上我也有很大的过错，因为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之间很多事情都是通过我个人来联系的。一旦我离开工作，两个轮子立刻就不能动了”。^③不仅如此，当时有 18 个人民委员部，其中“工作根本不行的不下 15 个（列宁语）”。

但是，党政不分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这主要是因为，党的有关文件已经确定了党同其他机关的关系，党员对党组织应负的责任。虽然党员在政府各机关和各级权力机关中担任负责工作，但是他主要应该服从党组织的领导，听从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人的指示。这一点已经深深地印在党员的脑海里并有党的纪律的约束。

因此，1922年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常委会在讨论检查机关条例草案时，因“双重”领导问题引起激烈争论。司法人民委员部起草的条例草案第 5 条规定：“地方检察长越过地方执行委员会，直接受共和国检察长的领导；地方检察长的任免、调动和停职也只通过共和国检察长”。常委会有关委员会在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0 卷第 204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4 卷第 696 页。

③ 同上。

审议该条款时，多数委员主张地方检察长受省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机关通过共和国检察长的双重领导。俄共布中央为领导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而设立的专门委员会也通过了同样的决议。实际上这是否定司法、检察机关独立，把司法、检察机关置于地方行政当局，同时也是置于俄共布的领导之下。因此，列宁专门通过电话口授给政治局一封信，建议中央委员会否决“双重”领导，规定地方检察机关只受中央机关领导。5月22日，政治局以多数票通过了列宁的建议，并把这个问题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的共产党党团审议。可是常会共产党党团仍主张“双重领导”。最后中央政治局再次出面干预，才使否定“双重领导”的条款获得通过。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执政党同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事实上，一切重要问题甚至并非重要的问题都要由俄共布最高机关解决。久而久之，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又有了发展，发展到机构重叠、办事拖拉、互相推诿、无人负责。由于机构重复设置，党的机构一般负责通过决议，而政府机构一般负责执行，因此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脱节，决策缺乏科学性，执行缺乏积极性。这个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直到苏联解体以前，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这种做法一直作为固定的模式、体制存在于所谓的苏联模式之中。

三、党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

所谓社会组织，这里主要指工会、青年组织即共青团、妇女组织和合作社组织。这些组织可囊括所有行业 and 所有年龄的成年公民。共产党同这些组织的关系是一种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系。共产党正是在这些组织的帮助下动员工人和农民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

1921年苏维埃俄国有将近850万劳动者参加了各行业工会，其中人数最多的是铁路和水路运输工会，大约有150万人；五金工会大约有60万人，纺织工会42.8万人，矿工工会32万人。因此发挥工会的作用至关重要。

关于工会的作用，俄共（布）和工会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许多决议中已经作过有关规定。1918年1月初，全俄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目前，工会工作的重点应当转到组织经济方面。工会是按生产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它应当担负起组织生产和恢复我国被破坏了的生产力的主要工作，积极参加调节生产的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组织工人监督、登记和分配劳动力，组织城乡之间的交换，积极参加工业的军转民工作，同怠工现象作斗争，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等等……这就是当前的任务。”在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日益发展的工会应当成为社会主义政权的机关，应当同实现组织经济生活的新原则的其他组织并列地进行工作。”

1919年俄共（布）党纲指出：“公有工业的组织机构应当首先依靠工会……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因此，工会用这样的方法来保证中央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且广泛地吸引后者直接参加经济管理。”^①

1920年秋天，在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中，托洛茨基建议按各个工业部门把经济机关同工会合并起来，赋予这些统一体以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541—542页。

行政—经济管理职能，使工作“国家化”。托洛茨基还建议对工会进行“整刷”，把善于“拧紧螺丝”的人放到工会岗位上，采用强制性的工作方法。他非常热中于“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众所周知，这一时期俄共（布）内部就工会作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党内许多重要领导人，如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索柯里尼柯夫等人，都卷入了这场斗争中，列宁批评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工会问题上的观点，提出了在苏维埃俄国，工会的最重要作用是共产主义学校的观点。但是托洛茨基等反对派在争论中显然是从党纲中的上述论点出发的。他认为列宁等人对工会的态度背离了党纲。

但是 1920 年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对工会的作用又作了明确规定，实际上是修改了党纲中的说法。对此托洛茨基等人显然是有意回避了。代表大会《关于工会和工会的组织问题》的决议指出：“工会的任务主要是在组织经济方面和教育方面。工会不应当作为一种独立的、组织上孤立的力量，而应当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国家的基本机构之一来完成这些任务。”代表大会接着指出：“由于苏维埃政权是集中无产阶级全部社会力量的最广泛的组织，所以显而易见，随着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和创造精神的发挥，工会应当逐步变成无产阶级国家的辅助机关，而不是相反。”^①

1921 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对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进行了总结并进一步明确了工会的地位和作用。代表大会指出：“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是向阶级觉悟程度不同的一切无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2 分册第 18—19 页。

产者敞开大门的群众性组织”。^①

由此可见，关于工会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是在激烈的争论中逐步明确的。虽然托洛茨基仍然反对关于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的提法，但是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后，这个问题原则上算是有了结论。

从此以后，工会的主要活动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团结劳动者，吸引他们参加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工作。工会开始更加坚定地动员工人努力提高生产率和加强劳动纪律，更加重视在劳动者当中开展文化教育工作和举办职业技术训练，关心保护私人企业、小手工业中工人的利益。

俄共（布）为了加强对工会的领导，派出一些有威望的党员加强共产党党团和工会机构，如 1921 年 5 月派扬·厄·鲁祖塔克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责任书记、费·安·谢尔盖耶夫、阿尔乔姆·狂全俄矿工工会主席、伊·伊·列普斯为全俄五金工会主席。瓦·弗·古比雪夫也参加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

俄共（布）认为：“只有当工会在形式上是非党的组织，但是在实质上是共产主义的组织并执行共产党的政策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才有保证。”^② 因此，党要求在每个工会中都应当有有纪律有组织的共产党党团；每个党团是地方组织的一部分，隶属于党的委员会，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则隶属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

此外，俄共（布）还非常重视对基层工会的领导。共产党领导工厂委员会和地方工会委员会的选举工作。例如 1922 年秋天索尔莫沃工厂改选工厂委员会时，省里党的积极分子中的优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2 分册第 75 页。

② 同上，第 19 页。

秀力量都被吸引来参加这个大企业的选举工作。结果，在新选出的工厂委员会中，先进的工人共产党员占了多数。彼得格勒五金工人在改选五金工会各工厂委员会的运动中取得很大的成绩。改选前各工厂委员会中党员占 32%，改选后占 60%。其他地区情况亦大致如此。

在从战争向和平建设过渡的过程中，经济困难对青年人产生很大影响，很多没有专门技能的青年工人失去工作。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最初几年，私人企业数量增加，许多青年到私人企业谋生。这部分青年同共青团组织失去联系。他们的困难处境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社会情绪。为此，俄共（布）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改进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希望通过共青团组织加强对所有青年的影响。仅仅从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到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一年时间里，中央组织局和书记处就审议了 156 个有关共青团活动的问题。^① 中央委员会要求党的组织经常帮助共青团，选派共产党员加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层组织。俄共（布）中央指示共青团组织，尤其是各民族共和国的共青团组织，要改进组织活动和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积极地参加苏维埃的工作。中央还要求共青团维护在私人企业中工作的青年的经济权利。

1921 年 6 月举行了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代表会议认为必须把共青团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工厂支部上，加强共青团同劳动青年的联系，扩大共青团的工人核心。代表会议规定非工人成分的青年在被吸收入共青团时要有预备期。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共青团员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关于在工

^①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2 年 3—4 月）》1961 年莫斯科版第 675 页。

厂中组织突击队的决定。

1921年9月又举行了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充分说明了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后俄共布对青年工作的重视。代表大会号召各级共青团组织更加广泛地吸引青年参加恢复工厂、运输业和发展农业的工作。同时要求共青团组织更加关心青少年的劳动保护，提高职业教育水平和改善青年工人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代表大会号召共青团组织巩固农村支部，吸收贫雇农青年参加共青团，提高他们的文化政治水平。

应当指出，俄共布的青年政策对于组织青年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巩固苏维埃政权，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随着向经济建设过渡，劳动妇女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专制制度下，妇女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受到残酷的压迫。十月革命后妇女得到解放，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战争结束时，列宁指出：“妇女……参加党和苏维埃的工作具有巨大的意义”。^①他还指出了妇女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只有在全俄千百万妇女而不是几百个妇女参加进来时”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够向前推进”。^②虽然当时还没有正式的妇女组织，但是俄共布中央和地方党委员会下面都设立了妇女工作部。党中央制定了俄共布中央和省委会妇女工作部章程，经常召开这些部的领导人会议。俄共布中央妇女部还出版机关刊物《女共产党员》杂志，《真理报》等许多报纸都定期出《女工专页》等等。这些工作提高了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提高了她们的文化水平、政治水平和劳动技能。在那些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妇女从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86页。

②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50页。

前受的剥削和压迫更加深重，党组织对妇女工作给予特别的重视。1921年4月中央委员会召开了苏联东部第一届妇女工作组织会议。会议对成立妇女俱乐部给予高度评价。1920年根据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妇女部的倡议，成立了第一个妇女俱乐部不久许多地区都成立了妇女俱乐部这是文化教育性质的机构在这里妇女们可以了解医学知识、生产情况。甚至在游牧民聚集的地区也成立了流动红色帐篷俱乐部。所有这些都助于吸收广大妇女群众参加经济建设。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合作社的作用越来越大。严格地讲合作社不仅仅是社会组织它更是一个经济组织。由于合作社在联合劳动农民和手工业者、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小手工业、实现城乡间商品交换方面起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所以俄共布对合作社给予高度重视，努力使合作社运动服从党的领导按照俄共布确定的方向发展。

合作社在俄国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它在打破俄国村社的封闭状态，发展农村资本主义关系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布尔什维克认为，革命前俄国农村和城市的各种合作社均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合作社。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对旧的合作社进行了改造，把它们置于国有企业和国家机关的控制之下。布尔什维克政权把合作社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加以利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布尔什维克党对合作社的态度又有了巨大变化。列宁晚年曾明确指出：“在我国现存制度下，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生产资料属于国家

即属于工人阶级的”。^①“在我国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②

正因为合作社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俄共（布）及苏维埃政府加强了对合作社的领导和引导。从新经济政策时期起，俄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通过了一系列法令，规范合作社的活动，培养合作社干部，把富裕农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赶出合作社领导机关。

布尔什维克党所做的这些工作加强了合作社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作用，促进了国内政治局势的稳定。

这样一来，布尔什维克在确立了一党统治地位后，又把所有社会组织都纳入自己的领导和影响之下，使整个社会都能够按照共产党的方针发展，按照俄共（布）和列宁的社会主义目标前进。

四、党同人民的关系

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③

这段话精辟地论述了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即党应该表达人民的愿望，维护人民的利益，为人民的事业而斗争。只有这样，党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772页。

② 同上第773页。

③ 同上第685页。

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并不是俄国最大的政党。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都比布尔什维克影响大。但是立宪民主党企图恢复君主制或搞君主立宪，它维护的是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它很快就被人民抛弃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虽然都主张俄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当然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各不相同），主张对俄国进行革命改造。但是他们从护国主义立场出发，主张继续进行战争。而且他们没有准备掌握政权，主张由资产阶级掌权。这样一来，他们实际上无法反映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只能跟在资产阶级后面，或至多起资产阶级政府反对派的角色。他们也不可能得到人民的支持。饱受战争之苦、深受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是：和平、土地和面包。布尔什维克清楚地认识到了人民的迫切要求，勇敢地出来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毫不犹豫地承担起历史的责任，及时果断地领导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发起进攻，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立即着手实现和平，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才能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面前坚守自己的阵地。但是，国内战争结束后，布尔什维克党仍然实行旨在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因此也损害了工人的利益。1920年底至1921年初俄国各地爆发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和城市骚乱，说明布尔什维克已经同工人和农民处于危险的对立状态。苏维埃政权面临着被推翻的危险。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及时改变政策，停止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充分考虑和照顾农民的要求和愿望。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改善了作为苏维埃政权牢固基础的工农关系，活跃了国家的经济生活。

俄共布根据历史经验把党和劳动者的紧密团结看成是向社会主义顺利前进的条件。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号召全党“到群众中去！”列宁曾严厉批评个别党员企图以空话和命令来代替在人民中间进行耐心的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的高傲态度和官僚主义作风。他要求共产党员深入研究劳动群众的情绪，善于说服群众并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不要迁就缺点和偏见，而要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政治觉悟。列宁写道：搞好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联系，这就是：

“联系群众。

生活在群众之中。

了解情绪。

了解一切。

理解群众。

善于接近。

赢得群众的绝对信任。

领导人不应脱离所领导的群众，先锋队不脱离整个劳动大军。”^①

为了加强同工农群众的联系，当时实行了召开非党的会议和代表会议的制度。中央委员会建议各级党组织认真对待这两种会议。在这些会议上非党农民和工人同共产党员一起认真地讨论复杂的国家问题，提出建议，制定克服企业和机关工作中的缺点和具体措施。担任企业和苏维埃机关领导人的共产党员在会上要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介绍工作进展情况，阐明有待解决的任务和必须克服的困难。这些会议对于沟通党和群众的联系，促进群众积极性和政治觉悟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525—526页。

但是，在党和人民群众关系中，当时更多地强调党对各阶层劳动群众的领导和教育，而忽视了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干部的监督，对各级管理工作的参与。这个不足和缺陷一方面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发挥，另一方面也使官僚主义逐渐滋生和蔓延开来。

历史的发展进程表明（俄共（布）以及后来联共（布）苏共在领导俄国和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同群众的关系不断疏远。苏维埃政权初期，布尔什维克党认为，由于群众普遍文化水平低，不可能实现劳动群众的管理，而只能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进行管理。这一时期，由于彻底摧毁旧制度后缺乏管理人员，一些旧时代的官吏被吸引参加管理机关，从而助长了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作风。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建立起一整套使劳动人民参与国家管理和对国家官吏进行监督的有效机制。人民无法监督和召回他们选出的代表，无法通过有效途径赶走那些不称职的、甚至腐败的官吏。

众所周知，苏联最终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这个体制的核心是党。而党内实行严格的集中制（实际上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一直没有得到实现）。人民群众在社会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主人公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久而久之，执政党和群众的关系又变成了简单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好执政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是苏联官僚主义严重泛滥，最终导致执政党垮台的原因之一。

第十章

共产党与苏联体制

一、共产党的组织政治活动

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掌握了国家政权，确立了对所有社会组织的领导地位。共产党的组织政治活动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俄共（布）的组织政治原则是在 1919 年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确定的。众所周知，这时正值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和苏维埃国家正实行严格的集中制、铁的纪律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对布尔什维克党组织政治活动原则的制定有所影响。

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奥新斯基和萨普龙诺夫等人认为在国家机关建设中建立严格的集中制、制定铁的纪律是践踏民主制。此外，还有人中央的组织政治工作提出严厉批评，主要内容有：“在国家建设方面群众工作死气沉沉”；“文牍主义严重”；“党

组织取代了苏维埃的职能”等等。奥新斯基、萨普龙诺夫、伊格纳托夫和柯伦泰建议把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分开，赋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职能，把各人民委员部变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部门，以便更有效地监督它们的工作，在地方苏维埃执委会内设特别行政司法部以杜绝滥用职权的现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中央和地方权力机关的权限，等等。奥新斯基认为，这些措施“可以防止苏维埃机构出现官僚主义现象，活跃苏维埃的工作，吸收新干部参加苏维埃工作，有助于消除群众对苏维埃机构缺点的不满情绪。”

代表大会批评奥新斯基和萨普龙诺夫等人的观点，拒绝了“反对派”的建议，强调保持原来的党和国家的权力结构，特别强调“在目前阶段党必须直接实行军事纪律”。^①与此同时，代表大会也指出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沾染官僚主义的严重危险”，但是这时并没有把官僚主义视为一种社会现象，由于缺乏民主和监督机制造成的，而认为是由个别领导干部的个人品质造成的。

按照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设想，党和国家的权力结构是这样的：俄共（布）最高权力机关是党代表大会，至少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由 19 名委员和 8 名候补委员组成。根据俄共（布）八大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央委员会每月召开两次全体会议，讨论“一切急需解决的最重要的政治和组织问题”。为了主持日常的政治和组织实践工作，俄共（布）中央设立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政治局由 5 名中央委员组成，每周召开一次会议，“对不容拖延的问题作出决定”。组织局也由 5

^① 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1 分册第 567 页。

名中央委员组成，每周至少召开三次会议，“指导党的全部组织工作”。组织局还主管中央鼓动宣传部、登记和分配部、党的新闻部等部门。书记处由一名责任书记（由组织局成员担任）和 5 名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的书记组成。

俄共（布）组织政治机关负责保证中央同地方党组织的日常联系，下发信件和指示，收集地方上报的关于地方政治形势、关于俄共（布）省委、县委针对最重要的社会经济政策问题通过的决议的情况。俄共（布）中央机关负责对党的前线动员工作、粮食工作、运输业工作进行一般性指导，还负责“有计划地调派”党的干部。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关于党的干部分配的决议是必须执行的，只有经组织局批准才能撤销决议。在地方，党的省委员会和市委员会也有相应的权力。根据党的干部“调动”的资料形成有关登记文件（档案），记载某干部的工作能力以及关于该干部在党和国家机关岗位上晋升的情况。

在俄共（布）中央注册的党员干部为俄共（布）中央“主管干部”；在省委注册的干部为省委“主管干部”，以此类推。各级主管干部职务的设置和任命需经上级机关批准。由中央书记处官吏发明的这套工作程序逐渐变成了一种社会制度，涉及一个特殊的共产党员阶层。在俄共（布）苏共的历史上俗称为负责工作人员，得到中央或地方省委员会的特殊信任，一般不受人民和党员的监督，或无法对他们进行监督。在俄共（布）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间隔时期，雅·斯维尔德洛夫任中央责任书记。他对干部状况比较熟悉，不需查阅专门的登记资料就能提出干部人选。斯维尔德洛夫去世后，负责为组织局会议讨论党的干部任命问题准备材料的俄共（布）中央书记处逐渐变成苏维埃俄国

一个官僚机构^①，下设有局、处，一开始有几十个人，后来发展成数百人，有办事员、打字员、速记员、信使等等。当然，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是因为由书记处提交组织局和政治局讨论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组织局和政治局不得不陷入一些纯行政事务工作中。接替斯维尔德洛夫任中央责任书记（在八大到十大期间是尼·尼·克列斯廷斯基。他同时兼任组织局委员，在解决党的组织和政治活动的最重要问题方面已经拥有很大权力。

在 1919 年 12 月举行的布尔什维克第八次全俄代表会议上，俄共（布）八大关于组织问题的建议正式写进党章。党章中还增加了党员预备期（工人和农民至少经过两个月预备期，其他人员须有 6 个月预备期，入党须经两个人介绍并由当地党委审查）关于州、省、县和乡党组织和党支部等等内容。新增加了关于党的纪律的条款，指出，“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和一切党组织的首要义务”关于党外机关和组织（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工会、公社等）中的党团的条款，要求这些党团“严格而坚决地执行”各级党组织的会议。全俄代表会议还特别重视“使用”新党员问题。为了积极吸引新党员参加党的工作，建议教不识字的共产党员识字，执行“最简单的管理职能”，要求党员学习关于共产主义理论，参加党史方面的讲座，等等。所有党员都必须参加基础军事训练，并“参加特别支队”。^②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明确要求党组织“在劳动者的一切组织（工会、合作社、农业公社等）中起决定性的影响和掌握全部领导”。决议号召党力争在当前国家

再后来，这项工作由苏共中央总务部负责。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1 分册第 589—604 页。

组织——苏维埃中实现自己的全部统治。^①实际上，这意味着俄共（布）中央组织政治机构的权限不仅扩大到各级党委，而且扩大到包括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在内的各级国家机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作用被忽视，从宪法规定的实行最高立法和执行权力的集体领导机关变成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一长制领导的机关。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只是为了批准俄共（布）中央起草的法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大都是各省党的领导人，他们可能很熟悉地方的社会政治生活问题，但完全不懂得全俄的立法工作。而且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期很短（1—2个星期），根本不可能认真研究某项法案。人民委员会会议是经常和定期召开的。但是当时人民委员很少出席会议，经常是派他们的副手与会。当时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是列宁，据有关资料记载，会上很少发生争论，因为主要决策环节在党内。

俄共（布）中央组织政治机构在地方的全权代表是党的各州、省和县委员会，负责领导地方苏维埃执委会的工作。州委、省委、县委和市委（大城市）常委会在相应的州、省、县和市党代表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上选举产生并经上一级党的机关批准。地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形式上是在苏维埃（共和国、省、县和市）代表大会上按照地方党组织常委会提出的名单选举产生的，也需经上级党的机关批准。原来布尔什维克党章规定的地方党组织在处理地方事务上的相对自治权受到很大限制。

中央执行机关和职能部门——各人民委员部和部门对俄共（布）中央组织政治机构有某种相对的独立性。这些部门的领导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1 分册第 570 页。

均由俄共（布）中央任命，但是他们的工作不受党的监督，因为这些都是些要求专门知识的具体工作。这些中央职能部门的共产党领导人要熟悉他们的工作特点（粮食、运输、工业等等），他们要迅速学会利用各种专家做具体工作，自己负责维护上级部门的利益。军事部门内部这种“劳动分工”最明显。

当时在这种体制下，人民委员部在地方的全权代表同地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经常发生摩擦，因为代表中央利益的全权代表并不总是考虑地方的利益和条件，不认为自己应该服从地方党组织的领导。甚至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也对中央职能部门那些不完成中央任务的责任人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办法惩罚不做具体工作的人民委员部领导，而那些做具体工作的人有时根本不是党员，而是“党外专家”。

中央各职能部门都配备了“党外专家”。布尔什维克经常讲，这些专家是官僚主义的根源，这些为苏维埃政权服务的资产阶级专家把专制官僚机关很多坏作风和传统都带到苏维埃机关中来，如工作拖拉和滥用职权现象。

俄共（布）中央非常重视国家镇压机关，特别是全俄肃反委员会。这些机关有不经审判镇压“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特权。俄共（布）中央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同时又是“出色的契卡人员”，随时保持高度警惕，向“有关部门”通报所有“可疑分子”。当时鼓励揭发批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政策的人。俄共（布）中央不仅没有阻止滥用暴力的行为，反而主张施行“红色恐怖”。国内战争时期，有些地方已经出现 30 年代那种“三人小组”由党委书记、地方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和地方契卡主席组成。在许多地方，“三人小组”已成为省或县的权力机构。

俄共（布）这种组织政治结构和国家权力结构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组织政治形式的

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问题是，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并没有改变这种结构甚至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也是如此。实际上，这已经是苏联体制或模式的雏形。

1920年初 俄共布 党员人数已经增加到 60 万人 其中至少 2/3 的人在红军服役或在各种国家机关中工作。他们都是由国家保障供给，职务越高，供给水平越高。另外，据有些非官方资料表明 这 60 万党员中有近 18 万工人，但是他们不是根据职业，而是根据出身而列入工人一类。其中究竟有多少真正的工人，党内没有统计。有一点非常重要，即这一时期的共产党员大都承担一定的管理工作，因此党事实上已经同政权融为一体，成为行使政权和管理职能的政党。

像在任何国家一样，由于存在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的结构等级制，苏维埃俄国的国家职员阶层的成分是极其复杂的。对于一个行使国家权力和管理职能的政党来说，党员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是不同的，一个人的职务越高，他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就越大。因此个人的物质待遇和特权往往取决于所谓的职务。于是党内自然地分化为“上层”和“下层”不是简单的上下级领导关系，而是同物质因素混杂在一起。党内上、下之间的矛盾随之产生。这不是通常的党内矛盾，党内事务，而是更加复杂的社会问题。

首先，由于国家权力和管理的不断集中，党内出现社会分化；与此同时，由于出现不同的政治群体和两代共产党人（十月革命前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和新党员）之间的冲突，党内上层经常发生政治分歧。1920 年曾访问苏维埃俄国的著名英国哲学家和政论家贝·罗素看到了这种情况。他写道：“我认为 整个执政阶层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的人。第一种是多年受反动专制制度和临时政府迫害的老革命近卫军。大多数最高领导职务都由这

部分人担任。监禁和流放生活锤炼了他们坚韧不拔和狂热的性格。这是一些非常忠诚的人，深信共产主义会改造这个世界。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伤感情绪，但是在共产主义和他们所建立的制度面前，他们非常容易伤感。执政阶层中的第二种人是野心家，他们由于布尔什维主义物质上的胜利而成为狂热的布尔什维克……执政官僚的第三种人不是热心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团结在政府周围 因为政府比较稳定 他们是从爱国主义思想出发为政府做事，或者觉得这里可以施展自己的才能。他们中间有些人能力不亚于美国托拉斯巨头，均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取得功名，他们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功名为政府效力。可以说，布尔什维克成功地解决了利用实业家为国家服务的问题，但是不允许他们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发财。’^①

其次 俄共(布)上层’和’下层’以及上层各种政治群体代表人物之间矛盾的客观发展使布尔什维克党不断受到党内斗争和组织分裂的威胁。由于党政不分，在党内斗争中常常采用非同志式的态度和方式，甚至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解决党内问题。俄共(布)在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形成的这套组织政治活动原则亟待改变和改善 因为党的活动决定着国家的发展 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前途。党的前途决定着国家的前途。

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官僚主义是以往一切剥削阶级政权无法摆脱的疾患。无产

^① 贝·罗素《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和实践》1991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5—46页。

阶级政权机关能否克服官僚主义？怎样克服官僚主义？这是新政权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布尔什维克党领袖列宁始终关心的问题。十月革命后，他曾非常忧虑地指出：“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即官僚主义。——作者注）”。^①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曾在反对官僚主义方面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② 列宁充分肯定并高度评价了巴黎公社的原则。他在《国家与革命》这篇著作里，针对公社采取的这两条民主措施指出：“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量转化为质’的实际例子。”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由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③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部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的著作里，设想“工人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把它彻底摧毁，彻底粉碎，而用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措施：（1）不但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所有的人都要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④ “把国家官吏变成我们的委托的简单执行者”^⑤，“变为特殊‘兵种’的工人”^⑥。列宁坚信，“如果沿着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30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13页。

③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147、148页。

④ 同上第210页。

⑤ 同上第154页。

⑥ 同上第20页。

这样的道路前进，我们就一定能彻底破坏官僚制’^①。

但是，由于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便爆发了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国家建设等问题暂时被搁置起来。到国内战争结束、和平建设时期到来的时候，苏维埃俄国的官僚主义现象已经相当普遍地反映出来。1918年，官僚主义问题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到1919年3月举行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时列宁已经提醒说“官僚主义就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②1921年春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和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都开始对官僚主义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1923年列宁在自己的晚年郑重地宣布：“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他痛心他指出：“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建立还不很久，却已积了这样一堆形形色色的渣滓”。^③

当时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是：办事拖拉、议而不决、不学无术、狂妄自大、滥用职权、独断专行等等，对事业造成很大损害。

与此相联系，当时严重存在人浮于事、机构庞杂、臃肿的问题，各种公文浩如烟海。苏维埃机构陷入琐碎小事和官僚主义烦琐事务的泥坑而不能自拔。有一个例子，1918年8月对莫斯科的机关进行一次调查，当时国家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人员总共有231000人。于是提出精减机构问题。到1922年10月又进行一次调查，精简的结果是机关工作人员数量反而增加到243000人。^④

为什么会产生官僚主义？它的根源在哪里？列宁认为，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已发展起来的资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21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08页。

③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791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508页。

产阶级正是为了反对工人的（部分地也是为了反对农民的）革命运动而需要官僚机构，首先是军事的、其次是法庭等等的官僚机构。这种现象我们这里是没有的……我们这里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是另外一种：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涣散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 交通的闭塞 文盲现象的存在 缺乏农工业之间的流转 缺乏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协作”。^①除经济方面的原因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观念上的原因。在旧制度下，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压迫和奴役。在苏维埃政权条件下，人民群众“对自己现在是统治阶级这一点还不习惯”。而“革命不可能立刻在一生困于饥饿贫穷而不得不在棍棒下工作的千百万人身上培养出这种品质。”^②其次，劳动人民缺少知识和文化，他们不能立即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能。由于缺乏管理人才，当时不得不在许多部门起用一些资产阶级专家。这对苏维埃政权内部滋生官僚主义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外，“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也助长了官僚主义的产生。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指出，这一时期“党的工作方法总的说来趋向于战斗命令制……由于需要极端集中化……就发展了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倾向……”^③因此党的十大决定用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同时，还决定改变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方法 用“工人民主制”取代极端集中制 使民主集中制的重心由集中转向民主，以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

与此同时 列宁已经意识到官僚主义是一种顽固的现象 不是简单地把旧社会残缺不全的民主制加以扩大，实行政治变革就可以消除干净的。他指出：“可以赶走沙皇 赶走地主 赶走资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51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05页。

③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51—52页。

本家……但是 在一个农民国家中 却无法‘赶走’、无法‘彻底消灭’官僚主义。只能慢慢地经过顽强的努力减少它”。^① 列宁在世时为同官僚主义斗争作出很大努力。首先，他希望通过吸引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国家克服官僚主义。“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② 但是，由于受文化水平限制，居民不可能大规模地参加国家管理。鉴于这种情况，列宁要求尽可能地吸引和选拔工人参加管理，参加工农检察院。第二，主张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经济条件，提高居民的文化水平。为了向官僚主义作斗争 让全体人民管理国家“首先应当改善一般生活条件，使工人不必拿着口袋四处奔走找粮食”^③；需要每个人都识字、每个人都有文化’^④。因为在贫穷落后、缺乏生活保证的条件下 谈不上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第三 主张精简机构 重视人才，提高工作效率。列宁要求“毫不留情地赶走多余的官员，减缩编制”^⑤；撤换不认真学习管理工作的共产党员”。^⑥ 他要求寻找和选拔能干的人才，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最后，列宁主张对官僚主义者采取法律措施。他指出：“要人民法院加倍注意对官僚主义、拖拉作风和经济上的指挥失当进行司法追究”^⑦，由司法人民委员部进行公审。对于那些失职犯罪者，列宁特别强调指出，苏维埃共和国需要的不是神圣的品德，而是处理事情的才能。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50 卷第 330 页。

② 同上 第 26 卷第 154 页。

③ 同上 第 40 卷第 48 页。

④ 同上 第 259 页。

⑤ 同上 第 42 卷第 395 页。

⑥ 同上。

⑦ 同上 第 362 页。

列宁曾设想，一旦我们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把权力交给人民，由人民自己管理国家，历史上那种因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阶级矛盾和利益冲突而产生的官僚主义就会消失。让所有的人暂时都成为“官僚”就是为了消灭官僚，真正建立起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因为按照巴黎公社采取的两个步骤，第一，可以克服国家政权的异化，第二，可以防止国家官僚、官吏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这样也就消除了官僚主义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

但是，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发现在苏维埃政权内部官僚主义已经复活，几乎每个部里都存在官僚主义，而且不仅苏维埃机关内部有，党内也有官僚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袖认为，官僚主义的主要根源在于经济、文化不发展和管理机关中有旧社会的专家，以及一些公职人员品行不端。反对官僚主义的措施也是针对这些根源制定出来的。

事实上，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要复杂得多。巴黎公社采取的两个措施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没有实行，也不可能实行。假使实行，也未必能够杜绝官僚主义。只要有国家存在，就要有专职的官吏，专门的管理阶层存在（厨娘管理国家的说法无疑带有浓郁的乌托邦色彩）。这个阶层（即使在无产阶级国家）也有自己的利益，而这种利益（物质方面的）同官吏的社会地位有直接的联系。无产阶级国家作为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者，也有自己的利益。它需要掌握一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便贯彻自己的政策。因此国家的利益并不总是同社会上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相一致的。这一点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当然无产阶级国家的利益同社会及其某个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并不一定是对抗性的。尽管如此，要克服官僚主义，仅靠推翻旧制度，砸碎旧的国家机器是不够的，甚至仅靠

发展生产和提高居民的文化水平也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和制衡机制。

在这方面，苏维埃俄国的政权建设尚不完善。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建立了议行合一的苏维埃政权。随着布尔什维克在革命进程中战胜其他政治对手，掌握了全部政权，结果苏维埃俄国的权力结构不仅仅是议行合一，而且是党政合一。由于党内实行高度的集中制，对权力机关和公职人员实行监督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在一个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衡的权力结构中，产生严重的官僚主义是不足为奇的。正因为如此，在苏联历史上，官僚主义一直是影响人民积极性发挥、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之一。

三、关于党内民主

虽然俄共（布）和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但是列宁的建党学说是重视民主的。列宁主张发扬党内民主。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虽然列宁提出的党章草案的基础是集中制思想，但是包含了一系列民主原则，如实行集体领导，讨论和通过决议要经过简单的多数、实行地方组织在地方事务上的自治，每个党员或者同党有来往的任何人，都有权要求把他们的声明文本送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所有党组织都有权处理它专门主管的党的工作范围内的事务，等等。这个思想后来用“民主集中制”一词表述。“民主集中制”一词最早是由孟什维克在1905年11月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的。1905年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代表会议确认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把民主集中制原则正式写

进党的组织章程。

在党内生活中，列宁坚决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自己处于少数时，一方面服从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一方面为自己的正确观点而斗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章第一条的争论，十月革命后关于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争论，都充分反映了列宁的民主作风。

在不同时期，在合法条件下和非法条件下，在和平条件下和战争条件下，党在执政条件下和不执政条件下，列宁对民主和集中制原则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但总的讲，列宁尽量强调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当然，党内民主程度不仅仅取决于党所处的历史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党的宗旨、党员的数量和质量、党的政治文化水平、党的领导者的民主作风等等。列宁主张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通过实行民主集中制提高党的战斗力。

在党内实行民主，首先要求创造条件使党员群众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意志，监督党的工作，因此要让党员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列宁认为，一个欺骗自己的党员、掩盖事实真相的党是注定要灭亡的。“如果一个党竟使自己最诚实的代表陷入……骇人听闻的进行欺骗和撒谎的泥潭，那么这样的党也就彻底完了”^①。列宁认为，党内可以有不同意见、不同观点之争，在争论中辩明是非，认识真理。他说：“没有各种倾向之间的公开斗争，不向群众介绍党的哪些活动家、党的哪些组织正采取哪种路线，那就不可能有群众性的政党。”^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认为：“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464页。

② 同上，第16卷第154页。

能发展起来 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①

其次，要发扬党内民主，必须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列宁强调指出：“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活力、朝气蓬勃的政党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再庸俗不过的是沾沾自喜的乐观主义。”^②批评应当贯穿于党的整个生活之中，应当允许对党的所有文件，包括纲领性文件，对所有党员，包括党的领导人都自由地进行批评，批评不应当只是上级对下级的批评，而首先应当是下级对上级的批评。“共产党人的责任不是隐讳自己运动中的弱点，而是公开地批评这些弱点，以便迅速而彻底地克服它们。”^③但是列宁反对批评时走极端和不作任何区别，谴责为批评而批评、为哗众取宠而批评，要求批评应是建设性的。

正是由于党内有这种民主风气，苏维埃俄国比较成功地解决了布列斯特和约问题，比较及时地解决了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问题。

列宁一方面认为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即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另一方面坚决反对任何对少数人采取的暴力形式，反对多数人的胡作非为，反对对少数人的硬性压制，等等。他认为，必须保障任何少数和任何忠实的反对派的权利，通过相应的文件确认这些权利，并且必须保障有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思想斗争的权利。历史经验表明，少数人在许多情况下是正确的。忽视或压制他们的观点使俄国社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值得指出的是，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在苏共、苏联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都造成了很大影响。前面已经指出，该决议是在新经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70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334页。

③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235页。

政策条件下实行的措施，当时列宁曾设想这是一项临时措施。但是历史的发展表明，这个决议的有效期被无限地延长了。由于后来在联共（布）党内所有与斯大林持不同意见的人都被视为反对派，并往往被打成“人民的敌人”和受到镇压，党内已无正常的民主生活可言。

应该承认，在以往的党内生活中，派别活动影响了党的行动的统一，思想的统一，但是并不是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都是反对党的。在列宁时代，党内不同观点、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斗争，即使是尖锐、激烈的斗争，均视为正常现象，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争论有助于党作出慎重的决策，所谓反对派的某些不同意见，并非总是没有道理。在民主的气氛中必然会有各种意见、观点。但是从俄共（布）十大起，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当时主要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的主要领袖人物中，没有人进入中央委员会，而他们中有些人原是中央领导，如安·布勃诺夫曾任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虽然列宁重视党内民主，但综观俄共（布）的历史，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强调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也没有为此建立一整套组织上的保证措施。列宁在世时未完善新形势下党内民主原则，也未能使之具体化，在党的生活准则、党内选举制、监督机制的建设方面还有许多工作未完成。

列宁逝世后，党内斗争日趋激烈。斯大林确立自己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后，党内民主生活开始不断恶化，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不仅被定为反对派，而且往往被视为反党集团，视为阶级敌人，“人民的敌人”。从此党内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一种意见。这种作风还扩展到国家各机关，形成了一种制度。虽然表面上出现了“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但是全党的智慧，人民的智慧受到压制。享受不到正当民主权利的党员，不可能

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党的领导和党员群众的关系开始疏远。苏共最终在 20 世纪末垮台，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苏共内部没有完善的民主机制。

四、谁来监督执政党

布尔什维克党在领导人民推翻资产阶级和地主统治后，明确表示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 即以苏维埃为代表的“高级类型的民主”实现广泛的无处可与之比拟的地方和区域自治 真正把权力和自由交给无产阶级和农民“，消灭议会制的缺点 特别是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代表机关脱离群众”等等。所有这些内容都已写进布尔什维克党纲，成为布尔什维克党为之奋斗的宗旨。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政权结构是以执政党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后迅速战胜其他形形色色的政党 成为执政党 也是合法存在的唯一政党。由于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不高 不能直接管理国家 所以实际上管理国家事务的是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和管理国家的基本模式是这样的：(1)共产党员应该掌握所有国家政权机关，应该领导所有劳动者的社会组织；(2)在政权机关供职和在各社会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人必须绝对服从同级地方党委的领导，接受党组织的监督；(3)各权力机关和社会组织的领导人由同级或上级地方党组织推荐或任命；(4)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一来，实际上所有国家权力都集中在执政党手中。由于十月革命后国家面临严峻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中央权力机关控制了绝大部分资源（首先是粮食）地方苏维埃代表大会和苏维埃执行

委员会的权力以及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由于权力过于集中，而且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大都是职业革命家出身，不懂得经济工作，所以苏维埃俄国出现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认为，必须成立一个监察机构，负责监督领导干部的工作，同“违犯党纪”、“滥用职权”和各种官僚主义现象作斗争。1920年9月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应当由党内最有修养、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能够严格执行党的监督的同志组成。”监察委员会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有权接受和协同中央委员会审理一切控诉，必要时可以同中央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或把问题提交党的代表大会。^①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选出了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一般说来，中央委员不应当被选入监察委员会。但是在第九次代表会议上，中央委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捷尔任斯基被任命为监察委员会首届委员。但是中央决议同时指出，这两个中央委员会在他们的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中不受中央委员会决议的约束。在监察委员会专门讨论同他们的工作有关的问题时，他们不参加表决。

地方也建立了相应级别的监察委员会。为了使监察委员会独立于党的其他机构，地方监察委员会也由党的地方代表会议选举，党委会成员不能参加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相应的党委会之间的争端应当在双方联席会议上解决，如果联席会议上仍然达不成协议，则应由上一级党委会解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之间的分歧应交由党代表大会解决。^②但是，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43—44页。

② 参看（俄）《党的工作者手册》第1册第56—57页。

在实际工作中，要明确划分监察委员会和党委会的职权并非易事。因为，一方面人们希望党委会本身应该杜绝滥用职权现象，另一方面，这种滥用职权的现象又往往同日常的行政事务联系在一起，因而监察委员会不得不接触到地方党组织的实际工作。于是便出现一种情况：监察委员会成员有权出席党委会会议，但没有表决权，而党委会要负责实施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因为监察委员会没有自己的执行机构。事实上，监察委员会不可能保持超然的独立地位。地方监察委员会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地方党的生活矛盾之中，形成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而且经常不知不觉地卷入地方党组织的派性之中。这种情况损害了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声誉，降低了它的作用。人们呼吁加强监察委员会本系统的纵向联系。

1922年3月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对监察委员会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明确指出：“中央监察委员会过去在统一和领导各级地方监察委员会方面是做得不够的，所以要求下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更多地注意这方面的工作。”^①代表大会重申监察委员会担负着严肃和重要的任务，应防止发生无谓的纠纷和派别活动。为了使各级监察委员会切实发挥应有的作用，代表大会再次强调，监察委员会和党委员会平行地行使职权，向本级代表会议报告工作，即省监察委员会向省代表会议报告工作，州监察委员会向州代表会议报告工作，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向党的全俄代表大会报告工作。代表大会还明确了担任各级监察委员会委员的条件：中央监察委员应至少有10年党龄，省监察委员会应至少是二月革命前入党的党员；监察委员不得兼任党委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193页。

员会委员 也不得兼任负责的行政职务 等等。

这些规定对于改善各级监察机关的工作起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俄共布权力结构的变化 监察委员会制度的应用范围和所起的作用发生了变化。众所周知，当时俄共（布）内部的最高机构依次分别是代表大会、中央全会、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其中书记处最初只是为组织局做决策服务的机构，1920 年以前实际上只有一名责任书记斯维尔德洛夫（他于 1919 年 3 月去世后则是克列斯廷斯基）。但是 1920 年 3 月又加派了两名书记，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这 3 个书记每人主管中央委员会的几个部，具体工作程序是，凡是需要由一名书记作出决定，而不需提交组织局研究的比较重要的事情，需在 3 名书记协商的基础上处理。1921 年对书记处和组织局的关系形成了一个明确的说法：“如组织局成员中无人表示反对，……书记决定可视为组织局的决定”。^① 书记处的权力扩大了。1922 年 4 月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后的全会上 斯大林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成为一身兼任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这 4 个机构的成员的唯一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斯大林充分利用了这个条件。他逐渐地把中央监察委员会也控制在自己的手里。1921 年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按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由 5 名委员和 2 名候补委员组成）中只有一人在 1922 年重新当选 而在 1922 年当选的 7 名委员中 有 4 人后来曾多年保持自己的职位。从此，中央监察委员会开始转化为与党的书记处权力平行的另一个高度集中的权力机构，从最初防止党内官僚主义的机构逐渐变成党内某些领导人手中的政治斗争工具，监察委员会曾在惩罚官僚主义和滥用职权等腐败

^① 参看《俄共布中央通报》1921 年 7 月 20 日第 31 页。

现象的斗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后来，一些人被开除出党、撤职或受到其他处分，往往是因为发表独立见解或同领导者有不同意见。

此外，当时苏维埃俄国还有另一个监督和检查机关——工农检察院。它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各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的活动，监督各社会团体，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检查苏维埃政府法令和决议的执行情况，等等。工农检察院在工作中依靠广大工人、农民和专家中的积极分子行使监督和检查职能。但是，工农检察院的工作也不尽人意。列宁对这个部的工作评价极低，多次说过该部门毫无威信可言，没有比它办得更糟的部门。

总之，列宁在晚年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对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的工作效果不满意，对国家机关的状况不满意，明确指出：“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 即使不令人厌恶 至少也非常可悲”。^① 因此，列宁建议改组工农检察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首先，列宁主张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组成，“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 75—100 名……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也像一般中央委员一样，应该经过党的资格审查，……他们也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按照列宁的计划，工农检察院应保留 300—400 个职员，他们应该精通业务，经过特别审查。非常可靠，应该享受“很高的薪金”。^② 这些想法同列宁一贯主张的劳动人民参加国家管理的思想是一致的。在选拔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问题上 列宁主张“宁可数量少些 但要质量高些”对准备录用的人员要有几各党员推荐，经过考试和考核，“与其匆忙从事而毫

① 《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4 卷第 784 页。

② 同上，第 781 页。

无希望得到优秀人才，倒不如再过两年甚至三年好些”。^① 列宁还主张把党的监察机关同苏维埃的监察机关合并。在 1923 年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虽然形式上还是两个机关，但实际上已经合并，成为党和苏维埃的联合监察机构。

应当说，列宁的思想是明确的，也是正确的，即在布尔什维克一党执政的情况下，通过设立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使权力得到制衡，通过设立有工农分子参加的、独立的监察机构的办法来防止官吏腐化、堕落，防止新政权机关变成脱离人民的官僚主义机构。

但是在 1923 年 4 月党的十二大上，斯大林没有采纳列宁关于加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建议。大会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规定，中央候补委员可以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中央委员会有权派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中央监察委员会。^② 决议还规定，只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成员才是相当于中央委员一级的工作者。这极大地降低了中央监委的地位并改变了其成员不得兼职的规定。1926 年 11 月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联席全会。会议决定奥尔忠尼启泽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同时兼任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不仅否定了有关中央监委不得兼职的规定，而且实际上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决定。1934 年 1 月 联共（布）十七大决定，将中央监察委员会改名为党的监察委员会并决定派一名中央书记为领导者。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监察委员会的职责是“1. 监督党和党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执行情况；2.

^① 《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4 卷第 786 页。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2 分册第 297—298 页。

审理违反党纪的人 3. 审理违反党的道德的人”。^① 这样 监察委员会已经不再是中央的机构了。1939 年 3 月 联共（布）十八大对党章作了进一步修改，决定把党的监察委员会再次改名为 附属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党的监察委员会。^② 党章明确指出 党的监察委员会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下设机构 规定党的监察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并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1952 年 10 月，联共（布）十九大对党章中关于监察委员会的条款又作了修改，进一步缩小了监委的职权范围，取消了监委监督党和中央委员会决议执行情况的权利，仅保留了监委检查党员遵守党纪的情况并对违反党纪和党的道德的行为追究责任的权力。这样一来，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地位、任务和权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先前监督中央委员会（包括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变为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先前被它监督的对象成了它的上级领导机关。这样，再没有任何机构、任何人可以对政治局、书记处和党的最高领导人进行监督了。

实践表明，列宁原来的设想并未实现。事实上，监察机构的作用如何，不仅取决于条例，而且取决于党内整个民主生活制度，取决于国家政治体制的整个框架。苏联的历史表明，由于执政党内没有正常的民主生活、国家管理体制上实行高度集中和行政命令，对各级权力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权力结构是金字塔式的，责任制度是层层对上负责，公职人员的升迁往往只由一个上级领导决定，只接受领导的监督和考验。公职人员首先具备的是忠心，而且不是对党、对事业、对人民、对国家的忠心，而是对某个或某些领导人的忠心。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4 分册第 402 页。

② 同上，1954 年俄文版第 3 分册第 387 页。

结果 俄共布 作为执政党 虽然自己建立了一套监督机制 但实际上是不受监督的。列宁希望建立起一套少而精、高效率的政权机关，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却是多而滥、低质量的机关。一个不受监督的政权是无法防止官僚主义和腐败的。一个脱离群众的政权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爱戴的。

五、列宁遗嘱

列宁的遗嘱问题曾几度被学术界和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遗嘱”一词通常作为法律术语使用，指一个人在生前或临死前按法律程序或通过有关途径处理身后财产问题或有关事务的嘱托。这里所谓的列宁“遗嘱”当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

所谓“列宁遗嘱”通常指列宁晚年（1922年12月至1923年1月）口授的几篇文章和书信，史称列宁最后的文章和书信，总共有八篇。也有人把列宁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作为“列宁遗嘱”，这是一种狭义上的理解。

1922年12月23日，列宁经医生允许，开始每天从事少量工作，向秘书口授自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他先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此后，他又口授了《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俄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在这些文章和书信中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问题的看法。这是列宁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表达的对他毕生奋斗的伟大理想和事业的希望。

1922 年底至 1923 年初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期呢？首先，革命后立即建成的“战时共产主义”没有取得成功。它在国内战争时期发挥了作用，但是在和平时期，尤其在对内政策方面，没有显出预想的效果。经济上的崩溃局面和群众不满情绪的爆发迫使布尔什维克党紧急转向新经济政策。但是新经济政策刚刚显示出初步成效。大多数人认为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是一种明显的退却，甚至认为是退回到资本主义。第二期待发生的世界革命显然“延迟”并没有发生一连串新的“十月”革命。第三，社会主义胜利的问题已经逐渐演化成两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可能性问题和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归根结底，问题在于俄国能否取得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

列宁在这些文献中批评了孟什维克关于俄国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俄国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没有达到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程度的观点。列宁认为，俄国存在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须的客观条件，也存在主观前提。十月革命的胜利、地主和资本家被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为克服由旧制度继承下来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创造了决定性前提。俄国经济、文化上的落后使俄国革命具有某种特殊性。“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国内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要先于它的经济进步和文化进步”。^① 列宁说“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使俄国各族人民能够“用……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② 来提高生产力。俄国具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无产阶级专政、工农联盟、

① 《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4 卷第 773—774 页。

② 同上第 777 页。

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是足够的一切。”^①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人民面前展示出了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景，巩固了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列宁坚信，苏维埃国家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克服经济技术方面和文化方面的落后，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认为做到这点的保证在于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正确领导。

列宁在谈到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国际意义时，强调指出它同世界革命前程的总前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认为，十月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开端，十月革命给世界各国人民指出了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其他国家早晚都必然要走的道路。”^②

列宁还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同无产阶级的、一般民主的和民族解放的革命进程联系起来，同全世界大多数居民特别迅速地投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什么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③

在最后的文章和书信中，列宁再次重申了建成社会主义同国家工业化的联系，强调在最新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重工业、机器工业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借助于大机器工业才能保证劳动农民转上社会主义道路。大机器工业能够为扩大对农民的经济援助提供条件，为合作社制度建立物质技术基础。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76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38页。

③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796页。

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论述了合作社的重要作用。十月革命前的合作社是资产阶级合作社，十月革命后和新经济政策初期，列宁曾把合作社视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苏维埃政权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原则作了让步，“正是从这一点……产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时做得过头的地方，并不在于我们过分重视自由工商业的原则；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时做得过头的地方，在于我们忘记了合作社，在于我们现在对合作社仍然估计不足”。^① 列宁发现，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正是通过合作社找到了“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此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在向新制度过渡方面，合作社是“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② 列宁认为，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别聪明的办法。“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③ 列宁这时所讲的合作社，主要的是流通领域的合作社。但是列宁又强调指出，在这方面，文化变革、文化革命具有重要意义。列宁所说的文化革命，既包括纯粹文化方面，也包括物质方面，即文化建设所应具备的相当发达的物质基础。只有到那时才能建成社会主义。

此外，在列宁口授的这几篇文章和书信中，苏维埃政权机关建设问题占有重要地位。他在《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两篇文章中提出了完善国家机关的具体措施。

列宁对国家机关的现状非常担忧。他说：“我们的国家机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768—769页。

② 同上第768页。

③ 同上第771页。

关，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①十月革命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为建立和改善国家机关做了大量工作，但是成效甚微。列宁晚年对这项工作的效果非常不满意。他说：“在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方面，我们已经瞎忙了五年，但只不过是瞎忙而已，五年来已经证明这是无用的，徒劳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瞎忙使我们看起来像是在工作，实际上却搅乱了我们的机关和我们的头脑。”^②这种状况如持续下去，必然会威胁到苏维埃政权的存在。所以列宁在晚年特别强调要完善国家机关，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和管理水平，号召他们学会科学地组织劳动和管理，学会在日常实践中运用科学成就的本领。与此同时，列宁指出，改善国家机关、选拔优秀的人才应遵循“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原则。

在列宁晚年口授的这些文章和书信中，我们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党的建设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给代表大会的信》在这些文献中排在最前面，列宁最先口授的是这封信，而且因为党的建设、党的统一是苏维埃政权成败的关键。

当时的政治体制是从夺取政权的秘密斗争时期延续下来的，所以最高领导人的个人素质、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党、国家和社会的前途和命运。为了加强党的稳定性，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主要从工人阶级中选出。列宁认为这样做是必需的，这样可以增加中央委员会集体的作用。他警告说：“如果我们不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779页。

^② 同上第786页。

实行这种改革，我想，一旦事态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而不能寄希望于十分有利这一点上），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①

列宁预感到中央的稳定性会出问题，党内可能会出现分裂，而这种分裂的危险首先来自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即党内两个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多半是由他们的个人特点决定的。为此 12 月 24 日列宁谈了他对这两个主要领导人的看法：“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 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 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②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谈几句。依我看 他们是最杰出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 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

……其次是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但是太热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

① 《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3 卷第 743 页。

② 同上 第 4 卷第 745 页。

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望他的。

当然，我对两人作这样的评语是仅就现时情况来说的，而且还假定这两位杰出而忠诚的工作人员得不到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

这里，列宁对这些党和国家的活动家主要品质的评价，并不像后来那些诠释者所描述的那样，充满强烈的否定色彩。比如，列宁还讲到：“我不打算再评述其他中央委员的个人特点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①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大能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②对这个说明应该作如下理解：不应把这些人的错误看成是阴险预谋的结果，而应视为某些人利益和情绪的反映。可以说，列宁对他们的评价是中肯的，更是充满善意的，是出于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而讲的肺腑之言。

1923年1月4日列宁又对1922年12月24日的信作了补充：“斯大林太粗暴 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 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

① 1917年10月11日及24日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会议通过举行武装起义决议的次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向中央提出一个声明，并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莫斯科区域委员会、芬兰区域委员会以及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写了一封《论时局》的信，申述他们反对立即举行起义的理由。他们的信曾在10月15日及28日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宣读过。但是不论在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还是在10月16日（29日）中央扩大会议上，他们都没有得到支持。但是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加米涅夫于10月18日及31日在半孟什维克报纸《新生活报》上用他们两人的名义发表了反对武装起义的声明。列宁当时非常气愤，曾要求将他们开除出党。

②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745页。

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①

列宁根据切身体会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作出的这个评价，是非常重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充分反映了列宁对党内状况、党的命运的担忧。他认为，这番话若送达代表大会代表，足以撤换过于强硬的总书记。这是列宁提出的组织问题上的建议。他没有强迫代表大会接受自己的建议，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列宁仍然坚持他的民主作风，遵守党的章程，努力通过党的最高机关解决党内最重要的问题。

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对俄共（布）党内的状况了如指掌。他关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可能导致党内分裂的警告是有充分根据的。事实上，当时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争夺在党内的领导权和影响的斗争已经开始。1922年12月21日，列宁让克鲁普斯卡娅记录下他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口授给托洛茨基的一封信。斯大林得知此事后，对克鲁普斯卡娅大发雷霆，打电话粗暴地骂了她，并以投诉监察委员会相威胁。其实，这封信的内容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列宁只是表示对中央全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决定表示满意并打算在代表大会上再提出这个问题，等等。斯大林对信的内容不应该有异议，因为他当时也开始接触这个问题，并且是支持列宁的路线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一 这封信不是给他的 而是给托洛茨基的 第二 这封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746页。

信表明列宁仍然保持着政治积极性，仍在参与党和国家的生活。这对斯大林来说，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危险的。对此只能作这样的解释。他当时暴跳如雷的情况从 1922 年 12 月 23 日克鲁普斯卡娅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信中看得非常清楚。克鲁普斯卡娅写道：“列夫·波里索维奇：由于我记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医生许可口授的一封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极其粗暴无礼。我入党不是一天了。30 年来从未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事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①

从整个情况判断，克鲁普斯卡娅是 1923 年 3 月初把这件事告诉列宁的。他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② 因此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及其补充内容中对斯大林的评价并没有受这件事的影响，即没有私人成见，完全是从党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在此作这个说明也许并非不必要。

列宁在最后的文章和书信中阐述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极其重要的问题，涉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最重要方面。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甚至他关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这种“小事”的观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正是由于没有处理好这件“小事”，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52 卷第 703 页。

② 同上，第 555 页。

六、斯大林体制的形成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本来是写给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但是斯大林等人在这个问题上做了手脚，没有向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介绍列宁信的内容。斯大林把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说成是给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但是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这封重要的信也没有向整个代表大会宣读，而是分代表团进行口头传达，且不是传达全部内容。列宁关于撤换斯大林的观点是明确的，但是在代表大会上却对列宁的话进行了歪曲，似乎列宁是在提出某种建议：如果……有可能撤换……云云。斯大林还辩解说，他的粗暴表现在对敌人粗暴。在斯大林没有在党内确立绝对统治地位之前，这封信对他来说始终是一种威胁。

1927年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再次提到列宁的信。当时决定将列宁的信作为副件收入大会记录。这意味着把这封信作为正式文件并在《列宁文集》中发表。当时正值党内斗争异常激烈的时期，斯大林经过努力只发表了信的前一部分，而且是发表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第30号通报上。这是一个秘密文件，只有少数人能看到。整个信的全文到1956年才由苏共中央决定在1956年《共产党人》杂志第9期上发表。

斯大林隐瞒或篡改了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自己不利的内容，但是在同各种反对派的斗争中却充分利用了列宁对其他人的批评性评语。

正像列宁预料的那样，在他逝世后，两位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这种恶化的起因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对于斯大林来说，对他威胁最大的就是托洛茨基。他同托洛茨基的斗争早在列宁在世时就已经开始。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成了联盟。

在 1924 年 1 月举行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政治局将中央委员托洛茨基、拉狄克、皮达可夫等人列入正式“反对派”和“派别集体”之列，并把这一切匆匆地登载在报纸上（1924 年 1 月 16 日《真理报》）。在 1924 年 1 月 16—18 日即列宁逝世前两天举行的第十三次紧急代表会议上，斯大林作了关于谴责“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报告。会议通过的决议认为“托洛茨基反对派”是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倾向”。

1924 年 1 月 21 日，列宁逝世。此后党内斗争日趋激烈。权力开始向斯大林手中集中。在 1924 年 5 月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党的主要领导人都作了报告，但是没有让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作报告。代表大会还批准了第十三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关于谴责托洛茨基的“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1925 年 1 月，托洛茨基被解除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挫败托洛茨基后，1925 年斯大林又向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发起进攻。不久，“新反对派”领导人相继被撤销领导职务。

1926—1927 年联共（布）党内又出现一个反对派（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托季联盟））主要代表人物有托洛茨基、皮达可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反对派在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国内工业和农业政策问题上同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有意见分歧。1926 年 7 月至 1927 年 10 月，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先后被分别撤销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 年 12 月）

上 托季联盟 75 名骨干分子被开除出党。

托季联盟被粉碎后，党内最有影响的老布尔什维克就只剩下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了。20 年代末期 苏联社会正面临从一个发展阶段向另一个发展阶段的过渡时期。新经济政策已经实行 6 年多时间，它对于恢复经济、活跃城乡交流、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热情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在党的领导人中很多人仍然认为，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富裕阶层力量的扩大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严重的威胁。因此主张停止施行新经济政策。1928 年发生的粮食收购危机使关于新经济政策命运的争论激烈起来。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一派主张采取非常措施收购粮食，而以布哈林为代表的一派则反对采取非常措施，主张继续用新经济政策的方法发展经济。此外，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问题上两派也发生分歧。布哈林等人被指责为“右倾投降主义”，1929 年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被解除在《真理报》的职务。1930 年李可夫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同时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

30 年代大镇压期间，制造了一系列案件，这些当年的反对派均遭到镇压，命丧黄泉。

这里并没有详细介绍各反对派同斯大林在观点上的分歧，因为这些斗争的实质是争夺领导权问题，观点上的分歧只是表面现象 或只是借口而已。例如 在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时曾严厉谴责托洛茨基在工业化方法问题上的立场，批评托洛茨基通过剥削和剥夺农民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的观点，但是斯大林后来的做法比托洛茨基的主张有过之而无不及。

同反对派的一系列斗争导致了以下结果。首先，在党内：
(1) 出现了“一言堂”局面，不能发表不同意见；(2) 在干部问题上，主要的任用标准不是个人品质和能力，而是对上级领导人是

否忠诚；(3)党内已没有正常的民主生活，一党执政变成了一人专政；(4)开创了在党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对待党内同志的先例。在国家管理和经济管理方面：(1)放弃新经济政策，倒退回‘战时共产主义’的管理办法；(2)缺乏有效的民主机制，一人说了算或主要领导人说了算，抑制了广大群众积极性和智慧的发挥；(3)用强制和恐怖手段贯彻上级的命令和指示，尤其在解决1928年粮食收购危机过程中)；(4)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管理体制。

所有这些方面正好构成了斯大林体制的主要特点。苏联依靠这种体制搞了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增强了国家的军事实力，成了唯一能与美国和西方相抗衡的超级大国。这是一种适合于战时和准战时条件的管理体制。作为一种通常条件下运转的体制，它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决策过于集中、不承认市场作用；政治上缺乏民主；权力过分集中和缺乏监督制衡机制导致严重腐败；对科技革命成果反应迟钝，等等。

历史的悲剧在于，斯大林把这种体制看成是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把它意识形态化并推广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使本应生机勃勃、不断发展、不断改革的社会主义运动变成了僵化的、死气沉沉的运动。

在这种体制中，党和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始终没有理顺，以党代政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普遍的规律。列宁晚年曾多次强调要划分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职能，而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党包揽了全部权力，同时也承担了全部责任；同人民形成了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同时也要面对这种关系所必然带来的后果；党没有精力真正加强自身建设，没有能力监督所有的党员，而人民群众又无法切实有效地监督执政党的党员。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成了

一切投机钻营、阳奉阴违、野心家和阴谋家追求的目标。对于这些社会渣滓来说，只有钻进党内才能实现自己的私欲，党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恰恰为他们向上爬提供了条件。这种现象从十月革命胜利时起就已经开始了。

在地下活动时代 参加布尔什维克党是要冒风险的 有时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所以只有那些真正的革命者才参加党。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走出地下状态时只有 2 万多名党员。在 1917 年的革命高潮中，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十月革命前夕已发展到近 35 万人。^① 就是这 35 万布尔什维克发动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内涌入大批新党员。到 1921 年 3 月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时 党员人数约 75 万人。此后多次进行清党，清出大批不合格的党员。应该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战争年代，大多数共产党人起了模范作用。但是由于党内民主生活制度不健全，党员的责任和义务感日益淡薄。因此，到 1991 年苏联发生剧变前夕，苏共党内虽有 1900 万党员，但是在反对派的进攻面前毫无抵抗之力，甚至可以说攻不破。而那些反对派正是来自党内。

所有这些现象的根源，应该从历史中去寻找。本书在这方面只是作一点初步的尝试。

① 参看《苏联共产党历史》（多卷本）1967 年俄文版第 3 卷上册第 243—244 页；关于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党员的数量，另有其他说法，如《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作者伦·夏皮罗所引资料表明，1918 年 1 月 1 日布尔什维克党员人数只有 11.5 万人。

结束语

在苏联的权力结构中，实际上存在一种等级制度，各级权力机关的组成就如同一座金字塔，层层对上负责。下级机关同上级机关的关系只是一种服从关系；人民群众的监督职能，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只不过是一种口号、标签，实际上从来没有有效地实行过。在这座权力金字塔上，处于最上层的部分自然地拥有了无限的权力。人们已经习惯于这种结构、这种政治生活气氛，尽管不是出于自愿的。这种政治体制已经形成一种惯性，依赖于这种惯性向前发展。

历史上形成的这种权力结构拥有权威。表面上看，它是威严的，威严得没有人敢于触动它；表面上看，它也是稳固的，似乎坚不可摧。但是，一座建筑物不管它多么雄伟，多么威严，总要不断进行维护、维修，才能使它坚固如初。政权亦是如此。而维护和保养政权这座建筑的最好方式，就是监督、制衡，最佳的维护和保养人员应当是人民群众。而只有当人民群众把政权看作自己的生命，如同保护眼睛一样来保护它时，这样的政权才能够经得起暴风雨的考验。

苏联后期，人民对于自己的政权机关，对于高度集中的这座

权力大厦，权力金字塔主要是敬畏，人民不敢靠近它，也很难靠近它，甚至当这座大厦、这座金字塔轰然倒下时，人民仍然木然地站在远处 无动于衷。

其实，在苏联后期这座貌似坚固的权力金字塔就如一座倒置的金字塔，只要最关键部位的一块石头发生腐烂和异位，就足以使这个庞然大物土崩瓦解。

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列宁对苏维埃政权的设计不是这样的，他设想让全体人民都来参加国家管理，甚至当他发现人民群众由于文化水平的制约不可能直接进行国家管理时，仍然希望通过吸收更多的工人党员参加俄共（布），吸收工人参加工农检察院来监督手中掌握权力的各种官吏，防止他们变成官僚主义者。但是，列宁并没有勾画出未来政权的详细结构。他对资产阶级政权的形式也是持完全的否定态度的。他要建立一个全新的、摆脱资产阶级民主制弊端的人民政权。但是这个全新的政权的形式，只能通过实践来摸索，在实践中形成。

历史的发展表明，苏联政权建设并没有完全按照列宁的思路发展。历史的、传统的、文化的、个人的、社会心理方面诸因素合力运作的结果使苏联形成了所谓斯大林式的体制。了解这一体制形成，发展和崩溃的过程，对于我们认识苏联解体的原因无疑是有帮助的。

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央编译局学术前辈和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李兴耕、郑异凡和李宗禹三位研究员为本书的写作和修改提出许多宝贵意见；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得到中央编译局科研出版基金的资助，在此谨表由衷的谢意。

主要参考书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 版；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
3.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
4. 《列宁选集》中文第 3 版。

※ ※ ※

尼·伊·布哈林著

《布哈林文选》(上、中、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北京 1983 年版；

尼·伊·布哈林 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

《共产主义 ABC》三联书店 1982 年版；

米·波克罗夫斯基著

《俄国历史概要》三联书店 1978 年版；

陈启能主编

(《苏联大清洗内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

陈之骅主编

- 《苏联史纲 1917 - 1937》上下册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罗·卢森堡著
《卢森堡文选》(上、下卷) 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罗·亚·麦德维杰夫著
《让历史来审判》(上、下册) 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列·托洛茨基著
(不断革命) 三联书店 1966 年版；
(论列宁) 三联书店 1980 年版；
康·米·西蒙诺夫著
《我们这一代人的见证》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版；
伦纳德·夏皮罗著
《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 东方出版社 1991 年版；
郑异凡著
《布哈林论稿》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 年版；
(天鹅之歌)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 《工人反对派》 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列宁论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人民出
版社 1978 年版；
《“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文选》 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版；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 人
民出版社 1956 年、1964 年版第 1 分册 第 2 分册 第 3 分册；
(苏联共产党历史)(多卷本 第 1 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苏联共产党历史》(多卷本 第 2 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 ※

Л. Алексеева

История инакомыслия в СССР. Вильнюс – Москва, 1992.

Б. Буранов, В. Хрусталеv

Гибель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дома. М., Прогресс, 1992 г. .

Ю. А. Буранов

К истории ленинско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завещания».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91, No. 4.

Н. Ф. Бугай

Чрезвычайные орган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М., 《Наука》,
1990.

Р. Ю. Виппер, И. П. Реверсов, А. С. Трачевский

История нового времени. М.,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5 .

М. Геллер, А. Некрач

Утопия у власти.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 1917 года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М., 1995.

Е. Г. Гимпельсон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М.,
《Наука》, 1995.

Г. Иоффе

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 Ленин, Керенский, Корнилов. М.,
《Наука》, 1995.

Корниловский путч и раскол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91, №. 8.

С. М. Киров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и речи (1924—1934). М., Партиздат ЦК ВКП(б), 1937.

Г. М.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

Десять лет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1917—1927 гг.). М., 1928 г. .

В. А. Кувшинов

Программа партии кадетов.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91, №. 8.

Б. В. Леванов

Праграммные принципы партии социалистов –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91, №. 6.

М. Н.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 –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1907 гг. . М., РОССПЭН, 1997.

В. В. Леонтович

История либерал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1762—1914. М., 1995.

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и М. Н. Покровский

Семь лет пролетарской диктатуры. М., “Московский путь”, 1925.

Роберт Слассер

Сталин в 1917 году. М., Прогресс, 1989.

А. Рубцов, А. Разумо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завещание В. И. Ленина. М., 1989.

М. Ферро

Николай II, М., 1991.

О. В. Хлевнюк

Политбюро. механиз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 в 1930 - е годы. М. РОССПЭН, 1996.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ереписка. 1921—1927. М., РОССПЭН, 1996..

Второй съезд РСДРП. июль - август 1903 года. Протоколы и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тчеты съездов и конференци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59.

Десятый съезд РКП (б); март 1921 год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63.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 3, кн. 1,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7.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 3, кн. 2,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8.

Истор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России.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94.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1917—1991, М., Терра, 1997.

Кто избирали секретарями ЦК партии в 1917—1922 гг. .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No. 8.

К истории опубликования статьи В. И. Ленина «Как нам реорганизовать Рабкин».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No. 11.

К вопросу об отношении В. И. Ленина к И. В. Сталину в последний период жизни Владимира Ильича.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9.

Либер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 М., Агентство «Знак» 1993.

Меньшевики.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3—февраль 1917 гг.). М., РОССПЭН, 1996.

Нэп. 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и потери. М., «Наука», 1994.

О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м «антисоветском правотроцкистском блоке».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1.

О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м «антисоветском объединенном троцкистско — зиновьевском центре».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8.

О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й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децист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апронова, Т. В. и Смирнова, В. М.».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91, № 7;

Один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КП(б). март — апрель 1922 год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61.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 —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1907 гг.). т. 1, М., РОССПЭН, 1996.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В 2 томах. М., 1995.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в партиях и лицах. М., Терра, 1993.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в партиях и лицах. М., Терра, 1994.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ередины XIX в. — 1917 г., Изд. МГУ, 1992.

Программ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России. конец XIX – начало XX вв. . М. , РОССПЭН, 1995.

Седьмая (“ апрельская ”)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и Петроградская общегород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СДРП (б). М. , Партий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34.

Третий очередно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социал –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чей партии, 1905 года. Полный текст протоколов. . . М. , Гос. изд. , 1924.

Финансовое оздоровление экономики: опыт нэп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90.

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й механизм периода н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20 – х годов). М. , 1990.

前 言

20 世纪即将结束。回首走过的一百年，恐怕无人否认，本世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最重大的两个事件是 1917 年的十月革命和 1991 年苏联的解体。

十月革命影响了整个 20 世纪。它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了社会主义实践的先河，并导致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1989 年秋冬东欧 8 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剧变；1991 年 12 月，曾经显赫一时的超级大国之一——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苏联突然解体，苏东集团土崩瓦解。

苏联的突然解体令全世界震惊，甚至连西方消息最灵通的人士或集团对此也始料不及。苏联解体对世界的影响绝不会亚于十月革命，它将影响到下一个世纪。苏联的解体改变了世界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格局，使相当一部分人的观念发生变化。旧的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格局和价值结构被打乱以后，世界将追求建立新的格局和结构，寻求新的平衡。这是一场利益重新分割和重新组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东西南北、四面八方都在利用世界格局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为自己在未来的世界中寻求一个有利的空间。不管这一过程持续的时间多么长久，斗

争多么激烈，结果究竟如何，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一过程是从苏联解体开始的。

与此同时，人们开始认真总结苏联发生剧变乃至解体的原因，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试图找到满意的答案，从中悟出一些有益的启发。本书不谋求对苏联剧变的原因作全面的分析和探讨，更不追求最后真理，而是试图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俄国为背景，通过分析俄国各政党产生的历史条件、纲领、策略，通过对各政党进行分析和比较，揭示布尔什维克党诞生、发展和成功的历程以及布尔什维克一党制的确立和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的形成过程，从一个侧面考察苏联模式的形成及其特点。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应该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在以垄断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必然是集权政治。

此外，一个新的政权、新的体制、新的社会不会是凭空产生的，它们无疑是在旧政权、旧体制、旧社会的基础之上产生的。不管新旧政权的更替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是改良方式还是革命方式，新政权，新体制和新社会都必然带有旧时代的痕迹。

因此，要认识解体前的苏联和苏联的体制，必须了解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了解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受此制约的居民社会心理特点。

俄罗斯拥有横跨欧亚大陆的广袤国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拥有众多的民族，文化差异颇大。博大的生存空间孕育了俄罗斯人豪爽、粗犷的性格，以多神教为基础的东正教培育了俄罗斯人崇拜偶像、崇拜权威的心理，古老的村社制度造就了俄罗斯人推崇平均主义、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意识。在专制制度的俄国，沙皇拥有绝对权威和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直至 19 世纪

中叶，当欧洲资本主义已经相当发达时，俄国才刚刚开始进行农奴制改革。

1861 年改革后，西方资本主义开始对俄罗斯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道路不同于在欧洲其他国家。俄国资本主义没有像欧洲资本主义那样发展。资本主义在俄国几乎越过自由竞争阶段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一下子发展到垄断阶段。垄断资产阶级同专制制度、王公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借助专制政府的保护和提供的特惠，靠剥削本国廉价劳动力维护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没有沙皇政府的照顾，资产阶级经不住同外国资本的竞争。

由于没有经过自由竞争发展阶段，俄国不存在人数众多的私有者阶级，因此没有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基础。垄断资产阶级同专制制度有矛盾，但他们只是希望得到更多的特权，更少的限制，他们并不想彻底摧毁专制制度。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在俄国遇到巨大的反对力量。君主派反对触动专制制度，认为民主是西方世界产生的最大邪恶；他们反对工业现代化政策，反对触动土地私有制。资产阶级对西方资本主义、尤其对资本主义民主制的支持是有条件的。自认为代表农民利益的民粹派也坚决反对资本主义。他们看到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自身矛盾和腐朽性，试图探索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他们的目标是，利用俄国村社的平均主义传统和组织，没有痛苦地过渡到农民社会主义，以避免“资产阶级化”的惨剧。因此，从民粹派发展而来的社会革命党也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已经成为事实。但是，垄断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前提，是社会主义的入口，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是反对资本主义的，而且随时准备摧毁专制制度，组织社会主义的人民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的